

二〇二五年六月一日王怡牧师公共神学分享会纪念文集



看得見的山之城

王怡 著



出版



秋雨圣工
EARLY RAIN MINISTRIES



王怡文库
WANYI RESOURCE LIBRARY



王怡文库
Youtube Channel



看得見的山之城

王怡 著

紀念文集
公共神學

二〇二五年六月一日王怡牧师公共神学分享会纪念文集

目 CONTENTS 录

| 代 序

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 1

| 2005

与神亲嘴：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讲座） 9

| 2006

你见过死亡的颜色吗（访谈） 43

| 2007

同性恋的罪与权利（书信） 64

| 2008

对成都宗教局和警方冲击秋雨之福教会的声明（文件） 91

从改革宗神学看政教关系与灾后重建（讲座） 104

基督教对政体与公共社会的影响（随笔） 126

| 2009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影评） 140

家庭教会的传统和公开化异象（论文） 146

| 2010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论文） 175

| 2011

家庭是最重要的 NGO（牧函） 198

成立“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的公告”（文件） 202

基督徒社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访谈） 209

| 2012

我的异性交往界限（牧函） 264

| 2013

重要的少数：长老会在中国的角色（牧函） 269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证道） 274

| 2014

梦与真相：社会篇（证道） 298

基督教春联（诗歌） 329

| 2015

无伪之信（证道）	336
以恩慈相待（证道）	356
为什么反对“同性婚姻”（随笔）	367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诗歌）	378

| 2016

王明道在 1955（随笔）	385
电影里的人生和信仰（讲座）	392

| 2017

何时反抗？何时顺服？（证道）	422
社交媒体的第一个试探（牧函）	445
社交媒体的第二个试探（牧函）	454
十字架与文化使命（证道）	463
保守主义与文化使命（证道）	478
末世论与文化使命（证道）	489
在巴比伦上小学（学堂证道）	504
十字架和垃圾场（牧函）	520

进入白宫的路德（随笔） 526

政教冲突的属灵益处（牧函） 536

历史是大写的基督（证道） 543

宗教改革与中国文化的挑战（讲座） 558

| 2018

我对时局和教会使命的三个意见（论文） 602

关于成都 5.12 教案的声明（文件） 609

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文件） 614

为中国作起哀歌（灵修） 637

2018 年——宗教战争沉思录（论文） 643

作一个职场圣徒（证道） 658

| 编后语

..... 683

| 代序

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

根据圣经的教导和福音的使命，我尊重上帝在中国设立的掌权者。因为废王、立王，都在于上帝。为此，我顺服上帝对中国历史和制度的安排。

作为基督教会的一位牧师，我从圣经出发，对社会、政治、法律诸领域，何为公义的秩序和良善的治理，皆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同时，我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剥夺人类的信仰和良心自由的罪恶，充满厌恶和痛恨。但是，一切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变，都不是我蒙召的使命，也不是福音被赐给上帝百姓的目的。

因为，一切现实的丑陋、政治的不义和法律的专断，都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的、唯一的拯救。也显明了真正的盼望和完美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于地上的任何制度和文化的改变中，而单单在于人的罪恶如何被基督白白赦免，得着永生的盼望。

作为一位牧师，我对福音的笃信和对众人的教导，及对一切罪恶的责备，都出于基督在福音里的命令，出于那位荣耀君王的无法测度的爱。每个人的生命都如此短暂，而上帝如此迫切地命令教会，去带领和呼召任何愿意悔改的人向他悔改。基督如此迫切的、乐意赦免一切从罪恶中回转的人。这是教会在中国的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向世界见证基督，向中国见证天国，向属地的短暂生活见证属天的永恒生活。这也是我本人所蒙的牧职呼召。

为此，我接受和尊重中共政权是上帝所允许的暂时的统治者，如同主的仆人约翰·加尔文所说，邪恶的统治者上帝对邪恶的人民的惩罚，目的是催逼上帝的百姓向他悔改。为此，我乐意在身体上服从他们的执法行为，如同服从主的管教和训练。

我同时相信，中共政权对教会的逼迫是极其邪恶的犯罪行为。作为基督教会的牧师，我必须对这样的

罪恶发出严厉的和公开的责备。我所蒙的呼召，也要求我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和平和忍耐中，去违背那些违背了圣经和上帝的一切人间法律。我的救主基督也要求我，喜乐地承受违背恶法的一切代价。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个人和教会的抗命行为，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维权行为或公民不服从的政治行动。因为我完全无意于去改变中国的任何制度和法律。作为牧师，我唯一关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带来的对罪恶人性的震动，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

作为一位牧师，我的抗命行为是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基督的大使命要求我们对世界的大抗命。抗命的目的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见证另一个世界。

因为教会的使命，仅仅是成为教会，而不成为任何世俗体制的一部分。从消极的角度说，教会必须将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避免让自己被这个世界体制化。从积极的角度说，教会的一切行动，都是努力向这个世界，证明另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圣经教导我们，在关乎福音和人类良心的事务上，只能顺从神，不能顺从人。因此，信仰上的抗命和肉体上的忍耐，都是我们见证另一个永恒世界和另一位荣耀君王的方式。

这是为什么，我对改变中国的任何政治和法律制

度并不感兴趣，甚至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的政策何时会改变也不感兴趣。无论我活在现在或将来的任何政权之下，只要世俗政府继续迫害教会，戕害唯独属于上帝的人类良心，我就将继续信仰上的抗命。因为上帝赋予我的全部使命，是藉着我的一切行动，好叫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人类和社会的盼望，仅仅在于基督的救赎，在于上帝超自然的恩典掌权。

如果上帝决定藉着中共政权对教会的迫害，来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对前途绝望，带领他们经历信仰的幻灭与荒漠，从而认识耶稣，并不断熬炼和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我十分乐意顺服上帝的安排，因为他的安排总是慈爱而美善的。

正因为我的一切言行，并不寻求和期待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任何改变；我对一切社会政治的权势，也不再存畏惧之心。因为圣经教导说，上帝设立政府的权柄，是叫作恶的人惧怕，不是叫行善的人惧怕。信耶稣的人，并没有作恶，也就不应惧怕黑暗的权势。尽管我是常常软弱的，但我笃信这是福音的应许，是我殚精竭虑，要在中国社会传扬的好消息。

我也明白，这恰恰也是中共政权对一个不再惧怕它的教会充满了惧怕的原因。

如果我被关押或长或短的时间，能够帮助掌权者减少他们对我的信仰和我的救主的惧怕，我十分乐意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但我知道，唯有当我对一切迫害教会的罪恶说不、并以和平的方式抗命时，我才能真正帮助掌权者和执法者的灵魂。我渴望上帝使用我，以失去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告诉那些让我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有一种比他们的权柄更高的权柄存在，也有一种无法被他们关押的自由，充满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教会。

无论这个政权对我加以怎样的罪名，泼以怎样的脏水，只要这罪名指向我的信仰、写作、言论和传教行为，那不过都是魔鬼的谎言和试探。我将一概予以否认，服刑而不服法，伏法而不认罪。

并且我必须指出，对主的教会和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中国人的迫害，才是中国社会最邪恶、最可怕的罪恶。这不但是对基督徒的犯罪，也是对一切非基督徒的犯罪。因为政府粗暴而残酷地威胁他们、阻拦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世上没有比这更罪大恶极的事了。

如果有一天，这个政权被上帝亲自颠覆了。不会有其他原因，必然出于上帝对这一罪恶的公义的刑罚和报复。因为在地上，从来只有千年的教会，没有千年的政权。只有永远的信仰，没有永远的权势。

关押我的人，终将被天使关押。审问我的人，终将被基督审问。想到这一点，主使我对那些企图和正在关押我的人，不能不充满同情和悲伤。求主使用我，赐我忍耐和智慧，好将福音带给他们。

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里复活，这些世上却无人能做到。

既然如此，尊敬的官长们，停止作恶吧，这并不是为我的益处，而是为你们和你们子孙的益处。我苦苦地劝你们住手，因为你们何必为我这样一个卑微的罪人，而情愿付上永远沉沦地狱的代价呢？

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为罪人而死，为我们而复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我的君王和整个世界的主。我是他的仆人，为此被羁押。我将温柔地去反抗一切反抗上帝的人，我将喜乐地不服从任何不服从上帝的法律。

我坚信，圣经没有赋予任何政府部门管理教会和干预基督徒信仰的权柄。因此，圣经要求我，以和平的方式，在温柔的反抗和积极的忍耐中，充满喜乐地，去抵制一切迫害教会和干预基督徒信仰的行政和司法措施。

我坚信，这是一种信仰上的抗命行动。在迫害教会和抵挡福音的现代极权国家中，信仰上的抗命是福音运动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我坚信，信仰上的抗命是一种末世性的行动，是在短暂的罪恶之城，对永恒的上帝之城的见证。抗命的基督徒，以十字架的道路和方式，效法那位曾钉十字架的基督。和平的抗命，是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避免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方式。

我坚信，圣经要求我，在实践这一信仰上的抗命时，必须倚靠基督的恩典和复活的力量，遵循两个不可逾越的底线。

第一是内心的底线，对灵魂的爱，而不是对肉体的恨，是信仰上的抗命的动机。对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对环境的改变，是信仰上的抗命的目标。在任何时候，如果外在的逼迫和暴力，夺走了我的和平和忍耐，使我内心对那些逼迫教会和欺辱基督徒的人，生出了怨恨和苦毒，这一信仰上的抗命就失败了。

第二是行为的底线。福音要求信仰上的抗命必须是非暴力的。福音的奥秘是以积极的受苦，来替代身体的反抗，并甘愿承受不义的刑罚。和平的抗命，是爱与饶恕的结果。十字架意味着在不必受苦的地方情

愿受苦。因为基督拥有无限的反抗能力，却忍受了一切羞辱和伤害。基督反抗这个反抗他的世界的方式，就是在十字架上，向一个将他钉死的世界，伸出和平的橄榄枝。

我坚信，基督呼召我，在这个抵挡福音和迫害教会的政权下，以一生的服侍，来实践这信仰上的抗命。这是我传福音的方式，也是我所传福音的奥秘。

主仆王怡

2018年9月21日初稿，10月4日修订，被羁押48小时后由教会发布

2019年12月8日，秋雨圣约教会教案一周年时由秋雨圣约教会发布

| 2005

与神亲嘴： 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新教来华二百年

2007 是新教来华 200 周年，从马礼逊 19 世纪初(1807 年)进入澳门，到整本圣经翻译出来是 19 世纪 20—40 年代，开始从文化上产生影响力。这大致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专制主义中追求民主化转型的历史是同步的。以前主流知识界对来华的传教士有一个误解和诋毁，就是跟鸦片战争以来一个所谓的帝国主义情结有关系。这个关系我不讨论，但在以前被提得比较多。不过，新教来华，或说福音进中华的整个历程，跟中国社

会寻求民主自由，在专制权力之下痛苦挣扎，寻求一个平等和文明的政治与社会共同体的历程，的确是大致同步的。这两个历程之间的交接、影响和关系，可能在以前就谈得比较少了。我前段时间开始思考中国的基督化和自由化这样一个福音与文化的关联时，特别默想诗篇的第二章：一个“与神亲嘴”的概念：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 2:12）

列王记中也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

箴言书中说，“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23:26）。每个基督徒的个人生命，有一个从悖逆亲嘴，到与神亲嘴的关系的恢复。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整全性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当终于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人世上没有乌托邦，若有基督就不用来了。但基督徒重生之后，被留在这个世间，却有责任透过生命的见证和社会关怀，叫人间朝着一个满有神的爱与公义的社会，一个“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 5: 24）的社会更新。整个族群也应当有一个与神亲嘴的关系，而不应该永远是一个与巴力，与一切偶像亲嘴的制度。

诗篇第二章说：“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

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这一章表明神与大卫家的立约，也预表了基督要来作万王之王。基督的国度不在这世上，基督的教会不依靠任何世俗权柄去扩展神的国度。但这世上的一切权柄都来自于神，世上的君王和审判官，都应当降服和顺从爱与公义之下，“当以嘴亲子”，接受教导，心存畏惧。这是我们在尘世中思考世俗国家的分权制衡的一个起点。

“三自”和登记问题

上午快结束时，谈到三自。我非常同意吴弟兄的看法：三自不是教会，而是一个捆绑教会的政治机构。晓斌也说到，今天注册在三自爱国会下的信众，公开数目有 1500 多万，其实可能有二、三千万。那这两三千万是不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想普通信徒中的绝大多数当然是我的主内肢体，丁光训就一定不是。三自的这几千万信众，当他们组成地方教会时，在整体上是被某种政治权力捆绑着的。但我们退一步看，我们何尝没有被政治制度捆绑呢？“三自”和“基协”是共产党捆绑基督教会的两个专门机构。但今天整个共产党政权，它所有的机构，实质上都是捆绑基督教的，都在剥夺和削减着我们信仰的自由。我们活在整个体制之下默默无声，他们也活在三自的体制之下默默无声。这两者当然有本质分别，就是唯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内的一切权柄唯独从他而来。真的教会必须以不惜玉石俱焚的心志，去拒绝世俗权力对教会事务的介入和干预。这个根本分别，就是我们今天继续拒绝三自路线、领受

家庭教会传统的原因。

但在另一方面，三自下的信众没有使神的名得荣耀，我们难道就使神的名得着荣耀了吗？他们将信仰臣服在三自机构和宗教局的权势之下，我们又何尝不是臣服在整个无神论国家的机构与权势之下呢。我们带着各样的罪来到教会，谁有资格拿起那块石头？

有三种所谓的“登记”，第一是教会作为社会团体、作为一个 NGO 法人在民政部门的登记。这个登记是公民的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但目前没有，中共看起来也不打算不给我们。从长远来看，教会要去争取这个登记，争取这个登记就是争取宗教自由。第二是宗教局对所谓“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这是对教会的一种歧视性的和审查性的登记。如果政治局开茶话会不需要登记，同学会搞活动不需要登记，我们也就不需要去登记。但目前，政府也没有打算让家庭教会去登记“宗教活动场所”。第三是所谓在“三自”的登记。意思是说，共产党的政策仍然是一种宗教只准有一个机构，一个地方只准有一家教会。所有教会都必须先加入这个唯一的“三自”会，才能被政府当作是“合法”的。但这是对宪法第 35 条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公然的侵害。一个是和我们的信仰违背，一个也和中国的宪法违背。所以我们只能有一个态度，就是坚决反对。

总的来说，当“登记”不是一种简单的备案程序，而是一种对信仰的审查时；当登记与否仍然是共产党决定镇压和逼迫

一部分神的子民的判断标准时，我的信仰，使我坚决不能顺服和接受政府的登记制度。因为传福音的权柄和使命是来自基督的，不来自政府的同意。但反过来也有一点很重要，没有在“三自”登记，并不意味着家庭教会就因此被分别为圣了。我想这是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家庭教会在内，也包括三自会下的信众在内，中国的教会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撒旦权势的捆绑，能够自由地去传播福音？我们如何帮助“三自”会下的信众，也帮助我们自己出埃及后，再进迦南？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得到一个信心，就是这世上并非都是埃及。这就有一个中国的福音化、基督化跟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关系。或者说那些追求或关注民主自由和宪政转型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需要来探索，在一个无神论的、专制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政权中，基督徒的政治观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如何处理福音的自由传播与国家政治制度更新的关系，以及我们与各种致力于推动中国自由化、民主化的非基督徒群体的关系？

总之，就是我们既不是分离主义的基要派，把社会政治的领域拱手让给撒旦，但也不是“社会福音”派，在倡导基督徒的社会参与时，逐渐偏离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唯一根基。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想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教义的方向，改革宗信仰有一个伟大的和平衡的传统，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和领受。另一个是历史的方向，就是对新教来华这两百年的回顾和学习。

福音与文化

首先可以从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的变迁，来看这两百年福音和文化的消长关系。其实在天主教利马窦等人来华的初期，传教士影响社会主流的起点当初是非常高的。包括徐光启、李之藻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李之藻也是高官。基督徒影响社会思潮的起点很高，也影响到了顺治和康熙。不过如果看唐代的景教，它的起点更高，是皇帝主动邀请传教士，而且宰相在城门口亲自迎接。所以基督教来华的历史，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起点越高的，失败得越快。从唐代到元代，从明朝到清朝，起点一次比一次低，马礼逊来华的起点最低，不但没有人迎接，偷偷进来还怕抓住杀头。结果上帝的心意，反而就是起点最低的这一次。

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对福音的社会思潮的抵挡。后来，有学者经常谈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有世俗的自由主义倾向，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同情的立场，甚至是有过多的赞扬，认为像易经、像老子、有很多和基督精神相似的地方。对文化的态度，他和早期天主教的传教士比较接近，就是从补儒、合儒到超儒。当然这也有他宣教路线的考虑。第二点，李提摩太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一个很强的同情态度在里面。他跟康、梁都有过联系，在戊戌变法之前，据说梁启超曾做过他的私人秘书。我们再往下看到辛亥之后，基督徒影响革命的比重也相当高，

竟然一个二千年的古中国，革命之后，从孙文到蒋介石，两个总统都是基督徒。广东革命政府的官员里，基督徒的比例竟然高达 40%，而当时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一。结果到新文化运动之后，这时基督教在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反而有一个下降的趋势，或者说被所谓本色化的压力被捆绑了。这之后将近一百年间，福音在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影响到徐光启，或是影响到康、梁这样的中国主流文化人物的阶段。

在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知识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由于《圣经》的广泛传播，经典的“和合本”与新文化运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把它作为文化读物来看待。当基督教被“非基督教化”，或者说基督被“非基督化”之后，基督教思想在文化上还是产生了一些次要的影响，有很多文学家、作家或者诗人，从《圣经》的语言上、文化上受到的影响还是有的。非基运动之前，我们看到像陈独秀、周作人他们对基督教都有一定的了解跟接触。陈独秀有篇很有名的《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他把基督的神格去掉了，说要“提取基督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来作为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更新的作用。多数知识分子也提过大致相似的观念，就是要以基督教的精神来救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弊端。这是一种把基督降为革命家、把人抬高为神的另一种“非基”运动，使基督精神被主流的人文主义所扭曲了。这种被扭曲的“基督教精神”，对 20 世纪的共产主

义革命也产生过文化上的影响。老诗人流沙河曾对我说，他年轻时进步青年们写诗，引用圣经是很时髦的，其中最常被引用的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用来激发和颂扬革命烈士的牺牲。再如基督徒作家冰心谈爱的散文，我们发现很多都是直接从圣经尤其是从诗篇中翻版过来的。但当信仰的磐石被去掉之后，这种“爱”变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没有来源的爱。这种爱的宣扬在中国现代史上，连独裁者的一个喷嚏都抵挡不住。事实上在残酷的 20 世纪，也就没有在中国的主流思想界和社会政治领域留下什么。在二十年代整个非基运动中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主流知识分子都站在“非基”、也就是反对基督教的一边。只有极少数人（周作人、晚年梁启超），公开反对“非基”运动，主张宗教自由。而极少数主流文化中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那样一种时代的哲学和政治氛围下，也是“悄悄地作门徒”，譬如作家老舍、教育家陶行知等都是基督徒，却几乎没有人知道。

于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追求，就在思想的启蒙上，更多地受到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而几乎没有受到基督信仰的更新。福音化和民主化虽然历程上重叠了，实际上一直貌合神离。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中国人，背对上帝，努力建造着自己的巴别塔，一百年了，仍然徒然劳力。而基督徒和教会，也不大关心中国人的政治苦难，对中国人渴望改变专制制度这样一个“两千年

来未有之大变局”，严重地缺乏同情之理解，和属灵上的支持。我们的神把中国两千年专制体制的崩溃和转变，和福音进入中国的契机，奇妙地放在了同一个时代。难道只是为了让两种历程彼此割裂、彼此对立吗。一百年来，知识分子们也在两种自以为是的价值下去追求中国人的自由民主。一种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政治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偶像崇拜运动，也许也是撒旦在人心中和历史上掌权的一次最空前的尝试。但这一尝试的地点在哪里，神对撒旦得胜的工场就在哪里。另一种就是最多推演到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的概念。人们把它作为一个普世的价值框架和价值常识接纳下来，但却认为基督信仰是过时了，只要把“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作为在来源上被抽空的、或者在来源上仅仅依靠人类理性的一个超验价值接受了下来。以此来与共产主义的专制主义对抗。也和民族主义（这是另一个政治上的偶像崇拜运动，直到1973年福音派的《芝加哥宣言》，基督徒才第一次提出对“民族国家”这一近代偶像的批判，呼吁福音派要“反对对民族国家的宗教化的忠诚”）——去对抗。

一百年以来，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基本上就处在这样两种思想观念的对峙中。我们看到一个尖锐的事实：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世界观以及中国的基督徒们，基本上没有在中国这一百年的政治转变和文化嬗变的民主化历程中，发挥一个明显的作用。不管是观念上的、属灵上的还是个人生命上的。这一百年来，福音部分地自外于这个世界。中国的基

督徒或许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但中国的基督徒也离弃了这个世界。而且一旦离弃后，等到中国出现了人类史上最专制的强权，也就只好效法了，最后教会就被拆毁。就像倪柝声弟兄，在创办三自爱国教会初期，曾那么坚定地反对“三自”，后来很快也妥协了，说教会是个杯子，国家是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里面，所以我们要爱国，要爱这个盘子，所以应该加入三自。教会就算要妥协，至少也应该比知识分子们的妥协慢上一点。如果教会的妥协甚至比外邦人的妥协都还要快一拍，那就不是基督的教会了，是淫妇而不是新妇。

尽管教会内部也出现了一批在政治苦难中持守信仰的圣徒，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中国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但教会至今为止，对 49 年以后的各种政治灾难，仍只是从教会和信徒的角度称之为“大逼迫”，好像共产党只是专门逼迫了基督徒似的。几千万中国人在一种独裁政治中被扼杀、被饿死、被羞辱，基督徒并非是其中受害最深的一个人群，更不是在这一百年中为受难人群提供了最大安慰和帮助的人群。我总是觉得，中国教会对基督教在文革中的命运的反思，仍然是较为狭隘的和缺乏怜悯精神与国度眼光的。事实上到今天为止，福音尚没有更深地进入中华，进入中国社会，没有在中国被传播到地极，尤其是一个非空间意义上的“地极”。当上亿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非正常地死于枪火和政治压迫时，基督徒没有成为这个国家中最爱他们的人，基督徒没有为他们提供其他人群所不能提供的属天的祝福、爱和宽恕。福音在中华，尚未以自己的样式

和他们站得最近，在对苦难和罪孽的共同的担当和反省之中去传福音。这是基督徒对神对人的亏欠。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族群中，我们却亏欠了这个时代。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也是一个世俗的和人文主义的启蒙。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在国内思想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一个主流的思潮。大部分反对政治专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处在这样一个思潮中。这一思潮往何处去，神对中国的计划我们不清楚也不敢论断，但直到两百年后，我们可能在历史中看见的一个启发，就是如果没有中国的福音化，中国的民主化就不能摆脱建造巴别塔的梦魇。而没有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教会也不可能独自战胜来自政治权力的试探和压迫，对受难与殉道的某种高举，甚至会加深这种来自撒但的试探，拆毁的命运也会一再发生。

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变化，89 屠杀是福音从乡村教会走向城市，开始在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中传播的一个重要起点。到九十年代中期，“文化基督徒”成为一个主流知识界的讨论话题。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步同情和接纳基督教的信念或价值，有少数人认信，大部分没有认信。其中大部分人也不参加正常的教会生活。这种在九十年代中期被称为“cc”也就是文化基督徒的现象。我们今天回头来看，从信仰上说，所谓“文化基督徒”就是既没有在基督里的生命，也不要教会传承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在个人的意义上认信基督，或在思想观念的

层面上接纳基督教神学，但他们大多数人的骄傲和对理性的崇拜没有完全放下，没有一个从悔改认罪开始、并与圣徒同国的重生得救。

但我常觉得，神的工作是奇妙的，他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预备。近一百年来，近三十年来，教会在中国的乡村养成了经过试炼的生命传统。教会的事工，与关注和改革社会政治苦难的力量之间“道不同不相与谋”，或者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不同的宣教路线，其实都有神的美意在。我试图批判性的描述这些现实，并不意味着我缺乏对这一切的感恩，更不意味着这些情况溢出了神在中国掌权的计划。因为一切的错误都被神使用，但一切的错误仍然是我们的错误。我个人认信、但尚未受洗的时候，总在反复思想中国人的苦难，总会提一个问题，上帝到底有没有在如此苦难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掌权？当我跪下去，受洗成为基督徒时，我不但确信我个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被他的宝血所救赎，我也确信上帝在历史中一直掌权，感谢上帝赐给我强大的信心。历史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历史和时间都是神的器皿。生命在历史之上，神发誓要给我们的，在历史当中，又超越历史。历史若有目的，只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的完成。历史的一切，中国所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基督徒的个人生活，“在神都没有惊奇”。

九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基督徒现象，是利马窦、李提摩太之

后一百年来，第一次使得基督教的信仰和精神开始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和知识界，促使了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和公众抱着程度不一的同情态度，去接纳或思考。换句话说，基督教在中国重新具有了话题性。这一变化我觉得是有文化基督徒的一个被神所使用的美妙贡献。的确是在九十年代，部分地因为刘小枫先生等这一群文化基督徒的作为，当然更主要的是海外华人教会一批知识分子传道人像唐崇荣、赵天恩、远志明、张伯笠、陈佐人他们，还有范学德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一批在共产党体制下从无神论者成为基督徒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带出了这样一个效果。这是神在他的计划中所兴起的器皿。

然后这些年我们看到，从文化基督徒再往前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人士，这些文化上的精英阶层成为基督徒，他们既有个人的认信，也谦卑下来，在教会生活中去学习顺服上帝的话语。他们在逐步兴起的城市教会中被牧养，有可能把福音更深地带入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基督的真道在文化上、艺术上、社会上乃至政治上开始被传扬。也使基督徒的平安和喜乐实在不是偷着乐，而是充满了一条又一条的大街，让所有外邦人都知道在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时代，还有一个如此喜乐和丰盛的群体，而且就在你的隔壁。这是我所看到的异象，就是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家庭教会的地下状态或者叫江湖状态，将逐步被打破，家庭教会逐步的社会化、公开化，去改变一般民众和主流社会空间长久以来被专制体制隔绝在福音之外的局面。

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大批出现，导致国内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潮与之相应的，在最近几年也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分化。我仅以“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为例，我想从这个角度已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无神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持一种世俗的、以个人主体性为起点的自由主义。他们不把上帝、或从最低限度来讲不把一种超验的、在自己之外的价值和秩序的源泉，放置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世俗的价值观念之上。那么我称他们是世俗的自由主义者。仅以个人主义为起点，完成了对自由价值的论证。我想到今天为止，这仍是国内自由主义的一个主流，如朱学勤、徐友渔等先生为代表。但开始出现了另一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变化，就是向着基督信仰接近，向着基督精神顺服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国内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一代，相当部分的人都重新萌生出一种对超验的价值源泉的渴慕。他们把中国追求自由民主这样一种世俗的政治理想，逐渐地放置在一个超验的道德价值和生命价值的审视之下。当然这个超验价值，在他们那里可以对接和追溯到任何体系中去，儒家的信奉者也可能直接把它对接到儒家道德传统上去，譬如秋风和萧瀚的超验主义倾向，就向着儒家倾斜了。刘军宁和秦晖也在向着儒家倾斜，但似乎只是功能主义的，在刘军宁那里被称为“普世价值”。不像秋风和萧瀚那样对儒家有超验性的认信。但另一部分的年轻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寻求信仰和超验价值的道路中，最终走向或正在接近耶稣基督的真道。最终认信唯有基督教信仰，才是世俗的平等和自由价值的坚实的根基。如余杰、任不

寐、范亚峰、李柏光、焦国标、王怡等人，以及亲近基督教的陈永苗、许志永、滕彪等人，还有李和平、张星水、高智晟等一批接受基督信仰的人权律师。年轻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几乎只有杨支柱好像是比较彻底的世俗自由主义的典型，连秦晖对儒家的那种价值情结似乎也很难看到。

我的这些观察是片面的，只是一个切片。对基督徒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对自由的看法已超越了洛克以来完全权利化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自由不但意味着人世间的某些必须被政治尊重的权利束，更意味着甘愿受上帝的话语的约束，并在上帝的话语中得以释放，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和恩典。人的自由的本质不是无拘束，而是顺服。人要么顺服在神的真道之下，像造物主的样式，就得着真的自由。要么就顺服在个人的血气和意志之下，这种一种虚妄的自主，但其实仍是罪的奴仆。没有在神面前的顺服和约束，人就像保罗说的，“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只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和“群己权界”意义上的自由，它关心的是人与人在一个共同体之中的行为边界，而不是每个人的内心，及人与人在灵魂中的关系。因此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不是生命意义上的和本体论的自由。

这是一个最近刚刚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趋势，也是国内自由主义思潮出现的一个转折。这是我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史与福音关系的回顾。我自己思考两个问题：中国

这两百年福音的传播，不管从信仰角度还是从宣教的路线来考虑，总会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处理福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一个是处理福音与政治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各种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向。从神学立场上的差异，到具体宣教策略上的不同。比如对待中国传统，刚才说到，像李提摩太是有一个同情跟尊重的态度，甚至同情到过分的地步，这个路线譬如直到今天的梁燕城博士。也有一种看法，视儒家、佛家的传统为撒旦和邪魔掌权的、是一种专制、野蛮和无神的文化，要统统砸掉。但即使后一种观点它出于宣教策略的考虑，那么在宣教上也会做一些妥协性的东西。但这个妥协会不会反过来付出信仰的代价？比如我们怎么看待民国时代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及其与后来三自运动的关系。以及“本色化”的主张本身？我个人是提出一个意见，就是适度尊重中国传统，但重心在于促成中国传统向着基督信仰的顺服。神的拣选、神的救恩、神的救赎计划都是从罪人开始的，从我们的罪和不配中把我们赎出来的。它一开始的起点，基督的宝血是用来对付罪，不是来对付罪人的。当然到终末的审判，是要对付罪人的。但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不是直接毁去罪人的血肉。我们被容许继续活在世上，去经历一个顺服和重生的有形生命。同时神在他的计划中，也一直使用着罪人，甚至也使用有罪的见证。那么，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族群的充满悖逆与无知的历史与心灵的外观，也是如此。

中国文化是有罪的文化，正如我是有罪的人。那么就有两

种立场：一是为了宣教的需要，是不是一定要来迁就？要一个本色化。我觉得这里有本末的倒置。你不能把基督教来本色化，因为基督信仰是普世的，基督信仰在教义上，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是一致的，这就是教会的大公性。没有什么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特色。教会只有一个化，就是基督化。永远都要嫌自己的基督化还不够，而不是嫌自己的本色化还不够。本色化的实质就是“效法世界”，就是“体贴肉体”。而信仰的实质，却是要把我们从这些所谓的时代特征、所谓的民族特征中分别出来。一个 2005 年的中国基督徒，应该和一个 1650 年的英国基督徒，或一个 1990 年的马来西亚基督徒更相似，归根到底，就是和基督的样式更相相似，而不是和一个 2005 年的中国非基督徒更相似。这才是分别为圣的意义。所谓本色化，我觉得是对真理在文化中的落实和应用所导致的差异的一个夸大和凝固，是个人生命和教会建造上的本末倒置。结果，“本色化”运动使教会的建造受制于民族主义危机的压力，带来了大公性的割裂，也就在神学和教会治理上，都和普世教会的传承割裂了。这种倾向，是和中共政权下的“三自”运动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你若以中国为本位，也许“本色化”是一种保守主义，但你若以基督信仰为本位，“本色化”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激进主义。

第二种态度，如果彻底否认、彻底拆毁中国文化，试图要在新的文化肌体上来传播福音。这也觉得不符合神的救恩。我们的重生，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身体，神的恩典是叫我们的肉

体从罪中挣扎出来，学习顺服在心中圣灵内住所结的果子之下。只要信徒愿意顺服，我们有罪的肉体神一样地爱，就像爱我们的灵魂一样。神所爱的对象并没有灵魂与肉体之分。这种两分（以及倪柝声弟兄的三分法）不过是希腊哲学的影响，对我们认识和更新自己的灵修生活，在非本体论的层面可能也有帮助，但这不是希伯来传统对人的观点。也不是上帝对人的观念。上帝爱的那个对象，乃是一个有位格的整体，就是出自于神的形象的全人。因此，中国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顺服和更新的问题。既不是迁就，也不是彻底摧毁。它是有罪的文化，它跟我们一样是戴罪之身。它并不就比我们个人更可恶。福音的传播不需要以剪除它为前提，就像不需要剪除我们的身体。经过这两百年，上帝在中国历史中的作为，就是不断破碎我们的传统，破碎我们的骄傲，直到尝试过一切人的路，结果都无路可走。今天我们对残存的中国传统的肌体，观念上可以彻底否定，行为上却要以爱心接纳。就像接纳一个尚未悔改归信的残疾人。

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传播才必须以彻底剪除旧文化为前提。因为除了剪除，它没有更高的力量。但基督的福音既可以彻底更新文化，又需要“文化大革命”。这是我说中国的文化有一个基督化的过程，这是我追随赵天恩牧师的异象。中国传统包括儒道释的精神，要在向着基督的顺服之下得到一个重生，和一个成全，就是成全孔子所说的那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福音与政治

这不是我重点想谈的，我的重点是福音跟政治的关系。政治也是文化的部分，也需要一个基督化。基督徒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就要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的基督化有负担和渴望。这种渴望是人之常情，连外邦人都会有。基督信仰从来不抹杀人之常情，基督徒比外邦人不同的，是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作光作盐的时候，我们知道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什么。我们既不会迷信穷苦人的暴力，也不会崇拜国家权威的偶像。我们用一种相反的力量去改变社会，那就是爱与非暴力。这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更高的力量，是从每个人的腹中流出的活水江河。它以不受制于政治的方式去更新政治，换句话说，基督信仰的伟大就在于它有力量改变政治，但却不会被“政治化”。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受到政治权力的捆绑，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自由。如蔡卓华弟兄传播《圣经》仍然会受到政权的迫害。很多传道人和大量的信徒，也仍然受着世间权力的逼迫。那么这种局势下，我们怎么才能自由地传福音？怎么才能在传福音的时候彻底去掉内心的恐惧？因为福音是释放我们的，不是使我们恐惧的。怎么才能公开地传播我们所相信的真理，而不是偷偷地传扬？如保罗说的，传福音是我们最大的荣耀，而不是一种羞耻。家庭教会也许有一种误区，就是以“地下状态”自许，自我非法化，甚至以“非法”和“地下”为荣。以为地下状态是坚持真道的结果，是被分别为圣的标志。借用知识界

的一个概念，这可能是一种信仰的“犬儒化”。所谓地下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以福音为耻”的状态，是令主蒙羞的状态。“家庭教会”这四个字，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基督徒的光荣，但不要忘了，这同时也是我们的耻辱。教会应当在大街上，不是只在客厅中。十字架应当悬挂在每个人都看得见的地方。教会如果今天仍然以地下状态自以为义，不为摆脱这种状态而努力，不克服恐惧，从这种地下状态中得自由，那教会就大大得罪了神。1999年，中国的几个乡村家庭教会系统，联合公布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近年来一些受到逼迫的教会也开始以法律的方式，温柔但是坚定地，寻找为自己辩解和维权和空间。教会的公开化，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化，社区化，和日常生活化，也是真正的民间化。我们现在不叫“民间”，只能叫“江湖”，意思是在民间里面，都是边缘化和神秘化的。

基督徒怎么才能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化和福音化的中国？政治和政教关系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是被专制者所霸占的政治，也不是狭义上的、仅仅与公共权力的划分和直接运作相关的领域。其实“政治”就是一种公共生活，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就是每一个人群乃至每一个人在一个共同体中去彰显和表达自己的机会。对教会来说，就是在公共生活中去彰显福音，去表达我们的见证和赞美。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基督徒的政治观，借用捷克总统哈维尔的话说，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基督徒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不直接针对国家机器和狭义上的政治制度，基督徒只是

当这些制度和暴力违背基督的教导时，向着标竿直跑，在乎无亏的良心，而无视恶法的存在。但只要基督徒诚实地宣告上帝的话语，就一定会对人间的政治构成压力和影响。因为上帝的道与这个世界的冲突是如此尖锐。但信仰对政治的影响在整体上仍然是“非政治化”的，而非政治化的。就和耶稣受到罗马的审判一样，耶稣的教导是超越政治之上的，是“非政治化”的，但这一教导的效果却引发了“政治性”的影响。

基督徒以自己向着标竿直跑的行为，以爱与非暴力的方式，以自己甘心受苦并主动饶恕的生命样式，希望并且迫使这个世界的制度，向着公义的原则更新。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有“政治野心”，这个“野心”就是上帝的主权要遍满地面。但基督教的意思，是否定和拒绝以政治的方式去实现“政治野心”。事实上，当通过政治去实现人类的自由和梦想的道路被否定之后，这个“野心”就不再是政治了，而是信仰。所以基督教其实是超政治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制度跟基督教之间的一个关系。中国这一百年，一开始可能去学日本、学德国、学法国。但今天在我的观念里很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宪政制度，包括宪法概念的产生，和立宪主义的发展。就是从英美的清教徒传统中产生出来的。政治权力必须受约束的观念，与圣约的传统息息相关。人类的立宪主义，几乎就等于英美清教徒的立宪主义。它基本上不是在欧陆的政治制度和观念革命

中萌发出来的，相反，欧陆非清教徒国家的整个宪政制度的尝试是非常失败的，法国失败，德国也失败。如果没有二战胜利的奇迹，没有基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英美这一支，那么整个欧陆的宪政化，可能永远得不到一个修正的机会。

学术的基督化

今天，基督徒知识分子（我提前讲第三个问题，因为和这里有关）面临一个困境。我们在今天可能承担着一个时代性的使命。我自己在祷告中不断接近这样的异象，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基督的福音要在这一片土地上，在每一个公开的角落，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领域，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上、政治上、公众舆论和道德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学术上、学院里，在每一个人文、艺术的创造里，都要高高地张扬起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更新千百年来那样一种背弃神的文化。这就有一个中国的福音化，将从边缘化走向公开化，甚走向文化的中心地带的过程。亚峰目前的家庭教会多有江湖的痕迹和味道。江湖第一是边缘化的，这固然是制度的捆绑带来的。但如前述，在这样的捆绑下，基督徒也可能把边缘化和地下状态当作十字架，而不是把突破地下状态当作十字架。到目前为止，基督信仰在中国整个主流文化或和社会生活当中，仍然处在边缘化的江湖位置。所谓江湖，就是一个没有发展起来的公共生活空间。发展起来了就不叫江湖了，就成了市民社会，成了民间的一部分。新教来华二百年，我们实事求是地说，教会仍处在江湖状态，

而不处在公共社会中的状态。

因此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后，会有一种特别的试探。因为知识分子都要开口说话。你一开口，你的喉咙就成了“敞开的坟墓”。如雅各书所说，你就在舌头上不断堆积着你的罪。一个在不特定公众中享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要将自己的笔、自己的舌头或其它表达工具分别为圣，你就必然在一个广义上的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和政府体制和公众生活构成冲突。知识分子的公共身份，会促使教会的“江湖”状态的结束，这是上帝要在 21 世纪的中国成全他的旨意，复兴他自己的名的一个信息。地下状态招致了政府对教会不断的残酷逼迫，但地下状态也的确回避了教会与政府、以及福音与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重大冲突。或者使这样的冲突被推迟了。当江湖状态一旦在城市当中被打破，基督徒就要开始背起另一个十字架。在这个过程里，城市教会和它们中间的大批知识分子、商人和其他阶层的专业人士，要看到上帝对自己的托付，有勇气担当起前二十年受逼迫的乡村教会为主的名所担当的职分。

教会是作为圣言的托付者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神在末世为他所拣选的一个团契。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是作为教会的肢体，可能是一个作家，可能是画家、编辑、记者或律师，可能是研究政治、法律、历史、文学的，他在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在专业上的一般呼召，都是在这个时代作打破中国家庭教会地下状态的事工，作神的大复兴的福音预工。今天的基督徒知识分

子面临一个文化使命，就是从“基督的学术化”到“学术的基督化”，这是“文化基督化”的一部分。我们处在一个外邦人的知识环境中，生命的成长要求我们“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做褻慢人的座位”。这里面有很多艰难。上午吴兄弟讲过，比如职场上你要不要做假帐？为香烟公司做广告？每个基督徒在他的专业中都会面临类似的处境。而知识分子面临的是更具有公共性的，因为他们是以广义上的言论来对受众施加影响。办公室里可能只是一对一的生意，你选择与世界合作，对他人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但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后，他与这个世界相互苟且的言论，如果是坐褻慢人的位子，他的罪所波及的就不是他一个人了，这个罪在社会的效果上看是特别大的。就是在整个公共空间，在神面前对他所有的受众都犯下罪了。是神的器皿还是撒旦的器皿？从某个角度讲，一个越大的器皿，因为你影响的人是众多的。而且你影响的不是人的吃穿饮食，你影响的是人的灵魂与精神。所以谁的话多，谁的罪就大。我成为基督徒，对自己以前的言论惶恐得不得了，你的每句话都大大的跌倒过人，大大的得罪过神。若不是上帝施恩怜悯，实在应当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称这个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困境，为公共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比如来审视经过这一百年的思想启蒙，所谓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观念。今天我们用基督信仰去审视，都会有极大的偏差，比如我们片面地讲政教的分离、我们片面地讲人的自由，讲人与人之间的多元和包容，也片面地去理解爱与公

义，片面地理解信仰自由，就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都自由。其实知识也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一个社会的知识氛围营造了一种强大的属于这世界的合法性。教会的地下状态，老实说避免了与这种知识合法性的直接冲突。教会里的人说什么，主流社会根本听不见，也不在乎。就是所谓文化基督徒，也不大会去读王明道、倪柝声或唐崇荣的书。教会和社会各说各话，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言论，却开始使这种冲突尖锐起来。世界认为你这个知识不是公共知识的一部分，只是你个人信仰的、不具有“合法性”的。如一个研究历史、法律、政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我对法律、对政治、对历史的视野和看见，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尝试表达的时候，就会在世俗生活中遇到一个言说的困境。人家会说这不是公共知识的部分，是你的私人知识。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事实上基督教的信念与价值观，包括由此带出来的历史观、道德观、法律观、政治观等，的确尚未在这个社会构成公共知识的组成部分。

尽管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大多知识分子不再信仰基督教，也会排斥基督教的信念在公共知识之外，但基督教的整个信念与知识传统在社会上的合法性地位，仍然还是有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非基督徒所认同为一个共享的文化前提。但在中国，我们开始面临整个知识合法性的困境。这一文化性的处境，与政治性的处境甚至一样严重。回头看文化基督徒，他们的做法往往是“福音的学术化”。文化基督徒在知识界的表达，迄今

为止没有受到明显的阻隔，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在知识合法性上没有被置疑。非基督徒知识分子都接受他是在谈学术，我不是基督徒，我也可以接受这种知识作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在学术体制里也可获得评价，可以评教授。另一方面是也没有明显受到政治权力的打击。虽然《圣经》仍不能自由的传播和印刷，但基督教学术书籍的出版近五六年来却很兴盛。一些释经性书籍甚至也可能以学术的面貌出版。我认为，这是文化基督徒时代的“福音的学术化”。我要把我作为基督徒的信念带入学术研究。

我想起今年美国有几个州，通过立法在公立学校可以同时讲授智慧设计论（创造论）和进化论，接纳创造论作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中国的基督徒也有这样一个使命，就是寻求基督徒的价值世界成为社会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但你会面临上述的困境，学术的评价和分配体制，可能认为你在谈信仰，不是谈学术，无论在官方还是在学院，你都很难在不妥协信仰的前提下得到承认。如有些基督教学者，受洗之后，就在学术和社会体制内受到减损，像何老师他们。今天的学术体制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它也对你会有捆绑。一些公共性的学术讨论可能有忌讳就不请你去了。话语权的丧失，或知识合法性在公共领域的不被接纳，知识分子因其信仰而在文化上的边缘化。这对基督徒知识分子们是一种试探。一些人可能保持所谓文化基督徒的定位，或在公共学术领域隐藏自己的信仰立场。像北村弟兄写小说，知识合法性的问题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你从事法律、政

治学的研究，你试图表达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价值观就显得比较困难。这是一个来到我们眼前，让我们看见了的使命，就是把一个整全的信仰，一个完整的圣经世界观，带到一切的知识与道德领域中去，并成为更新文化的源泉，这就是“文化的基督化”，是基督徒知识分子在 21 世纪不可回避的负担。

政治的基督化

回过头讲政治的福音化。刚才说近代宪政制度是从英美清教徒传统中产生的，我们也看到人类史上人与人的绝对平等的观念的树立，也唯有在基督教中。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和人在神面前才有了一个被造平等的坚实基础。在其它文化包括中国传统中，引不出人与人之间从起点到终点的绝对平等观念。佛家的众生平等也只是起点的平等，成佛与否，悟性与否如果是一种天然的差异，而不能被归在一个至高神那里，那么人与人之间其实还是一个差序格局。不可能被彻底消除，更不可能通过爱的力量来融合。因为没有神，就没有恩典。如果靠自己，就像百米赛跑，不可能都是第一名，不可能都得长子的名分。英国清教徒革命中的谚语说，“在亚当夏娃的时代，谁是士绅，谁又是农民”？这正是立宪观念和平等思想在英国诞生的一个起点。

第二是契约论。契约论实质上分两种：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是像卢梭式的契约论。卢梭的契约论是无神的，人类仅仅通过

多数人的同意，来建立一个契约作为相互之间的治理。归根到底，统治的力量、统治的源泉仍然是人的意志。民主不过是用多数人意志代替了一个人的意志。但从加尔文主义者开始的契约论，是建立在圣经和圣约根基上的。霍布斯的契约论也是有神的。我们看整本《圣经》就是神和人所立的一系列的圣约。

《圣经》里的第一重约，是神自己指着自己的约，是他自我成全、自我约束、自我丰盛的意志和智慧，和人的意志没有关系。当人起誓的时候，他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圣经中说，但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神指着他自己起誓，说他的话绝不徒然返回。所以第一重约就是神的信实，一切最高的价值根源在他的话语当中。所谓约束，也是从神甘愿约束他自己开始的。约束的本质是放弃，放弃的本质就是爱。神因为爱世人而放弃自己的无边意志，接受自己的话语，也就是他自己的信实、公义和圣洁对自己的约束。第二重是这样的一位神与人立约。第三重就是人和人开始立约了。在《圣经》里，人跟人的第一次立约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在一口叫别是巴的井旁立约，人说话是不算话的，所以人与人的契约的实质，是人在神的恩典、眷顾和应许之下，指着神的名相互盟誓。没有圣约的背景，说话不过等于放屁，怎么可能在一个恶狠狠的社会中产生出一种信奉契约和宪法的传统来呢。宪政的一个基础就是契约的观念，英美的宪法观念实际上是在神与人立约、约束彼此的意志的这一基督教圣约传统之下形成的。它的前提不是人的意志是无边的，而是人的意志是残缺的，是应当受到约束的。这是我们站在基督

信仰的角度来看人间的契约和法律，来看为什么权力需要制衡？你一旦看到需要制衡的其实不是权力，而是人的意志本身，一个简单的民主主义的理想就破碎了。人的社会与政治的理想，同样需要一个超验的和宗教的源泉。

保罗说，人间没有什么权柄不是出自神的，人间的法律、人间的契约、人间的宪法，它的合法性根本来自哪里？所以你看立宪制度它有两个起点：一，人的罪性是政治文明的一个起点，罪意味着权力制衡的必须性。罪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残缺性。意味着世间君王也好，人民主权也罢，世俗的权力一定是残缺的，必须是残缺的。人不破碎他自己，人就无法承受生命，国家不破碎自己，就是专制。二，上帝的公义是世间的君王和审判者必须接受管教的一个前提和判断的标准，这也是宪法的一个观念来源。“圣约之下的契约论”，“上帝之下的审判权”，我的看法，没有这两样，就根本没有宪法和宪政的出现。其实，俗世的宪政民主制度是罪人沉沦的一个结果，也是神的普遍恩典，在基督再来之前对罪人的一种弥补。在基督之后的两千年中，这样的制度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从瑞士、苏格兰、英格兰到美利坚，这一清教徒的或说福音主义的传统中慢慢发展出来。这不是乌托邦，不是美好新世界，而是一个注定要结束的末世之中的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福音并不希望借助世俗的宪政民主制度去传播，但宪政制度的确是一种最不妨碍福音传播的制度，也是一种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能够在基本的和平秩序和世俗的自由权利中共存的制度。神使用这样的制度，容许

这样的制度，并使它逐步扩展到全世界。

基督徒所喜爱的宪法，是一部能体现神的公义、神的美善，体现人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谦卑和人在世间的平等、自由、相爱的关系的宪法。用它作为规范世俗政权、评价世俗政权的标准。我们所寻求的宪法民主制度的根基，是对神的信仰。如果没有对神的信仰，人间的政治共同体不管你在技术上采纳什么措施，都一定不公义。就像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有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只是领受这种爱。国家或政治共同体也一样，它里面没有公义，公义是绝不可能从一个被称为“国家”的东西里面产生出来的，公义、自由和爱，这三样都只能是领受的。一个基督徒公民当以这样的心志，与非基督徒公民一道，去达成、捍卫和尊重这样一种世间的制度。

今天，中国人寻求自由民主制度，跟基督徒追求福音的传扬，很大程度上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基督徒公民要看到这样的关系。这并不等于说，我一定要委身于这样的关系。因为神对每个人的计划和托付不一样。但教会也不应当对信仰与世界的关联（祝福或咒诅）避而不见，或将这种关系推到基督徒的视野和天职以外。更具体地来看，基督徒公民，在中国追求民主化的历程中，不该是集体缺席的。

不缺席的意思，不是走到街上去。第一，公义的政治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基督徒政治观的一部分。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福音化的社会，自然是喜爱公平，不喜爱不义的。所以宣教本

身，就是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福音不是为了民主化，但福音在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一定会促成民主化。这是信仰与文化的一种关系。换言之，民主化是福音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反过来。第二，在世俗的宪法权利里面，跟基督徒关系最大、最直接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现在我们都受到信仰不自由的捆绑，很多传道人和主内肢体都受到过逼迫，所以教会顺服和依循法治方式对信仰自由的维护，将构成中国民主宪政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插一句话，维权是对世俗法律的顺服，是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什么是基督徒对人间权柄的顺服？当法律被滥用时，尊重法律本身，而不是尊重那些滥用法律的人；当一般法律违背宪法时，尊重宪法本身，而不是尊重一部恶法，这才是真正的“顺服在上掌权者”。因为“法治”的意思就是法律的统治，在现代社会，是法律而不是国家元首才是在上的掌权者。通过法律途径在公共领域彰现我们的信仰，用“温柔敬畏的心”在法庭内外表达和寻求信仰自由、并为基督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竭力辩解，这是基督徒在当代中国一个特别的负担。

教会在表达和维护宗教自由时，如我有参与辩护的蔡卓华牧师一案中，我接触到有两个意见：一种是基督徒只应该为他祷告就行了，我们只要仰望神，不要去抗拒当权者，甚至去打乱神的安排和计划，或去向世间的君王要求什么。这种看法的神学立场或许是片面的，至少把保罗的后两次宣教都否定了，因此保罗就是充分利用罗马的法律来维权的。这也把主动把教会在掌权者面前为真道辩解的使命排除了，似乎这不是尊重神

的计划，反而是替神去计划。是把上帝当成了福利国家，换句话说，是不是把神当成了一个神秘主义的偶像？另一种意见，则反过来轻视祷告的力量，过分积极地去寻求世俗社会的努力。这都是我不能赞成的。在教会对宗教自由的维权中，祷告是我们最根本的力量，祷告的心志不是指向一个案子的结果，而是指向一个关乎教会和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这时代的异象。一方面，我们通过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看见和接近这一异象。异象先于成败。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诉讼、抗辩，通过社会参与和公众舆论的形成，包括其它一切合法和合宜的方式，去承担福音的自由传播这一与世俗政权有关的使命。在法庭上的宣讲，既是为主内肢体洗脱世俗政权所施加给他的罪名的抗辩，也是福音预工的一个禾场。因为天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福音的工场。社区不是，街头不是，法庭也不是。上午吴弟兄讲到把婚礼和追思礼拜都变成公开的布道会，让我很感恩。上帝在任何国家，永远都为福音的公开化开道路。不管从宣教角度还是从基督徒的生命来说，他的婚丧就是要与这个世界分别的。法庭也是一样，既然基督徒被押进了监狱，我们也有权先到法庭去走一趟。

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流，是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89 之后，这十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信成为基督徒了，从这里开始，就有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什么是神义论下的自由和平等？什么是圣经之下的世界观、政治观和历史观？什么是圣约之下的宪政民主观？对

中国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启蒙，把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话语带入到中国主流社会的观念、思维和道德的格局中来。原来这才是中国“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呼召和挑战，也是我所看见的神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异象。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方面就是道德生活上的张扬。教会内的事工，比如婚姻关系中的婚前辅导、对未婚同居等行为的劝勉与惩戒。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教会不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也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将构成保守主义的中坚。我接触到的非信徒，可能一般会认为基督徒群体的道德品格比其他人群高一些，基督徒的道德观，尤其是婚姻观和财产观，应该在这个时代被彰显出来，教会的公开化，意味着教会将在社会道德的意义上，逐渐形成一个统摄了基督徒个人生命见证的“群体性见证”，换言之就是教会在社会中的“品牌”。我们的信仰带出来的道德生活，不仅是在教会里被教导，也应该在社会上被不断彰显和高举，这没有所谓政治上的敏感性，一种圣洁的道德生活及其标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向社会宣示的。在一个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组成的现代社会中，道德应当在国家那里是宽容的，而在教会那里是严格的。在国家那里是世俗的，在教会那里是圣洁的。在未来的一两代人中，教会的信仰是否扎根在中国社会与文化当中，将取决于教会的群体性见证，能否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成为道德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

最后，回到起先提出的三自问题。我同意三自的问题是如何出埃及、进迦南。晓斌弟兄也讲到，这两三千万信众有这样的可能，一旦政治制度有很大的转变，那个高高在上打压基督徒和基督信仰的工具发生颠覆时，三自可能有一个整体的出埃及的可能性。我们站在关爱三自内的主内肢体的角度上，可以看见基督化与民主化之关系中的另外一层意义。

2005 年 12 月 30 日，根据在中福圣山“基督化与民主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2006 年 6 月修订。

| 2006

你见过死亡的颜色吗

深秋的巴黎，今年意外地尚存暖意。在塞纳河边一栋 19 世纪的楼宇，我应邀来到巴丹戴尔先生的家中，作为法国外交部邀请的访问学者，与这位 78 岁的老人，谈论他一生为之燃烧的事业——废除死刑。

参议员罗伯特·巴丹戴尔，是法国废除死刑的道义象征。在世的法国政治家中，他无疑是最得民众敬重的一位。如一位法国朋友介绍的，巴丹戴尔是一位已进入历史浮雕群的人物，是法兰西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理想的“一个活着的传统”。30 多年前，巴丹戴尔是一位极力反对死刑的著名律师。1976 年，被告亨利绑架并杀死一位 8 岁男童，激起媒体和政界的巨大义

愤，“99%的法国人支持死刑”的呼声几乎响彻整个法兰西。已很少判处死刑的法国，因此案的社会影响，连续出现 7 例死刑判决。这时巴丹戴尔以他集律师、政治家、学者和人权斗士于一身的辩才，作出了也许是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反对死刑的辩护，挽回了亨利的生命。他在最后陈词中说，“当一位母亲的泪水汇合进另一位母亲的泪水时，正义到底在哪里？”让法官和陪审员紧握的拳头终于松开。

此后，巴丹戴尔接连奋战，前后将 6 名公众认定必死的被告，从死亡的刑罚中拯救回来。1981 年，密特朗总统任命他为司法部长，推动法国通过了废除死刑法令。1986 年—1995 年，巴丹戴尔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成为政坛的 5 号人物。2003 年后，他任参议员和巴黎大学法学教授，开始关注在全世界推动废除死刑的事业。2004 年他曾访问中国，并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他的回忆录《为废除死刑而战》，中文版已在国内出版。会谈结束时，巴丹戴尔先生将他刚出版的一本文集《反对死刑（1971—2006）》送给我，其中收录了 30 多年来他反对死刑的辩护词、议会演讲、对话和论文。

在他的书房我们开始了谈话，这位年迈的斗士脸上，已隐去几分英气与激情，但谈吐间的睿智和刚毅，却有增无减。他坐在我对面，手无箭矢，前倾的身体却仿佛一张强弓。背后是巴丹戴尔先生祖母的一幅油画，以一种温情俯瞰着这场围绕死刑的交谈。

残酷的永久标志？

王：巴丹戴尔先生，请允许我以一个哲学化的、而不是法律化的问题，来开始我们的谈话。对你而言，死亡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什么是人的死亡？

巴：死亡就是生命的终止。如果要加一个形容词的话，那就是在陆地上的生命的终止。

王：您的意思是否意味着，你相信人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性质或部分？

巴：我不知道。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死亡是我们在大地上的终止。大地之外的，我想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王：我知道福柯和德里达和你都是朋友，他们也是反对死刑的。尤其是福柯对酷刑和监狱的论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德里达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死刑判决是一种“宗教性的”仪式，就像对国家的一种献祭。我的理解，其实死刑的本质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崇拜。你在亨利案的辩护中也曾将死刑的执行称为“一种司法献祭”。你认为一个不再相信上帝的现代国家，需要死刑作为一种日常的献祭吗？死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国是西欧最后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在西欧也是国家崇拜和中央集权特征最突出的国家，这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呢？是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总是很

难废除死刑？

巴：我认识德里达很久了，他这个观点在哪篇文章？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把死刑视为一种原始献祭？除非只是一种比喻。

王：他 2001 年访问中国，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这样说的。他将死刑与一种神学政治联系起来。我想他也只是一种类比。但他在那场演讲中也提到了你。说你在 1972 年为本坦斯辩护时，曾在广播里听到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死刑违宪的判例，受到鼓舞。当时美国最高法院以宪法修正案第八条“禁止特别残酷的刑罚”为依据，判定当时的死刑执行是“特别残酷的刑罚”。但后来死刑执行方式改变后，多数州又恢复了死刑。

巴：我尊重宗教和神学的看法。不过我更喜欢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我引用一句雨果的话，“死刑是残酷和专制的一种永久性的标志”。这个看法对我来讲更简单一些。毫无疑问，死刑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永远的记号，因为死刑肯定了国家对于公民的绝对权力，反复地肯定。法律通过各种具体的标准和细节，为国家争取这种判处死刑的权力。当代的民主制度，是根据一种道德的准则来定义人权的。人权的第一个权利与此密不可分，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尊敬。每个人都享有这个权利，犯罪的人，他自己不尊重这种权利。但一种民主的法律，必须要尊重这个权利，不管罪犯尊不尊重。是否杀人，这是国家和罪犯的区别。最绝对的权利，就是国家要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

的生命。这不是一个人类学的或宗教学的视角，这是与近代形成以来的人权价值体系分不开的。反对死刑的哲学的根本立场就在于此。如果你信仰上帝，你可以把这个起点改为，生命是上帝给予的，也只有上帝才能收回。我是一个法学家，我从人权的角度，来判断死刑的反人权的性质。

宗教和人权的信仰

王：反对死刑的理由是“不可杀人”。但有意思的是，这正是上帝在《圣经》中颁下的十诫之第六诫。如果“不可杀人”是一个绝对的人权标准。那么死刑（正义的、谨慎的和合法的）显然也就构成了“不可杀人”的诫命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杀人者永远不会被杀”也成了一条绝对标准的话，那么“不可杀人”是不是就等于被废除了呢？

巴：我想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我不相信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或者，这不是我思考的方向。

王：请让我引用一位基督徒作家的话。我注意到你也喜欢引用雨果。德里达曾说，欧洲的作家通常都反对死刑，但欧洲的哲学家通常都不反对死刑。因为对他们来说，死刑的正当性，就等于国家的正当性。不能杀人的国家还能叫国家吗？除非你相信，在国家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正当性？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对法学家来说，你认为是人权。但对雨果来说，他有句名

言，“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九三年》）。所以废除死刑，就等于取消了“人民主权”的绝对性。法国的国会在很长时间，和英国的国会一样，“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什么都可以做”。而你的主张，等于是再给人民主权加一个限制，“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也不能把活人变成死人”。从世俗政府的有限性的角度，我很认同这个想法。但你的这个逻辑继续下去，就是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所以你在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时，要求改革宪法委员会只能对法案进行“事前审查”的做法，而由普通公民来启动对国会立法的违宪审查。可惜你的提案失败了。迄今为止，法国的国会和人民都不太愿意接受对一个世俗国家的议会主权的进一步限制。

雨果诉诸于基督教的信仰来反对死刑。作为一位基督徒，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另一位作家是俄国的托尔斯泰，他在小说《复活》的扉页上，题下《圣经》里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强调罪人在这大地上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个权力不是一份世俗的社会契约可以创造出来，或者私相授受的。但存在主义的作家加缪，他却站在反宗教的立场来反对死刑。他相信只有去掉了关于天堂、永生与灵魂的观念，死刑的合法性才会彻底消失。所以他说“死刑的终结就是宗教的终结”。我认为他作为一位反对者，倒比雨果和托尔斯泰，跟了解基督信仰与死刑之间的关系。他之所以积极的反对死刑，其实是为了积极的反对一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上帝。我知道在法国废除死刑的过程中，天主

教会也发挥了相当大的道义力量，也给过你极大的支持。你和一位主教是朋友，在亨利案中，你甚至引人注目的传唤了一位狱中神父出庭作证。也许我的问题很冒昧，也没有礼貌，你反对死刑，是否也是反对宗教的一部分呢？

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在 1972 年，法国的天主教首次明确了他们反对死刑的态度。他们（法国主教团社会委员会——笔者注）发布了一份主教声明，其中说，“将一个人处死，就是否定他有重新做人的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怀疑‘宽恕’的强大力量，就是否认‘救恩的普遍性’与‘重生的可能性’”。所以主教们说，“社会，即使是经过正规的审判，也不能以一个人有罪为借口而处分他的生命。生命权是绝对的，死刑是无视人的血肉生命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很尊敬这样的立场。

王：从当代欧美各国的经验看，宗教和人权，的确是废除死刑的主要观念力量。目前在中国台湾的相关讨论中，人权团体和宗教团体也是重要的发言者。不过情况也很复杂，新教中的保守的福音派教会，也同样以《圣经》和诫命为依据反对废除死刑，这也是我的立场。还有，人们对佛教的一般印象是慈悲为怀，反对杀生的。但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台湾的星云大师，也坚决反对废除死刑。我知道你和达赖喇嘛也很熟悉？

巴：我和他是好朋友。达赖喇嘛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佛教徒，我了解他的看法，他认为死刑是有违佛教教义的。

王：我是否可以这样描述，你一生反对死刑的价值信念：你是一位宗教上的不可知论者，但你相信天赋人权是高于世俗国家和司法权力的一种信条，人权的价值受到几百年来的法治文明的论证、呵护和坚固，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除非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所以你一再强调废除死刑是一个道义范畴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司法的技术性问题。废除死刑所代表的那种不可置疑的、不可被削减的人权价值，对你而言，是作为法律人的一种信仰。或者说，是替代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一种现代信仰。据我的观察，这基本上也是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信仰。

巴：你说的不错。我不是根据宗教，而是根据政治哲学和人类的理性，来解释人权的绝对性。不过我还可以增加一个经验主义的论据。“非公正的司法”，这个结论不是从理论上说的，而是从现实中说的。在现实中，永远都是“人在审判另一个人”，而不是上帝在审判犯罪的人。人审判人，一定不公正。因此人的司法不具有绝对性，也不应该具有绝对性。人的审判是有限的，是一定会犯错的。

王：我这样理解，法律设置了一种程序，把一个人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但他仍然不过是人，而且是有限的，甚至在内心可能是和被告一样脆弱和卑微的人。法律只能设置一个物理上的位置，不可能设置一个道德上的宝座。

巴：是的，所以一切判决都是相对的，也只可能是程序意

义上的。如果人间的司法能够判决死刑，就等于否定了司法的模糊性，也就否定了审判权本身的正当性。没有死刑，司法是可以依据正当程序而成立的，一旦有了死刑，人的司法就不能成立。

王：你的看法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显得很尖锐。康德说，死刑的唯一正当性就是它的公正。这是支持死刑的理由，同时也是反对死刑的理由；换言之，人类到底怎么理解“不可杀人”的诫命？在基督徒看来，“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命题在观念上是正确的，不过在人类的司法经验中，对这个命题的应用常常是错的。中国人曾崇拜过各种独裁者或国家的至高无上，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对“法治”和“民主”的崇拜。因为我们始终不愿意承认，人类不可能建立起绝对的公正，即使是通过司法的正当程序。所以你认为，废除死刑是废除“一切人对一个人的死刑”，我记得这是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之前说的话。但很讽刺的是，他曾经也反对死刑。废除死刑并不是在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废除，更不是宗教和宇宙论的意义上废除。在康德的命题里，也可以这么说，人对人的死刑，其实都是一种“私刑”，因为上帝的审判属于上帝，但人间的法庭无法满足公义的绝对要求。所以我同意，死刑只能应用在杀人罪上，而且死刑的应用和实施应该降到最低，但我不认为，人类有权利废除“不可杀人”这一绝对的道德诫命（同时也是真正的和绝对的人权标准）。

巴：废除死刑，是因为事实上各国的司法经验，都充满了

错误的死刑判决。如美国 1970 年到 2000 年，共有 642 人被处决。同一时期却有 87 位死囚在处决前被推翻判决。（《经济学家》曾对此评论说，如果每出 7 架飞机就要掉 1 架下来，早就应该停飞了——笔者注）。有学者说，最大的问题是辩护律师的懒惰和无能。在对抗制的诉讼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水平是相对的，而决定他们水平差距的，就是当事人的财政能力。这也是相对的。所以美国监狱中的死囚，以穷人和黑人居多。美国判决死刑的案子多集中在南部，如德州、密州。那里的黑人被判死刑的，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口比例。在死刑制度下，对经济水准越低的社会群体就越是不利（如台湾 1955—1992 年共处决 482 人，基本特征是“初犯，18 至 30 岁，初中毕（肄）业以下文化，工人或无业者——笔者注）。

另外法官的判决也充满了各种相对性。如法国的经验，一个案子在死刑判决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广受关注的冤案，于是法官改变态度，本来要判死刑的人就不判死刑了。又比如穷人，国家虽然会给他指派律师，但在财政能力和法律水准的悬殊下，人的一些激情和情绪就会被过强的表达出来，影响整个诉讼。比如种族歧视的、排外的、仇富的观念被渲染出来。但一个人的生命如此尊贵，是不应该被这种或那种的偶然性所决定的。偶然性的存在，显出了死刑判决的荒谬。死刑把人类的偏见最大化的带入到了审判之中。通过死刑，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因素都被放大了。

王：是的。死刑对政府权力来说，是极大的诱惑和试探。要么拒绝承认这些相对性的存在。要么明知这些相对性存在，还要坚持用杀人来达到某些社会目标。比如威慑犯罪，维持社会稳定等。这等于不把一个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其他人的手段。事实上，如果一个法庭对死刑判决的公正与真实没有绝对的确据，却仍然判处被告死刑。这时候，死刑和谋杀就会失去区别。但又有哪个世俗法庭的法官敢确信自己的判决绝对公义呢？所以我坚持认为，死刑首先是一个信仰问题。一个法官、或一个国家，如果他们不能信赖上帝的公义和基督的恩典，他们的确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公平的，良心无亏的判决死刑。

巴：所以理解死刑的实质，是人在审判人、人在杀死人，就能回到一个经验主义的常识。人不能杀人，即使是通过法庭。另外，即使是考虑到社会目标，死刑与犯罪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各国司法经验的常识。全世界 129 个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废除死刑而引发更多的人犯罪。他们的社会治安不比有死刑的国家差。有一些国家出于这种顾虑，曾经临时性的废除死刑，像英国、加拿大和土耳其，他们决定 5 年内暂时不判决死刑，看看情况如何。结果 5 年后发现不必担心，就把死刑永久性地废除了。在美国，废除死刑的 12 个州，谋杀案的发生率甚至比有死刑的州要低得多。如果法律比以前更尊重生命，社会也会比以前更尊重生命。

王：我看到美国几年前的报道，在过去 2 年，有死刑的州的谋杀案，比已废除死刑的州平均多出 48-101%。

死刑与民意

王：1921 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在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在瑞典废止了死刑。一位死刑专家曾说过，“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过半民意赞成才废止死刑的”。你提出废除死刑法令时，法国的民众也有 62% 在调查中持反对意见。基于你的信念，人权的价值是否超越在一时一地的民意之上？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国家，并不意味着民意决定一切，而是一个以人权价值为磐石的国家？你当时曾经反对将死刑问题诉诸全民公决？

巴：人权当然高于民意。但我们没有强迫民意，而是按民主程序去影响民意。以前蓬皮杜和德斯坦两位总统都不赞同死刑，但他们顾虑民意，不敢公开反对死刑。到了 1981 年总统竞选时，密特朗明知多数民众仍然主张死刑，还是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如果我当选，我一定要废除死刑。这是我的信仰。结果法国人还是选择了他当总统。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是渴望左派上台的。他上台后任命了我做司法部长。这就是以民主的方式对待民意。如果政治家是机会主义的，一件事他竞选时不说，上台后开始做。或者说了却不做，那就是非民主的，是对民意的欺哄。

王：可惜多数政治家都是机会主义的。

巴：也许是的。至于全民公决，根据法国宪法，只有涉及国家体制变更的重大事项才应交付全民公决，死刑废除只是一个刑事法律的问题，在议会的权力范围内。把议会应有的权力交还给全民，看起来是一种更民主的诉求，其实是反民主的，是违宪的。

王：然而有意思的是，当代两个最主要的没有废除死刑的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不废除死刑，因为他们有清教徒的传统，还有很多人相信上帝和《圣经》的权威。中国不废除死刑，恰恰相反，因为他们有共产党的传统，还有很多人是不相信上帝的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希望这两个国家也废除死刑的话，我认为从宗教的角度去讨论死刑，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巴：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思考这个问题。

收回死刑复核权

王：近年中国也发生了几起著名的谋杀冤案，如聂树斌先生在执行死刑十年之后，警方抓到了真凶。而佘祥林被控谋杀妻子，十年之后他的妻子回到了家中。这些案件被广泛报道，使死刑问题也开始被公众讨论，一些学者也明确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新华社的“人民网”上开辟了专题讨论和民意投票，

反对废除死刑的比例是 50.4%，比当初的法国更低，不过这只是部分网民的倾向，只是互联网上少数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信息较广并对这个话题有热情的那部分人。中国的最高法院，将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收回曾长期下放给各省的死刑复核权。院长肖扬最近发表讲话，表示收回死刑复核权后，要“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尤其是对“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或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更要“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你如何看这一变化？你曾经与肖扬会面，你们一定谈到了死刑问题。

巴：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两年前访问中国，与肖扬先生见面。他是一位很优秀的法学家，我对他的印象很好。我向他阐述了我对死刑的看法。他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应该的，是早晚的事。但他向我介绍了中国的一些情况，表示你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当然，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我想问，你们有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王：社会观念的转变和支撑，的确是很难的。除了媒体和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启蒙、宣传和辩论以外。在技术上，废除死刑与很多制度问题紧密相联，所以有许多逐步限制死刑的主张。譬如目前有 68 个可判死刑的罪名，减少死刑罪名，尤其是杜绝新增死刑罪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首先的努力方向。在中国还有大量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废除财产性犯罪的死刑，

停止用杀人来维持财产秩序。也是学者们建议的一个方向。但这个问题又跟中国当前的反腐败连在一起。很多老百姓认为废除死刑就是便宜了贪官，甚至和“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传统有关联。这也是渐进论的一个困难，如果不能一视同仁的看待生命，废除死刑的主张可能会缺少道义上的力量，甚至演变成另一种社会不平等。

另一种主张，是只能以杀止杀，必须把死刑局限于谋杀罪，废除其他全部的死刑。罪犯都没有杀人，政府怎么能杀人呢？这想，这至少是我和您的一个共同立场，“不可杀人”是一个绝对标准，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人权的。先把死刑局限于谋杀罪，杀人的严重性才不会被其他的罪名掩盖，杀人才会成为人类最不可容忍的犯罪。

另外，中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很低，基于各种原因，律师不愿代理刑事案件，也很难较深的介入实质性的审理。很多案件开庭只花 2、3 个小时，就判被告死刑了。所以减少死刑判决，与整个诉讼与司法制度的改革又连在一起。肖扬先生最近两年开始呼吁减少死刑，今年 7 月 1 日开始，各省法院对所有死刑案件的二审进行开庭审理，这也是一个好的变化。

死刑与人体器官移植

王：中国还有一个与死刑相关的人权问题。目前全世界的

人体器官移植，大量来自中国死刑犯的器官。福柯曾说，“犯人的肉体变成国王的财产”。这只是哲学意义上的象征，但在中国，却成了一个事实描述。我们的问题是国家不但剥夺罪犯的生命，而且征用死刑犯的身体，把他们死去的肉体“国有化”。

丹麦、英国等媒体有过许多批评。中国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洁夫，在今年 11 月的人体器官移植大会上公开表示，除少部分器官来自交通事故的死者外，中国的器官移植大部分来自死刑犯。他说“中国政府会尽力说服死刑犯及其家属，同意犯人被处决之后捐出器官”。据卫生部的统计，每年有 8000-9000 多例器官移植，其中肾脏移植大致有 5000 多例，肝脏移植在 2004 年有 2600 例。中国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一直是个谜，一位法学家刘仁文的研究测算是“一年 8000 人”，他曾在北京见过你。大赦国际的估算，2004 年执行死刑的数字是 3400 人。占全世界执行死刑人数 3797 人的 90%。2005 年判处死刑的至少有 1770 人。但以卫生部披露的人体器官移植的规模来推算，我个人倾向于刘先生的数字。有记者在北京的医院调查，在 120 多间厕所里都发现了器官买卖的广告。中国卫生部颁布了一个《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医院临床用的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这个规定从今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这当然是一个进步。我的问题是，即使所有死刑犯都有书面同意，死刑犯成为一个社会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你会如何在道德和人权的角度上评价它的影响？

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详细的信息。一个被关在监狱中即将被处死的人，怎么可能有平等的契约权利呢。如果一个人没被判死刑，你可以与他协商，比如今后将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被判死刑了，就不能再去问他，他已经丧失了自由的同意权。我可以用一句话，很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纳粹的做法。如果导致了一个局面，为了取得一个人的器官，而倾向于判决死刑和执行死刑，那这是人类最野蛮、最残忍的制度，我甚至不能相信。

王：我也不相信中国的法院会滋生这种倾向。但大量的死刑犯器官移植，是否已经影响到了司法和狱政体系的运作，甚至因腐败而影响了死刑判决的增加？我没看过任何有关的研究。我想目前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调研。只是设想这种可能性，已是一种令人扎心的念头。但据法国的中国人权问题专家玛丽女 1997 年以来的观察，2003 年以后，全世界开始陆续出现去中国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广告，如在东南亚、以色列等地。而这在 2000 年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以色列的报纸上称每年有 30 个以色列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这是公开告诉大家，要做手术到中国去，那里有大量的死刑犯。《丹麦基督教日报》最近报道说，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器官移植的网页，并不讳言它们的器官来自中国的死刑犯。其中一个网站公开报价，“一个肾脏是 77150 到 82300 美金，一个肝可开价到 123,500-138,900 美金”，网站上还特别刊登了两位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日本病人的感谢信，作为宣传。

巴：谢谢你，我不会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奥运与赦免

巴：人类史上即使有死刑，也通常是和赦免制度相联系的。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希特勒曾经同意这一年之内不执行死刑。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承诺，但德国在这一年的确停止了死刑的执行。在以前的法国，总统拥有赦免权，要对每一个死刑犯作出个别的决定，是否一定要执行死刑。特赦制度对国家领袖的良心是一种反复的试验。所以蓬皮杜总统在 1970 年 3 月的电视讲话中说，“每一次我面对死刑犯，每一次当我一个人独自作出决定时，都是对我的内心争战的一次公开展示”。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向中国政府提出倡议，在 2008 年奥运会这一年停判处死刑，或者停止执行死刑。只是暂时性的，让这一年成为无死刑年，你觉得如何？

王：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倡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感谢你愿意将更多的目光和你个人的声望，投往这个死刑最多的国家。你的想法使我想到了《圣经》中的“禧年”，旧约的律法中记载，每隔 50 年要将一年作为禧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一切被仇恨、劳役或契约所约束的人与物，都要得到自由。犹太人从来没有实行过禧年，因为他们信心不足。天主教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宣告禧年，罗马的教宗宣布赦免一切人的罪孽。按照圣经的观念，人不可能有公义，所以完美的公义

一定伴随着赦免，基督的赦免就是律法的一部分，用圣经的话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换句话说，没有赦免的死刑制度，一定是不公义的。因为上帝藉着他的儿子耶稣，赦免了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但反过来说，没有死刑的赦免制度，也是不公义的。因为就连上帝要赦免人类，也为此付出了他的儿子，成为人类的替罪羊。

其实，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不定期的“大赦”制度。皇帝遇到国家大事比如登基、建储、大婚或天灾的时候，就会对颁布普遍性的减免刑罚的命令。中国史上社会最和谐的唐朝，“大赦天下”的次数也最多。一个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在贞观年间颁布赦令，罪不分轻重，包括死罪在内，全部赦免。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未对一般刑事犯实行过大赦和特赦，中国的刑事法律只保留了最残酷的死刑，却不再保留最仁慈的赦免制度。因为中国人连上帝的赦免都不相信，又如何能够相信人的赦免呢。所以我非常赞同和尊敬你的建议。从现在开始，这也成为我对于奥运会的一个梦想。

巴：我会发表这样的建议，并愿意在中文媒体上这样倡导。如果中国不行，可以在香港。

王：巴丹戴尔先生，非常感谢你的时间。我曾看到报道，说法国的最后一个刽子手，费尔南·梅索尼埃，今年74岁了。他创办了一个“正义与惩罚博物馆”，并写过一本书《刽子手谈话录》。他说如果可以重活一次，他希望成为一位研究刑罚

史的学者，或是一位神父。在给每个读者的签名中，他这样写道，“我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被人们记住”。他的故事让我想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我最后想对你说的，你的努力，不但将一种罪人——死刑犯的身体从断头台上救了回来；也将另一种罪人——刽子手的良心，从断头台旁救了回来。在中国，有无数的死刑执行人，和无数的不应该被杀的死刑犯，都在等待这样的“禧年”。但耶稣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救了罪人的身体，但耶稣救了罪人的灵魂。

巴：谢谢你。我要送我的第二本书给你，是关于欧盟宪法的。希望中国的律师、法学家和作家，有更多人来思考废除死刑的问题。我相信人类对生命的敬畏，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

王：我也相信。但我不是相信人类，我是相信上帝。在我的信仰中，只有末日审判之后，才会彻底的、永远的废除死刑。

2006年11月28日

于巴黎返国途中

删节版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这是原稿全文

| 2007

同性恋的罪与权利

一、

Pilgrims，本来这个议题是“与天路客谈信仰”系列的一段，迄今我的思考大概尚未超出这段文字。后来在论坛上，作为对基督徒孙海英批评同性恋者这一公共事件的回应，希望有助于对此议题的不同意见人群对彼此道德观念的了解，这篇讨论就扩大成现在的样子。有人说，是不是反自由主义的、原教旨的基督徒，就看他对同性恋的态度。曾有网友也追着这个问题问我。我在归纳这些讨论之前，试图先提出四个命题。

首先，我反对同性恋婚姻或支持同性恋的合法化。我希望

你了解，我的反对当然基于我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的圣经伦理观。但在这里，我并非想以圣经启示（特殊启示）去说服一个非基督徒，而是企图阐释基督徒的圣经伦理观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基于一般理性（基督徒称为普遍启示）也可以推导出的、某种值得被了解和被尊重的公共价值。

孙海英基于《圣经》，认为同性恋与乱伦、婚外恋等一样，是一种身体淫乱的“罪”。这个“罪”是道德性的评价，而非法律的评价。对基督徒来说，“淫乱”首先不被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你相信人类是被造、而非偶然进化的，那么道德的意思首先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在圣经中，“淫乱”首先指向在神—人关系上人向着他的创造者的背离和“花心”。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道德的根基是上帝与他的被造物的关系。在这个议题上，你不需要是基督徒，你只要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你相信宇宙间一定有某种高于人类肉体生命的力量和价值——即使你不确定那是什么；我想你就可以接受我的第一个命题：人类最大的不道德或最初的不道德，就是对那高于自己的价值和存在者的违背和否认。这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道德”的起点。希望这是我们即使站在不同信仰中，也可以对话的一个共识。即法律关心的，是一个肉体生命与其他肉体生命的行为界限。因此在法律的层面，我毫不犹豫地承认、尊重并支持同性恋者的某些“权利”，如他的人身权不能因他是同性恋者而受到区别对待。他也不应因一种“自愿的、不直接侵害第三者权益的”行为方式，而受到拘捕、罚款或任

何政府强制力的干预。甚至包括他与同性伙伴缔结民事契约处理财产关系的权利等等。但道德一定是关于灵魂的，一定是关于一个人与超验价值的关系。人的一切行为，都基于人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和对这一关系的评估。无论这个道德关系在你那里是以什么方式呈现：信仰、天地良心、最高理性、文化遗产，或其他什么。换句话说，人若只有肉身，而没有灵魂。人间就根本无所谓道德。

所以我希望指出的，也包括第二个命题，即若你不接受人有灵魂，不接受道德是关乎价值的，即道德的实质是人与他的造物主的关系。那你就无法从逻辑上摆脱道德虚无主义的陷阱。因为否认这一命题的终点，一定是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假如在你这里暂时还不那么彻底，那我就要提出第三个命题，一个人若不承认第一个命题，也不承认第二个命题，那他的道德观一定是多重标准的，一定是破碎的，不能逻辑自洽的。

我并不想通过这个讨论，使你接受基督信仰。你是否基督徒，并不影响这个讨论在一般理性中的价值。我只盼望能使你承认一点，即当我论述同性恋的议题时，我的圣经道德观，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具有在其他道德议题上的一致性。而一个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坚持这世上没有任何道德，人可以为所欲为，他只根据自我中心的功利原则，对法律进行选择性的规避。除此之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一个上帝，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的”。那么我也在理性上承认，这个

人的看法尽管我不同意，但他的看法的确也不是混乱的，而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如果多数人的看法在这两者之间，譬如支持同性恋婚姻，却反对一夫多妻的婚姻，认为同性恋是正当的，卖淫不是正当的。认为同性恋是“真心相爱”，母子乱伦却一定不是“真心相爱”。认为不让同性恋者结婚，伤害了他们的人权，而不让一对表兄妹结婚，却没有伤害他们的人权，等等。我希望你能承认，这些道德观其实是混乱和多重的。于是我想提出讨论开始前的第四个命题：“道德”一定是整全性的，是我们对人与最高价值、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一个完整的正当性评价系统。因此，凡是不整全的道德，就是不道德。

人类最近两百年的精神苦难，就是人一味地以为，若没有信仰，人就会更自由。若没有道德，人就会活得更快乐。但我在历史和人心中看见的却恰恰相反。即使我们相信的出路可能不一样，但我不知道你看见的真相又是什么。

二、

基督徒相信婚姻和性关系的价值，是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被赋予和界定的。但同性恋如果只停留在一种个人行为上，基督徒不会因此要求政府对一种道德行为的强制性矫正。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立场，也符合圣经的教导。同时，当一个基督徒说同性恋是一种淫乱的罪时，他一定承认自己同样有罪。耶稣说，看见妇人心里动邪念的，已经犯奸淫了。这并不是一种

儒家式的对外在行为的清规戒律。淫乱的反面是圣洁，上帝的心意是叫人圣洁。换言之，爱是和圣洁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说，你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若没有上帝，你心中动邪念，可以假装没有背叛你的妻子。但若有一位上帝，或中国古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么内心的邪念，不但已在上帝眼中犯了淫乱，也同样在妻子的生命里造成了伤害。那作在自己身上的，就作在了妻子的生命里，那作在自己灵魂里的，就作在了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跟同性恋的朋友一样，都是犯淫乱的人。只是我从来没有受到同性恋这一种很特别的淫乱的试探，因此我也不了解他们的忧伤和痛苦。我宁愿像基督徒文学家 C·S·路易斯的態度一样，不在自己没受过试探的罪上去指责别人。但我一样总是受过淫乱的试探，我从一般性的淫乱的罪上，也了解那种难以自拔的罪的捆绑和纠缠。所以当一个人基督徒说同性恋是一种罪时，我想他首先应当出于一种怜悯，而不是出于一种把自己撇清的厌恶感。同性恋的确是一种罪，但并不是同性恋者的存在，就显出了异性恋者的义来。

但是，“同性恋婚姻”却不是一桩道德性的个人行为。无论是否基督徒，我想你也能承认，婚姻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上极少数普世性的价值、传统和基本社会制度之一。也是政治国家对一种个人行为在法律上的加冕和命名。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也不赞成对一个同性恋者的外在的行为强制，因为性关系是道德性的，不道德的性关系所显出来的，是对那位圣洁者的冒犯，及一个人自己的内心苦难，而不是对社会的一种外在

损害。因此这个议题不应该是“治安性”的。但是，当同性恋者进而要求这个社会将他们的关系“合法化”，要求他人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将他们的同居关系称之为“婚姻”，也就是要求来自社会的一个道德性的加冕和命名时；这时我基于基督徒的伦理观，一定会在公共政策上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任何可能性。有人说，你认为同性恋不道德，就是一种观念强制。我恰恰认为，寻求同性恋关系合法化的努力，才是对我的一种观念强制。你可以将道德性与审美性做一个类比，因为它们都不具有治安性。就如一个长得很丑的人，我们同意他不应受到制度的歧视和强制。但我们有权在制度之外有自己的审美评价，如坚持认为他就是很丑。我的审美评判只是一种舆论，不是什么观念强制。任何人都不能免于被别人的审美观批评，更不能免于被他人的道德观批评。但当这位被批评者要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称他为美人的时候，他的要求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审美观，倒真的构成了一种强制。因为他试图将一个审美评判，转变为一个法律评判。将一个与国家无关的议题，带入一个可以使用强制力的范畴。

恰恰因为圣经认为同性恋是反道德，所以在基督徒看来，“同性恋合法化”或“同性恋婚姻”，并不是解决他们痛苦的出路。换言之，“国家”和“法律”不是他们的救赎主。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婚姻，其实是反对一个同性恋的乌托邦，和一个国家主义与立法主义的乌托邦。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就和大多数人的审美观一样，是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 facts。如果你支持同性恋者诉

诸民意，去争取某种合法化。你就等于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道德性的分歧。那么你的思维恰恰正是“政教合一”的思维。就如那个很丑的人去打官司，告那些认为她不美的人造谣诽谤，伤害了她的名誉权，就等于他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审美性的分歧。那她的思维我就称之为“政美合一”。而她是否真的受到伤害了呢。不错，假如她真的认为自己有多美，她受的伤害就会有多大。但问题是在法治的原则上，一个认为她丑的人不应对她的沮丧负责任。她的痛苦需要的是在心灵上被医治，而不是在法律上被娇惯。

你也认为，“同性恋者最好寻求其他保护方式，比方说一系列的财产契约、继承契约等，法律应该会保护这些契约的”。我也同意，当法律保护一份财产契约时，同性恋当然不应该构成一个歧视的理由。我去法国时，看见法国每年的初生婴儿，已有一半以上是非婚生子女。因为一半以上的法国人不选择婚姻，而以各种非婚协约作为同居的法律基础，包括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这个国家在道德和信仰上的堕落感到痛心。但如果你只是选择避开婚姻，你的选择是你的个人自由，我在道德上批评，但在法律上接受，并在爱心上宽容。但如果你进而以自己的性道德，去挑战“婚姻”本身的概念和价值，那么一个相信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就必将全力反对，说，这就是我的立场，绝无妥协的余地。

Pilgrims，你提到，“我知道的基督教义，是应该要求干涉

李银河所提到的一系列性行为的”。如果你所说“干涉”的意思，是指任何强制性的介入，那么这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当然只有一种情形下可以强制性干预，就是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但这不是基督教特有的，这是公共的和法治的一个普遍性原则。

假设中国有信仰自由，那么基督的教会在公共生活中，一定会是一种道德性的保守主义力量。教会及其信徒，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可能会公开地批评和反对一些社会议题。但针对个人的道德性行为，去寻求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却是与基督的十字架道路相悖的。换言之，如果可以强制的话，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过退一步说，即使一个意见群体要求对某种个人行为进行立法限制，在一个民主社会，只要他的意见表达方式是非强制性的，那也是正当的。如美国史上曾有保守派的基督教游说团体，曾经成功地促成了“禁酒令”的宪法修正案。我并不同意这一立法游说，但我要承认，以游说方法去取得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成就，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体制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反对，也只能用游说的方法去废除这个禁酒令。后来果然也被另一条宪法修正案废止了。

除了在公共生活中，教会持一种保守的、但却非强制性的道德立场之外；教会在内部对会众的惩戒，同样是非强制性的。假设有个基督徒是同性恋，或有婚外情，一个忠实于上帝话语的教会，应该指出这是违背圣经教导的，教会不应妥协，其实这也可以——尽管目前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妥协。

教会和信徒们应当帮助和劝勉他，希望他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无力，并靠着上帝的恩典改变自己，回归圣洁和自由的生活（你会发现我们对“自由”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是如何迥异）。最终，教会也应对拒绝认罪的信徒施行惩戒。这一惩戒依照圣经的原则，同时也受到一般公共准则的制约。因此也不会涉及对身体的强制。主要的惩戒有两种，一是暂时停领圣餐，二是将其除名，不再看他为教会的成员。这和一般的社团内部处罚分为警告或开除是类似的。如果你把这个称为“干预”的话，那么教会的确会“干预”一个信徒的道德生活。教会有权柄也有责任很清楚地表达对一种不道德行为的反对，但目的也不是要显出自己的义来，而是要以爱心挽回和得着自己的弟兄。假如一间教会明知信徒有违背上帝诫命的行为，却装着不知，也不指出。那就不是基督的教会，而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俱乐部。

无论在公共生活中，还是在会众中，基督的教会都彰显出一种保守的道德立场，必然会对他人产生一种道德性的压力。但即使以自由主义的理念而论，这种压力的造成也是正当的。任何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对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甚至针锋相对的人而言，都会构成某种压力。如一个不贪污的同事，一个不乱开处方的医生，都会让其他人活得不自在。但那又怎么样呢。我不会为了让你活得自在而改变我的道德观，我不会为了让你舒服而去撒谎。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与思想自由。任何人的信仰和思想自由，都会产生出对其他意见人群的外在压力。只要这

个压力不是强制性和垄断性的，就符合公共生活的自由主义准则。但今天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却愈演愈烈地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外在压力，就是不宽容。只要有批评，就是不宽容。只要不持一种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不宽容。最好世上不要有基督徒，也不要有穆斯林，干脆不要有任何坚持一种特定道德观念的人群，那么社会就“和谐”在彻底的相对主义当中了。老实说，这种左翼的“政治正确”观，才是最大的思想不宽容，且跟共产党其实异曲同工。

最后你说，既然我反对强制，为什么又说堕胎、乱伦或同性恋不构成一种“宪法权利”，岂不自相矛盾？不错，我一直使用“宪法权利”的概念。是否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在宪法权利以内呢。老实说，“自由就是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一切事情”，这句话中的“自由”二字，带着很浓的大陆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痕迹。虽然它一直被当作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一句经典性的表达，其实基本上是同义重复。我一直对此并不完全以为然。当“自由”一词被更换为“权利”时，你会看出差异。英国普通法中的“权利”观，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当中的权利，不是一种逻辑推导出来的结果。因此，你看人可以做的事（也就是政府无权对之动用强制力的事）多得不得了。但公民的“宪法权利”，在世上任何一部宪法中，也只有那么十几项。因为宪法权利是法律对那些在历史上形成、在历史中生长并在历史上得到辩护的，值得人类去珍惜和捍卫的自由的一种法律化和类型化的表达；而不是对任何想象出来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在公共生活中并

无根深蒂固的传统可言的“做任何事的自由”的，一种彻底的涵盖。国家不能干预同性恋的性行为，是因为人人享有人身权，同时享有财产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项宪法权利，筑成了一道防线，使发生在私人产权范围内的任何成人之间的自愿性行为（乱伦、群交、同性恋或其他），都不能受到政府强制力的审查。换言之，法律只能看不见这些行为，而不是说我看见了，并且我承认这些行为本身构成一项宪法权利。

举例说，乱伦显然不是一项宪法权利。如果是的话，婚姻法禁止三代以内血亲通婚就违宪了。同性恋婚姻也是如此，堕胎也一样。美国最高法院 1972 年在罗伊案中，认为堕胎的自由选择属于公民的隐私权，而隐私权则在之前的一个判例中，从宪法修正案中引申而出。但这几十年来，当初这一宪法权利的推导过程一直都受到质疑，认为宪法依据不足。包括两年前去世的首席大法官奎伦斯特，也不同意这个推导。假设一个最高大法官以你的方式论证说，因为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堕胎是非法的，因此堕胎当然就是一项宪法权利。那这个论证实在是一个笑话。这是欧陆启蒙作家们的论证方式，不是一个英美法官的论证方式。当然也不是我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论证方式。

当李银河女士主张同性恋、以及各种自愿性行为的“非罪化”时，我同意并支持。当她的言论自由受到刁难、羞辱甚至压制时，我更加支持她。这也符合圣经的立场。耶稣在抹大利妓

女的故事里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基督没有否认卖淫是在上帝面前的一种罪，反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再次肯定了卖淫确实是一种罪。但基督质疑的是我们的审判权。因为我们也是罪人，甚至如我前面说，一样是犯淫乱的人。因此基督徒会坚持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但也会坚持认为，同性恋者也好，妓女也好，都应该免于被这世上的任何人扔石头（是真的扔石头，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扔石头。比喻上的“扔石头”是言论自由）。因此，我当然支持“同性恋者的权利”，就是他们被免于拘留、罚款、劳教、判刑或其他制度性歧视的权利。这就是“非罪化”，我的说法是“非治安化”。

也可以借助“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来分析。你可以说，我认同“同性恋者的权利”，是一种免于强制的消极的权利，但却不是一种可以合法排除阻碍而积极达成的权利。老实说，我对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划分也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从来不是一种消极自由，而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可以积极达成、可以拿着尚方宝剑排除非法阻碍的权利。以言论自由为例，不是当政府主动立法干预、限制或取消我的言论表达时，我的权利才被激活。而是当这个制度的任何一个层面，影响了我言论表达的机会与效果时，我都可以要求排除此类障碍。我可以要求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受到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的审查。你说这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呢。

但李银河女士受到诟病，也因为她将一种道德行为（道德

或不道德的行为)应在公共生活中不被强制的正当性,过分地夸大了。或者说,她过于暧昧地省略了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各种非婚性行为给出道德上的适当评价。“权利的正当性”,其实已构成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最强势的一种话语。当人们理直气壮地说,“我有权利如此这般”。这句话的社会氛围,甚至已暗含了一种道德上的合法性。换言之,人们不知不觉地开始把“权利”道德化了。“我有权利如此这般”,只是表明你的行为将不受到公共权力的强制,但不表明你的行为在道德上具有一种正当性,也不表明你的行为值得他人尊敬,更不表明你的行为可以免于社会舆论的抨击。

而基督徒,就是在道德上对同性恋及偷情、乱伦、性交易、性聚会、婚前同居乃至一切婚外的性行为,都会进行批评和反对的一个意见人群。尽管我信主之前,一样有过婚前同居。但我承认这放肆的罪,并曾为此而哀哭。你若曾向上帝哀哭悔恨过,你就一定也尝过你的眼泪由咸转甜、那蒙恩赦免的喜乐。

乱伦或同性恋,不是一种宪法权利。不过 Pilgrims,最后这一点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抱歉只能作出上述概要的表达,尚不能给出更有力的论证。

三、

Pilgrims, 说到某种道德伦理的保守主义, 的确是许多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共同倾向。《旧约》中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和性关系的界定, 也是犹太—基督—伊斯兰这三大教共同遵循和领受的旧约启示。如果你能在一个更广泛的保守主义的视野中去观察基督徒的伦理观。我想你可以在更公共的意义上, 去理解一种道德与文化的保守主义的价值。

圣经中, 这个基本的界定就是,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离开、接纳、联合、成为一体, 这就是圣经的婚姻观和对性的结合的立场。就圣经的观念而言, 婚姻是上帝设计的, 婚姻中的合一 (包括性的愉悦) 是上帝的祝福和应许。男女成为一体, 也是被造物的一个完美次序, 而不是人的欲望的随心所欲。随心所欲的结果一定是苦难而非自由。性的圣洁和美丽, 在基督徒看来, 唯有在这个关系里才成为圣洁和美丽。

今天, 无论你是否基督徒, 都面临一个时代的危机, 即婚姻的神圣性到底存不存在, 爱情与性到底是不是圣洁的? 在道德上, 唯有当你对此冷冰冰的全然否定, 连自己初恋时对人类爱情的一种道德的和审美的憧憬, 那起初的爱心里所包含的值得珍惜的高于一切动物的梦想, 也冷酷的否定了; 你才可能在道德与生命的价值上去完全肯定同性恋, 说那是天经地义的。

在我看来, 这种肯定, 其实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羞辱。换

言之，当我们仅仅停留在法律和权利的层面上，讨论不要歧视一个同性恋者时，我们的讨论是出于对一个挣扎的灵魂的关切和尊重。而当我们在道德上也夸大这种正当性时，我们恰恰就是在歧视一个灵魂。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灵魂的苦难，和道德上的罪的人，恰恰是把他们和自己看作同样的人，有着同样的灵魂，同样的被一位上帝所创造，所关爱，所拯救。并且相信我们的爱同样不是由生物性所决定的。而那些明明是异性恋者、却又“政治正确”地宣称同性恋是人类正当生活方式的人，其实恰恰没有把同性恋者当作同样的人，恰恰没有给予他们的灵魂以同等的尊重，也不看他们是自己的弟兄姊妹，而把自己优越地撇开了。一旦你承认自己是“正常”的和“正当”的，而又承认有一种人是“天生”的另一种人。人人平等在你那里其实就是一个谎言。换言之，你的所谓宽容在表面上“政治正确”，骨子里其实是一种“性的种族主义”。

有一次，我直接地问一位自称支持同性恋的女学者，如果今天你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你会不会伤心？会不会难过？我们不要谈理论，就用心去体会我们是否难过？她很诚实，想了想，承认说我会难过。我说，这是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当你说你支持同性恋的在生命意义上的正当性时，其实你并没有爱他们，没有真关心他们的灵魂，就像爱你的女儿一样。你会自然地为你的女儿难过，但你却被一种意识形态说服了，不去为他们难过。

作为基督徒，我坚持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否认上帝、也否认生命意义的罪性，同时也是一种个体的苦难。因为我相信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人。一样忧伤、一样有罪、一样不能自拔、不能自我救赎。因为这世上本来就只有一种人，就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一种，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而死的那一种。

我想对同性恋的朋友说，那些无条件支持你们、声称尊重你们选择的人，并不一定真爱你们，或不知道如何去爱你们。他们可能真想帮你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但他们可能既不承认这世上有真理，也不承认你们有相同的灵魂。而那些批评你们的人，也不一定不爱你们。他们爱的是你们永恒的灵魂，尽管你们不一定认同。

四、

基于认可同性恋的几个常见思路，提供几个反驳：

1、“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个暧昧的命题是一个知识论上的神话。这个神话也并不能为同性恋朋友真正提供安慰和勇气，反而加重了一些人的宿命般的挣扎和内心苦难。换言之，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神话。同性恋有生物学和心理学上的因素，并不等于一个同性恋者就是“天生”的。强奸犯也有生物学上的基础，甚至生理上的某项指标，可能明显比一般人群高。但这并不能构成对强奸犯的一个轻罪辩护。以前的刑法理论有一种臭

名昭著的生物学流派，通过识别生物学上的特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更有可能犯罪，高概率的人群被称为“虞犯”。同性恋有生物学上的指标，因此同性恋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一命题既否定了道德的本质，也与当年“虞犯”理论的逻辑如出一辙。男人偷情的生物学基础就更明显了。性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男人的性反应比女人快，更易被引发，没有周期性，性反应和性心理特征更集中于身体，更不易受到干扰。那么这些生物学特征，是否能够直接转换为一个道德性的评价指数。意味着男人偷情是比女人偷情更值得原谅，更天经地义的？因为有生物学的理由，这个理由就可以直接构成道德的理由？

“天生”是一个带着价值判断的概念。但“生物学的指标”，不能为道德的正当性提供当然论证。也许男人真的天生就好色，也许某个强奸犯的性欲真的超出常人，也许有人非要乱伦，才有性高潮。这些都可能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并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当然你会说强奸犯不同，他伤害了别人，同性恋没有伤害其他人。这一层我会接着谈。但这里的逻辑是关乎“天生”的或生物学指标是否具有道德正当性？我想你应该承认，这一“正当性”不能在一个整全的道德观中获得自洽。除非一个妻子当丈夫偷情时，心甘情愿地承认“他偷情比较道德，我偷情比较不道德”。其实在这一点上，基督徒是最有个人体会的。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从悔改自己“天生”的罪开始的。是从承认“我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开始的。“天生”恰恰不是无罪的辩护，反而是认罪的开始，当然也是挣扎的开始，和得到平

安喜乐的开始。所以我想，在同性恋者当中，基督徒其实是最能够理解同性恋者的一个群体。因为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包括淫乱的罪，并曾经为此痛苦和挣扎过的人。而且如有必要，也是愿意在众人面前为这罪及其悔改作见证的人。

在知识论上，我不相信生物学的指标，可以推导“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一不负责任的道德正当性论证。这是我的认知立场，但我不是专家，所以不打算在这一点上继续延伸。

2、“没有伤害别人的自愿行为”，这也不是一个道德正当性的论证。而只是一个“不被强制”的理由，是一个针对公共权力的、而不是针对道德观念的禁止条件。即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允许政府的介入，而不是不允许在道德上被批评。今天在这个议题上的最大误区，就是“权利上的正当性”被夸大和误会为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事实上，除非你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否则也不可能把“自愿的、没有直接伤害别人的行为都是道德的”这一命题贯彻到底。前文已举过乱伦的例子。按你的逻辑，没有伤害别人就不能说不道德。那你是否认为亲兄妹可以结婚、或母亲和儿子可以自愿相爱呢。你是否认为全世界的婚姻法，都侵犯了有恋母情结的人的天赋人权呢？为什么亲兄妹不能结婚，即使作了绝育手术也不准他们结婚？自由主义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困难的。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使一个诚实的人不得不在“道德是一种普世价值，道德一定有一个超越

性的标准”的命题，与道德虚无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你若支持同性恋却反对乱伦，你在逻辑上就是凌乱的。同性恋当然和乱伦不同，每一种处境都不同。问题是每一种论证，每一个自我道德观的命题，都应在一切处境下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假设一位同性恋朋友看见报纸上说，某地有一对母子乱伦，甚至要求结婚，他的第一反应可能和你我一样，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可他自己却主张同性恋者可以婚姻。那么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受苦的灵魂，因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苦难，而选择使自己活在一个断裂的世界里，以世界的断裂为代价，来提供虚假的个体意义和安全感。我若看见这一点，却不敢讲出来，我才真的得罪了他们。

3、对我来说，同性恋的不道德出于圣经的启示。基督徒相信婚姻及其道德，是上帝所定义的。但这一定义不但在圣经中，并且也在人心和历史中被显明，因此今天世上的民族和国家，无论是否受到圣经影响，“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都是人类对婚姻和爱情的最主流的界定，也是这个世界亘古以来最具有正当性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理想。你说“我不相信圣经”，这并不重要。绝大多数的非基督教国家，一样也活在这一人类婚姻的文化遗产之中。而圣经的影响也不只是文本性的影响，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影响，而且是一个今天仍有 20 多亿人所坚持的一种伦理观的基础。对一个多元社会来说，不谈信仰，这一经验主义的正当性理由就已经足够了。

而在《圣经》启示中，婚姻是一男一女在上帝面前的盟约，是在圣爱之下的彼此委身，是从此向着一个人的生活死，向着两个人的生活活。性是这种合一与委身的最美丽的表达，是上帝之爱在一男一女中间行走的记号。中国古人则认为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从来没有一种婚姻观，认为婚姻及其正当性是由国家和政府来定义的。可我们今天呢，大多数人在婚礼上，既不是以上帝或上天的名义宣告一个婚姻，也不是以父母之名宣告婚姻。而是——多么可耻啊——宣读结婚证书，以政府的名义宣布一个婚姻的正当性。这一婚姻中的国家主义偶像，与个体层面的生物学的道德论证，相互迎合，正是导致当代同性恋问题泛滥的一个根本困境。婚姻不但被世俗化，生物化，而且也被国有化。

无论我们的道德观是否相同，我想你都会承认一件事，就是婚姻的意义和正当性一定与国家无关。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被上帝定义的，你不认同也没关系，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婚姻可能是被人类历史文化的传承定义的。但无论如何，婚姻都不是由国家定义的。通过一次投票或修改法律，就可以决定什么叫“婚姻”，就可以赋予一种性行为以道德正当性的冠冕。我想连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同意这一点，这是多么荒唐和霸道的逻辑，干嘛不把《新华字典》也拿到全国人大上投票表决呢？

所以我说，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合法化”，乃是反对一个关

于同性恋的乌托邦，和一个国家主义的道德乌托邦。这涉及一个政治哲学的命题，“婚姻”和“国家”，谁先谁后？显然未有国家之前，就有了婚姻。这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自由主义政体的逻辑。国家的婚姻法，就如整个民法，是对先于国家的那些个人自由的承认，而不是创造。国家不能反过来定义什么是“婚姻”。这不是一个可以落入“民意”或“立法权”范围内的事项。婚姻就是婚姻，婚姻在一切性行为中立起一道永远的界碑，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你的自由选择是一回事，你要改变这一正当性的信仰根基和历史传承，就是另一回事。假如你相信人是猴子变的，我要说一句也许刻薄、但却是将经验主义逻辑贯彻到底的话，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信仰的角度看，“同性之间的婚姻”只有一个逻辑上的机会，就是等待人类的下一次进化。

不错，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而基督徒(至少是福音派基督徒)这一元的立场，是根据圣经伦理观，认为同性恋的泛滥（包括对同性恋在道德上、而不只是在法律上的认同）显示出整个社会在道德上的堕落。中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也许希望向社会表达这样一个肯定的、但尚不被社会了解的看法，即将同性恋视为人类正当的和美好的性关系的一种，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与国家无关的议题，是一个灵魂被罪所捆绑的苦难问题。因此，我认为基督徒第一应当反对的，是国家法律对同性恋者的任何强制性的治安处理；第二也反对同性恋者向国家争取“合法化”的内容，基督徒应当指出这是一

条无益的道路。第三也应反对一些激进的基督徒向国家寻求法律干预的行为。尽管最后一点对中国来说尚没有什么针对性。因为缺乏宗教自由，许多基督徒和同性恋者一样都是偷偷摸摸的。甚至仍有不少基督徒不敢或不愿在同事、亲友面前见证自己的信徒身份。在网络论坛上也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做基督徒其实和做同性恋者一样，都可能承受超出一般意见的谩骂、侮辱和不友好的言论待遇。因此基督徒，更应该体会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痛苦和困境。

4、我们讨论的重心，并不是基督徒要求非信徒“都要按基督教信仰提倡的那样生活”。对基督徒来说，首先，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而不只是基督徒的上帝，这是我们的信仰。其次基督徒也相信基于圣经的婚姻道德观，是上帝对人的要求，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要求。第三，基督徒自己都很清楚违背上帝对于圣洁婚姻和性关系的诫命，会带来怎么样的痛苦、挣扎和诅咒。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这一切，知道这种诅咒和审判将有多么真实。当同性恋者越过了一个针对性的诫命和边界时，在这种诅咒之下，不可能有什么“在人间意义上纯洁的、感人的爱”。在基督徒看来，人间的爱是对上帝之爱的效法、领受和接近，爱一旦越过了界限，有的只是苦毒。一个基督徒也知道他曾经历的赦免的真实性。这是一个基督徒向社会包括向同性恋者表达自己道德立场时的一个生命前提。我们不是向同性恋者传递一个可怕的定罪，而是传递一个真实的盼望。一切眼泪都会被擦去、一切苦毒都会被安慰，而我们无论如何不堪，无论

处境如何，都可以重新活在平安喜乐当中的那个盼望。

今天，中国的福音派基督徒正尝试着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清楚明白地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目的是让其他人群更加了解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一元。彼此影响、彼此对话。尤其是在社会对此并不清楚的时代。这就是孙海英事件的意义。从李银河等人的反应看，这些颇似“前卫”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太了解他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很奇怪的是，李银河女士不可能不了解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美国，支持同性恋合法化与反对同性恋合法化，是两种如何尖锐并势均力敌的意见人群。但她的反应，却好像孙海英真是从中世纪刚刚走出来似的。那些鼓吹同性恋合法化的人，给了中国人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以为赞成同性恋是这个世界上最流行、最进步、最主流的趋势。谁不赞成谁就落伍，就政治不正确。可他们一点都不谈，在这个世界上所谓最文明、最西方的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和孙海英一样反对同性恋。在美国参议院里，至少有 70% 的参议员和孙海英一样反对同性恋合法化。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 10 亿以上的人（而且并非世界上受教育程度、财富程度和智商程度最低的 10 亿人），所持的基本立场都和孙海英差不多，也和我差不多。而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可能有数千万的福音派基督徒，持有类似的想法。其余佛家、儒家的信奉者中也一定有相当人群，可能持类似的道德保守主义立场。可是 Pilgrims，为什么连你也以为，一说起反对同性恋，就一定是和中世纪或专制主义联

系在一起的呢。这是对当下时代的道德观格局，显然存在着一种无知和误解。原因在于某种看法的普遍性和正当性被高估了，因此保守主义的道德观的表达，才显得这么奇怪。我在这里不是要高调地批评同性恋，而是首先希望你对这个时代的道德观的格局，有一个符合事实的了解。

5、至于有人辩称，乱伦禁忌也是生物性的产物，尽管乱伦的确会带来生物学上的不利后果，但乱伦的禁忌从来都是道德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法律上的乱伦禁忌所指向的，自古以来都是一种道德性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名分”，而不一定是真实的血缘联系。这就是“伦”的意思。可以把两者区分开来的例子，就是法律上称为的“拟制血亲”。大概有三种，一是姻亲，无论是旧约的《利未记》，还是可兰经，或者古代罗马法，或者欧洲中世纪的法律，都一律禁止娶继母、继女为妻，也禁止娶岳母或儿媳为妻。在《新约》中，保罗曾公开要求教会把那个与继母结婚而不悔改的人，从会众中赶出去。二是收养，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法律，都一概禁止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婚姻。有意思的是，《旧约》中反倒没有这一限制。今天很多国家仍有这个禁忌，但罗马天主教却根据圣经，比较质疑这个婚姻障碍的正当性。第三种是宗教性的拟制，即教父母与教子女，或中国比较世俗化的“干妈干儿子”。这在教会法中也是一直禁止的。全世界的古人都有相同的立法，不是因为他们都傻到以为“拟制血亲”之间结婚，也会生出畸形儿，而是出于他们对道德价值相同的和普遍的关切。

今天，法律上对“拟制血亲”的多数结婚禁忌，已逐渐被取消。这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所致。但法律不再施以强制性的禁忌，代表着法律的谦卑，而非代表道德上的正当性。而目前，如果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自愿放弃生育能力，各国仍然都不允许他们的性关系被称之为婚姻。你不可能同意同性恋，反而不同意一男一女之间的“真心相爱”？那么一个“真诚”地爱上自己继母的儿子，一个“爱上”岳母的男人，一个“真诚的爱上”自己堂兄的女子，假如社会不允许他们结婚，或舆论充满对他们情感的质疑和批评，难道这不会给他们“造成心灵和肉体的苦难吗”？我想也一定会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出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道德上慢慢地允许一切人伦之间的“自愿的性关系”，可以救赎这样的生命苦难吗？你不一定同意一个基督徒的观点，但我想表达的是，这不是真的出路。至于为什么不是，则和我的信仰有关。也和圣经对“爱”的教导有关。不过这已超出文章的论域，就此停住。

结束之前，我想向陷在同性恋中，甚至被某种不负责任的理论暗示自己是“天生的同性恋”的朋友说，我没有经历你们的挣扎，但我一样经历过性的挣扎和试探。无论是手淫、淫秽图片或心中对异性的邪念。当年一些理论告诉我，手淫有利于心理健康，是正当的，是天生的。我很喜欢这样的理论，因为它讨人的好。但当我在青春期陷在反复挣扎和精神痛苦当中时，我产生了怨恨。我才清楚地知道，原来那些理论及其倡导者根本不在乎我灵魂的苦难。他们恰恰是缺乏爱的、不负责任的理

论。我的罪，即使是在“不可淫乱”这一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的诫命中，也一点不比你们更高尚。但我直到有一天，完全承认了这一点，不但在上帝面前悔恨，今天也在你们面前承认这一点时，我就得到真正的赦免、医治和改变。不错，没有人可以赦免人，也没有人可以定罪人。所以当一位基督徒说同性恋是一种罪，他们不是在定罪你们，而是在诚实地传讲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将你领到上帝的话语面前，你自己去面对。你要否定，你也要亲自地去否定。但在一切人之上，赦免和定罪都是如此真实。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我们情欲的道德律，不管这社会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的苦难都将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苦难。两个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固然令人绝望，一男一女之间也一样如此。你们活在你们的苦难里，我们活在我们的苦难里。除非这世上没有救赎的可能，如果有，能拯救同性恋者的，就是能拯救异性恋者的。希望在你身边，有基督徒可以真正来关心你，帮助你认识那一位神。如果你在成都，我欢迎你随时来参加我所在教会的聚会。尽管我们的聚会有时会被警察干扰，但教会的门永远向愿意进来的人敞开。

你的弟兄，王怡

2007年9月4日修订

| 2008

对成都宗教局和警方冲击 秋雨之福教会的声明

2008年5月2日，成都市宗教管理部门和警方出动约40余人，对秋雨之福教会的室内聚会进行冲击，对在场的信教公民进行强行登记、拍照，对聚会的主要带领人进行隔离询问，并以“涉嫌非法传教”的名义，扣押了信教公民的私人财物，并强迫中止了信教公民的合法聚会。我们认为，宗教管理部门和警方的这一行动，缺乏法律依据，在执法程序上严重违法，执法过程中也令人遗憾地出现粗暴野蛮的现象。这对政府对和谐社会的提倡，对文明执法的要求，及奥运会之前倍受国际国内关注的社会氛围和人权状态，尤其是对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都构成了极大的

损害。

我们认为，成都宗教管理部门和警方的这一粗暴执法：

1、与 2004 年《宗教事务条例》第 12 条“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的立法精神相悖；

2、与 2007 年《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第 8 条“信教公民按照教义、教规和习惯，有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也有在自己家里过宗教生活的自由”及第 24 条“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的立法精神相悖；

3、违背了 1997 年以来国务院对国际社会关于“以亲友为主、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的说明和承诺，而以粗暴的执法，陷中央政府于不义和无信的处境。

4、与国家主席胡锦涛以中央中央总书记身份，在 2007 年 12 月 18 日发表宗教问题讲话中所说的“坚持以人为本，团结信教群众”的主张和要求，也是直接抵触的；

5、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 2008 年 3 月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所说“我们只管理宗教事务，不管理宗教”的开明态度，也大相径庭。

我们也注意到，5月1日，美国部分参众议员联合12个国际人权组织召开新闻会，强烈谴责中国奥运之前的人权状态，其中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情况。作为信教公民，我们既对这些针对中国的批评感到痛心，更对成都宗教管理部门在5月2日对我们的这一粗暴执法，继续为类似的批评提供口实，而感到更加痛心。

我们决定：

- 1、向成都市宗教局说明我们对这一粗暴执法的意见；
- 2、也向众家庭教会、社会各界及关注信仰自由的国际国内舆论，说明事实经过和我们的意见；
- 3、耐心等待宗教局的行政处理结果；
- 4、决心以合法和温柔的态度，顺服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和程序，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向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申诉、控告、请愿，向成都、四川及全国人大提出个案监督、特别调查、违宪审查及公民请愿，以及根据宪法第41条，向政府及其具体执法人员提出公开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等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任何侵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的不同意；
- 5、并怀着为政府祷告、为国家祝福的心，帮助政府在文明执法

和尊重公民信仰自由、并克服对一个信仰自由的多元社会的恐惧感等方面，尽到基督徒作为一个好公民的责任。

一、事实经过

2008年5月2日，基督教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团契，在成都双流县九江双龙园度假村，包下14个住宿房间，和一间会议室。利用五一假期，进行团契的退修聚会，预备内容包括6小时的“全人敬拜”课程，敬拜赞美，新信徒的洗礼，以及游戏、体育等活动安排。团契共有11个家庭、大人孩子共44人参加聚会。预计从5月2日早上10点，到5月3日下午15点结束。

2008年5月2日下午15:44，大约20名着便装的执法人员，未经允许，强行闯入正在唱诗的聚会室内。未进入室内的，尚有着便装或警服的宗教局执法人员、辖区派出所民警，及未表明身份的公安系统干警及少数联防队员不少于20人。随后，双流县民宗局和成都市宗教局的两名干部出示了执法证件，带队的是成都市宗教局副局长红晓。他们表示，收到举报，认为我们的聚会“涉嫌非法传教活动”。

团契的带领同工王怡，向执法人员出示了身份证件，表示愿意接受调查。本教会的三名主要同工王怡、周茂建、陈中东，

与成都、双流两级宗教局的带队干部，及一名未表明执法身份的公安人员，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的谈话。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交流：

1、什么是不需要登记的、“以亲友为主的家庭聚会”？

2、如何界定“亲友”的范围和规模？

3、什么是“公共场所”？度假村的包租房间，是否属于公共场所？

4、什么是“传教活动”？家庭教会内部的团契活动，是否属于“传教活动”？

5、未登记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是不是《宗教事务条例》所说的“信教公民”和胡锦涛讲话中要求团结的“信教群众”？

三名同工表达了对上述问题的基本意见：

第一，我们是以“亲友”为主的家庭聚会，包租的房间是私人场所，信教公民在包租的房间内聚会，与在其家庭住宅内聚会的法律意义是一样的。

第二，我们的聚会是团契内部活动，在封闭的非公共场所进行，并未涉及具有公共性的和针对非信徒的“传教活动”。即使不提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按《宗教事务条

例》的规定，我们此次聚会也不具有行政违法性。

第三，信教群众在度假村包租房间，聚会、度假，不但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更受到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民事契约关系的保护。无论根据《宗教事务条例》还是《治安管理条例》，都无权对公民的人身进行强制，更无权要求我们离开。

红晓副局长表示，除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是要团结的“信教群众”外，其他问题均与我们的看法相反。三名同工表示，请执法人员出具冲击聚会的法律依据，遵照程序执法，并愿意等待他们的现场处理决定。

在三名同工与执法干部谈话期间，其他执法人员将聚会的信徒群众软禁在室内，强行进行身份证登记，和拍照、录像。其中出现不少粗暴执法的行为，如不出示执法证件；对未带身份证的公民进行人身威胁；试图抢夺私人财物等。在进行完登记、拍照和录像后，并威胁和强迫部分信教群众回房间取行李，要求离开。在三名同工与执法干部谈话完毕后，一名未表明身份的公安人员，并以粗暴的方式，将三名同工堵在房间内，阻止他们回到聚会的室内。

各方执法人员现场开会，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告诉我们，成都市两级宗教部门，决定以“涉嫌非法传教”的理由，暂扣涉

嫌非法活动的物品。三名同工表示不服，但表示接受他们的现场决定。执法人员提出扣押王怡的个人电脑，王怡表示不接受，但愿意将电脑桌面预备的圣经课程、敬拜赞美、游戏活动等 PPT 文件复制给执法人员，以配合调查。但在王怡被隔离调查的情况下，三名执法人员在没有被调查方在场的情形下，曾强行重新启动王怡的个人电脑，严重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和隐私权，后因被发现而中止。

执法人员提出暂扣的物品包括合法印刷的《圣经》，及部分合法出版物。三名同工表示反对，认为这与所涉嫌的非法行为无关。因为公民在任何地点和时间，都有权携带、阅读和赠送合法的出版物。但在执法人员坚持下，我们再次表示了配合调查的态度。

宗教局扣押的物品包括：

- 1、唱诗班服装 10 件；
- 2、复印的诗歌文件本 12 本；
- 3、书籍两本，圣经 10 本；
- 4、教会的空奉献箱一个；
- 5、用作游戏奖品的 DVD 碟 18 张。

此外，执法人员未经许可、列表，拿走课程讲义、课程复印资料若干，及王怡个人圣经中的笔记本等私人物品。

此后约半个小时内，执法人员对王怡、周茂建、陈中东三人，进行了分头的调查笔录。三位同工在调查中表明自己是聚会的组织者，表示我们的聚会是合法的，对他们的认定和决定表示不接受。

成都宗教局副局长红晓表示，他的工作到此为止，暂扣的物品调查结束后，一定会如数返回。但公安人员转而对度假村的老板进行威胁，要求他们中止与我们的合同关系，以间接的方式逼我们结束聚会和度假。为了不与度假村发生纠纷，我们同意离开。

大约当晚 19:00，我们全体离开度假村。在确定我们上车离开后，40 余名执法人员也陆续离开。

整个过程中，尽管我们不同意宗教局和警方的上述行政行为 and 行政决定，但对执法人员的工作，始终保持了克制、配合和顺服。

二、我们的意见

这是一次缺乏法律依据、违背法律程序的非法的行政调查行为：

1、整个执法过程中，进入执法现场的公安人员没有向被调查人出示执法证件。当王怡向执法人员清楚询问当天的执法主体是谁时，红晓表示是双流、成都两级宗教局，根据《宗教事务条例》执法。其中一名便装公安人员，在整个过程中粗暴、野蛮，在被调查人王怡几次反复强烈要求他出示证件的情况下，仍然拒不出示。因此在法律上，我们不能视其为政府执法人员。我们将根据事态发展，考虑向社会公布我们所获知的这名非法人员的个人信息。

2、整个执法过程中，宗教局的执法人员也没有向我们出示和提供任何法律依据，甚至连《宗教事务条例》和《成都市宗教事务规定》也没有出示。一切针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强制措施如登记、拍照、录像、人身扣留和暂扣财产等，均没有根据国务院、四川省或成都市的宗教管理法规和规章，提供行政执法的依据。因此在行政法上，这是一次典型的非法的行政调查行为。

3、整个执法过程中，没有向我们出具现场的行政决定书，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行政执法的正式文书。只有一张临时手写的暂扣物品清单。暂扣清单上，没有任何一名执法人员的签名，也未说明这一取证行为已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因此，暂扣决定也是一个缺乏法律依据的非法的行政强制措施。

三、我们的要求

1、我们敦促成都和双流两级宗教管理部门，慎重处理此事，撤销现场行政决定，对违法行政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退还被暂扣的信教公民的私人财产。

2、我们要求成都市宗教局副局长红晓，代表执法各方，对执法过程中的上述违法情形，向被调查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会众，作出书面和口头的道歉。

3、我们要求双流和成都宗教管理部门，对于我们在双龙园度假村聚会被冲击、停止的损失，包括我们长期预备安排此次活动所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进行赔偿。我们将在适合的时候开列出损害赔偿的清单，提交给成都市宗教局。

4、我们要求成都市宗教局提请国家宗教事务局，尽快出台《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细则。尤其是对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的规定，是否包含了家庭教会的非公开聚会的例外；对“亲友”的定义，“为主”的涵义，“亲友为主的聚会”是否受到规模的限制；以及家庭教会的聚会是否可以在包租的私人场所举行等问题，作出清楚合法的解释，以防止地方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对政府与家庭教会信教群众日益缓和下来的关系，造成破坏、挑拨，人为制造社会冲突和恶劣的国际影响。

5、我们要求成都宗教局给予说明，5月2日的执法是否属于与警方的“联合执法”，若是，其法律依据何在？若不是，

为什么在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的执法中需要动用警方？我们强烈质疑这一在针对家庭教会的行政调查中，利用警方进行威胁，并以粗暴的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的方式，来处理政府与信教公民的关系。我们极其遗憾地指出，这往往是导致宗教管理部门与中国家庭教会的信教公民不能进行文明对话和沟通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在这一事件中，不但暴露出成都宗教管理部门行政执法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漠等问题，也暴露出《宗教事务条例》在行政程序规定上的一些欠缺。我们将一面等待成都宗教管理部门对这一行政调查的结论和决定，一面考虑在适当时候对暂扣私人财产这一非法的行政强制措施单独提起行政诉讼。并以爱心、耐心和毅力，等待、观察和监督成都市宗教局和其他政府部门对此事的态度，以决定我们对此事进一步的回应和辩护，并保留一切以温和适当的法律手段，表达和维护信教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四、我们的愿望

1、建议宗教管理部门邀请家庭教会的代表，对如何团结信教群众、发挥家庭教会信教公民的积极社会作用，如何促进政府与家庭教会基督徒的相互谅解、彼此尊重 and 良好沟通等问题，进行交流和研讨；

2、建议宗教管理部门就政府宗教管理方式的改革、《宗教事务条例》和宗教事务执法中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如何保障家庭教会信教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社团登记等一系列议题，召开听证会，以积极和法治的方式，共同推动社会在此方面的进步；

3、建议各级宗教管理部门聘请既懂法律、也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法律界人士，担任法律或学术顾问，举办宗教与法律问题的讲座、培训和探讨。秋雨之福教会的同工、成都大学的法律教师王怡，愿义务担任成都市宗教局的法律顾问。秋雨之福教会也愿意为此类的讲座、培训和研讨，提供人力财力的支持；

4、既然国务院的白皮书、国务院和四川省的条例，均承认基督徒未登记的家庭聚会是合法的，为了逐步消解宗教管理部门对家庭教会的误解和隔膜，我们真诚地邀请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成都宗教局局长赵璐先生、副局长红晓先生，以及任何宗教管理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公务人员，在任何你们认为适当的时候，访问和参加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家庭聚会。

成都秋雨之福教会 全体同工：

王怡 周茂建 陈中东 黄维才 吴茂华 蒋蓉 王海文 王伟

2008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

附：

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地址：成都市东胜街 6 号

电话：028-86637474 传真：028-86241503

从改革宗神学 看政教关系与灾后重建

感谢神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其实我在主里的时间不长，而且非常抱歉晚来了，错过了很多从大家领受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在接受改革宗信仰的过程中，家庭教会在神学传统上带来的争战比较少一点。我和我的同工，在慢慢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感谢神在这些年间，在城市里大大做工。秋雨之福是在这一波城市福音浪潮里，主把我们慢慢召聚起来的，一间典型的教会，以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居多。我自己除在教会讲台服侍，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和主赐的异象，是从改革宗神学所传承和表达的那个基督信仰，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宇宙中的真信

仰，一定是在宇宙中的任何领域都能够透出上帝大能的信仰。因此用一个扎根于圣经上的，和委身在归正传统中的整全的世界观，在这个汉语的世代中，在主为我预备的那些文化领域去阐释和表达基督教信仰。这是我所领受的呼召，就是作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使徒。其中一点，因为我是学法律的，所以特别在这个专业上，我的负担，是以改革宗神学的眼光，来观察家庭教会跟政府的关系。我对近代以来的一种启蒙式的或自由主义式的政教关系，特别有反思和重新阐释的负担。

我今天的分享是试图从改革宗神学来观察教会在灾后的参与及当前政教关系的走向，我想提到三个重要的主题。

第一是国度的眼光。其实“政教关系”并不是圣经或者基督教的概念，而是一个世俗的政治学概念。当然基督徒几乎都会说我同意“政教分离”，我们没有意见。但仍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当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时，他一定是在一个国度的眼光中的。换言之，他不是在国家内部，去看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如何。而是从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与这个世界，这个地上之城之间的关系去看的。政教关系，是从世俗的政治学角度，对罗马书第5章所说的“亚当”和“基督”两个国度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如果末日之前，在属灵的意义宇宙中只有一个国度，就没有什么政教关系之说。在伊甸园，是“政教合一”的；在新天新地，也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反过来，当天使堕落，人犯了

罪，在宇宙中自以为建立起一个自立为王的国度时，这个世界就被迫“政教分离”了。再反过来，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在上帝没有以眼睛看得见的方式，在这个眼睛看得见的世界中作王之前，这个世界就一定而且必须是“政教分离”的。任何意义上的政教合一，都是对上帝的叛乱。但改革宗的主流传统，相信上帝的确以眼睛看不见的方式，至始至终在世界中作王，不是到千禧年才作王，今天就在作王，不但在我们这个会场，今天下午，同时也在中南海作王。

世俗国家的权柄，是上帝设立的。正如教会的权柄、天国的钥匙是上帝设立的一样，唯独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才能理解政教关系的实质。它的实质就是两个国度的停火线，在哪里停火，就在哪里等候和平之君。国家在任何层面上都不能干预教会事务，在任何层面上都无权闯入人的良心自由。因为国家的疆域，原本就跟灵魂的国度没有关系。所以从路德到加尔文，到诺克斯，都坚持这个不可妥协的圣经原则，就是地上有两个国度，我们同时活在两个国度当中。这两个国度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是重叠的。所以基督徒看政教关系是以国度的眼光，绝不是从国家内部去看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所以，这是处理政教关系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教会及其同工，圣经说是神奥秘事的管家，是神话语的一个托付者，我们所传讲的，我们祷告里被成全的，我们生命里活出来的，都是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的呈现。威斯敏斯特会议期间，有一个委员去国会发表演讲，说，你们这些贪婪的人啊，你们拥有了刀剑和军

队还不满足，还妄想得到天国的钥匙。今天，我们要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勇气，总要站在这个贪婪的世代和国家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

5月12号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当时我在家里，我们家是16楼的层高，摇得特别厉害，那个时候，人们全都跑下来了，市民恐慌了，成都几百万人呆在大街上。差不多两点半地震，我上街之后三点钟，开始给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发短消息。因为宗教局到我们教会冲击过两次，所以我手机里差不多有四个宗教局干部的号码，我给他们也发了消息，祝福他们。当时大家心里还很惶恐，后来有一个干部回了短消息，说感谢我对他的鼓励。我这么做，不是从世俗的角度去讨好他，或者说趁机可以拉好关系。我们会说，这是出于基督里的爱。这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眼光，是说这是天父的世界，是我天父的世界。这世界发生一切事，包括地震了，我们基督徒都是管家，都是领受了修理看守的职分的。尽管看上去，好像是政府在“修理”我们。在身体的层面上说，也是的。但当一个公务员的灵魂受到惊吓的时候，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当仁不让的管家，当仁不让的治理者。安慰他们，不但是福音使命里面的一个行动，也是文化使命里面的一个本分。就像医生照顾病人，是他的本分一样。在灵魂的国度里，照顾一个地震后的世界，这是教会的本分，而且除了教会，谁都没有这个本分，这个托付唯独在我们身上。所以我那天一下楼，看见满街的人，就在心里叫一声，主啊，我们要怎么交账？

所以你是用一个国度的眼光，不但去看抽象的政教关系，也因此去看你和一个宗教局干部之间具体的关系。

第二是管家的职分。林刚长老说，我们要去思想，神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复兴和使用改革宗神学？我的粗浅看法是，当我们看见教会总要慢慢浮出水面，基督徒开始影响这个世界，参与和更新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圣言的托付者，有一个管家的职分。教会的参与，给教会提出很大的挑战。你有没有一个整全的基督信仰，一个天父世界的眼光，决定着你到底要去如何行。尤其这两周多，成都的各教会在赈灾救灾的事上，我们也会有一些看见。在第一周的时间，最大的感受就是乱。有一些弟兄姐妹先去灾区，当他们回来分享时，他们主要的感受就是心很乱，不平安。他们要做事情，也在做事情。但老实说，还不是在一个天父的世界中做事情。一个同工在医院服侍，问一个相处几天的义工，你有信仰吗。他说我是基督徒。又问他，你为什么来医院呢。他说，我是中国人，这是什么时候啊，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来的。这位同工的心一下就痛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只是肉身的反应。无论是否基督徒，都被灾难震惊了，再刚硬的罪人，也有恻隐之心被有限地激发出来。无数人是凭着残存的良心的一个回应，去参与救灾的。然后社会舆论把这种道德性拔高到一个偶像的地步，大肆渲染中国人的良心，中国人的打不垮。一场灾难带来的最主要的社会效果，并不是人的悔恨，反而是一场偶像崇拜。

所以我慢慢看见，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做的，是作为管家去做事情。管家第一要尽自己的本分，第二要把这个天父的世界交托给天父。不然你开车去送东西，第一种情况，是一路上看见满目疮痍，如果你不能交托，你一辈子都走不拢目的地。第二种情况，是你送东西去了，你心里就平安了，你不去，心里就不平安。可是你的平安不是建立在基督里面的，是你的行为带给你的，你假设你的行动可以带给你的。你做事情是为了安慰你残存的良心。换言之，就是在苦难面前，你回到了以行为称义的自我成全的企图。

所以这时候我看到的，其实不是救灾，反而是教会牧者的负担。成都的教会在未来几年里，需要几倍于地震之前的牧养、教导和关怀的服事，成都和四川的基督徒才能真正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去做事，去交帐。当我们被给予一个机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参与面，去浮出水面，以比以前更公开的方式在人群中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也因此与政府和主流社会的关系得到了一个更新的可能性。这首先是对家庭教会的治理、牧养，和家庭教会在真道上的认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基督徒在某一个时刻，差不多都想去赈灾，想去帮助灾民。但原来每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他首先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需要被提升的人。他到前线去了，回来马上需要在神面前的祷告等候，然后他需要协商，需要被牧养，需要从新得力。教会和团队之间，以前同工较少，连接较少，现在一下付出水面了，更加需要合一。不然闹得不可开交，都是主内的志愿者，甚至到了要

去报警的地步，把弟兄告在不信的人面前。我们看到地震后的中国，上帝对基督徒，对家庭教会提出如此的要求，就是当教会真的开始浮出水面，去参与一个时代从建筑到灵魂的重建时，我们到底在天父的世界里，有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眼光。

如果没有这种管家的眼光，做事情只是一个“好人”心态，基督徒跟其他人一样，看见大灾难临到，觉得一定要做点事，不做就心不安。好人的心态，就是通过做好事去自我安慰，自我安慰的意思就是抗拒恩典。你觉得基督徒以前做得太少了，并没有为这个世界付出更多的爱。其实不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的。好像平常走在马路上，开车撞到人他就会跑，或者红灯亮了他还要闯过去，可是这个时候，他也载着一车物资跑到前线去赈灾了。因为他心不安，他的灵魂被灾难冲击了。那么这时候，基督徒要随时提醒自己，我是以一个好人心态去做事情呢？还是怀着管家的职分去交账呢。我是追随一个从天上来的异象去做事呢，还是追随我的良心的控诉去做事情呢。箴言书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容我说一句，没有异象的慈善，没有异象的关怀，一样也是放肆。

这是我天父的世界，我是管家，教会是管家，我永远带着管家的职分去参与治理这个世界。我在亚当里是乞丐，在基督里是王子。这就是改革宗的文化使命，就是治理这地的使命。我们跟政府是两个国度，教会是眼睛看不见的国度，是一个真实的、大能的国度，在基督里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我们凭着神

的话语的权柄，我们不像政府有很实际的、本质上是强制性的权柄。但我们仍然真真实实、的的确确地，是以传讲神的道、活出神的道的方式，治理着这个世界。教会应当有这样的信心，知道我应该、而且我就在参与和治理这个世界，我凭着神的话语治理这个世界。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一个影子政府，教会就是这个世界的影子政府。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大有能力的王权就来了。但是当基督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地上的影子政府，我们惟一所有的，是凭着神的话语，凭着在基督里的爱去做，而不像政府那样下命令。如果用世界的观点来说呢？你这个根本不叫治理，因为治理就是说话要上算，你这个叫秀才遇到兵。但基督徒却有一个信心，唯有耶和華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是不徒然返回的。所以爱才比恨更有力量，教会比政府说话更算话。政府说，中国要崛起，中国就地震了。但教会说，天国近了，天国就真的近了。我们的信仰是，教会在管理这个地球，教会在管理全地。没有这个信心，谈政教关系怎么谈都是错的。没有这个信心，谈救灾，或是参与灾区重建，都没有办法得胜有余。

第三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我接触一些基督徒，包括部分教会同工，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我们谈圣经经文的时候，他们让我非常尊敬，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也清楚基本的要道，也有活出来的生命。可当我们谈世界上其它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的真道，在他里面没有变成一个好像会随时更新的 windows 软件。我每次上网，发现微软的操作平台每天都在更

新。我就着急得不得了，心想我在基督里的更新速度，怎么就没有这么快呢。

我们因着信仰，就当对世界有一个完整的、分别为圣的看法。我不知道前些日子，围攻家乐福有没有基督徒参加；反美游行，西藏骚乱，台湾局势，腐败，人权问题，没有人可以离开上帝所许可和给定的这些历史处境，而去信仰上帝。CS 路易斯说，我们要有两重倾听，一重是倾听圣经中神的话语，一重是倾听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处境中，去应用、持守和回应上帝不变的道。不是说一定要关心和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说，任何人对这些问题都一定有自己的观点，既然有观点，这观点要么是基督化的，要么不是。

包括一些传道人，一说到台湾，他跟很多非基督徒的“爱国愤青”的可能反应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应该打台湾啊”，“怎么能够容许台湾独立呢”，“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这些观点是谁告诉你的，是基督呢，还是政府呢。是一个非基督教的文化呢，还是一个被神的道所更新的文化呢。甚至当我们唱《宣教的中国》时，说中国是福音的最后一棒时，有没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也在里面呢。我们的异象的形成，是不是其实和政府宣称中国崛起，和儒家宣称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有某种相似性，也和 GDP 的增长率有关系呢？

当信徒缺乏一个整全的信仰，缺乏对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有一套全备教导的信心时，信仰就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部

分而已，它不能来每日更新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套根深蒂固的看法。你的看法，就是你的世界观，仍然是受制于你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受这个世界的观念影响，甚至包括在骨子里受共产党几十年教育影响的。虽然信徒已经摆脱了无神论的影响，但还有很多很深的影响，包括基本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等。

所以，一切反神学的倾向，都是在为我们脑海里的旧思想体系，充当魔鬼的辩护士。因为只有一套基于圣经的神学框架，才能拆毁你脑海里那个比你想象的更顽固的思想框架。所谓改革宗神学，就是对圣经中有一套完备的教义体系的信心和传承。所谓加尔文主义，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有神论。意思是说，在每一秒钟都是有神论，在每一种处境下都是有神论。在每一个人类社会的领域中都是有神论。换言之，就是坚决信靠上帝至高的主权，指望他的恩典和无比的荣耀。

改革宗的传统，是以圣约神学来观看一个完整的世界。以神与人、人与人、人与万物在圣约中的生命关系，来建立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立场。并且在圣约中领受管家的职分和神的托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就发展为一种世界观神学。

基督徒的心里，多少都有一些意识形态，就像官方的意识形态一样。家庭教会里，也会有一套意识形态。但这些意识形态却不一定都是从圣经教导来的。当我们说到教会浮出水面的时代异象时，我们需要先扎根在圣经教导之上的，一个长期的清理，一个杀毒软件的更新。以前，当教会四面墙堵起来，

跟这个社会没有太大交流，我们比较封闭，与这个世界比较分离的时候，这个分歧显得不是那么严重。当基督徒开始在社会上做光作盐，我们以光明之子的身份能够进入主流社会，希望凭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改变，从而影响这个世代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没预备好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你就没有能力进入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些基要派的肢体，他不太认同或不了解改革宗信仰的时候呢，可能说你们讲的文化使命、社会参与，是不是一种“社会福音”？我们当然不是，我们是以福音为根基，惟独基督、惟独恩典、惟独信心，然后在敬畏上帝的主权，归荣耀给父神的虔敬之下，去看待教会的管家职分和给予社会的祝福。但“社会福音”仍然永远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所以这一次，成都、四川和全国的很多家庭教会，大家都动了起来。大家觉得发生这样的灾难，教会一定要做事的。这些天来自各地甚至海外的基督徒团队，每天都会来很多波，到成都来，到各个灾区去。光我们一个小教会，在接待上都已非常疲惫。大家有感动要做事，拼命想做事。但最近一周，我在思想，如果神真给我们开道路，可以更多地进入社会，祝福社会。甚至在未来，我不知道多长，五年，也许十年，二十年，家庭教会可以公开地建教堂，敬拜神，影响社会文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教会本身在治理上，在教义的传承上，包括圣职的按立上，教会在这一切的预备上，最迫切的是领受一个完整的信仰，在大公教会的传承中，建造一个认信的教会，成熟的教

会。这个预备如果不够，好像一个机会来到我们面前了，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方向。

这次救灾和灾后重建，其实基督徒做得并不是很好，至少成都的教会做得并不好，因为我们太弱小。但以家庭教会为主体、以城市教会为主体，的确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夜之间浮出水面的规模。最近，社会学家于建嵘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他看到灾区的基督徒志愿者，他要告诉人们，中国的基督徒是合格的公民。感谢神，开始使用我们卑微的见证。这一次的见证，和以前不同，就是唯有在社会化、公开化的存在中，教会才可能在公众中形成“群体性见证”。而不是个人见证的简单汇合。譬如在以前，我们都知道小敏的见证，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小敏的教会。我们知道吕丽萍是基督徒，但我们不知道她委身的教会，甚至她是否委身教会。

这一周多，我看到很多教会同工都很积极，今天有一个团队来，或者有什么需求很紧迫，马上就组织物资运过去，然后这样到处跑。我们走出来了，但我们也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教牧的危机。教牧有教牧的职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始终圣言的托付者，教会不是福利机构，不是慈善机构，我不是说教会不做这些事，而是说，越是有事要做、有事可做的时候，教会越要清楚知道自己的位分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以怎样的方式去推动、鼓励每一位基督徒在他自己的职分上去参与那些事情。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给教会的建造带来很多挑战

的，就是社会参与、文化使命跟教会本身的建造与治理的关系。在我看来可能非常复杂，因为我还不能想太清楚。尤其是在这一两周，一些成都的教会，有 11 间教会一起组建了“彩虹重建行动”这么一个平台，来推动本地包括外地来的教会团队，参与赈灾的一些事工。这 11 间教会中，多半可以说是有改革宗神学的色彩。无论是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你领受的异象，你有更大的机会开始落实，你一开始有机会，就会看到自己的缺乏，和家庭教会潜在的危机。

这次赈灾当中，也确实看见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整体局面，就是民间社会的参与面非常大。因为以前你只看见解放军在那里，可这一次你却看见，十万多军队在那里，一百多万民间志愿者也在那里。合法或不合法的 NGO，注册或没注册的网站，登记或不登记的教会，有执照或没执照的和尚，偷税的和没偷税的企业，都来了。志愿者里也出现基督徒的身影，在成都的街上，灾区的路上也常常会看见贴着有基督教赈灾车，或类似字样的车队。我个人估计，在四川的基督徒志愿者，可能达到十万人次。但有一个重要的分享，就是当基督徒投身社会参与时，需要一个专业性的、社会化的和非营利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机构。新教跟天主教在慈善和社会福利上，有一个区别，就是天主教会和他的圣职人员，通常会自己去做，结果教会或修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慈善系统。但新教很少是教会自己来做的。家庭教会的途径，也是如此，是透过大量的基督徒机构，去做光做盐。教会呢，用奉献去支持机构，用神的话语

去喂养和鼓励信徒的参与。但是教会本身，我的意思是教会里做神话语执事的同工，不要越过圣言托付者的角色。因为无论任何时候，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将神的话语带给世界，和将世界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其实这是政教关系的一个内涵，就是福音跟文化的一个关系。尤其是接受改革宗神学的教会或基督徒，特别会强调文化使命和社会的参与，既然神已经开始慢慢在中国预备福音的社会参与之路，我们也要特别反思这些问题，准确地说，是在这些问题上反思自己的动机、敬虔、呼召和根基。我们不会希望或真的走得太急，把教会变成失去了教会本身的那个位分。未来中国教会的复兴，最大的果效在这里；但今天，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试探也在这里。

我印象很深的，是以前在美国南部的长老会，里面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问会众：“如果下一周主日是世界末日，你们还会不会到教会来？”然后他说：“不管你们来不来，我是一定要来的，因为我是牧师，我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准时到这个地方来讲道，即使下面只来了一个人，我也要像对着全世界讲道一样”。这就是位分，有人出去救人，这是好的，有人不管天崩地裂，永远站在那里讲道，这是更好的。

在目前，家庭教会其实也没有合法的身份去做更多事情。但在成都参与赈灾呢？教会其实是在后台，各种正式的或临时的基督徒机构，是志愿者团队的主要平台。这些机构多是海外的基督徒机构，有些在本地已经很久了，比如“心连心”机构，

像台湾的“慈福”，台湾的基督徒救助协会，宇宙光等，还有“世博恩”。本地的像“圣爱基金会”，早期本地的家庭教会，通常是透过这些机构平台去参与的。因为他们在红十字会那里可以拿到通行证，有合法的身份。他们可以在车上打上“基督教赈灾车”，或者打上“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把后面的“上帝”省略了就行。然后是“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香柏领导力”等机构。“彩虹重建”也想成为这样一个机构的雏形。基督徒个人的公民身份，在目前，尤其是在城市，还是没问题的。城市的教会，可以支持基督徒机构的存在。用奉献去支持非营利的机构。这是家庭教会“借壳上市”、在城市中拓展基督徒社会参与和合法存在的主要途径。

对城市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目前在大城市，已有一些基督徒机构。成都不算多，也有至少 10 多家。但目前，第一，这些机构大多是基督徒个人的集合，教会的背景很淡，甚至是反教会的。意思就是就是一些没有委身教会的或缺乏教会观的，就聚在一起搞个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团契。第二，因为和教会的关系没有成型，差不多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营利性的。虽然说我做这个是为谁做工，不为赚钱，但始终要收费，赚钱，才能维持。这就不是 NPO 和 NGO。一种是得到海外教会和机构支持的，可以非营利。第三种是基督徒企业家或专业人士（如律师）团契，有自我支持的资源，虽然非营利，却处在营利背景的试探之中。后两者都不依靠信徒们在教会中的奉献，换言之，就是不依靠中国家庭教会的生命成长。

一个人拿 10 万元出来，这和几百个弟兄姊妹的奉献汇聚，在生命的沉淀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机构与基督徒社会参与、或机构与赈灾的议题上，第一，是我们需要机构，成为福音改变生命的果效，能够渗透和祝福社会的管道；同时也使教会及其同工在一个大时代中免于更深的试探。第二，就是在家庭教会的公开存在尚且艰难的时候，如何避免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基督徒在机构发展上，走上一条分离的、与“教会国度化”的异象相反的道路。

另一方面，教会要以奉献支持机构事工，而不是自己举办社会事工，这种观念也几乎还未成型。有评论从宏观的民间参与上说，2008 年是中国的 NPO（非政府组织）元年。灾难带来的一个局面，是显然促进了民间社会的成长。而我渴望分享的异象，渴望在更多圣徒和教会同工中得到印证的，就是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NPO（非政府组织）元年”。

基督徒个人，目前多数只能透过工商注册，去参与社会慈善、教育援助、文化、心理辅导等各样事工。只有极少数背靠官方机构的，才能拿到社团注册。这和民间 NGO 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没有结社自由，民间只能以高成本的慈善，去打破官方垄断的慈善。教会以议会（长老会或同工会）的决议，支持信徒以异象拓展机构，教会以奉献去支持。然后教会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集中焦点，来建造一个认信的、大公的教会，在牧养、教义和治理上来扎根。我想这也许是受改革宗神

学影响的城市教会，在未来社会参与的一个方向。

我们教会的异象，一是在教会的公开化和社会性的存在方面，服侍于神在本地的教会，所以教会虽然很小，灵里面也单薄，但我们聚会是很公开的。不注册，不意味着我们是地下教会，是业余教会，是非法教会。我们是符合宪法的、公开的和神所设立的教会。政府承不承认我们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基督徒是以一个国度的眼光、管家的眼光，在这里存在，在这里努力祝福我所在的社区。这是教会的负担。所以我们求主使用，能在这个方面，服侍和祝福成都的众教会。第二是文化使命的负担。我们追随的异象，是透过文化性的福音预工，促进成都的主流知识界和主流社会，增强对教会的了解和接纳。我们希望与本地的主流社会保持关联，希望他们都来教会看看，知道基督的教会就在他们隔壁。跟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了解基督教，形成对自我世界观的挑战和冲击，更广泛地预备福音的土壤。我们希望这一班基督的儿女，成为本地家庭教会跟本地主流社会之间的一个窗口，也成为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沟通磨合的一个管道。在这样的负担下，我们求主预备自己，来背自己的十字架。但福音预工性质的工作，不应该都由教会自己来完成。你做得太多呢，你就失去了你是神的道的管家的清楚位分。所以教会的方向，始终是鼓励基督徒机构的产生，鼓励信徒在教会外的更广泛的服事，然后将福音预工性质的工作，从教会剥离出来，用奉献去支持它。

当前政教关系的走向，我也有一些简单的观察。从 94 年至 97 年，中国政府大概有第一轮宗教立法调整，以前根本说不上法律，只有党的政策。94 年开始，出现宗教立法的第一轮调整了。那么到了 04 年至 07 年，我称为第二轮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立法调整。04 年的宗教事务条例刚出来的时候，各地方的执法部门，实在还不太清楚中央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到底是想更松呢，还是更严呢？所以地方的执法尺度出现很大的差别，有些地方比以前宽松得多，有些地方却刚好相反。那么到了 07 年底，这一轮立法调整基本上就结束了。

结束的标志有两个。一是共产党的 17 大，在党章里把宗教工作写进了党的任务。这是中共当政史上的第一次，以前党章中从来没有“宗教”二字。不是说它以前不管宗教，而是说，它反而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公开宣扬管理宗教是共产党的任务之一。另一个是去年 12 月底，中共政治局的宗教问题学习，之后胡锦涛作了宗教问题的讲话。这也是他当政后的第一次，党的头号人物为宗教政策发表定调子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为 04 年以来的一些混乱和暧昧，在内部统一了思想。也就意味着这一轮调整的结束。

我对这一轮调整尘埃落定的看法，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就是法律上开始被迫和适当地承认家庭（住宅）内信徒聚会的合法性。05 年后，政府的打击重点已不再是家庭住宅里的聚会，他即使找你麻烦，也是说你扰民了，声音太大

了。但他打击的重点是教会的拓展和社会性的存在。商业场所的聚会、外出的培灵、神学教育、教会间的会议、联络，跟海外机构、教会和牧者的联系，以及教会领袖等。以及从住宅向着非住宅的场所拓展的趋势。就是城市教会逐渐从住宅走向写字楼的变化局面。他们制约的重点在这几个方面。

所以胡锦涛的讲话，一个方面是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是共产党 90 年代中期以后一贯的提法，也是三自最近 10 年来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核心口号。第二是很微妙的提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所以 5 月初成都宗教局到我们教会冲击的时候，一个副局长带队，我跟他交流的几个问题之一，就是家庭教会的信徒是否属于你们要团结的“广大信教群众”？他说，当然是。我再说，今天在场的基督徒，是不是胡锦涛讲话里面提到的“信教群众”。他说，当然是要团结的信教群众。所以你会看到，这就是软硬两个方面的结合。最近几年，政府在海外对三自会和圣经事工的大肆宣传，效果上很成功；兴办三自主控的形象开明的基督教资讯网站；在各地兴建大教堂；在一些三自的著名堂点作“改革开放的特区”，广邀海内外知名讲员来，这些都是软硬结合的一面。

这些对家庭教会的成长是好还是坏呢？对教会在灾后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是利是弊呢。上帝的心意一定是好的，只是我的看见不够完全。但至少有三点简单的看法，第一，是 2008 年的共产党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宗教问题，政府从来

没有把宗教的影响力看得像今天这么显赫过。所以感谢神，49年以后，经过50年的冲突，中国的家庭教会至少在一件事上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宗教真的很重要。第二，是政府对宗教的重新调整，帮助了宗教局从政府的边缘地带向着中间地带移动，经费也会增加。譬如叶小文的出境率最近几年明显增加了。这对整个宗教部门的影响是很微妙的，地位的提升带来专业性的变化，然后带来观念的更新。主给我一个信心，就是今天的宗教部门，可能在未来成为信主比例最高的政府部门。甚至逐渐成为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争取宗教自由的支持者。其实在一些大城市，这个变化已经很明显了，打压家庭教会的主要势力是公安和国安，而不是宗教局。宗教局屈服在秘密警察的势力下扮演配角，他们和大多数政府部门一样，也和我们一样，都在等待一个既不受制于秘密警察，也不受制于政治局的那一天。

第三，是目前软硬结合的统战局面，带来一个效果，就是对当前宗教政策局面的凝固化作用。换言之，随着回归统战局面和三自内宗教特区（如北京海淀堂、杭州崇一堂）的形成，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既不可能突然更加开明，但也不可能全面倒退。因为这些年间，大把的钱、大把的资源已经花进去了，甚至较成功地改变了海外某些教会、机构和舆论对中国宗教问题、对三自与家庭问题的看法。因此任何倒退都意味着前功尽弃，在宗教和统战部门内也会引起极大分歧。

所以家庭教会的成长面临新的挑战，就是当你必然慢慢走向社会、参与社会，慢慢浮出水面的时候，家庭教会一旦可能在未来去掉“家庭”的前缀时，你自己的牧养、治理，你的教义、圣职、教产，你对着全社会的一个整全的、认信的告白，换言之，当“家庭”的光环逐渐淡去，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在以前，逼迫是很大的试探，今天已进入了尾声。而开放，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要面对的更大试探。这也是我所理解的，神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复兴和使用改革宗神学，因为只有改革宗神学，可以将我们装备起来，有一个整全的信仰，去面对神透过时代给我们的呼召。之前的几十年，家庭教会的圣徒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怎么为主去死。但到今天，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这一代的教会面对的挑战，是从此怎样为主去活。而且真正活在天使跟世人的面前，成为一台戏，把这台戏，更深地扎根在中国这个族群的文化、社会、政治和一切的灵魂之中。当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一一在地上倒毙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子孙的子孙，成为耶和华的儿女，中华归主，进入迦南美地。

求主成全，求主为此使用我们。我的分享到这里，感谢主！

根据 2008 年 5 月 26 日在“福州改革宗教牧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根据 2008 年 7 月 11 日在加州湾区“第二届基督徒与社会

参与”研讨会上的发言补充修订。

——摘自《论政教关系》

基督教对政体与公共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知识界开始关注宗教在中国的复兴，尤其是基督教的传播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

因为各种本土宗教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形态具有较强的同构性，而基督教无论在其独一神论和救赎论的教义层面，还是教会生活的形态层面，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都是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并与西方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政治与社会、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同构性。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扎根与扩散，长期被当政者诠释为一种“渗透”的原因。如果对“渗透”一语不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渗透”的确是一个很准确的描述。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的各要素，大多是以冲击、颠覆、对抗、争战的方式影响中国的。

无论赛先生还是德先生，都以上街游行的方式登台亮相。几乎只有基督教，是以“渗透”的方式，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肌理中一路沉淀下来。一个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可能在一个极其偏僻的村庄里，以他数十年的传道与服务，改变了当地民众的话语方式、思维习惯、交往方式、灵魂信念，乃至寒暄问安的用语或写春联的造句。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范式。这种范式对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而言，几乎是全新、异质而充满想象力的。相当于在一个旧的社会中，渗透扩展出了一个新的亚社会。以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来论，普世的人类自由在近现代中国的落实，几乎只有基督教，是一个典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例子。

虽然早期的传教士们，也曾借助不平等条约中传教条款的保护。以至于在政治和文化层面，都酿成过剧烈的教案冲突。但 1951 年，中共赶走全部外国传教士后，基督教以一种民间的、草根的、边缘的承受苦难的方式，在恶劣的政治压迫下，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中国得不能再中国的信仰共同体。新教徒从 1949 年的约 80 万人，竟然在历次政治迫害下增长到 80 年代初的 800 万人，30 年后更增加到可能有 7、8 千万人之多。增长近一百倍。在中国 160 年的西方化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经受了历史动荡之考验的、彻头彻尾来自西方的、生生不息的自发演进秩序。1978 年后市场经济的逐步成形，则是中国社会的第二个西方化的自发演进秩序。第三个自发演进秩序，即政治层面的自由民主体制，则还没有形成。

很有意思的是，在迄今为止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饥渴慕义中，这个顺序刚好是反的。甲午海战后，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第一位关注的都是民主与政体，第二位是经济，宗教甚至排不上第三位。但这三个自发演进秩序在中国社会层面的落实，却出人意外地颠倒了过来。第一个成形的，是信仰共同体；第二个成形的，是经济共同体；第三个才是前面的政治共同体。

前两个共同体的成形，都与强大政治力量的介入相关。但介入的方式刚好相反。一个是打压，一个是推动。唯有当基督教这一信仰共同体的内在生命力，超过了它所遭遇的政治高压的残酷性时，基督教自发演进秩序的形成，才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数千万基督教信仰群体在 1949 年后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学上很难解释的奇迹。尤其是考虑到几乎任何一种本土的自发秩序，每一个根基厚实的信仰或知识共同体，都无一例外地在 1949 年后的中共独裁政治中遭受了毁灭性的瓦解，至今没有真正恢复元气。而基督教这一异质文化在相同的政治磨难中，反倒在中国社会培育出了元气。几乎没有一种实证理论，可以逻辑周延地同时解释这一相反的社会演进。

这三种自发演进秩序的顺序，和 1949 年后中共镇压和瓦解民间社会的顺序，也是一致的。第一场“文革”从 1951 年开始，残酷镇压一贯道等“会道门”，驱赶外国传教士；1953 年到 1956 年，以软硬两手镇压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群体。第二

场“文革”以 1956 年为中心，镇压的是资本家群体。第三场文革从 1957 年拉开序幕，到 1966 年进入高潮，镇压党内当权派和同情自由民主的党外启蒙知识群体。

为什么中共的镇压逻辑，比当时乃至今天的多数自由知识分子，都更准确地吻合这一顺序，把看起来在政治上最重要“敌人”排到最后去对付呢。或者反过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贯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要么是一字并肩王，要么是中共的头号敌人。结果中共第一个对付的，却是基督宗教（在本文中泛指基督教和天主教）。显然在中共看来，它与基督徒这一共同体的异质性，要远远大于它与右派们的异质性。

这一命题，正是理解中共政权之宪政转型的一个关键，也是重新理解宗教自由之于未来宪政中国之核心价值的关键。否则，今天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宪政民主带着某种制度崇拜之嫌的理解方式，和潜意识里的排序（政治第一、经济第二、信仰第三），仍将在未来可能留下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

这一系列评论，希望从宗教自由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共之意识形态统治，并以“政教关系”为核心，论述宪政转型的实质和当代中国政教关系的事实与趋势。从顾准开始，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隐约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宗教性。“意识形态政治”，或“极权主义”，是一种过于启蒙式的话语方式。有学者提出“人民宗教”的概念，倒是中共意识形态之宗教性的准确描述。

所谓宗教，是一整套具有宇宙论、世界观、以及对关乎人的根本问题与终极出路的信念系统。当这一系统的解答方式标榜某种终极性，其信念不建立在实证之上，并在人群中形成一种以此为指导的群体生活方式——包括“教义”的形成、“祭司”的群体、程度不一的团体生活、因此形成的经济联结等，我就称之为宗教。

以此，我将中国社会之宗教共同体，区分为四种：

1、启示宗教，相信启示的和独一的上帝，建立在旧约或新旧约圣经之上的信仰群体（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

2、民间宗教，在本质上的不可知和神秘主义的认知中，持守源远流长的泛神或多神信念，（佛教、道教，马祖、关公崇拜等）；

3、新兴宗教，这是多与民间宗教有关，又受到某些现代、后现代哲学思想影响的，晚近历史中出现的信念系统（新纪元运动、气功运动、瑜伽等）；

4、人民宗教，即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内核，借助国家权力建立的一整套涉及教育、就业、参政、立法、司法、宣传、出版、仪式，在各方面影响和塑造社会群体生活方式的类宗教模式。

儒家（尽管有学者标榜为儒教）在当代中国仍不构成一种宗教，这不但是从“教义”上审视，其对人的根本问题与出路的回答，不具有较明确的终极性。更重要的是，儒家对群体生活方式的宗教性影响，已基本上被瓦解。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存在一个信仰共同体，或信仰影响下的群体生活范式，可以称之为儒教。因此新儒家只是当今的一种思潮而已。但随着祭孔等仪式在国家扶助下的建立，和儒家学堂的发展，也不排除儒家在未来与民间宗教的因素结合，形成介于人民宗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另一种雏形的可能性。

中国经历 160 年来的积累、嬗变与反复，其最终的转型与立序，从种种迹象观察，极可能发生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这一转型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政体即制度层面上的民主转型。二是宪法权利尤其是集会、结社、新闻、出版等政治自由的复苏，及宗教信仰自由的落实，而带来民间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生活范式之转型。三是文化的转型，新的政统，其正当性、持续性及其生命力，都呼唤和依靠新的“道统”的形成。当代的自由主义等思潮主要是一种政治学说，宪政中国的文化新道统中，不能想象没有宗教信仰在超验的终极关怀与经验的群体生活样式这两方面的塑造力。

以四种宗教信仰的范式，来看未来的中国转型之政体与文化层面。均可解读为人民宗教与公民宗教之争。中国的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基本上是在人民宗教的范式之下被统摄（法轮

功除外)。很多同情、亲近甚至认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中,对于基督教群体在第一个制度转型层面上的现实政治影响,抱有某种想象和期待。就如耶稣的时代,以色列的追随者对耶稣会带来政治性复兴的期待一样。

这些期待有些被夸大了,有些因为不了解基督信仰,因而与中共一样,基本上以唯物主义者的方式,将宗教处理为一个“政治”议题。

基督徒社会作为当代的一种自发演进秩序,其对社会转型的影响主要将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对国家主义和一党独裁这一本质上的偶像崇拜的政治体制,在政治哲学和国家学说层面的冲击力。二是基督徒群体的生活方式,将深刻影响一个正在衰败中的、缺乏信任与活力的公共文化、道德生活、家庭价值与人际交往模式。因此基督教对中国宪政转型的影响,主要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

但那种认为宗教全然与政治无关的、看似小心翼翼的论调,也对圣经和社会两方面都显得无知。不必讳言基督教对未来宪政中国之政治性的影响。就如耶稣来,不是为着颠覆(以武力方式)一个殖民的政治体制;但耶稣的信念和全部教导加起来,却对人心与国家,都必然构成一种真实的颠覆力(以非暴力的、怜悯大于指责的、及以个体灵魂为关注中心的方式)。若以中共操控下的司法标准为参照系,并考察当代既往政治犯的案例,那位以前所未有的锋利言辞,指责以色列的公会、祭司、法利

塞人和一切假冒伪善的权势人物的耶稣，他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放在 2008 年的共产中国，依然是成立无疑的。这一点，正是渴望忠实于全部圣经教导的家庭教会，在人民宗教与一党独裁的中国，依然难以获得宗教自由的原因之一。

但基督教的政治性影响，基于正统的基督信仰要义，却不是“解放神学”或“社会福音”式的。而必然是以“灵魂渗透”的方式，或说自发演进的方式，而不是抗争的方式和顶替的方式。不过，越是在缺乏宗教自由的地方，越是在宗教群体的社会空间趋向地下化的局面下，教会对纯正信仰的持守，越是可能陷入试探、误区和偏差。换言之，缺乏宗教自由的政治环境，正是培育邪教、和引诱宗教群体走上弯路的温床。相反，唯有当宗教信仰自由在政体上得以确立时，才能防止宗教以错误的方式影响政治。

换言之，一个独裁政权如果打定主意一百年不变的话，基督教的确就是它最大的敌人。但如果它不排斥变化，只希望这变化是一个温和的、谅解的、渐进的、甚至是自身有安全保障并得到谅解的过程，那么基督教就是它最好的朋友。

在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的传播对中国的政体转型，可能具有三方面的较大影响：

1、重构政教关系的压力。中国的其他宗教与知识群体，从未真正对国家不能干预人的灵魂、不能审判和强制人的精神世

界这一点，也就是对国家权力最根本上的一种限制，构成过最严肃、尖锐和持久的挑战。几乎只有当基督宗教这一自发演进秩序在中国社会形成后，这个议题才在中国成为一个优先性的冲突。新教的家庭教会和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在数十年的政治迫害中，甘愿付出生命代价去坚持的，是在中国以往的文化和历史中，从来不曾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议题。那就是政教分立，国家权力不能及于一个人的内心。换言之，因为对上帝的信仰，基督徒在世俗政治的层面，必然成为极权体制的天生反对者。因为他们拒绝国家的主权是至高的，拒绝国家权力可以掌管灵魂的事务。尽管他们在行为上强调顺服，但在内心，他们比中国社会的任何其他人群，都更加是不妥协的“不从国教者”。如果看到中共政体的本质是一种现代的“政教合一”。那么基督教在中国 50 年来的存在，实在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秩序在中国生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以后，随着教会与政府这一长达半世纪的地下化的尖锐冲突，开始呈现开明、温和的趋势以及进入对主流社会有更公开影响力的阶段。这一“不从国教者”的自由秩序，将对国家学说构成更明显的压力与挑战。

2、数千万基督徒社区的形成，表明基督教在中国，不是一个所谓个人性的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丰富的、类型化的和新的群体生活方式。这一庞大人群以及群体生活，事实上构成了民间社会中最大的结社，最大的 NGO，和最大的亚社会。在这一群体从“非法化”走向合法化的过程中，将涉及的也不只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而对诸多宪法权利的落实，和公民

社会的形成，都具有议题拉动与先行的影响力：

A、结社自由。教会的合法登记不可能单独获得，必然与整个社会的结社自由密不可分；

B、出版自由。教会系统的庞大印刷需求，必然与整个社会的出版自由密不可分；

C、集会自由。教会的传教与布道的聚会，必然与整个社会的集会自由密不可分；

D、言论自由。福音的传播与宣讲，必然与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密不可分；

E、教育自由。教会学校与家庭宗教教育的发展，必然与整个社会在教育上的去国有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密不可分；

3、在良心自由与外在顺服之间，在内心信仰与教会生活之间，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具有一种在保守、顺服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张力，在政治上显然会更多地倾向保守，和倾向对法治的尊重。因此成熟的教会对未来中国民主化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一大批经过了教会生活操练的、具有成熟品格的选民。反之，不成熟的教会则提供不成熟的选民。

这三类影响无疑都是政治性的，但与一个狭义和具体的政治概念，即关乎公共权力的分配运作过程，并没有太直接的关

联。

基督教对未来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影响，则可能是更加丰富的，更加具有道德性，以及在变革与保守之间保持张力。事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层面，和文化层面，基督徒都可能构成未来中国最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从法治的层面说，当代中国最严重的对生命权利的体制性侵犯，集中在三个方面：

- 1、计划生育制度；
- 2、劳动教养制度；
- 3、死刑制度；

基督徒的信仰，在上述议题的变革上，显然具有比其他维权人群更尖锐、更内在的驱动力。那就是重新带回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尤其是计生问题，触及到基督徒对人的生命观念，与无神论群体最大的迥异之处。基督徒群体必将成为在未来推动废除计划生育的主力。就像基督徒曾经在英国和美国，成为废奴运动的主力一样。

基督徒与世俗社会的诸多文化冲突，也将随着教会的公开化，而日益成为影响社会议题与文化品格的场域，仅以婚姻家庭的层面为例：

1、对婚前同居、婚外恋和一切婚外性行为的反对态度；

2、以横向的夫妻关系为核心、而非以垂直的父母关系为核心的家庭观念的冲击力；

3、对同性恋等议题的保守立场；

4、教会婚礼、婚前与婚姻辅导、心理辅导、对离婚的劝诫等仪式与观念系统，几乎是当代中国唯一可能影响衰败中的家庭婚姻价值的、有生命力的生活范式。

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基督教的群体生活范式，亦将对诸多议题形成道德性和制度性的影响与冲击：

1、基督徒的什一奉献和慈善捐助，以及全时间奉献的牧师、传道人群体，对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复兴，如对济贫、救灾、对孤儿、乞丐、艾滋病人及各种弱势群体的关怀的影响。

2、基督徒、牧师和传道人群体及各种志愿者的“自愿性贫穷”，即普遍地主动选择一种略低于自身有能力获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生活方式，及这种选择所蕴含的道德性活力，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财富观与价值观的冲击。

3、教会在圣经原则下的治理，包括圣职人员的选立，其对仆人式领袖和服侍精神的强调。对彼此服侍与顺服的操练，中国教会若在这方面日益成熟，将对“民主”不是作为一种狭义的

政治制度，而是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的彼此相爱、彼此尊重的品格的养成，及对民间机构、公司乃至政府机构的治理，都可能构成巨大而独特的影响。

4、对妇女和儿童权益，及更广泛的宪法平等权议题的认同和推动。

5、对普遍的腐败、偷漏税等具有道德性的法律议题的影响。

6、教会的社区化、及牧区和教区的逐步出现，对民间社会的自治及社区共同体的模式具有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的尖锐性，以及基督徒所言“光和盐”的作用，效法“好撒玛利亚人”的道德实践，以及饶恕、感恩和尊重平等等品格，在中国的政体、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将促使基督徒群体构成一种既有变革性，又有保守性的温和的社会力量。考虑到变革与保守、冲突与宽恕的平衡，可能正是影响中国未来转型之效果的、最稀缺的品质。基督教群体在中国的实践，其以宗教信仰自由为直接诉求的，对社会、文化和政治议题的全方位影响，并不像一些知识分子所期待的、或如政府所顾虑的那样，会对狭义上的政治变革构成直接的推动。但却有可能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发挥出人意外的、更重要甚至更关键的作用。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

2008 年 11 月 15 日

写于红照壁

| 2009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春节假日，我和妻子，陪伴一对再婚夫妻，预备他们的婚姻更新礼。老话说百年好合，他俩加起来已超过百岁了。在周围，见过许多不成功的再婚者和调低期望值、筹划好财务清单的黄昏恋。那天，再婚夫妇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说出誓言，“从此委身于你、爱护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几位初次参加教会婚礼的朋友都流泪了。在场的基督徒夫妻一起上台，围着他们祷告。我和他们都相信，这是真实的祝福，不是讨一个口彩。

给他们推荐了几部电影，就有《非诚勿扰》。“舒淇”爱上有妇之夫，不能自己，转头对“葛优”说，我愿意在身体上

忠实于你，与你结婚；但我心里要留一个房间，容许我念想着他。“葛优”挨过来，说那我把心全都给你，但容许我的身体偶尔开个小差，不知可否？

冯小刚的好处，是他对时代精神（病）气质的敏锐。冯氏电影大都以一种缺乏道德担当的手法，抓住一个时代的道德症候。这正是好莱坞的精髓。首先，他们对时代的嗅觉，不输给哈佛大学或华尔街；然后，他们用一部好看的影片，与某个时代性的议题擦肩而过。把票房空间留给自己，把评论空间留给《纽约时报》。冯小刚的嗅觉，几乎和贾樟柯、李杨等人一样棒，但只有他最接近这一好莱坞模式。所以有大学生问，你的《天下无贼》是否充满了人文关怀？冯先生大咧咧地回答，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人文关怀。

他只要嗅出问题在哪里就好。《非诚勿扰》延伸了《天下无贼》的两个议题：一是由“盗亦有道”的诚信，延伸到了婚姻中的委身。这个时代最大的难处不在政治，也非商业，而是婚姻；这个时代最大的合法性问题，也不是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政体之合法性，而是包括津津乐道者在内的婚姻之合法性。尤其在越来越多的婚礼上，开始宣读政府颁发的《结婚证》，说“我宣布他俩的结合是合法的，是有效的”。这两个合法性危机，就凑在一块了。

年前回老家，小小县城，单论市面繁华，胜过欧美大多数城市。可两样东西，越来越贵，几乎买不回来了。一是文化。

20年前，县城书店可以买到徐志摩，县城报摊可以看《南方周末》，县城电影院有同步上映的凯文·科斯特纳。而今反倒全没了。有的是低俗的歌舞团，五颜六色的书摊，还有唯一占领县城、向着全世界叫板的《环球时报》。“开放”二字，叫人怎么说呢！幸好有网络，不然满大街都成白痴了。

也是节前，和媒体朋友闲聊。我一胆大，出个馊主意，建议他们做一个精神病院专题，问卷调查全国 1000 名精神病患者，他们最喜欢的电视栏目、最爱读的报刊、最喜爱的主持人，都是些谁啊。我的猜想，不一定对，他们或许更喜欢张艺谋，而不是冯小刚。

第二样买不回來的，就是婚姻。走在街上，两边的树，落叶缤纷，仿佛看见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开始在红尘里衰落。《琵琶行》里，琵琶女娓娓道来，说自己“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这里的“委身”，有一种万般无奈的哀怨，并单单指向肉身的交付，就像付款一样。今天的问题有的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灵魂的委身，仍然是与肉身割裂的。不同的是，古代妇人期望值低，咬咬牙就委身了；今天的“舒淇”，却连一锤子买卖也难以付出去，难到蹈海自杀的地步。

“葛优”的朋友邬桑，最后开车唱歌、泣不成声的长镜头，最意味。镜头要停这里，就成日本电影了。邬桑的哭泣，说明这故事不单是“舒淇”和“葛优”的。那种在世间行走、委身不得的孤独，正是这个时代的症状。“葛优”说，我不缺钱，

就缺朋友。不也替我老家说出了真相吗？缺的不是钱，就是彼此委身的生命关系。

《圣经》中说，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亚当在伊甸园美滋滋的，以为自己一无所缺。上帝却指着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婚姻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骨子里都想自立为王。婚姻却是向着一个人的生活死、向着两个人的生活活。一个法国哲学家说，所谓爱情，就是你拥有全部的权利，我拥有全部的义务。听一遍很浪漫，听两遍很恐怖。因为婚姻的实质，就是打碎我们自立为王的梦想。但婚姻的悲剧就在于这一梦想的顽固，甚至胜过身体的情欲。我们唯独在性爱中，有全然的委身。因为天然地，没有委身你就没有快乐。但在性爱之外，两个自立为王的男人和女人，怎么可能彻底弃绝那自立为王的骄傲呢。

《圣经》对婚姻的描述，可称为盟约式的婚姻（Covenant marriage）。在上帝与人的立约中，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个担保。上帝作为立约的那一方，先向我们无条件地委身，为我们死了。以此呼唤我们在信心里向他委身，也在婚姻盟约中向着对方委身。

这是有神论的婚姻，它和无神论的婚姻观至少有三个迥异。一是婚姻的合法性。自古以来，结婚的意思只有四种：一是在祖先和父母面前结婚；一是在国家和法律面前结婚；一是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结婚。最后一种，是只在自己面前结婚；但这等于取消了婚姻的合法性。当代称为同居，古代称为野合。婚姻

的合法性影响着夫妻的委身，就像政治的合法性影响着公民的委身一样。

第二是灵魂。无神论的意思是不承认灵魂。“舒淇”和“葛优”在身体与情感的大峡谷中，无法看见婚姻的实质首先是灵魂的合一。用社会学语言说，就是信仰、价值和人生观的合一。若是一男一女对“人为什么活着”持不同的信念，他们的身体合一，套句成语，就叫“同床异梦”。同床异梦就是对委身的否定。换言之，你从此分不清爱和淫乱，也分不清盟约和契约。

第三是重生。也是冯小刚从《天下无贼》延伸出的第二个议题——“信仰”。这次教堂代替喇嘛庙，成了他触碰议题、始乱终弃的一个文化符号。导演给“舒淇”、“葛优”的爱情救赎，安排了两条道。“舒淇”是蹈海自杀未遂，仿佛一次死而复生的洗礼。“葛优”则走进北海道的小教堂，从幼儿园偷东西开始，没日没夜地忏悔，直到神父累趴在地上。

那天，我对那对再婚夫妇说，委身的前提是重生。感谢神，你们不用去跳海，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们死了。你们的婚姻因此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圣洁的。无论你们年龄多大，一生一世的盟约都从今天开始。那位爱你们、又叫你们彼此相爱的，人领你们返老还童。从此，你们就如摩押女子路得所说的：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你的神就是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

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2009 年 2 月 3 日

家庭教会的传统和公开化异象

这是一篇纲要，根据我在几场纪念加尔文诞生 500 周年的研讨会上的讲稿整理。也是我在 2009 年经历秋雨之福教会取缔案，及目睹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面临极大困境与争战，也面对更大的契机与祝福之际，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及对当前城市新兴教会担当的推动家庭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的异象，所作的一些领受与反思。

一、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不从国教者

到底什么是“家庭教会”及其传统？在 2003-2006 年，同时在新兴城市教会和海外华人教会中，出现了一种质疑和淡化“家庭

教会”的倾向。新兴的城市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基督徒及传道人，有一种论调，就是“家庭教会”与三自之隔离，是上一代圣徒的争战，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争战。但这种论调背后，更多的出于一种对于时代格局的虚假判断，及对政府宗教政策可能对城市新兴教会网开一面的美丽的误会。一些教会特意淡化“政教关系”这一在当代中共政权及其语境下的核心命题，而将城市新兴教会列为“家庭教会”和“三自”之外的所谓第三种教会。

如果说，中国家庭教会最大的不足与虚弱，出在一度割裂了其在大公教会、历代圣徒传承中的领受。这一割裂的高峰固然发生在 1949 年后，受无神论的极权主义政府逼迫所致。但更深层、更早先的原因，出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上。自“义和团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之后，与西方教会的关联，及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危机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教会一种最严重的灵性的焦虑症。本色化运动，和分离主义倾向，就是这种焦虑症的两个直接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明道先生的持守、倪柝生弟兄的成圣观，贾玉铭牧师的神学，都不可避免地处在这一时代性的焦虑症中。

当“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兴起时，他们固然是靠着恩典，在厄困中持守了信仰；但在这恩典中，也有上帝容许并使用了他们的某种民族主义立场的部分。王先生、倪弟兄和耶稣家庭的敬弟兄领导的一批本土教会，早在政府向教会动手之前，就已在奉献、财务、治理和神学上，与一切西方教会根除了连接。

恰恰是事实上最“三自”的一批教会，成了当时抗拒“三自爱国运动”最坚定的基要派。他们在事实上，是 1949 年后的“不从国教者”。但他们不从“国教”的理由，基本上与“国”无关，只与“教”有关。王先生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针对的是教内的“不信派”，而不指向无神论政权。换言之，他避免触及政教关系的议题，这里面既有应对的智慧，也有其神学立场的自洽。因此基要派在 1949 年后的坚持，是在救恩论的底线上的坚持，不触及国度观，更不触及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之冲突。这和天主教会的中国神父们大相径庭。像龚品梅等神父，以非常清晰的圣经价值观，早在“三自运动”之前，就以极大的属灵勇气，直接指称中共的总路线是建造地上天国的、敌基督的乌托邦，“我们绝不同意”。反观基督教内，没有任何一位传道人，能以属神的智慧，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作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深刻洞察和准确理解。这正是因为天主教的“大公教会”特征（尽管我们不同意罗马天主教会等同于大公教会），使中共政权下的天主教领袖，几乎脱离了民族主义立场的捆绑。而在基督教，从不信派到基要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民族主义者。

因此王明道先生只强调不与吴耀宗之流同负一轭。但北京宗教局后来主动退步，要求他们在三自会以外，独立组织学习班。这时政教关系的议题就隐藏不住了。当时 11 个未参加三自的北京教会领袖，商议后答复说，我们只能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不能以教会领袖的身份参加，因为教会与政治无关。上帝的恩典，许可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最终以一种彻底的分

离主义的立场，来拒绝政府对教会的辖制。

这一基要派的家庭教会传统的形成，是上帝在 1949 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定意成就的极大恩典。也是当代中国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他个人信主的经历是否与家庭教会的传承直接相关）的属灵先辈和伟大的属灵遗产。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传统中的缺陷，第一，始终包涵着潜伏的民族主义立场；第二，容易导向一种割裂大公传统的倾向；第三，容易坚持一种圣俗两分的政教观。这三点始终是当代家庭教会在向着大公教会之神学与教会正统归正的过程中，需要清理和对付的。

因此，2006 年前后，也就是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起草与颁布的长期间内，城市新兴教会中，再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意图割裂传统、否定家庭教会之教会史意义与使徒性传承的危机。甚至以各种如“未登记教会”、“独立教会”、“自立教会”等层出不穷的、淡化 60 年家庭教会传承的概念。从文化的意义说，名称的形成是历史性的；从信仰的意义说，名称的形成是恩典性和国度性的。否定和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其实就等于否定上帝在中国教会 60 年的恩典。在历史性的恩典中，没有“家庭教会”这一出现共产政权下的清教徒运动，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当我们轻易地越过救恩历史中的中国历史，直接说我们是从神领受时，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我在台湾遇见一位同工，提到赵天恩牧师的腰病。她说，许多去过大陆家庭教会宣教的老传道

人，腰都不好。因为他们曾年复一年地，带着满箱子的圣经、资料和书籍，进入中国。“家庭教会”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传统，是由无数细节中的恩典组成的。但这么短的传统，竟然已经老得又想抛弃了。老实说，这也是中国社会一百年来的革命文化的恶性影响所致。同时，如果我们看见了家庭教会传统本身的缺陷，我们就会说，那些否定和淡化家庭教会立场的基督徒，恰恰是“最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感谢上帝，近年来城市教会仍受着间断的逼迫。随着“登记”的暂不可行，及政府新一轮宗教政策调整的结束（2004-2007年）。尤其是新一轮调整后，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因着奥运、六四20周年、西藏和新疆问题及60周年国庆等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尝试对城市新兴教会进行适度限制与打压。换言之，政府并未将城市新兴教会视为“家庭教会”之外的新型教会。对政府来说，仍然只有一个准绳，就是“非三自教会”等于非法教会。政教关系的议题，并未如一些城市传道人想像的那样，会日趋淡化。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凸显了。因此，最近两年，随着城市教会面临有限的逼迫，城市教会之主流反而比三、四年前更加认同自身的“家庭教会”的名分。到底什么是家庭教会及其属灵传统，也这一自我定位的前提下，成为城市新兴教会需要、希望也开始努力去思想、澄清和领受的重要议题。

因为家庭教会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未来的中国教会就是什么。理解家庭教会的概念、传统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属灵意义，

直接关系着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理解教会和政府、教会与社会、意即基督的国度与地上国度的关系。

我以四个方面，来简要归纳中国家庭教会 60 年(1949-2009)的传统：

第一，信仰层面：

在极权制度下持守**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
在现代文化中持守**圣经启示的无误与全备**；

第二，政教关系：

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坚守**政教分立的原则**；
在逼迫中持守**对掌权者的顺服**

第三，属灵传承：

十字架的**舍己道路**
恒切**祈祷的传统**
依靠**圣灵的大能**
末世中的**积极宣教**

第四，公共领域：

在民族主义国家持守**天父世界的普遍立场**；

在最私人的空间（家庭）活出**信仰的公共生活**；

以上四个层面，从基要真道之界定、信仰实践之操练及信仰与社会政治之关系看，借用刘同苏牧师的表述，“家庭教会”的实质，就是在最私人性的场所，活出了最公开性的信仰。即使今天的聚会场所，开始走向一个从家庭向非住宅转移的公开化运动。但“家庭教会”这一称谓，形象地表明了，信仰既是大公的，也是私人的；既是社会的，也是家庭的。即使教会退到了一个退无可退的地步，退到最隐私的私人住宅内，教会一样是教会。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和乡村教会一样，都是从哪里出发、从哪里蒙恩的。这一从家庭到社会、从最私人到最公共的跨越，正是真信仰的标志。也是我们理解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一个前提。

二、理解 60 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

百年史上的四个 30 年

凯波尔说，传道人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C·S·路易斯说，基督徒要有双重的倾听，一是倾听圣经的启示，一是倾听我们的时代。不理解圣经之完备启示，就不能真正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但不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也不能真正理解圣经启示之于我们在肉身中的应用与挑战。

在 2008 年广州一个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的论坛上，我与政治学学者刘军宁，在演说中共同提出了四个 30 年的关键词，

借以理解中国社会一百年的变迁。如果将 1978 改为 1979，也是恰当的：

第一、1919 年-1949 年，关键词是文化；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这 30 年，形成和破灭了各路启蒙精英，意图以新思想、新文化（德先生、赛先生）拯救国家的第一个乌托邦。

第二，1949 年-1979 年，关键词是政治；

从暴力革命的成功开始，这 30 年，是妄图以革命解决文化问题，以文化解决灵魂问题的第二个乌托邦。

第三，1979 年-2009 年，关键词是经济；

从改革开放开始，这 30 年是非意图地以经济的个人主义化解集体主义暴政，以市场和制度转型反抗意识形态的第三个乌托邦。1989 年的天安门屠杀和 2009 年的天安门阅兵，标志着这一乌托邦的幻灭。

接下来眺望下一个 30 年，即 2009 年-2039 年，关键词是信仰；

但从基督教会的眼光看，百年史还有着另一条脉络，就是救恩历史的脉络：

- 1、1919 年出现了和合本圣经；
- 2、1949 年教会蒙难；
- 3、1979 年乡村教会复兴；
- 4、2009 年城市教会迈向公开化。

三、理解 60 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

1949 年后的四场文革

尽管中国社会寻求自由与复兴的百年史，是按着**文化-政治-经济-信仰**的时代核心议题的顺序。但 1949 年后中共政权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摧毁民间社会的顺序，却出人意外地，按着一个完全相反的顺序，即**宗教-经济-文化-政治**：

1、第一场“文革”

从 1951 年开始，镇压一贯道等会道门及驱赶外国传教士，到 1953 年的“三自爱国反帝运动”，镇压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群体，建立政教合一体制。

2、第二场“文革”

以 1956 年为中心，镇压资本家群体，瓦解多元的民间经济。

3、第三场“文革”

从 1957 年拉开序幕，到 1966 年进入高潮。镇压党外的知识分子群体。

4、第四场“文革”

从 1966 年开始，镇压党内的多元政治势力。

毛泽东的这一镇压顺序，比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也比当时乃至今日的家庭教会传道人，都更准确地理解了世俗社会的要害。1949 年后，中共处理的第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这正是中国不能不出现家庭教会的原因，家庭教会的历史因此与共和国的历史同行，也显明着基督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在中国并存。在毛泽东看来，他们的政权与教会这一圣约共同体的异质性，远远大于它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资本家、知识分子、旧官僚、民众等）的异质性。这一看法是异常准确的。反而教会长期以来都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也看不到逼迫与苦难的历史意义。

理解这一核心议题的顺序，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也是重新理解宗教信仰自由之于中国转型之核心价值的关键，更是教会理解自身在当代中国的公开化异象和宣教使命的关键。

四、理解 60 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

60 年来的四个社会共同体

基督教的来华，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形成了一种异质性最强的文化：

- 1、独一神论；
- 2、救赎论的教义
- 3、教会生活的形态

尤其是教会生活的团契形态，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影响和挑战，具有教会自身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意义。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制度、观念和器物上的转变与积累。但惟独缺少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的内在价值与外在样式。只有当教会真实、光明、具体地活在中国社会中时，就像耶和華从埃及挪了一棵葡萄树，栽在迦南一样。只有当教会在恩典、生命和敬虔之道中的群体生活样式，被栽种在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和中国文化的最深处时，中国社会的转型才能获得内在的生命价值与团体样式的支撑。也只有当教会一面获得自身的世俗合法性，一面为中国社会“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人群都不能提供的普遍祝福之后，福音的广传及福音翻转整个中国社会的远景，才能被真实地看见。

如加尔文阐释《使徒行传》第2章和4章时，提到受洗乃是进入和形成一个圣民社会的起点。彼此交接、掰饼，赞美，凡物公用，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些记载显明“圣徒相通”乃是指向一个从灵性到身体、从信仰到经济的共同体。加尔文说，“在哪里信徒同心合意地合一，就在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社会”（《基督教要义》4卷1章3节）。

从欧洲的教会历史和社会历史看，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亦可归纳为三个命题：

- 教会在社会中；
- 教会就是社会；
- 没有教会，就没有社会。

事实上，当家庭教会不能在共和国的民政部独立登记之前，不是教会不合法，而是这个民政部就还不是真正的民政部。当教会不能在公共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神圣价值、外在治理次序和源源不断的道德动力的有形社会之前，整个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

教会生活的样式及其意义，无论在基督的国度中，还是在世俗国度中的见证，都超出中国家庭教会迄今为止的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扎根与扩散，长期被当政者诠释为一种“渗透”。如果对这个词不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渗透”其实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文明的各要素，均是以冲击、颠覆、对抗、争战的方式影响中国。只有基督教是以“渗透”的方式，在社会文化的肌理中一路沉淀下来。一个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可能在极其偏僻的村庄里，以他数十年的传道与服务，改变了当地民众的话语方式、思维习惯、交往方式、灵魂信念，乃至寒暄问安的用语或写春联的造句。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范式。这种新的范式对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社会及其专制制度而言，几乎是全新、异质而充

满想象力的。以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理论来描述，家庭教会的意义，就是在一个旧社会中，以自发演进的方式，活出了一个新社会，一个亚社会。

普世的人类自由在近现代中国的移植与落实，150 年来，只有过一个半的自发演进秩序。一个是家庭教会，从西方传教士来华，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共同体生活，是最典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例子。半个是市场经济，政府主导与自发演进，彼此均具有对方无法掌控的独立力量，所以是半个。

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来看，很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中国主流社会对西方文明的饥渴慕义，无论是甲午海战后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还是今天的民运派、自由派、维权派或党内民主派，第一位关注都是民主与政体，第二位是经济，第三位是文化，宗教甚至排不上第四位。但这 60 年来，非特定公众的群体生活：

1、第一个成形的，是信仰共同体。在 1979 年，中国社会除了官方组织之外，几乎已不存在任何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但只有家庭教会，是唯一的既具有内在信仰与价值认同、又具有外在生活样式、次序与动力的共同体；事实上，家庭教会成为了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的雏形。

2、第二个成形的，是经济共同体；30 年改革开放的结果，是经济结社，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最广泛、突出和普遍的共同体。

3、第三个尚未成形的，是文化共同体。在缺乏结社自由、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的语境下，多元、凌乱、混杂和断裂中的当代文化，尚不能形成真实的共同体生活；但互联网的出现，正在加快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速度。

4、第四个尚未成形的，是未来的政治共同体。

五、理解 60 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

90 年代后的三个转折

第一，在政治、社会和信仰的三重危机之下，政府于 1992 年开始推行市场体制和经济自由化政策，弥补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缺失所产生的心灵空虚和社会失序。但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事实上促成了社会秩序的开放性和民间社会的重新培育。这一世俗社会的变化，使得家庭教会遭遇的打压尽管仍在持续，但其生存与宣教空间的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

第二，1989 年-1992 年，出现了 1949 年后的第一波向城市和知识分子宣教的福音运动。这是从乡村和海外同时向着中心城市两厢包围的福音运动，成为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中国城市新兴教会涌现的基础。也曾直接影响了 90 年代的基督教文化热。当民主运动在首都败北之后，福音运动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也从一个几乎只与乡村有关的词语，重新变成一个在主流社会眼里显得有“文化含量”的概念。这既是对中国教会而言、也是对当代中国

社会而言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第三，出于对上述两种趋势的回应，及市场带来的技术层面的法治化压力，政府的宗教管理体系从 1991-1994 年，出现了整体性转变。即 1979 年以来的中共宗教政策，从彻底的非法治化状态开始向着技术层面上的宗教立法转型。尽管其内容仍只是对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政策以法律形式予以“合理化”。但其实质的不正义，也在这一形式法治的框架下被放大和标注出来，以至诸般法律冲突在这一框架下，逐步走向不可逆的积累。

六、城市教会的四个时代使命

福音运动在中国的格局，到 2009 年为止，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分层中出现了两个中心、一个荒凉地带。乡村教会是 60 年福音运动的中心，而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城市（省会、单列城市和少数以旅游、文化或商业著称的二级城市），则成为这一波城市福音运动的中心。按刘同苏牧师的分析，第一波以安徽和河南的乡村教会为代表，彷彿中国的耶路撒冷；第二波以商业城市温州为代表，彷彿中国的安提阿；第三波以北京的新兴教会为代表，福音运动的焦点直指中国的罗马。在两个中心之间，全国两千多个县城、二级城市及其中心市镇，除了少数地方已从乡村到城市联成一片（如温州），其他绝大多数县镇，均处在福音运动的边缘。

这一格局和中国社会 30 年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是高度一致的。县城的荒凉与败坏，不但在信仰上如此，在文化、道德、家庭等层面均是如此。有学者指出，“宪政中国”的成败，关键在于“县政中国”的实现。国务院近年来也开始反过来采纳“弱市强县”的政策，有可能回归古代中国的二级地方治理模式（省县两级）。因此未来 30 年福音运动的走向，必以县城和市镇为焦点。中国福音化的真正标志，是二千座县城的福音化。只有当县城被翻转时，中国才真正被翻转了。这也是当年清教徒运动在北美的路径。美国之所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在于沿海大城市，而在于广大内陆的乡镇成为国度的根基。

但谁能向着县城宣教呢。在已完成财富积累与经济转型的今日，乡村教会已不可能成为向县城宣教的主力。从乡村教会向着城市的福音运动，只有过一个绝佳的机会，就是 1979 从农村开始的经济改革。因为在正常格局下，乡村文化不可能影响和翻转城市文化。惟独在 1979 年，在世俗的国度中，乡村非常特别地成为了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最具有活力的地方。而在基督的国度中，上帝也预备了乡村成为中国在灵魂上最具有活力的地方。

30 年过去后，当前这一轮中心城市福音运动和教会建造运动及教会公开化运动，显明中心城市教会的四个时代性使命：

其一，是自身真道扎根、教会建造与神学教育的**祭司性使命**；

其二，是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帮助乡村教会结束政治逼迫、完成治理转型的**先知性使命**

其三，是从中心城市向县镇宣教的**使徒性使命**；

其四，是承担影响主流社会及文化的**君王性使命**；

当前的中心城市教会亟需国度化的眼光，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大公性的教会，也为着乡村教会受逼迫肢体的缘故，站出来推动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合法化。靠着神恩，以又真又活的教会生活形态，努力争取中国的“米兰敕令”的出现，并用自己的生命、恩赐和文化积累，承载福音的信息，将福音运送到中国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中，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

七、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异象，在 2006 年前后，被称为“浮出水面”运动，准确的说，既是浮出水面，也是落在地上。就是重新从私人空间（家庭）中的困契，进入公共空间，形成具有完整教会生活形态（公共敬拜、圣职选立、系统教导、牧养体系、治理模式、公开见证与宣教）的会堂。

家庭教会的历史表明了，教会在任何外在制度环境不支持的情形下，依然可以在最私人的家庭空间，持守群体的信仰生活。这是教会的超越性的一面。而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则在一

定程度与市民社会的成长有关，表明教会在外在制度环境中的道成肉身的一面。

若没有世俗社会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成长和预备，即使家庭教会本身的建造产生了公开化的渴求，公开化仍然不足以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异象：

- 1、普遍的法治进步；
- 2、私有产权的确立：1999 年-2004 年财产权修宪，及 2007 年的《物权法》；
- 3、公民维权运动：2003 年-2008 年，互联网影响并提供了公民维权、公民意识及有限的言禁突破；
- 4、普遍的结社自由：500 万民间 NGO 的出现，其中家庭教会约有 100 万。

社会学家李凡，以非营利组织（NGO）的角度，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家庭教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及教会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地位、意义和世俗责任：

- 1、家庭教会是中国人数最多的 NGO；
- 2、教会教会是中国最有钱的 NGO；
- 3、家庭教会是中国组织化程度最高的 NGO；
- 4、家庭教会是与国际接轨程度最好的 NGO
- 5、家庭教会是成员忠诚度最高的 NGO；
- 6、家庭教会是成员生命连接最全面的 NGO

八、2000 年后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焦点转移

1、2000-2004 年，关键词仍然是“**家庭**”。在私人空间内聚会的合法性尚无定论；直到 2004 年后，政府开始承认家庭聚会的合法性。国务院在这一年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中，公开宣称“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2006 年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家庭教会，但“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规定，为非登记的家庭教会及其聚会留下了法律上的余地。随后，各省开始根据此精神修订地方性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2007 年）作出了最明确的表达，“信教公民按照教义、教规和习惯，有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也有在自己家里过宗教生活的自由”。

2、2006-2008 年：关键词是“**登记**”。私宅内聚会的合法性得到私人产权制度的支持和政府不确定的退步，在中心城市执法上出现较明显的默许。加上“三自会”开始推行家庭聚会点，在各地吸引和要求家庭教会参加，借此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因此家庭教会能否透过“登记”取得合法性一度成为讨论与尝试的焦点；

3、2007-2008 年：关键词是“**写字楼**”，聚会场所从私人空

间向非私人空间转移，聚会由“亲友为主”向非特定公众转移的聚会公开化，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教会本质上的公共性的焦点。1949年后，在中心城市重新出现了“非三自”的事实上的会堂，“会堂”替代“登记”，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公开化的标志；

4、2008年-2009：关键词是“**教产**”。中心城市形成的临时会堂，受到政府对租赁方非法治手段的打压和限制。在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间接保护下，选择购房建堂，使“教产”成为一个新的关乎会堂的形成与建造的焦点。

九、2009年以“会堂”为冲突焦点的四个教案

2009年6月后，出现了一系列以“会堂”为冲突焦点的教案。包括不同城市的四个新兴教会和一个传统的乡村传家庭教会（山西临汾）。但政府在这5个涉及“会堂”的案子中，明显采取了区别对待。在临汾，依然诉诸传统的暴力镇压和司法迫害；在中心城市，则选择了妥协和较为法治化的操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制度的差异。在城市，家庭教会能轻易地在丛林般的房产中，取得有产权保护的写字楼单元；但在乡村的集体土地制度下，一旦聚会离开了家庭（宅基地），家庭教会不可能取得合法的房屋产权，必然为政府提供非法建筑、非法占地等非宗教自由的指控与口实。意思是说，今天，中国的乡村教会无法在更广泛的社会进步（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之前，单独地实现合法进入公共空间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教会必须站出来，为中国教会拓

展公共空间和法律权益的原因之一。

2009年6-11月，有四间形成公开“会堂”的城市家庭教会，均因地方教会建造与会堂形成的因素，受到政府打击。而四间教会也先后采取了一个相同的回应方式，即走向户外崇拜，意图保持公共崇拜的完整性：

1、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改革宗的长老制新兴城市教会。因租用会堂、召集会友大会、选立长执而在6月被民政部门宣布“取缔”；

2、上海金灯台教会：聚会所背景的福音派传统家庭教会。因租用会堂、并成为上海家庭教会联祷会场地，而在7月因政府向房东施加压力，失去会堂；

3、北京守望教会：长老制的“改革宗福音派”城市新兴教会。因租用会堂并公开收取建堂奉献，预备购房建堂，而在11月因政府向房东施加压力，失去会堂；

4、上海万邦教会：主任牧师主导型的灵恩色彩的福音派城市新兴教会，是目前就单一会堂而论，规模最大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11月同时被民政局和宗教局宣布“取缔”。

秋雨之福教会，是第一间被民政部门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由，并以“非法社会团体”的指控宣布取缔的城市教会。政府绕开“宗教自由”议题，直接以“结社自由”的名义迫害

城市教会，显明了政府再一次地，比家庭教会自身更清楚地看到了家庭教会问题的实质。即家庭教会的合法性问题，就其与中国社会之关系而论，已不是一个单独的宗教信仰自由议题，而必然同时涉及到至少 5 项宪法权利：

A、结社自由。教会不可能单独获得合法登记，必然与整个社会结社自由的演进密不可分；

B、出版自由。教会系统的庞大印刷需求，必然与整个社会出版自由的拓展密不可分；

C、集会自由。教会的传教、布道与公共崇拜，必然与整个社会集会自由的践行密不可分；

D、言论自由。福音的公开传扬、宣讲和见证，必然与整个社会言论自由的空间密不可分；

E、财产自由。私有产权的进步正在为城市教会提供最重要的世俗权利的支持，但不公平的土地制度依然制约着广大的乡村教会。

事实上，这 5 项宪法权利，已基本包涵了整个人权条款与宪政制度的链条。家庭教会若看不到自身的建造与合法化，与世俗社会广泛的进步、变迁的紧密关联；看不到上帝已把教会和福音在中国的前景，放置在了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和一个转型中的宪政制度中，并放在了一个共同体生活样式的见证者、

和一个良心自由的公民社会的榜样的位置上，我们就无法看见上帝在这个时代定意要赐给我们的恩典。

十、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异象：以秋雨之福教会为例

秋雨之福教会举行户外崇拜，保持会众集体的信仰生活方式。就教会本身的建造而言，是对“会堂”所代表的一种完整的圣徒共同体的样式的坚持。就教会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则是在政府主动将家庭教会的议题拓展至“结社自由”之后，再次拓展议题，以进为退，以“集会自由”的权利予以回应。我们在《不服“取缔”提起行政复议的公告》中，从地方教会建造的角度，对我们的户外崇拜予以了阐释：

为主基督的教会，我们重申以下两个原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退却的。我们相信这两个原则，既符合圣经的教导，也同时符合我们所在国家的宪法和一般法治原则：

1、公共崇拜的原则：基督徒有在任何拥有财产权利（购买或租借）或不影响公共治安秩序的场所，共同敬拜上帝、表示信仰的权利。

2、教会治理的原则：基督徒有权在他们中间确定名称、确认施行圣礼、接纳信徒之条件，宣告信仰告白，制定治理规章，选立圣职人员。

我们在《行政复议申请书》（200907）中，则对“教会”在当前法律中的缺失进行了阐释，也为“教会”作为社团概念进入法律空间的可能性，意图提供一个讨论的起点：

1、“教会”是一个基督教神学概念，不是当前的法律概念。

“教会”的原意是被上帝“呼出来的一群人，指向一群具有相同信仰的人的生命关系，可能上千上万，也可能不到 5 人。从宪法和行政法的结社自由的角度讲，一间教会可能登记为“法人”，也可能不登记为“法人”。

2、公民自愿的结社、聚会或团体，包括了法人社团和非法人社团。

如同学会、茶话会，就是非法人结社的典型。只有当一个未经登记的“非法人团体”，直接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签署民事契约时，才属于《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 35 条予以取缔的非法结社行为。否则，《社团管理条例》就剥夺了公民普遍的结社自由。意思是说，50 人以下（社团登记的最少成员限制）是不准结社的，以及公民之间一切“非法人结社”均是非法的。

3、《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都没有出现“教会”的概念与定义。

对政府来说，一群人愿意称自己是“教会”，和愿意称自己是“同学会”、“亲友团”或“八百罗汉”，性质上都是一样的。但

《宗教事务条例》仅将“教堂”列为宗教活动场所之一种，而未出现“教会”的概念。《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对何谓“宗教团体”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但其中也不包括任何具体的“教会”。

4、《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宗教管理条例》和《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均没有将“教会”视为宗教团体，或要求其必须登记为社团法人。

5、解释和判断什么是“教会”，超出了民政局的管理权限和能力范围，因此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如果“教会”的概念、性质，以及是否应当登记均无法律依据，政府职能部门对“教会”之概念、性质的判断和认定，就侵犯了教会全体成员的宗教信仰自由。

6、迄今为止，无论成都、四川还是全国，均没有任何一个以“教会”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为社团法人的例子。

涉及基督徒的法人宗教团体，只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两家，但它们都不是“教会”。同时，作为组成政协的人民团体之一，“三自爱国会”也从未在民政部登记过。因此，要求一群自称为“教会”的公民必须登记为法人，并以未曾登记为法人为由予以“取缔”是无理由的。

十一、公开化异象的三个方面

政教关系的议题，只是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一个层面。无形的大公教会，本身就是公开的。即使在家庭的客厅中敬拜，这也是宇宙中最具有公开性的事件。因此教会公开化的意义，首先是与教会向上的敬拜目的相关，即公开的敬拜上帝，彰显上帝的荣耀、主权和慈爱，在地如同在天。其次是与教会向内的教导、牧养与团契的目的相关，就是活出一个真实的圣徒共同体的样式。第三，是与教会的福音使命和在世人面前对基督的群体性见证相关。即大使命说，“为万人施洗，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因此，教会的公开化，首先是我们所信之道及这道在圣民群体当中的治理的公开化。换言之，公开化的异象，首先是一个教会建造的异象，其次是一个福音使命的异象，再次是一个文化使命的异象。

用下面这幅图表来表述：

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三个层面

1、社会建造（敬拜、教牧、宣教）

认信的公共性

圣职的公共性

敬拜的公共性

治理的公共性

见证的公共性

传道的公共性

2、社会关怀（治理这地的文化使命）

婚姻、家庭、计划生育

伦理议题、社会公义

慈善、公益、妇女儿童

公民社会的形成与自治

3、政教关系（敬拜和事奉、上帝的自由）

结社自由

集会自由

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编者注：根据图表所示，1 影响 2 和 3，2 和 3 之间相互影响）

我以两段带着上帝荣耀的命令与应许的经文，作为结束，
并我在天父上帝面前为着中国教会的感恩、赞美和祈求：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
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
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
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命记》第6章4-9节）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诗篇》24篇7-10节）

60年来，家庭教会的前辈圣徒，在会堂被掳的处境下，依然把神的话语写在了自己“房屋的门框上”。今天，愿主使我们听见一个把神的话语写在“你的城门上”的呼召，并施恩怜悯我们，给城市家庭教会属灵智慧和勇气。

2009年12月14日

写于成都彩虹桥

祈祷

天父上帝，创造万有的主，我生命的君王，和全地的审判者，孩子将这些文字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求你使用它，如使用交在主耶稣手上的五饼二鱼。连那谬误和不

讨你喜悦的地方，你也洁净了，按你美好的预旨，用得符合你的公义与慈爱。孩子也把每个阅读者交在父的座前，为他们灵魂的益处恳求。求你坚立那些认识你的人，叫我们将一个被贪污的天父的世界还给你，以一个完整的圣经世界观来更新我们的全人。也求你亲自吸引那些尚未认识你的人深深切慕你。你无限的爱与全能，透过这地上最卑微的文字，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微小的部分，时光中最寻常的段落。但在圣父的恩惠、圣子的宝血和圣灵的感动中，却也成为向你悔改归正的一个足迹，和你所施奇异恩典的一个音符。并叫读到这些文字的每一个生命，终在基督里相遇，在你万事相互效力的世界中相隔遥远，却彼此相爱。叫你的荣耀、叫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都遍满地面，在地如同在天。如此祷告，依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 2010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一、基督徒是一个群体性事件

《使徒行传》11 章 26 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原因是巴拿巴带着保罗到了那里，“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

从这里看到，

第一，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社会学的称谓，而不是神学性的概念。是外邦人基于教会成员区别于其他社群的信念、生活、言行的外在观察的评语，而非主的教会对其个别成

员“重生得救”的内在判断。因此，一个虽在内心认信基督、甚至曾经受洗的人，如果他不是教会成员，不活在有形教会这一圣约群体中成为其中一分子；他当然也可能是“重生的信徒”，却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基督徒”。他无法、甚至即使在外邦人眼里也不配与其他“和教会一同聚集”的肢体们，分享“基督徒”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品牌”。

第二，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指向有形教会的社群概念，而不只是指向信徒个人的道德名片。这节经文，并不是对主的教会及其成员在上帝主权之拣选与救恩之落实中的神学性叙述（不同于《以弗所书》第 1 章的启示）。而是对五旬节之后有形教会如何落地开花，形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社群，并如何在不信的社群中首次获得公共见证的历史性叙述。确定了这一叙述的角度，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地方教会的形成及其与所在社会的关系上，不是先有“基督徒”再有“教会”。而是反过来，先有“教会”（足有一年时间，一同聚集，公共教导）才有“基督徒”。

要言之，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与地方堂会有关的概念，是外邦人对属于“教会”这个前所未有的新社群的个别成员的称呼，而不是对一个人在其内心、家庭或密室中与基督之生命关系的描述。安提阿教会是五旬节后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的第一次植堂，“基督徒”这一称谓是地方堂会浮现于异教文化与社会中的产物。尽管当时也有信徒去到其他各地，但首先是

在安提阿，形成了地方堂会这一完整和外显的信仰生活的社群样式。因此在其他地方，并不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却暂时没有出现世人眼里的“基督徒”。

笔者曾问家里的钟点工，你们家乡有没有“基督徒”？她这样回答，我们那里没有“基督徒”，只有“信耶稣的”。意思是，在她家乡可能有许多信徒，也可能有许多家里的聚会，但还没出现“安提阿教会”。

“基督徒”是一个地方教会（堂会）的概念。在使徒时代，所谓“基督徒”，就是与众圣徒一起领受主爱长阔高深的、某间地方堂会的会友或成员。用今天的话说，基督徒没有所谓“信徒”和“门徒”之分，基督徒就是主的“门徒”。顾名思义，所谓门徒就是经常出入教会大“门”的信徒。“进门”崇拜上帝、“出门”传扬福音；“进门”接受牧养，“出门”作光作盐；“进门”圣徒相通，“出门”殷勤做工。这是笔者在试图论述“会堂”之于家庭教会和主的国度的意义之前，需要在圣经关于初代教会的植堂中领受的一个讨论支点。成为基督徒，不但是蒙召走入一个属灵的、比喻意义上的“恩典之门”，即基督用他死而复活的永恒生命为选民所敞开的“羊的门”；也要在血肉的、日常的信仰生活中，经过地方堂会那道真实的、由榉木或铁皮制作的大门。

当笔者说“基督徒”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非淡化了这一称谓的属灵含义。在旧约中，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时，几乎失去

了作为一个圣约群体的、可识别和被分别的界限。因为律法失落，城墙被毁，圣殿坍塌。因此圣言、圣殿和圣城的依次复兴，就成为余民重新被建造为一个“社会”的起点。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时，“城墙”具有充满张力的双重意义，一是“分别”，二是“彰显”。城墙意味着可见的安全、保护和界限。这是从内心信仰到外在生活方式的“分别为圣”（如在安息日关闭城门）。同时城墙显然又是一种在万族面前的、无可遮掩的彰显。彰显就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进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成为山上之城，“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太 5:14）。主在这个比喻中，凸显的就是有形教会进入世界、“彰显”国度的这一重含义。主耶稣称我们为一座“城”，而不仅仅是一个“团契”。所以他接着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 5:16）。

地方教会就是城中之城，是在旧社会中蒙恩活出新社会。在圣经中，“基督徒”不是对无形教会之成员的称呼，而是对作为城中之城的有形教会之成员的称呼。对笔者来说，“中国有多少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中国有多少人是主的教会的成员。在 1949 年前的中国教会史上，基督徒数量的统计口径，都是指在地方教会领餐的信徒人数。但当家庭教会经历了会堂被掳、从地方教会完整的信仰生活样式被迫退回团契、小组和家庭聚会之后半个世纪，加上普世性的“信仰私有化”的后现代思潮及受其影响的布道决志运动、灵恩运动和中国教会传统的分离主

义倾向在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影响；今天当我们问，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或这间教会有多少信徒时，连许多教会也竟然不以领餐的信徒数、登记的会友数或出席主日崇拜的信徒人数，反而以所谓决志信主者的数量，或曾经受洗的总人数，或不参加崇拜、不领受圣餐的小组聚会数，在世人面前作浮夸的见证，更在主基督台前领属灵的空饷。

以今日教会流行的见证模式来看，我们能读到的信仰见证，也几乎都是信徒或牧者的个人见证集。但《使徒行传》及使徒书信却与这一模式大相径庭。圣灵并没有默示新约作者编写一部个人见证集（按今日观念，写一部十二使徒的个人见证集是相当合理的作法）。新约中所充满的，几乎都是以一处又一处的地方教会为中心的、以圣约群体的信仰生活样式为中心的见证。

同样的，教会成员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这是一个“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个人见证的简单汇合。“基督徒”是一个分沾了主基督身体之无上荣耀的团体身份的称谓，这一称谓不但显明主的身体即无形教会是整个救恩历史的焦点；更加显明了看得见的、被联络得合式的地方教会，是五旬节后基督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与扩展的焦点。尽管救恩的领受是个人性的，悔改与信心的回应个人经历上也总是独特的。但《使徒行传》11章26节的宝贵经文却向我们宣告说，进入世界并被世人识别出来的“基督徒”，并不是一群隐秘的和分裂的

个人，而是一同聚集、掰饼、一同遵守使徒的教训、一同以各种方式在基督里联合，并因此在多元社群中凸显出来的一个有机的共同体。

二、“会堂”是城市福音运动的焦点

加尔文阐释《使徒行传》第2章和4章时，提到信徒受洗的重要意义，是进入和形成一个圣民社会的起点。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群体被识别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需要三大要素，即教义、教职和教产。《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所描述的，就是圣灵降临、罪人经历超自然的重生与悔改之后，一个崭新的“宗教组织”的形成过程。五旬节后，信徒彼此交接、掰饼，赞美。卖了田产，凡物公用（教产），恒心遵守使徒（教职）的教训（教义）。这些记载包含了组织化宗教的三要素，更显明了“圣徒相通”乃是指向一个从灵性到身体、从教义到教产的社群共同体，即地方教会。因此加尔文说，“在哪里信徒同心合意地合一，就在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社会”（《基督教要义》4卷1章3节）^①。

初代教会的植堂进路，是从分散的家庭聚会，逐步形成城市中的固定会堂，慢慢为福音赢得一座又一座中心城市。从这一植堂的角度看家庭教会的历史，家庭教会的实质是在特定政治、社会际遇下因着持守主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从而承受了一个“会堂被掳、退回私宅”的过程。据笔者观察，

2000年之后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历程，经历了四次焦点的转移。

1、2000-2004年，焦点仍然是“**家庭**”。直到年底的《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其中“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规定，为家庭教会及其聚会的合法性留下了法律上的余地，各地行政部门对家庭聚会的执法也开始不同程度的缓和。

2、2005-2007年：焦点是“**登记**”。私宅聚会的合法性逐渐得到私有产权制度的支持和政府不确定的退步后，加上“三自会”开始推行家庭聚会点，在各地吸引和要求家庭教会参加，借此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因此家庭教会能否透过“登记”取得合法性，一度成为讨论与尝试的焦点；

3、2007-2009年：焦点是“**写字楼**”，随着部分城市教会的堂会转型，聚会场所开始从封闭和不稳定的私人空间，向着稳定和开放的非住宅空间转移，会众由半公开的“亲友为主”向着非特定的公众转移，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教会生活之公共性本质的焦点。因着这一焦点转移，城市中隐匿的基督徒才开始形成一个看得见的“社群”。1949年后，主的教会第一次在中心城市出现了“非三自”的事实上的会堂。

4、2009年-2010：焦点是“**建堂**”。一些在中心城市形成的临时会堂，受到政府对租赁方非法治手段的打压和限制。在城

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间接保护下，选择购房建堂，使作为不动产的“教产”，及属乎主耶稣基督的会堂在中国社会的重新出现，成为了城市福音运动的又一个焦点。

这一迅速来到、同时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和极大争战中的焦点转移，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具有难以评估的巨大的属灵含义和影响，虽然更多的教会和牧者开始看到这一点，但和以往的各次焦点转移一样，也难免有许多争议、困惑甚至反对的意见。尤其是从敬虔主义的传统和圣俗两分的传统出发，来质疑外在之“会堂”之于国度扩展的必要性。

美国柳溪教会的海波斯牧师，有一句名言，是笔者赞同的，他读到《以弗所书》3 章 10 节，“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从而提出，“地方堂会是世界的希望”。在前两节经文中，保罗说，主藉着使徒，“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因此第 10 节所说藉着“教会”，是指地上的和历史中的有形教会。

笔者认为，只有更清楚地看到一间、一间地方堂会在主的旨意中的中心地位，在基督国度扩展与福音使命上的优先性；今天的家庭教会才能于所处社会的特质中，看见从住宅到会堂、从团契到堂会、从隐秘社会到看得见的山上之城的时代异象。信仰的公开、会堂的建立，社群的形成，这一教会公开化异象

的实质，是真正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开始。如果“建堂”这一焦点转移能顺利地突破当前行政环境的压制，那么这一即将来到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具体形式，就将是一场前所未有、而家庭教会已为此预备了几十年的“城市植堂运动”。

家庭教会曾在会堂被掳的时代，见证了真信仰可以超越一切现实环境的制约，而继续存在于选民的属灵团契中。今天却需要反过来，继续见证这一圣徒的团契，也可以进入世界，在成为一座无法被遮掩的山上之城、并被外邦人识别为“基督徒”的同时，同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使徒传承的教训，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在“分别”和“彰显”之间持守中道，如光照在人前，叫这个时代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堂会”是称呼地方教会之整全信仰生活形态的实质，“会堂”是称呼承载堂会转型的、圣徒群体生活的外在空间与样式。从今日家庭教会的处境看，没有“会堂”对住宅聚会的突破，就无法带来 50-100 人这一规模瓶颈的突破，由此带来较完整的信仰生活形态和教会事工，尤其是儿童事工和宣教事工的成形。也不可能出现“堂会”及其牧养方式的转型，更不可能在未来出现以堂会为中心的“城市植堂运动”。

福音来华两百年来，如果问福音到底在哪些方面，已对中国社会构成了最大的挑战、祝福和真实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在三个方面，福音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已道成肉身作为一种异质性最强的文化，即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一是独一

的位格神论，冲击了中国文化中所有理性主义的世俗智慧；二是惟独基督的救赎论，冲击了中国文化中一切道德主义的进路；三是有形教会的生活形态，冲击了中国文化中一切血缘主义（包括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社会结构。但在上述三点中，福音藉着地方教会的信仰生活形态，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巨大影响与挑战，家庭教会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中，中国已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制度、观念和器物上的转变与积累。但目前最缺乏的一种有形资源，就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的内在价值与外在样式。换言之，教会本身还没有意识到，除了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除了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人也没有真正的结社自由，真正的良心和信仰的自由；甚至除了家庭教会的讲台，今天的中国人也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不受政治约束的公共空间。事实上，我们已经活出了一个对中国社会而言弥足珍贵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不受制于世俗权势的社会共同体的雏形。这不是因为家庭教会做得好，是因为基督的福音能够新造出一个与周遭环境截然不同的人类团体。

堂会的转型和会堂的建立，是对藉着地方堂会而成形的基督徒社群的更整全、丰富和公开的信仰生活的塑造和彰显。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度的眼光中，看到教会生活形态作为一种群体性见证，其意义实在超过了全体信徒个人见证的简单相加；那我们就看不到建造一种更完整的地方教会形态的巨大的福音

性功用。

三、“会堂”对城市福音运动的意义

在旧约中，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圣约群体，有过三种在地上的群体生活样式。第一，从族长时期到为奴时期，他们主要的群体形态是血缘意义上的家庭（家族）。第二，从摩西开始，他们作为民族国家存在，有了国法、国王和国土。圣约群体的成员身份，也因此转变为国民（如同先有教会，信徒才被称为基督徒；先有国家，族人才被称为国民）。第三是被掳时期，他们成为国际性的、分散的团契。于是在家庭和国家这两种群体形态之间，开始出现了各城市中的犹太“会堂”^②。

在新约中，上帝启示了新约教会的群体形态和长老的选立（徒 14:23），显然这一形态包含了但并不是血缘家庭，同时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如同流放时期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在万族、各城被呼召的、分散的地方堂会。初代教会的宣教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走入各城的“会堂”，按人的想法，犹太会堂应是上帝为新约教会预备的最好的落脚点。但犹太人跌倒在基督十字架的绊脚石上，保罗便从会堂转入家庭。经过百年的宣教，教会再重新走出家庭，建立新的基督教会的会堂。直到千年之后，教堂成为欧洲每座城市地平线上海拔最高的建筑。

即便我们认为，因着这个世界终将湮没，除了狭义上的传

福音，挽救灵魂，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那么会堂的建立，如同一个堡垒和据点，或主的国度的领事馆，也显然有利于福音在更广大人群中的传扬。这也是教会史上最普遍而合理的经验。并且，如果我们认同地方教会在大地上的存在，圣约群体在历史舞台上荣耀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样式，其永恒的意义，并不会随着旧世界在未来万物复兴、新天新地降临的审判与复和中彻底消失。就如复活之基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显明今生之经历与来世之永恒生命之间依然存在一些看得见的联系。如果我们也认同金钱奉献之于永恒生命的建造是有意义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水泥和教产，对于上帝国度的降临和扩展全无价值。会堂是大地之上，一切人类建筑和人类聚集场所中最独特和唯一的一种，一切人类用水泥、砖瓦、木头或石头修筑起来的工程，只有两种，一种叫教会，一种不是教会。只是这一层的福音性的意义，就已令人怦然心动。事实上，固定和公开的会堂，构成了在地上建造地方堂会和圣约群体之属灵生命的一部分。当主耶稣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约 4:21），主的确在他十字架的救恩中废除了对特定敬拜场地的拣选和偶像化。但这不是对“特定敬拜场合”本身的否定，而是意味着从此因着“被信心所洗净了”的心灵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威斯敏斯特信条 16 章 7 节），这世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也能够成为对上帝的特定敬拜场合。这不是对建立有形会堂的敬虔主义式的反对，而是对一场在天父世界中的植堂运动的授权。

笔者下面以 7 个方面的简要论述，来试图理解会堂之于当前家庭教会的意义。

1、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城市的理解。

一位河南教会的老传道人告诉笔者，他在 90 年代进入城市宣教的起因，是因为逼迫，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被赶到城里的。他的故事让笔者反思对城市的理解。在旧约中，“城门口”被视为寻求公平和怜悯的场合，是长老们聚集判断的地方。古语说，“小乱避乡，大乱避城”。城市的实质，是当人类的聚集和群体生活样式达到一定规模后，成为了文化的承载者，即人类的位格内涵相交的舞台，以及人们寻求财富、安全、公义的场域。这不是说堕落之人组成的城市能够达成这些目标，就像政府往往不能赏善罚恶，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上帝设立政府的目的和要求正是如此。当上帝要求我们顺服一切在上的权柄时，如果我们真相信上帝在罪人的城市、国家和历史中的至高主权，我们就会同意“最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以及“最坏的城市也胜过田野”。只能在城市中，人类的秩序、法律、公义、审判、慈惠以及科技、艺术和文化才能得以形成。没有人受到迫害，不是朝人多的地方跑，却往人少的地方跑。没有人上访，不是去更大的城市，去人更多的地方。传道人受逼迫，只能躲在城里，而不是躲在山里。连乞丐也不能在一个村子中生存下来，乞丐只能去城里才能生存。

换言之，城市是罪恶的中心，城市也是恩典的中心。在中国文化的潜在理念中，“乌托邦”或人类的理想社会总是一副乡村或田园场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教会对城市和天国的看法。但在整本圣经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一直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双城记。《启示录》所描绘的永恒的上帝国度，并不是从罪恶之城回到伊甸园，而是以上帝之城取代巴比伦。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提摩太·凯勒牧师，曾引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既然唯有神是神的形象，那么聚集了最多人的城市，就一定是上帝心意和教会使命的中心。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群达到城市人口的 10% 时，将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前提是这 10% 的人口，在城市中有公开的、能够被识别的生活方式、能够被找到的聚集场合。这就是为什么在世俗社会的管理中，一切营利或非营利机构的注册不但要求有适当的人和足够的钱，而且必须要求有固定的场所。因为没有固定场所的社群，是不能被看见、也无法被管理的社群。反过来说，没有固定场所的社群，对一座城市而言是不在场的社群，他们无法建立与一座城市恰当而广泛的连接、认同、接触和挑战，从而成为一个集合性的城市公民。并因此将基督的教义，转化在与现代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应用中。仅就技术手段而言，没有会堂的教会只能使用前现代的和亚社会的接触方式，去与一座后现代的城市对话。福音对社会的影响力因此被大大削弱了，教会成员的个人见证的可信度、持久性和相互印证，也将

因着教会群体身份的缺席，而被削弱、忽略、扭曲或在某些情形下难以被矫正。很显然，有固定会堂的 10%的基督徒群体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很可能高过没有固定会堂的 15%的基督徒群体的见证。

2、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公共敬拜的理解。

笔者侍奉的教会，在 4 年前的团契时期，曾有信徒主张偶尔外出聚会或去河边施洗。但我们坚持了主日崇拜必须按时开放。因为我们不能接受哪怕有一个人，曾有一个主日来到聚会地点却找不到我们。在某个意义上，堂会就像公司，一旦开张，除了老板就无人有权关上大门。这就是为什么法律规定，公司更改营业场所必须公告并更改注册事项。这并不是营利性的要求，而是公共性的要求。如果一间地方教会是蒙召建立的，她也一样必须持守敬拜的开放性。不具有开放性的崇拜，本质上不是地方堂会的崇拜，而只是一次内部的团契。

在《以赛亚书》第 2 章，上帝吩咐以色列人邀请各国一道来述说他的荣耀。《诗篇》102 篇 21 节和 22 节说，“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華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華的时候”。《诗篇》105 篇更呼召圣民要唱诗颂赞，“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些经文显明教会的主日敬拜，是一种宇宙性的、福音性的和公共性的敬拜。如果我们作为一间“教会”，只能躲在一起敬拜神。而散

会之后，弟兄姊妹才作为“信徒”出去传扬福音。换言之，当“教会”消失的时候，“信徒”就出场了。如果这是被迫的，我们当为此祷告，求主早日结束这种局面。因为每一间会堂，都应该是主基督的国度在一座城市中固定的、公开的敬拜中心。如果主在这时代已预备了走向公共敬拜的空间，教会就不当因着自己的胆怯或对隐匿状态的自义，继续满足于在一座城市中的非公共的敬拜。

3、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主日的理解。

基督徒最容易被识别出来的一种群体生活特质，莫过于主日敬拜，七日中以主日为安息。在十诫之中，这是惟独只有地方教会才可能持守并活出来的，可被识别的内心信仰的外在集体生活样式。主的教会能否在中国社会中活出一种六日为圣约家庭为中心，主日以会堂敬拜为中心的福音性文化，信徒能否守主日为安息日，作为主的恩典在时间洪流中的记号和对我们的生命管理的更新。这是福音在未来挑战和影响全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性事件”。但如果没有会堂的形成，无论有多少信徒静悄悄的守安息，也无法在社会中塑造这一群体性的和福音性的、反文化的文化事件。

主日是重要的福音的管道之一。如果家庭教会不能首先从中心城市开始，突破会堂建立的障碍，主日就无法在中国成为一个彰显上帝荣耀、传言恩惠福音，并因着教会在基督里的安

息而祝福所在城市的、大能的日子。

4、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文化使命的理解。

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时，圣民们犹豫着是否应该进入罪恶的敌国生活。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耶 29: 1），劝他们入城。这和他当初劝以色列投降一样，都十分出人意外。上帝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 29: 5-7）。

这段经文论到教会作为城中之城与罪恶之城的关系。一是肉身的进入，而非外在的分离；二是“你们”和“那城”又始终在叙述中被视为分离的主体，这意味着进入的意义在本质上是寄居；三是进入后的责任，一方面他们因着市民的身份，当殷勤作工，并为寄居的城市求平安。另一方面当他们到上帝面前为那城求平安时，则是凭着圣民的身份。这令我们想起亚伯拉罕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为罗得寄居之城求平安。在这里，圣民的文化使命，一面体现为在寄居之地殷勤的盖造、栽种和生养，好像那就是自己的家一样。另一方面体现为对世人和城市的普遍福利的怜悯、关怀和代求。于是以色列人

听从先知，进入罪恶之城，以犹太会堂为中心，一面持守信仰生活，一面为那城求平安。今天的城市家庭教会尝试建立会堂，也有福音性和文化性的两重意义。会堂作为公共崇拜和教会事工的固定载体，指向福音使命；会堂作为基督徒群体生活样式的外在彰显，和一个关怀怜悯、为万人代求的社区的中心，也指向文化使命。

5、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社区的理解。

在 2009 年，当笔者侍奉的教会被辖区民政部门宣布取缔时，教会才意识到自己虽然已建立了会堂，却与会堂所在的街道、社区，一直缺乏真实的社会性的连接。教会若不委身于社区，就难以真正有效的以福音侍奉城市的灵魂，以怜悯关怀城市的身体。虽然会堂的建立，也促成了教会会众在社会阶层的多元性。因为越是非公开的团契，会众的同质化程度通常就越高；越是公开化的会堂，会众社会特质的多元化就随着人数增长而越发明显。聚会场所的固定性越高，社区化的程度就越高。而敬拜的公共性越高，人群的多样性就越高。2009 年 8 月我们教会购房建堂以后，因着会堂的产权稳定，一些会友在买房、租房或找工作的选择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以会堂为轴心的半径。就一个覆盖了 600 万人口、会友却不足两百的教会而言，教会的社区化程度一年之前可以说几乎为零。目前开始增长到 10%。接下来城市植堂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教会社区化的过程。如我们预备两年内的植堂计划，将以新址为轴心呼召

半径距离内的信徒分堂聚会。那么未来第二间堂会的社区化程度，预计可以提高到 30%。

藉着会堂的建立和城市植堂运动，社区化的程度将逐步提高，最终使社区成为教区或牧区。主若许可，家庭教会藉着植堂运动，在结社自由的践行上领先于其他民间组织，则可能在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成形中，扮演重要的社区角色。从而为福音在未来一百年对城市生活的深入影响，奠定良好的开端。

6、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时代的理解。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社会都处于全面转型、中国文化也在整体上处于重新定型的最后预备时期。单就城市建设而言，从前没有一个时代，将来也很难再有一个时代，能像现在的政府这样，以低成本的、快速的和粗暴的方式，完成对整座城市的翻转改造。目前正在修建、筹建城市地铁系统的中心城市就有几十座。以纽约的经验看，一旦地下交通系统完成，至少在百年之内，世上最富裕的城市也无法承受整座城市的改造成本。甚至可能直到基督再来，若非出现极其重大的灾祸，中国各大城市的格局，都将于未来十几年高速增长和威权政治尚存的时期内成形后，就很难再有根本性变化。

就城市化进程而言，30 年来最大的社会结构改变是 4 亿人进入城市。城市人口预计将在十二五期间（2015 年）达到 7

亿，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另一方面，因为计生政策和城市格局的影响，2010年，专家预测许多大城市将首次出现居住人口的负增长。即使目前立即废止计划生育，城市的老龄化也将在15年后达到远超过国际老龄化城市标准的20%。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在交通格局和人口构成上的定型，即将完成。笔者在这里仅以交通和人口这两个简单的技术因素为例，提醒教会注意对时代的观察和看见，知道上帝将家庭教会的堂会转型，放在民族国家变迁的何等关键的时刻。一间一间的堂会，若不能在城市中离开住宅，脱颖而出，彰显于街道、社区之中。我们就很可能在未来失去更深广的以福音侍奉时代、影响族群的机会。焉知我们今日所得的位份，不正是为此吗。

7、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城市福音运动的理解。

纽约的救赎主长老教会，是一间致力于在全球最重要的50座城市中推动植堂运动的教会。他们的异象是“得着城市，得着世界；失去城市，失去世界”。凯勒牧师将一座城市中的福音运动，称为福音在一座城市中的生态系统。他强调两点，一是教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和教会作为一场有机的运动之间的平衡。组织性较高时，容易让教会失去有机的福音运动的活力和更有牺牲精神的委身。但当福音运动不能落实为组织时，就容易陷入混乱和失去持续性。

“运动”比“组织”至少在表面上对个人更有吸引力。家庭教

会在过去 30 年间的基本特征，就是一场布道的福音运动，而不是生根建造的植堂运动。巡回的传道人多，驻堂的传道人少。甚至有很多信徒和传道人，宁愿离开地方教会而委身于缺乏教会约束、差派和问责的“运动式的宣教”。主若许可，这些大量的脱离教会背景的传道，也会为未来堂会转型和基督徒社群的建造预备材料和砖瓦。但如果堂会不能在城市兴去，这一在“组织”和“运动”之间失衡的福音浪潮，就像一场灵魂的抢滩，难以在一代人的火热之后，留下堡垒般星罗棋布的地方堂会。

凯勒牧师强调的第二点，是不同堂会的模式、资源、领袖和福音运动的要素在一座城市中的连接。但在缺乏会堂的情形下，这种连接通常都只局限于牧者个人之间。不同的基督徒群体、不同的堂会和机构之间，很难在缺乏固定而公开的会堂的情形下，联络构成一座城市的福音生态系统。救赎主教会坚持认为植堂是最好的宣教，也是最好的构建城市福音生态系统的方式。因为堂会是最完整的圣约群体的信仰生活形态。只有当这种信仰生活形态围绕有形的堂会而形成成熟、稳定的样式时，教会作为一个社群，才不可逆地构成了城市生活形态中的、有机的一部分。

四、小结

会堂不只是一栋建筑，会堂是圣徒相交的地方。会堂意味着圣徒群体的公共性的记忆和形象，就是那些委身其中的会友

的位格内涵的产物。当会堂作为圣徒位格相交的外在彰显时，会堂开始彰显出地方堂会的大公性，从而而摆脱了私宅的临时性、个人性和偶然性对于圣约群体生活方式的影响。因此在会堂的转型中，家长制、夫妻店、世俗化团契或俱乐部的模式，都难以维持。会堂的形成不只是传福音的结果，会堂本身就是对福音的宣告和表达。会堂是看得见的山上之城，即使会堂并不会真像世俗政权的使馆一样，被政府视为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但圣徒作为圣灵的殿，使用会堂作为他们内心信仰的一种外在的福音性彰显时，就向世界彰显出了什么才叫真正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为另一个看不见的国度的主权，在这看得见的居所内被承认和顺服。

愿父的国在每一间堂会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中国每一间地方堂会，如同行在天上。

原刊《杏花》杂志 2010 年秋季号

2010 年 9 月 8 日

注释：

①参见拙文《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家庭教会的传统和公开化异象》（2009 年）。

②提摩太·凯勒牧师，《城市异象》，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植堂手册《福音 DNA》，2010 年。

| 2011

家庭是最重要的 NGO

在各人家中侍奉神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许多基督徒家庭，都以当年各支派聚集在示剑、约书亚说的那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书 24:15），作为写在门楣上的异象。表明这家是蒙了救赎，立志要过感恩蒙召的生活。

2010 年初，在夫妻团契的新年餐会中，我向主祷告，求让基督徒夫妻到年底超过 20 对。截止本月，教会的会友和预备会友中，共有 39 个基督徒家庭，其中 29 对基督徒夫妇，10 个单亲家庭。接着，又将有三对新人的结婚礼拜。届时，基督徒

夫妻将突破 30 对。

感谢主的厚恩和幽默，主一直激励我们“建造基督化家庭”的异象。因为圣约家庭是国度的细胞，是世上最重要的 NGO（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

有人想象一个圆，基督徒家庭在中心，单亲家庭在周围，而单身、丧偶、独居的肢体们就在最外围。这样，岂不是越在外围，越顾影自怜，觉得圣约家庭已经或尚未与自己有份？但我说，你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圆圈。你要想象另一个圈，单身、离异和丧偶的肢体在中心，而 30 对基督徒夫妻，手拉着手，站在最外面，形成一道马其诺防线。这才是一个基督徒社区的圆圈。同时，这也是一个属灵争战的圆圈。因为教会的时代使命之一，是在当代中国打一场真正的婚姻保卫战。未婚的信徒为主的缘故看守兵器，已婚的信徒为主的缘故站在前线。

今天，无数家庭在灭亡，无数客厅和卧室硝烟弥漫。无数妻子和丈夫，被他们在家庭以外的身份埋葬。在家庭中的付出被世人藐视，家庭不被视为与人类的自由和荣耀密切相关的场域。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家庭最大的变化，是先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复兴，后在伦理学的意义上衰败。相反，家庭教会三十年的意义，是使无数基督徒家庭成为“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从亚伯献祭开始，家庭最重要的定义，就是宗教活动场所。

从挪亚造方舟开始，家庭最重要的定性，就是非营利机构。

如果大而划之，我们的身份有三类，一是与后嗣权（家庭和教会）有关的身份，二是与公民权（政治与伦理）有关的身份，三是与财产权（市场和社会）有关的身份。在当代中国，彰显政治身份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绝大多数成员在他人面前最显赫的身份，都是财富身份。家庭身份呢，则被视为像内裤或卫生纸一样的私人用品。若有人摆在桌面上，甚至会被视为不礼貌。就像有人被问是否结婚，尽管他也信主，他却屈从在异国风弯曲世代的价值观下，说，这是我的隐私。

基督徒的圣约家庭，为教会永生神的家提供了道成肉身的样式。若不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上理解家庭，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家庭在救恩历史中的意义。

虽然家里有人当官，但家庭不是政治组织（专制主义使家庭沦为政权的中转站）。虽然家里做生意，但家庭也不是经济组织（所以家庭的时间、空间、财务与治理，通常应和生意有所分别）。

家庭要生养众多，所以家庭是教育机构；家庭要治理这地，所以家庭是文化机构；家庭要敬拜上帝，所以家庭是宗教场所；家庭要待人以恩，所以家庭是慈善机构；家庭要侍奉耶和華，所以家庭是福音机构。

愿我们问自己，作为一间教育或慈善机构，我和我家如何？

作为一家福音机构或宗教场所，我和我家怎样？作为一个工作坊、咨询中心或文化站，作为一间客栈、药房或沙龙，又值得我们献上多少活祭？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梦想，每对基督徒夫妇的家，是成都最吸引人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一个应许，当基督徒打开家门时，整个世界都将黯然失色。

愿主的异象成为我的梦想的王怡弟兄

写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

成立 “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的公告”

各位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教会 在 2010 年设立了慈惠基金。因着主的带领，慈惠事工的重心慢慢集中于三个边缘社群：流浪汉，良心犯和住院病人。在得到“慈惠委员会”和执事会支持后，长老会决定从即日起，在教会慈惠基金中，单设“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专用于对四川、重庆两地被羁押的良心犯家属的经济帮助。主若许可，当我们有能力时，再将这一援助范围逐步扩大。

主基督的诫命，嘱咐他的门徒“爱邻舍如同自己”（路 10：27），又与哀苦的人同哭，“记念被捆绑的人，好象与他们同受

捆绑”(来 13:3)。主的使命,叫我们传福音给普世之人,包括任何被歧视、排斥的人群。主耶稣在世的服侍中,特别关怀和进入罪人、妓女、税吏、病人、穷人等边缘社群,既怜悯、医治他们的身体,又传天国的道给他们,好叫他们的灵魂 得着释放。

《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22 章《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自由》中说,“惟有上帝是人类良心的主宰”(雅 4:12; 罗 14:4)。人若以强制力要求他人相信、盲从《圣经》以外的主义和命令,是”毁灭了人的良心和 理性的自由(罗 10:17; 14:23; 赛 8:20; 徒 17:11; 约 4:22; 何 5:11; 启 13:12, 16, 17; 耶 8:9)。

同时,中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民权公约》所承认的良心和宗教自由,也是这一《圣经》教导的部分彰显。

长老会认为,因一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自由及意见和表达自由”而对其施行强制、羁押和任何暴力对待,是违背《圣经》的。对具有神的形象的个人的思想、宗教及其表达的身体强制,在道德和灵性上是邪恶的。因为惟独主基督的福音,拥有呼召、改变和审判人类的思想 and 灵魂的主权。承认个人在神面前的良心自由,是福音使命的前提。

教会设立”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不代表教会对因言获罪之人的任何特定政治、社会、经济或学术思想、信念和言论的认同。评价或支持福音真理之外的社会思想和言论,或促使这

些思想对社会、制度和人心发挥影响，都不是地方教会的使命。

但教会对身边那些良心遭受强制之人，及他们的家属因此陷入的生活和精神困境，仍有不可推卸的怜悯、帮助和安慰的责任。尤其当这种对他们私下或公开的帮助，也成为对良心自由的考验、捆绑或试探时；教会当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赐我们做“好撒玛利亚人”的勇气和力量。

二战后，德国信义宗的神学家马丁尼莫拉牧师的广为流传的忏悔，刻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追杀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长老会认为，主基督藉着尼莫拉牧师的这段话，对今天中国教会的良心和敬虔，依然构成了挑战、警告和呼唤。长老会认为，教会对一切压制和强迫人类良心自由的罪恶的漠视或沉默，最终将损害教会的见证和福音使命。

长老会尤其考虑到，目前，成都和四川各地被政府拘禁的良心犯中，有好几位来过本教会聚会或出席礼拜。流浪汉陆大椿，上访者严文汉，维权作家谭作人，维权人士黄晓敏，入狱前都是来过本教会的慕道友。自贡的维权人士刘正有，也多次

在成都参加本教会的团契。遂宁在狱中的刘贤斌弟兄和他所在的“信望爱团契”，与本教会有主内的交通。被羁押的维权人士陈卫，也是这个团契的慕道友。被逮捕的作家冉云飞，则是本教会会友的配偶。长老会和执事会一致认为，无论教会可能因这项慈惠事工的开展，面临怎样的外在压力，我们的基督徒良心，也不许可我们从这些被“打个半死”（路 10:30）的人身边走开。因为要审问我们良心的，不是世人，而是我们的主基督。愿我们在时局艰难的时候，依然畏惧主的话，胜过畏惧世上的一切。

附：秋雨之福归正教会“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规则（试行稿）

一、对良心犯的援助范围：

- 1、因“以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因言获罪的罪名被拘留、逮捕或判刑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 2、在行政处罚书或判决书中，明确以其信仰、宗教活动、思想、言论、写作、出版及新闻传播等表达思想言论的行为作为处罚或刑罚之事实依据的被羁押者；
- 3、本人被羁押前或其家属目前居住在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中国

公民；

二、对良心犯家属的援助目标：

- 1、社会抚养金，在良心犯被羁押期间，筹集并帮助其子女在校教育的部分或全部费用。
- 2、家庭补偿金，在良心犯被羁押期间，按照四川省或重庆市平均社会工资或平均职工收入，筹集并向其配偶、子女或父母支付当事人被羁押期间的家庭补偿。
- 3、临时救助金，在良心犯被羁押期间，其配偶、父母和子女面临生活困难、重大疾病和危难时，筹集并支付足以帮助他们的金额。

三、事工流程

- 1、由慈惠委员会的”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义工小组，负责个案的联络、探访和资料的搜集，并根据情况向执事会提交个案的援助案及援助预算；
- 2、执事会讨论通过后，报请长老会审核后执行；
- 3、基金账户由教会的财务同工统一管理，执行《秋雨之福教会奉献及财务规则》。

四、援助基金的来源和使用

- 1、由慈惠委员会决定，从教会慈惠基金的余额中按比例提取的金额；
- 2、在教会主日崇拜收到的对“援助基金”或援助个案的指定奉献；
- 3、基金账户收到的转账的奉献或捐助；
- 4、援助基金将全额用对良心犯家属的经济救助；该项事工的全部同工、义工、行政及探访等费用，均从本教会的奉献及财务中支出。

五、目前的个案列表

1、刘贤斌，基督徒，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 10 年有期徒刑，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看守所 119 室 629000

2、冉云飞，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成都市都江堰看守所都江堰朴羊路上，电话 87107878，邮编 611830

3、谭作人，因灾区调查及互联网写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 5 年。

4、陈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四川省

遂宁市公安局看守所，邮编 629000

5、陆大椿，因互联网传播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已出狱，生活困难，需两笔手术费用）

王怡牧师起草，秋雨之福归正教会长老会于主后 2011 年 4 月 24 日复活节公布

基督徒社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

王怡，一九七三年出生于四川三台。原成都大学法学教师，宪政学者和基督徒作家。曾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独立中文笔会（ICPC）理事、副秘书长。二零零五年信主后，带领家庭聚会。二零零八年十二月辞去教职，蒙召全职服侍。二零零九年七月，在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当选为教导长老。

二零零四年，王怡入选《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二零零五年，参加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在闭幕式上作题为《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的演讲；同年，应邀参加瑞士“第二十一届国际南北传媒节”。二零零六年，在台湾东吴大学出席“两岸知识分子论坛”；入选法国外交部“未来人士计划”访问学者；在华盛顿参加“中国宗教自由状况高峰会议”，并应邀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晤。二零零八年，在华盛顿出席“全球基督徒法律人大会”，获颁“促进宗教自由杰出贡献奖”。

二零零八年以来，多次应邀在海内外各种教会、机构的研讨会、特会和讲座中担任讲员。

信主前，出版过随笔集《载满鹅的火车》、《不服从的江湖》，法学论着《宪政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转折》及自印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诗集《秋天的乌托邦》等。信主后，在媒体开设看电影、谈信仰的专栏，出版文集《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和《我有平安如江河》。二零零九年，他的专栏获腾讯“中国传媒年度专栏奖”提名。近年来，另有译着《自由的崛起：十五至十七世纪加尔文主义对西方五个政府的影响》，自印福音性文集《与神亲嘴》以及二零一零年秋雨之福教会每周牧函《灵魂总动员》等。

采访缘起

我与王怡认识已十多年。二零零零年前后，上海三联书店计划编辑一套思想随笔，北大的贺卫方教授给我发来电邮讨论作者人选，由此我与王怡联系上。这套书的第一本是我

写的《铁磨铁》，第二本是王怡写的《不服从的江湖》。从此，我与王怡成了好朋友。每次我回到成都探亲，都会与王怡等朋友相聚。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因与刘晓波一起酝酿撰写《中国年度人权报告》而遭北京警方传讯。在当时肃杀的气氛下，王怡愤而撰文声援。不久，我和妻子从北京回到四川，与王怡夫妇有了一次郊游的机会。路上，我们一起探讨信仰问题。那时，王怡提了很多问题，让我们穷于应付；倒是他的妻子蒋蓉很认真倾听，若有所思。

奇妙的是，几个月后，蒋蓉打来电话告知，她已受洗归主，是苏文峰牧师为她施洗的。我们大为欣慰和感恩，并认定王怡悔改信主的日子也不远了，上帝岂会只拣选姊妹而不拣选弟兄？有一次，王怡到北京出差，我们邀他来方舟教会礼拜。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家庭教会，我看得出他颇受感动。不久，他们夫妇在家里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查经班。二零零五年圣诞，他们邀请我和方舟教会的传道人邓晓斌到成都，由邓晓斌传道为王怡等八位弟兄姊妹施洗。

此后几年，王怡与秋雨之福的弟兄姊妹走过了一段充满风雨与祝福的天路历程。二零零九年，我与王怡合作撰写“基督与生命”访谈，王怡既是访谈者，也是访谈对象——对他的访谈，我大概是最佳人选。二零一一年三、四月间，我与王怡作了多次访谈，遂有了这篇文章。

从高高的书架上摔下来的那一刻认识神

余杰：王怡弟兄，我是目睹你走向基督信仰的见证人之一，可能除了我们方舟教会的会友，我最熟悉的就是你的信仰经历。不过，还是请你自己来详尽地分享一下这段心路历程吧。

王怡：在我归正的过程中，有三句圣经的经文，好像步步为营的，引领着我。

和你们方舟教会走过的路程相似。二零零五年四月，在我家开始了一个聚会，几个月后蒋蓉受洗。我参加聚会两个月后，还是没有信心，也没有悔改。我既没有独自一人开口祷告过，也没有一个人唱过赞美诗。有一天，我站在高凳子上，去拿书架上接近屋顶一层的书，突然从上面摔下来了。当时我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莫名其妙的就开口祷告了。脑海里冒出一句读过的经文：“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很久以前，我读自由派神学家的书，提到对加尔文的评价，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是不在上帝主权掌管之中的。当时我就想，我一两百斤啊，相当于好几百只麻雀。如果一只麻雀掉下来，都有神的主权掌管，那我掉下来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信主的开始。就是对上帝的主权和奥秘的掌管，充满莫名的敬畏，第一次开

口祷告，第一次独自唱赞美诗。

余杰：我记得我和妻子第一次向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反过来说，苏东坡是你心目中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诗文书画无所不精，淡定飘逸，进可治国，退可修身。如果苏东坡因为没听过福音，就会下地狱，这个信仰就是你无法接受的，你甚至说，宁愿陪苏东坡一起下地狱。那时，我和妻子是如何回答你的，我们自己都记不清了。但你的问题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思维，背后是对整个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的自大。

王怡：前不久，我拍着冉云飞的肩膀说，还记得吗，我以前并不比你更不骄傲。我的确是一个很骄傲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说法叫狂生。曾经有一次，两个朋友慕名请我吃饭，一个很委婉的提到我的穿着，说王老师应该穿得更体面，才配得上你的风度。另一个反驳说，我们这些为生存奔忙的人，才需要注意穿着。像王老师这样的人，随便穿什么，就可以去见总统。这个马屁简直让我舒坦极了。特立独行，天下皆醉、唯我独醒，这种士大夫的情结，其实是深入我骨髓的，外表谦虚，里头傲慢。作为法律学者，我关注中国的宪政转型，写了大量的文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也参与一系列维权事件。那时，“公义”这个词让我特别骄傲，觉得自己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当我的自由言说的勇气，得到别人的赞扬时，尤其是被人物周刊列上“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又因着这个，受到政府打压和迫害。就真的产生了一种虚妄的自义，以为十

亿兆民，天下重任，唯我二三子而已。但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件使良心蒙羞的事。在四川省高级法院门口，有一个上访者希望我帮她，拿了一叠材料给我。我去拿了材料，就准备离开了。但她一招呼，就围上来一大群上访者。她说：“这个人可以帮你们。”那群人就围到我身边，有的开口诉说，有的问，是中央来的记者，是律师，还是大干部？好像天下的冤屈都围拢来了。我一下子胆怯，吓坏了，露出我平日瞧不起的小市民的面目。连说我帮不了你们，我还有事呢，你们去找别人吧。那一天，我基本上是落荒而逃的。我骑着车离开他们，内心羞愧不已，后来一边骑一边流泪。看到了自己的卑微，傲慢，无力，看到自己里面并没有爱，更没有公义。我以前所做的一切事，满足的都只是我自己。

我的信主历程，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不断的悔改。这个悔改达到最高峰时，是我读到《诗篇》第五篇的一句经文：“你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那一次，我打开电脑，发现自己的文章已超过两百万字。我当时就想，神啊，如果我这辈子卖了两百万斤猪肉，我的罪或许没有这么大；但我写了两百万字啊，要么是字字珠玑，要么是字字杀人啊。文字是要影响人的灵魂的。一个不知道真理的人大声说话，好像所说的就是真理，那我是该死两百万次的人啊。这句经文让我停了很久，想了很久，悔改了很久。对我的自我期许产生了最后的、完全的破碎。我不过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余杰：这种反省是非常宝贵的。在中国文化中，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个人良心为最高判断标准，最缺乏的就是自我反省和自我质疑的维度。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知识分子群体遇到的最大障碍。他们常常说，基督教是好的，利国利民，但我个人不需要，我可以独自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靠得住吗？人的良知靠得住吗？你以为自己在行善，焉知不是在作恶？

王怡：是的，自我是一个偶像，没有自我的破碎，就不可能信靠神。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悔改是公共性的，指向的是“今生的骄傲”。还有私人性的，指向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爱自己的妻子，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同学，高中开始恋爱，我们的爱情沿途都被周围的人称赞。我也忠于婚姻，没有在身体上背叛妻子。然而，我也一样在网站上看過色情图片，我也如耶稣所说，对妇人动过淫念。你是知识分子，你是学者，你是作家，这些人前的荣誉和身份，其实一点都帮不了你。道貌俨然，内心污秽，别人不知道，难道在神面前你自己也不肯承认吗？

另一种骄傲呢，就是在私人生活上的，道德主义的骄傲。以为自己比别人圣洁。但是，信主之后，我发现真正的改变，真正的对堕落的情欲的胜出，并不是靠道德的约束，而是在基督里，内心的情感渐渐被圣化。经过几年的侍奉，今天当我在教会看见一个年轻姊妹时，我开始体会到一种非天然的、却是

真实的情感，就是她真是我的姐妹，真是我的女儿。其实，人们尽管都会受到性的诱惑，但通常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血缘的姐妹和女儿保有一种美好的情感，而不会生出邪念。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对其他异性生出邪念呢？不就是因为其他的女性跟你没关系吗。换言之，恰恰不是爱，而是冷漠，才产生了性的试探。

所以，你只能在基督里，才能胜过情欲的试探。而在基督里的含义之一，就是在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建立美好的、圣徒之间的“神圣家族”的情感。首先，你必须先在主的教会，看到你的姊妹们时，开始将她们当作在基督里的真正的母亲、姐妹或女儿；然后，当你看见世上的异性时，你的情感才可能慢慢被圣化和被祝福。换言之，上帝在教会生活中，扭转你里面的情感的样式，养成你的圣洁情感，让“福音”成为一切异性关系的磐石。眼目的情欲才得以胜过。这是我很深的一个体会，我越服侍主的教会，我个人的生命就越蒙受祝福。为什么我曾经走在街上，会对一个异性生出邪念？因为我不曾跪在上帝面前，为她祷告过。

余杰：谢谢你的坦诚。真正的信仰，必然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最多走到这一步也就停止了，最多也就是教会中的“消极会友”。但你却很快走向全职侍奉之路，神是如何带领你迈出这一步的，你又是如何寻求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的？

王怡：那一次从梯子上摔下来的经历，带领我刚一信主，几乎就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相信上帝绝对的主权，不但掌管我里面的一切，也掌管我外面的一切。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基督在十字架上，赎回了一个败坏的世界。这是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宣传部门有所谓“五个一工程”，每年评一本好书、一部电影、一首好歌等。信主后，我就用这“五个一”来寻求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所谓的“五个一”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座城市，一份呼召。信主后，我的寻求和挣扎主要在后面三个，“秋雨之福教会”，“成都”，和“传道人”。这三者最终确定了我一生的使命。之前，我觉得神对我的带领是继续做公共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教师、学者和作家的身份（或者地位），这些都是我驾轻就熟的事，老实说，也是功成名就的途径。以及，也是十分有安全感的选择。基本上不需要你放弃什么，只要沿着轨道继续走就好了。我原以为，神并不要我在教会全职服侍，我只是带职服侍，写作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写作的成就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胜过其他一切的成就。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后离婚了的原因之一。但我这个如意算盘，后来却慢慢被破碎了。

余杰：你在文章中说，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对你的信仰历程带来巨大的冲击，地震之后，你发现上帝的呼召更加清晰了，即便像约拿那样想躲到天涯海角去，还躲不掉。

王怡：二零零七年年底以来，我开始寻求全职传道的呼召。我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把蒙召传道当成天上地下最荣耀的一个职份？就是连天使都会羡慕，也值得我舍弃一切，看万事如粪土，值得放弃自我认知和安全感的职份？然后，我在这样的渴慕和认知中，坦然的、遗憾的承认，神没有让我全职传道，而差派我去做了另外的事？这样问自己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里面仍然轻看了传道的职分，在呼召的寻求上，我的知识分子情结并没有彻底破碎，我还是下意识地认为自己能做的，想做的，和擅长的，就是最重要的。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我们教会的退修会受到宗教局冲击。我们拿到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尝试用合法、得体的方式向政府表明：我们的聚会不是非法聚会。五月十一日是主日，那天教会宣布了二十天的接力禁食祷告。但第二天汶川大地震就发生了。祷告的主题变成了大地震。

我家的层高相当于十七楼，5.12那个中午，房子像船一样摇晃。我跌跌撞撞走进卧室，我们的孩子书亚刚过一岁，他躺在床上，醒了，就睁眼看我。我按着他的头祷告。我说：父神啊，如果今天你要带我们去见你，是好得无比的，但是求你怜悯这座城市。那是我这一生最接近死亡的时候，并以一种奇特和震骇的方式。但我心里从来没有那样的平安。

余杰：所以，你的第二本影评集名为《我有平安如江河》，

在那样惊恐万分的时刻，能够享有内心的平安，是何等大的福份。

王怡：我想，没有末世感和末日感的基督徒，是最不健康的基督徒。感谢神，借着地震带给我极强的末世感。地震之前我以为神对我的呼召不清楚，地震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他的呼召一直都很清楚，是我自己一直有障碍。我对经济的压力，对未知的道路，对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教师身份的难以割舍，都阻拦了我的正确回应。但是，地震一来，你亲眼看见自己的房子在你面前摇动，你大叫一声，“不动产”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词语。大地一摇，你三十万的房子就只值三万了。你伍佰元的西装就只值五元了。那一刻，对末世的焦虑更深的进入我的内心，让我承认我在这个地上真是寄居的，我一生要做的一切，都必须指向这一切结束的那一天。

我从楼上下下来后，看见所有人都到了大街上，整个城市就是一座难民营，所有人都活在恐惧中。我心里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们要怎么交帐？你在四川的儿女，你在成都的教会，要怎么交帐啊？当时电话打不出去，但还可以发短信。我就发短信给所有人。手机里也有几个宗教局干部的电话，我也发给他们，安慰他们。我不是要趁这个机会做“福音统战”工作，我知道那时候所有人都在恐惧之中，我必须安慰他们，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这个职份。我必须安慰他们，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是治理这地的。我们没有什么实际的权柄，

但我们用神大能的话语来治理这地。也有宗教局干部给我回短信表示感谢。

接下来几个月，我的精力几乎都放在教会和灾区事工上。神的呼召在我心里越来越肯定和迫切。读经时，神又给了我第三句话，《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我省察自己，虽然已在军中当兵，却还是舍不得世界，要偷跑出去做点小生意。九月开学后，上了第一周课，我回家对妻子说，我已无法集中精力上课了，我不能再等，必须辞职。

以前我也想做一个基督徒学者、基督徒作家。这些都很宝贵，好的基督徒商人、基督徒医生，基督徒职员。但今天的教会，最缺乏的还是丢了渔船、甘心上路的传道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必将经历社会、政治和价值观的全面转型。我相信，我也盼望，从地方教会的讲坛所发出来的声音，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这是神给我的呼召。

余杰：在中国，传道人的身份确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西方，这不是问题，牧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可以给人主持婚礼、颁发结婚证书，享有免税等各种优待；但在中国，教会和传道人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有多少人会认为“牧师”或“传道人”是一个正当的、具有“合法性”的职业呢？

王怡：是的，我作了传道人后，才了解这种边缘性，以前

你是大学老师，是知名作家，你是不知道的。譬如你申请不到信用卡，你无法按揭买房，等等。有一次我需要填一个简历，表格中有职业一栏。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岂不是“非法职业”吗，没有政府颁发的“传道证”啊。那时，我心中软弱，满有顾虑，就填了“作家”。后来我良心不安，就在主面前自省、悔改。环顾四周，有多少人在偷偷做基督的门徒，又有多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也在悄悄做传道人，有多少教会的执事、长老，他们的身份隐藏得如同秘密会社中的大哥一样？我在一些主内的聚会或讲座中也遇到过，一些与会者明明是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但他们都使用譬如经理、职员、教师的身份，全然不提教会的圣职。你说“天王盖地虎”，他不对“宝塔镇河妖”。我很伤心，但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在简简单单的一份简历上，第一，我亏欠了上帝的呼召；第二，我背叛了自己服侍的这一群圣徒。家庭教会很可悲，传道人就更可悲了。保罗说“不以福音为耻”，而我们脱离这羞耻，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余杰：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动摇、害怕吗，毕竟家庭教会还在受逼迫？

王怡：回想二零零四年，我开始慕道，以法律人的身份参加了几个重大的家庭教会受逼迫案件的调查、写作和诉讼。换言之，上帝呼召我传道之前，先让我观看了一些受迫害的教会。免得我以后上了船，才说不知情。后来学校停了我一段时间课，也不能在媒体发表文章了。有人打匿名电话，骚扰我和妻子，

去老家调查我的父母。用一些小动作恐吓我们，离间我们，譬如说我是王怡的女朋友啊，我是蒋蓉的老同学，暗恋了她十几年啊，要用一切手段抢回来啊。这些外在的压力、国保的骚扰、经济上的困难，曾让我处于恐惧之中。不是害怕坐牢，而是不知道未来。我那时也有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殉道”情结，也做好了被抓、坐牢的心理准备。但我对世俗的自由主义作为生命根基的怀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后来我回答一个朋友，说关于“殉道”，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的区别是什么。基督徒看重的是后面这个“道”，所以他甘心去“殉”。但人文主义者看重的是前面这个“殉”，因为殉的本身，赋予了自己价值。前者是信仰，是“道”赋予了“殉”以价值。后者是道德主义，是“殉”赋予了“道”以价值。所以我处在信仰的困惑中，就不断问自己：你究竟为着什么样的“道”而“殉”呢？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你是不是真知道你所殉之“道”呢？回想那时的勇敢，其实是以行为称义的悲壮感。你害怕是不自由，你说老子不怕，也是不自由。只有“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秋雨之福教会被民政局和警方宣布取缔。那个下午，我和同工们一起祷告，商议对策。我跪在地上说，主啊，原先我对自己的蒙召还有所保留，说愿意侍奉教会二十年。但现在，我在你面前说，我立志在这间教会侍奉你，一直到你带我去见你的时候，求主帮助我。过去这半年，

我有过四次被拘押，在警察局，不过都是当晚就放出来了。如果是“道”决定了“殉”，而不是“殉”决定了“道”。那么我虽不知自己将来是否软弱，又会在何时、何处软弱，但现在我凭着信心说，我放心的知道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之中。信主以来，我一直都有一个很清晰、强烈和持久的异象，就是今生必有一场牢狱之灾。既然我信主的开始，是从书架顶层掉下来。那么如果主的意思，是要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经历，来完成这个从摔倒到赞美的动作，我也甘心愿意。我知道里面的老我始终软弱、卑微，所以我不求主使我一生不遇见软弱，跌倒和恐惧，我只求主使我今后经历这些时，一生不离开圣徒的团契。

教会是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生命共同体”

余杰：我们此前都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信主以后，你对原有的自由主义立场有何反省与调整？

王怡：就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来看，以前我信奉自由主义时，虽然接触过社群主义的观念，但体会和认识都很少，最看重的还是自由个体的优先价值。后来我认识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随后，我转向共和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对传统的珍视中，逐渐看重共同体的价值之于个体自由的意义。宪约可以厘定个体交往的界限，却无法创造社群生活的样式。换言之，宪政主义是一个抑制公共之恶的灭火器，但不是一个眷顾生命之善的创世记。到这时，我的专业

寻求，就已经走到了被福音征服的边缘。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公共”二字已经表明了团体的存在。但这个团体仍然是虚假的，似乎借着自己的写作，你一下子便和十三亿人套了近乎。实际上，这不是真实的、位格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真实的群体生活。当我们在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坐标中对自我定位时，这跟我们批评的共产党的宏大叙事，跟那种不经被代表者确认的、不具有合法性的集体、人民、国家的公共偶像，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而我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身份的转换才真正发生了：我从十三亿人中的一名虚拟的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二、三十人中的一个真实的公共人物。我的生命到这一步，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余杰：原来，你在某个相对比较大的圈子当中，还算是“头面人物”，你说的话有人听，还有很多人赞美你；但当你退入一个很小的群体的时候，却发现要建立真实的私人生活的关系，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

王怡：是啊，我原本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很轻易就与庞大的群体，与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建立某种虚幻的超级链接，又透过写作与成千上万的读者建立起抽象的群体关系。但在地方教会的服侍中，这些立场都被一一破碎。一些知识分子信主后，难以承受这一步。在长期受到虚假的集体主义的意

识形态的欺骗和压榨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力量重新进入一个真实的群体。我们做惯了孤儿，回不了家。于是我们的全部热情，都用在了畏惧、警惕和防止群体对个体的抹煞上。因为我们错误的预设了“个体的完整和自足”。但上帝指着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一句话，就击碎了知识分子自我抚摸和 XO 式的珍藏。

余杰：这是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信仰上的最大问题，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很多知识分子说，我信主可以，但我不参加教会，为什么非要参加教会呢？一个人不也可以接近上帝吗？他们的信仰，是一种佛教个体修行式的信仰。另一方面，中国教会由于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状态，教会观相当薄弱，也不足以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这些疑惑提出解答。

王怡：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一个著名的定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以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全盘反对这个定义，信主后开始有新的思考。其实这个定义受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极大影响，其他文化中不会出现类似的定义，不会把人看作关系中的产物。从圣经看，人的本质确实存在于关系中。在旧约里，以色列对人的观念，有三点是非常独特的，第一是全人的观念，人包括了身体和灵魂，两者都是真实并指向永远的。第二是社群的观念。亚当在于上帝的约中代表了所有亚当的后代，如一位神学家说，世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全人类都悬挂在他们的腰间。在上帝的创造和救赎

中，个体从来不具有本体性的、和单独的价值。第三，选民的概念。上帝和他的选民的关系，是通过立约来反映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盟约中与上帝的关系，是人之为最根本的定义。所以马克思的这个定义，来自两个人类思想资源，一是犹太—基督教文明，另一个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后者取代了上帝和人的盟约关系，将圣约关系缩减为“社会关系”，又在社会关系中，继续缩减为“经济关系”。

我们否定的，是马克思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冷酷的唯物主义。但从圣经来看，人的的确是“关系的总和”。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与他人（邻舍）的关系、及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摩西十诫也将一切道德律都指向这两个层面的关系：爱神与爱人。

上帝以他的儿子基督的宝血，替代选民担当罪的刑罚，救赎一切信靠他的人。由此恢复和重建了上帝与人类在盟约中的关系。而圣灵建立了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可见的身体。就是要让上帝的儿女活在圣徒相通、彼此相爱的社群关系中，并向着万民传扬福音，从而恢复和重建人与他人的关系。因此，离开了地方教会的圣徒共同体，离开一个山上之城的基督徒社区，也就离开了人与人在救恩中的、整全的关系。如果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母亲；那么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也难以宣称基督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为你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你只能是其他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以前，我对关系采取躲避和排斥的态度，自己也缺乏在群体中生活服侍的经验。开始牧会了，才真实地建立起群体生活的样式。你怎么样做一个承担责任的人？人最大的失败，就是亲密关系的失败。离婚的人，离开教会的人，失恋的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人。一旦失去关系，就失去了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是残缺的。这就是个人与群体的神秘关系。就像你躺在病床上，如果认不出你的亲人了，也就等于认不出你自己了。传道人的家庭生活与教会生活是相通的，而不是割裂的。长老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又如何能照顾好神的家呢？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人、朋友、肢体中，如果缺乏在真实的团体生活中的委身，就不可能服侍教会，推而广之，也不能很好的担任公共职务和社会治理。

以前，家中来了朋友，如果不是我邀请的，我一般都不愿意出来打招呼，自己躲在书房读书和写作。在学校，我与同事和学生也没有建立一种团契的关系。我刻意与周围的人保持着距离，有了距离，似乎才有安全感。我通过写作、通过网络，也和少数人建立起某种关系，在这少数人中，似乎可以惺惺相惜，但这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团契关系。我以前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其实有很大的虚拟性。

有一次，我在教会跟一个弟兄谈话，他是一个工人。谈话中，我忽然有一种深切的自我省察：如果我依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会谈论国家事务，讨论下岗工人的难题，但我一辈子可能也不会跟一个工人，分享他个人生活的处境和罪恶，并

试着陪伴他经历这些问题。

余杰：我们常用“生命共同体”这个概念来形容教会。当我委身教会之后，深感教会确实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从所未有过的“生命共同体”。即便在观点和立场一致知识分子中，也根本没有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校友、同学、师兄弟、师生，这些关系都很淡薄，因为知识、文化不是爱。

王怡：这几年，跟弟兄姊妹一起走天路，感受到我能给他们的，远远不如他们给我的多。我称地方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社区。传道人的文化程度、神学背景，个人恩赐等，都不是决定性因素。最宝贵的是对福音的委身程度。这种在基督里的关系，就是“肢体”的关系，这是保罗用的一个很美的比喻。今天教会在中国的使命，不仅是要传扬一个“全备的福音”，不仅是要指向“个体的得救”，不只是一定要告诉人“上帝对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离开了上帝对整个教会的奇妙计划，哪来对你的奇妙计划？地方教会必须活出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社区，活出一个福音的生命共同体，在关系中持续的、有说服力的传扬福音。教会有能力也有责任，向着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一种群体生活的样式。

最近两年，我们教会每三个月举办一次会友课程，让新信徒了解教会的信仰。这个课程有六个小时。有一个小组讨论的题目，“请分享你信主前参加过的、一次最激动人心的团体生活的经验？你在里面获得了什么样的满足，受到过什么样的伤

害”？在大部分人的分享中，我发现人们群体生活的经验都非常贫乏。对多数人来说，融入最深的群体，大概就是班级；最密切的关系，大概就是老同学。此后，同事、朋友等，都比较淡漠些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没有激动人心的、有生命敞开的团体文化和团体经验。这和西方社会很不一样。在北美，教会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教会外更有各种社会组织、NGO等。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也可能是若干社团的会员，人们拥有丰富的、团体中彼此生命相交的经验。

余杰：这一点我的感受很深。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住在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简家中。简不是知识分子，她已故的丈夫是一名普通工人，她本人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她却积极参与公共活动，是一个接待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的老人组织的成员，所以把我接到家中暂住。她还是当地老年旅游协会、农业保护协会以及教会的活跃分子，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与之相比，中国人处于互相孤立的“原子”状态，缺乏群体生活的经验，也无法依赖群体组织的生态，来制衡公共权力的扩张。

王怡：我们只有自由的梦想，没有自由的经验。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是几乎惟一的、在国家体制之外拥有丰富生命经验的社会共同体。学者李凡说，家庭教会事实上是中国最大的NGO。我想更重要的是，教会向中国社会传讲的，并不只是一套关于得救的教义，而是一群得救的人的群体生活样式。而这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最匮乏的东西。今天，几乎所有的中

国人在接触教会之前，都没有过令人难忘、令人满足的团体生活的经验。而在教会中，每个人都拥有在有血有肉的亲密关系中改变自己的经验。“有血”，是指基督的宝血。“有肉”，是指罪人的挣扎。所以这样的经验尽管艰难，却始终有盼望。

余杰：在自我破碎与重建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教会中弟兄姊妹的关系甚至比血缘关系还重要。中国目前仍是一个血缘社会，或者是一个稍稍扩大的熟人社会；但教会则提供一种超越性的，基于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有生命联接的新的人际关系。

王怡：基督徒互称“弟兄姊妹”，我对这称呼的体会，是在服侍教会的过程中，才越发的深切。在旧约中，弟兄指的是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跟中国古代相似。但在新约中，这个称呼指向了所有跟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血缘上的同根，而是圣灵的同在。在中国古代，有异姓结义兄弟的传统，这是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同一个天父，同一位大哥，哪来超越血缘的兄弟情谊？所以，中国文化的悲剧，就是异姓兄弟的彼此背叛。三国，水浒，直到国共，无不如此。

余杰：我记得你在为电影《投名状》写的影评中，便表达了这个意思。

王怡：是的。人的结义是靠不住的。因为“义”并不在鸡血和牛头中。但在教会中，我真实体会到“异姓兄弟”的关系。

没有对教会长期的委身，你尽管受洗信主，也体会不到这一点，所以有个神学家说，“单独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疏离和迁徙的生活，改变了中国古代一个家族几代聚居、“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方式。今天，即便是近亲戚，往往也只在春节，才有一次团聚的机会。而这种团聚也往往缺乏实质性内容，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打麻将，谈不了什么关乎生命的话题，无法在心灵层面有交流，更不要说敞开自身的忧伤、软弱和羞耻了。但这样的生命交流，却每天都在地方教会中发生。

余杰：在中国要建立真正的生命共同体，首先要从家庭开始，然后拓展到教会，最后祝福社会。

王怡：有一个牧师说过，判断某弟兄的生命光景如何，如果还没有见到他妻子，你就不能下结论。在圣经中，对长老、执事的要求是，必须先在家中无可指摘的见证。在与家人的亲密关系中，你的生命呈现为什么样子，那才是你的本真状态。

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常跟妻子吵架。有时候，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落差和一种令人绝望的荒谬感。五分钟前，我还在思考国家的命运，自由宪政的前景，考量自己与诸多公共事务的关系，还有，我对一个抽象的群体的无比的热爱。五分钟后呢，我就跟妻子发生了口角，半天不说话。不等政府来抢你的麦克风，你就在最亲密的人面前，自己掐断了麦克风。上帝啊，难道生命的真相就是这样断裂，这样伪善，这样不堪一击吗？一

个连妻子都爱不彻底的人，如何去爱远方的人呢？

福音降临在中国的意思，就是福音降临在亲密的、共同体的生命关系中，降临在团契和小组中。在几个家庭之间，在互相陪伴和同行的人中，见证、目睹和分享生命被福音改变，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世界的一切改变都取决于此。美国柳溪树教会的海波斯牧师（Bill Hybels）说，“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这句话我很认同，整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一间一间地方教会、一个一个基督徒社区的形成。上帝的祝福和审判，都要从这里显明。如果要在这里列出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作为牧者，我是一个新手。在学习牧会的过程中，真实而惊讶的感受到了这一点。有些来教会的朋友，尤其是第一次来的，大多对这个群体感到惊讶。为什么人们会当众讲述自己的罪。特别是几个成年男人，在谈话中真诚分享自己的亏欠、软弱乃至污秽，边讲边流泪。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看到这一幕。它不一定会发生，但它只可能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社区中。即便是当代那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充满理想，坚持信念，心怀天下，我们也都很熟悉这个群体，但在他们（也曾经是我们）中间，没有过这样的生命的敞开、认罪、忏悔、饶恕、接纳和喜乐。这一切惟独只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中，向整个中国社会呈现了出来。而教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如果要按

知识分子的标准看，都是无知的普通人，如果不信上帝，就应该成为他们的粉丝才对。我遇到过一个在海外受洗的学者，问他为什么不去教会呢，他傲慢的说，中国人的教会也能去啊？我只去外国人的教会。

也许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也可以有美好的个人见证，也可以向世人传讲福音。但一个基督徒若不委身教会，他就不可能向世人展现天国，展现上帝三位一体的团契。我在牧会的过程中，与弟兄姊妹、与同工之间的忍耐与磨合，是一个也痛苦也幸福的过程。一开始，我更像一个教师，是单纯的教导者的角色，比较生硬和苛刻，在服侍一些软弱的肢体时，缺乏体谅和温柔。现在我也充满这些缺点，我还处在不断反思、调整、破碎和悔改的过程中。

余杰：牧者需要有一颗父母心，而不是像知识分子那样居高临下地对所谓的愚民作出“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评判。以前被我们当作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的鲁迅，放在圣经中，不过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罢了。

王怡：保罗在书信中有两次提到牧者的父母心肠。去年，有一次同工培训的总结，大家轮流上台分享。有个年轻同工讲到对教会的看法，存在哪些不足等。蒋蓉听了后对我说，面对这样的年轻人，第一次生出像是自己的儿女的心。我告诉她，我也一样。这种情感样式的变化，父母心肠的出现，是我在牧会中的一次突破。以前教会举行婚礼，我看到新人出场时，心

里想到的都是自己以前结婚的情形。今年初的一次婚礼，我看到新人时，忽然发现自己没有想到自己，而是想到自己的孩子，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娶妻、出嫁。爱德华兹在论敬虔的宗教情感时，说到三个对信仰生活的衡量，即：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和圣洁的情感。我的体会是，没有基督徒社区的亲密关系，就不可能有圣洁的情感。只有在圣徒的共同体中，人的败坏的、自私的情感，才能被福音更新和圣化。

余杰：你以前是大学老师，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的工作，看上去和牧者的工作很相似。实际上，两者差异却甚大。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又是如何完成这种身份转换的？

王怡：第一个是对写作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我以前以为写文章是了不起的事。听到说有人看了我的文章，对真理有了渴慕，甚至信主了，甚至有读者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我就在例行公事的把荣耀归给主后，难免也产生骄傲的情绪。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写文章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在影响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所有因素中，文章只是上帝借着撒种、甚至只是借着翻松泥土的工具，或许占百分之五。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才是最难的部分，就是真实的位格相交。而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撒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唯有耶和华使他生长”。但我自己会倾向于夸大写作的作用，甚至读者通常来讲，也会夸大。他的悔改信主，其实有更多恩典，但他也可能认为，

我是看了你某篇文章后信主的。

全职牧会后，我通过讲道、牧养、团契、教导，和个人关系上的探访、安慰、陪伴、辅导，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远比写文章多了。但我发现，效果却远比写文章差。写文章只要五个小时，辅导要五十个小时，而对方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可能还软弱退后了。我有时感到失望和沮丧。这是传道人的很普遍的经历。上帝借着这个经历，让我清楚地看到，牧会靠个人才华，不只是讲和写，这些本身并不能使人的生命改变。后来我开始反思，到底作家、教师跟牧者有什么区别？作家和教师只是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但牧者呢，他不能只告诉对方 A 点在哪里，B 点在哪里，还要帮助他、陪着他，从 A 到 B 去，而且还不能报账，要自己买票。告诉别人什么是真理，并不是最难的，一起走段路，才是最难的。如果你没有亲身走过，你不就露马脚了吗。你没有经历过十字架，你如何传讲十字架呢。牧师的意思，就是“多背一公斤”，“多走一里路”。我讲宪政主义，那多容易啊，反正黑灯瞎火的，谁也没有走过。

做教师和作家时，我可以省略这个过程，上帝没有让我负责这个部分，上帝借着另外的作为去做成了。但我没有很快的意识到这一点，我以为自己的文章多么重要，就变得骄傲。当你面对亲近的肢体，你用了很多心力，却可能没有一时效果。于是在你的骄傲与你的沮丧之间，遥远的人和亲近的人之间，

就产生了张力。上帝就让我在这个张力中，看到了传道人的呼召到底是什么，也更加坚信地方教会的优先性。

余杰：牧会的经历，不仅让个人生命得以更新，让婚姻与家庭更加牢固与美满，也让你对中国转型的路径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信仰与社会不是割裂的，而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信仰不是“私人化”的信仰，而是一种“大公”的信仰。

王怡：在今天的中国，建造地方教会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需要一间又一间公开化的、社区化的教会，在各城、各乡建立起来。而且，地方教会的建造，对中国社会也是一个祝福。中国社会的宪政转型，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群体关系的重建。而惟有主的教会，能够提供一个真正有活力、有生命力的群体生活的样式。

这就是地方教会的建造，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不是教会的目的，是教会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最终会为一场更大、更深入的福音运动预备人心。地方教会就是一个基督徒社区，是唯一真实的人类共同体。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圣经是这样描述信徒们的生活样式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这个群体在耶路撒冷，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新的社群。首先，他们的敬虔，在殿中和在家中，在公共生活和在个人生活中，是保持一致的。他们有敬拜，也用饭，

信仰和生活也是融为一体的。其次，众人对他们的态度是又畏惧、又喜爱的。他们超越了这座城市以前的全部生活经验，建造了一个公开化、社区化的堂会。其他人不是惊讶于一个人的改变，而是惊讶于一群人活出来的这种样式。于是，许多人就开始相信他们所传讲的基督。初代教父屈梭多模解释这段经文，有一句很美的话，称这样的地方教会是“天使的联邦”。

作家身份的牧师和文化基督化的愿景

余杰：我们接着谈你的写作吧。牧会之后，你写作的时间少了，发表的作品少了，不少朋友都感到遗憾，大家都不希望你停止写作。

王怡：我的写作不会停止，但是时间安排和写作内容会有很大调整。我的传道的呼召，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地方教会的牧养，然而文字侍奉，也就是将福音的表达带入公共领域。我这两个身份，在蒙召传道之前，反而是存在一定的断裂的，好像两个不同的方向。就像你说的，上帝到底是要我写呢，还是要我说呢。

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写了四年的专栏“电光倒影”，被官方叫停了，笔名也上了黑名单。其实，并不是我谈到的“福音”太敏感了，而是我的“家庭教会传道人”的身份太敏感了。以前，我这个身份是隐藏的，我表面上还是大学教师。但是，这几年

来，我的教会的身份加强了，随着秋雨之福教会经历建堂、选举、被取缔等过程，我的身份越来越清晰，我的公共空间就越来越狭窄。如果我有大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我还可以去炸个碉堡什么的。但当我只剩下“王怡长老”的身份时，我继续写专栏，人家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几年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自甘堕落，变成了“传道人”。现在，是一个“传道人”胆大包天，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受不了的是这个。

余杰：这对传道人极不公平。以《南方人物周刊》的专栏为例，为什么基督教的传道人就不能写专栏，佛教的星云大师却在上面有专栏？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歧视。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你如何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作家的身份，你是少数有“作家型的牧师”的自觉的传道人。此前，当牧师的作家倒不乏其人，比如张伯笠牧师，以前他是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北大作家班的学员，但他当了牧师之后，写作就基本上放下了。而你则将写作当作牧会工作的延伸和拓展。

王怡：我刚才说，两者对我是合一的。我就是要以牧师的身份，将教导、牧养和个人生命经历记载下来。我的写作是牧会的一部分，也是个人灵修的一部分。在我的内心，我的写惟独面向神的选民。即人群中的“隐藏的选民”。所以我只能，也必须以牧者的身份和心肠来写作。我必须假定我的任何一位读者，都可能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不为任何一位假设中的、最终将拒绝救恩的人写作。换言之，我是一位相信预定论的作家。

在这个意义上，我只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分为教内牧会和教外写作两个部分。

比如关于电影的写作，我的异象，不仅是以福音的世界观来评论电影，而且是写出汉语中从来没有过的文字的样式，即在一个整全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之下的写作。并达到一定的量和质。不仅在于文字的水准，而且在于文体的样式，是汉语中前所未有的。一位基督教的牧师，成为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先预设了一种福音派信仰、甚至改革宗神学立场的宗教身份的写作者。

余杰：我十分赞赏你的这一认识。但是，福音化的表达与公共空间中的表达，如何有一个平衡？如何让普通读者领会？这就需要高超的技巧。在西方，有悠久的传统可以继承和学习，但在我们这里，差不多是从我们这代人开始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挑战性更大。

王怡：有一段时间，我也陷入一种困惑的状态。记得我们在香港见到王永信牧师。他说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受现代派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文化衰微。他特别提到甲壳虫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1]。我没信主的时候，非常喜欢约翰·列侬。王永信牧师说，在他那个时代，约翰·列侬的每一首歌都是对这个世界的布道。这句话特别震撼我。今天也一样，如果说李宇春、周杰伦的每一首歌，都是对着中国的布道，那么家庭教会的牧师们的传讲，谁能跟他们相比呢？

我曾看到《南方人物周刊》上有一个报道，是在广州图书馆每个星期六的一个公益讲座。因为请了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报道把这个讲座和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央视的“百家讲坛”联系起来，说“这是一个讲台的时代”，所有的声音都迫不及待的，在向着这个时代喊话。就像王永信牧师讲的，所有人都在布道，甚至每支广告都在布道。周立波侃新闻，说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播广告的时候不能插播电视剧”。可见，每支广告也在对着这个世界布道。

我看到这篇文章，心里很难过、很忧伤。我想到教会的讲台。有人说，未来的中国，要么是这个世界的祝福，要么就是这个世界的祸害。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教会的讲台在哪里呢？种种思潮和宗教，都对着这个民族已彻底虚空的价值观、对着这个民族已彻底掏空的灵魂，喊着说，“就是我，就是，未来就是我，我就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那么，基督徒的声音、教会的声音在哪里呢？我当时强烈的感到上帝的呼召，就是一生委身于教会的讲台。

余杰：虽然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教会史上都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但追溯清教徒传统，就会发现，清教徒时代的牧师，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作家和学者。那个时代最敏锐最活跃的大脑，就在牧师群体之中。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拿来”的精神资源。

王怡：对。我记得你在一篇文章中说，你的榜样是 C.S.路易斯。我信主后，写作的榜样也曾经是他。但做传道人以后，

我的榜样不再是路易斯了。因为作家型的牧师，就要回到清教徒时代去。很多牧师都是多产作家，他们不但对教友写作，也对社会发言。他们不只在教会的四面墙内牧养灵魂，他的写作确实也影响社会。你的写作，我称为“先知型的写作”，而我的写作，是向着“祭司型的写作”转变。

余杰：这是一种崭新的身份的自觉，它必将带来作品质地的巨大变化。

王怡：神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奇妙作为，可能会产生很多新品种。有一本书叫《新品种的基督徒》中国社会有了基督徒群体后，中国社会就一定会出现一些新品种的人。我希望自己靠主恩典，为着见证基督的丰盛生命的缘故，也有一种新品质。曾经有个弟兄跟我讲，你要做十年牧师，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因为你在牧养的过程中生命会有彻底的破碎。如果中国还没有过一位作家，经历过你将要经历的破碎，那你就将要写出中国还没有过的文字。他说，你不要担心写作的时间少了，你若顺服，神会多多加添恩赐给你。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安徒生讲过一句话，也让我很感动。其实这是他的一个祷告。他求上帝使他这一生，不写下一个不能够说明基督的字。

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人类写作的最高峰就是旧约的启示，人类最了不起的作家，就是在圣灵启示之下写出圣经的那些人。除他们之外，其他的作者都是在揣摩，老子是在觉悟，柏拉图

他们是在推理。但唯有圣经的作者不是在悟，不是在猜，也不是在算，他们是领受圣灵的默示，说出是上帝的话语。一个基督徒的写作者必须承认，人类文字的最高峰是圣经。

余杰：中国文学的脱胎换骨，契机也正在于此。一群兼有作家、学者身份的牧师的出现，可以说是赵天恩牧师“文化基督化”异象的一部分。那么，你对此种愿景有怎样的评估？

王怡：我愿意用一句诗，来表达我在文化中、在处境中、在肉身中、在普遍启示的环境中，去叙说、传递和分享神的特殊启示，而要彰显出来的那一个“文化基督化”的场面。这句诗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红”。

在伊甸园，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的光景，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红”。上帝创造的万物可以用桃花来代表，万物本来是美的，但这一切创造的最高峰乃是人面，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人面桃花相映红”，是神创造的人托管万物的和谐相处。然后人堕落了，然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人被挽回，亏损的人面被赎了回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桃花一开始是美善的，神造它的时候说是好的。然后，因着人的堕落，桃花也变成了虚空的虚空，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万物都在劳苦叹息中等待着被赎，意思是人面把桃花连累了。到了最后，一切受造物都在基督里合一、更新的时候，因着“人面”被赎了回来，所以也“鸡犬升天”，连着桃花也重新开放在新天新地里，重新回到“人面桃花相映红”这一神创的世界里面去。

如果说《旧约》是预表，那么《新约》就是见证。我自己不擅长讲故事，而擅长讲道理。我也曾试着写过几篇小说，但我最不擅长的还是叙事体。有一次，一个传道人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写作要像保罗，讲道要像耶稣。我一听马上说，我做不到。我写和讲都像保罗，我没办法像耶稣，我讲不来故事，也用不好比喻。

但是，我慢慢看见基督徒写作的特质，无非就是两个：一是见证，一切都为了见证基督，在最终的意义上，我们不写任何新的东西，基督徒不求新，不去写世界上没有过的东西。二就是比喻和象征，神使用了文学的语言，来启示那似乎不可被启示的、不可被理解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若不用比喻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同时，文学是最好的认罪工具。在教会，听弟兄姊妹们的认罪祷告，你常会觉得很枯燥，很公式，有点像什么呢？中国法院的判决书是全世界写得最粗糙、最简短、最缺乏说服力的判决书。我们的认罪祷告，差不多就像中国法院下的判决书。如果你的认罪像判决书，你的一生就像判决书；如果你的认罪像说明文，你的一生就像说明文。实际上，大部分认罪祷告都像议论文。但是，如果你的认罪像小说，你的人生就像小说。最伟大的小说，就是对人的罪性有最深刻刺入的小说。所以我说，文学是最好的认罪工具，议论文不是，判决书也不是，说明文不是，文学才是。认罪要像跟写小说一样，要细节，要刻画，没有任何细节，就几

乎没有任何认罪。认罪如果像小说的话，神的恩典也就会像小说，也会那么丰富，也会那么形象。

我在想，如果中国的基督徒能写出最好的忏悔录，就写出了汉语中最伟大的小说。因为唯有基督徒，才能把人心里最深的罪、动机、忧伤、挣扎，都在一种恩典的、而非怨恨的眼光下，统统都写出来。

见证和象征，是基督徒写作的两个核心品质。因为神的道在肉身当中，归根到底是通过象征来揭示的。我不可能把基督的肉身指给你看，神也没有把他自己完全显明给你看。因为上帝是不可被看见的，也不可塑像的。你只能在基督徒的生命里看见，在神的话语中看见，和在我们真实的生命体验中看见。对教会而言，基督徒的写作，将会提升整个教会对“见证”这一概念的理解。对整个中国文化来讲，基督徒的写作将为其注入一种真正的见证文学。中国文学缺乏见证，缺乏象征，也就缺乏真正的生命力。最美的童话，最美的想象都是基督徒作家写出来的，比如安徒生跟 C.S.路易斯，他们的作品有温暖，不是让人恐惧，而是让人产生希望和爱，《纳尼亚传奇》和《魔戒》都是如此。基督徒的写作，就是要把自己一生中血肉模糊的东西都写出来，把每个细节中的魔鬼都写出来，然后交给耶稣的十字架。

余杰：以前你的文章讨论宪政问题，讨论一些敏感时事，你还写武侠小说和电影的评论，这些话题都很吸引人。最早你

在“关天茶舍”发的帖子，大都与这些话题有关。当你写作的内容转向基督信仰之后，关注的人肯定会少很多。长期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教育，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假思索地就排斥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昔日，你曾是一名比较“大众”的作家，如今你的文字越来越“小众”，你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呢？

王怡：如果我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信主了，却没有经历某种慢慢的边缘化，那我的信仰就可能有问题。对这种边缘化、小众化，感谢主，我预备受洗时，就有很强的心理准备。为什么呢？因为读你文字的总量会减少。你写的东西，很多人会讨厌，或者不喜欢，或者看不懂，或者强烈的反感。

余杰：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比如我在文章中引用了圣经，就有人给我写信说，就因为这句圣经，我不读你的文章了。当然，也有读者告诉我，我引用的某句圣经，使他对圣经产生了兴趣，还专门去找来圣经读。不过，前者是多数，后者是少数。

王怡：虽然有心理预备，刚开始我对这种“被边缘化”的处境和趋势，还是有担忧。但后来，是我前面说的那些“隐秘的读者”打动了我。他们一个人给我的安慰，胜过一千人给我带来的版税。用圣经的话来说，写作，就是“将属灵的事指教属灵的人”（林前 2：13）。隐秘的读者就是属灵的人，是在上帝的旨意中“预定得永生”的人。圣经是为神的子民而写的，不是为那些最终下地狱的人写的。如果我不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老实说，我很难抵御写作中的偶像崇拜对我的试探。

余杰：最近，我看到你们印刷的二零一零年每周牧函《灵魂总动员》。这是你以牧者的身份写给会友的信，其中既有对本教会发生的一些具体而微的事件的探讨，比如会友的婚丧、生日、疾病、工作等；也有对公共事件的关注，比如刘晓波获奖、冉云飞被捕等。在香港教会，我曾看到林国璋牧师给善乐堂的弟兄姊妹写过类似的文字，在内地的家庭教会，我好像是第一次见到此种牧函，尤其是最后整理成了一本书。对你而言，这也是一种新的文体。

王怡：我是从二零零九年待降节期开始，写作每周牧函，作为地方堂会建造和牧养的一种尝试。秋雨之福教会的异象，是建造公开化、社区化和长老制的地方堂会，所以牧函写作，也有三个异象：其一，是从圣言的分享，到圣徒的团契，呈现出教会生活的社群样式，其实也是追随初代教会的书信交通的传统，挑战信徒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和对地方教会的委身；其二，是以一种持续而紧密的基督徒社区的样式，在这座城市中传扬福音，见证主道。尽管对海外教会而言，牧函所呈现的只是一些日常而熟悉的场景，但对家庭教会在威权时代的堂会转型，这些样式和场景，依然是陌生而艰难的。求主能使用牧函集作为一个记录，一个样本，给众教会有参考的价值；其三，作为一间改革宗长老教会，我也以牧函的形式，来传递一间地方教会的归正之路，和神学在教会生活中的“软着陆”。对一间只有六周年的年轻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何等真切、艰难，充满张力和喜乐，也充满了羞愧和悔改的道路。

所以，牧函对这个时代而言，的确是一种新的文体。一方面，它既是教导性的，但又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红宝书”。它既是书信体和交流性的，但的确也带着牧职的和话语的属灵权柄。对教会的讲台来说，这也是对“解经式讲道”的一种“主题式”的补充。如果仅从文字的角度看，这种在个人与社群之间、介于权威与自由之间的文字样式，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所以牧函的内容既有个人的默想，也有对教会生活的描绘，和对时代社会的观察。既充满神学性的反思，也洒落着教会建造工地上的瓦砾。在一群看得见的弟兄姊妹的肉身和灵性的连接中，去触摸与主基督的生命关系，去彰显让这个世界惊讶的，让这个世界感动或反感、敬畏或害怕的生命共同体。

中国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长老会治理模式的推行

余杰：这几年，无论是在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牧会，还是你个人的写作，都显现出对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的承担。家庭教会为什么要走向公开化呢？走向公开化的社会意义和属灵意义何在？

王怡：首先，教会的公开化，并不是关于教会在地上的权益，而是关乎福音。我想需要纠正一个偏差，以为福音只是关乎个体的，在一个多元的、后现代的语境中，是个人主义的，甚至是隐私的。事实上，福音在本质上是关乎社群的。救赎历史的中心是基督和他的身体，即在基督里的整个圣约群体，也就是教会。因

此要有说服力地传讲福音，需要一个紧密的、持续不断的团体关系，在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样式中传扬福音，而不只是每一个信徒个人传福音的简单相加。耶稣从一开始就在公众中传福音，而不是办一所私塾。这正是犹太公会给他定罪的重要原因。公开化是福音使命本质上的要求，也是敬拜的本质要求。上帝要他的百姓在万民、万邦，甚至万有面前侍奉敬拜他。

家庭教会的地下化，并不是福音带来的，而是宗教逼迫带来的。地下化造成了对教会在公共生活中的区格。教会是在圣灵的充满中被分别出来，而不是在世界中被区格出来。前者使教会分别为圣，后者却使教会走向地下化，江湖化，远离了大公教会的传承和普世教会的连接。譬如，家庭教会在治理上的某些专制主义的、家长制的和中央集权式的、金字塔结构的特征，都不是分别为圣的结果，而是被世界绑架的结果。

我信主前后，作为兼职的维权律师，参与了几起家庭教会受逼迫案件和异端案件的调查，使我深深的感受到地下化的状态，对家庭教会的教义、治理和基督身体的光明、大公和敬虔，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和威胁。所以毫不讳言，在家庭教会中，也充满了层出不穷的异端教训和淫乱败坏的事。公开化的异象是一个时代性的异象，回应和面对的就是宗教逼迫和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这一异象推动我们，建造公开化、社区化的教会，具体来说，就是教会的敬拜、讲台、治理、圣职选立和财务的公开化，最终是福音和植堂的公开化。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家

庭教会的公开化，就是推动福音从“零售”走向“批发”。福音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个体意义上的罪得赦免、脱离死亡、获得永生；

第二是与神和好、传扬福音，全人做基督的见证；第三个，是万物复兴、天国降临。福音不仅关乎个人生命的得救，而且关乎整个宇宙的结局，福音是我们对整个宇宙和历史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方式。

余杰：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走在公开化前列的家庭教会，大都具有改革宗神学背景。那么，改革宗的神学体系和治理模式，与公开化的愿景之间，有何关系？你认为，改革宗的兴起，对未来的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怡：这是过于激动人心的，因此也说不太好的议题。目前，改革宗神学和改革宗教会，在华人世界中，大概有这样几个系统：首先在神学的传扬上，唐崇荣牧师是一位先知式的人物，然后是赵中辉牧师创办的改革宗翻译社，他的儿子赵天恩牧师创办的中国福音会，及受两者影响下的台湾改革宗神学院。我接受改革宗神学，基本上受这两个系统的影响。

其次，在改革宗教会的建造方面。从历史上看，台湾长老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系统，但他们囿于族群立场，与整个华人教会的关系不大。“中华基督教会”是一九四九年前形成的、以长老会为主的教会合一运动的产物，但在这一波改革宗神学的

运动中，和台湾长老会一样，都未发挥主要的影响。除了这两个系统外，海外的华人改革宗教会在建制上基本还没有成形，唯一成形的，是在美国改革宗长老会（PCA）宗派内的五间华人教会。

在国内，据我的了解，大概在建制上有这样几个源流。一是受PCA中的韩国教会和宣教士如车牧师影响的牧者和教会，如北京福音教会和门徒神学院，他们几间教会已开始形成区会。二是受荷兰改革宗教会和台湾钱曜诚牧师影响的牧者和教会，较早的有王志勇牧师，还有郑州的杨牧师、南京的齐长老，及改革宗出版社等。第三，是唐崇怀牧师在大陆的事工和培训所影响的牧者和教会，如在温州和东北地区。第四，是吕沛渊牧师的“真道培训学院”通过神学教育影响下的牧者和教会。第五，是英美的改革宗浸信会在国内的植堂和传扬，如在昆明的改革宗浸信会和改革宗经典出版社。最后，更多的是自修的、受到综合影响的，尤其是受到唐崇荣牧师倡导的归正运动激励的，一些持守改革宗神学的堂会。

国内还有很多教会受改革宗神学的影响，向着圣经和宗教改革的信仰归正。但大多还没有走到公开认信的阶段。相对来说，虽然改革宗的声音比较大，因为知识分子有麦克风，但在地方教会，改革宗教会仍然是非常弱小、少数的。

余杰：如果从新教在中国的历史来看，为何改革宗一直相对比较弱势？而最近十年来，国内家庭教会中为何出现改革宗

热潮？

王怡：是的，如果观察新教入华的历史，改革宗从来没有在数量上成为主要宗派。但我特别留意到，几乎在每个时代的转折关头，长老会的牧师都站在风口浪尖上。因为改革宗神学对上帝的话语有整全的视野和框架，所以他们能穿透时代，作出了属灵的正确判断，看见远大的异象。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来华并翻译圣经的传教士马礼逊，来自苏格兰长老会。第一个进入四川、湖北等内地省份、并翻译了圣经的传教士杨格非也是长老会的。他虽然在事工上不及戴德生牧师，但他的远见卓识，我以为稍胜过戴牧师。他说，“只有基督能引领中国复兴，走向光辉的黎明，引领这个高贵的国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义，不断拓展其文明”。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除了长老会的宣教士，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第二个例子是一九四九年，也是长老会的牧师一眼看穿了共产党的实质。尤其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毕范宇牧师，他预见到中国教会将进入最艰难的时代。大力倡导家庭敬拜，而这家庭敬拜正是改革宗教会和清教徒传统的特色。毕范宇牧师在一九四九年写道，“应对当前危机的根本之途，是将教会中心转往农村，并利用家庭聚会这一基督教的传统敬拜方式，使教会生存下去”。我称他是“中国家庭教会之父”。

如果再举第三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次教会合一运动，以持守加尔文主义的教会为主，建立了刚才提到

的“中华基督教会”。这涉及到地方堂会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宗派，如圣公会金字塔的结构，浸信会则是散点的结构。他们都无法帮助不同堂会之间的合一的建制。因此，长老会在这次合一运动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呢，我借用三个现代政体的概念来描述长老会的治理模式的特征，即联邦制的、议会制的和法庭式的。长老宗虽有一个总会，但尊重每个堂会的独立性。这个体制对美国政体的影响非常大。教会怎么治理，后来社会就怎么治理。因为教会先于国家，形成了一种良善的、基于圣经的治理方式。英美和欧陆的差异即在于此：欧陆国家的治理，大都与天主教会的治理模式相似。但在中国，却是反过来的：中国政府如何治理，中国教会的治理就带着什么样的特征。因为我们没有活出从圣经而来的美善治理。我们都曾参与独立中文笔会的工作，它的章程是按照西方 NGO 模式制订的，但它的成员虽然是所谓道义之交，但仍然缺乏共同的信仰和生命的联接，还是难以实现美好的治理。中国社会最缺的，就是一个人如何与另一群人生活？唯有基督的教会能够带给中国社会一个公共生活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在基督里的“团契”。这个团契不只是属灵的，而且落实在一个、一个真实的地方教会的生命共同体中。换成政治学的语言说，唯有主的教会，能够为中国带来真正的社群主义。

海外华人教会大都采取会众制，由执事会管理。家庭教会大多是带有家长制色彩的带领人负责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和不

成熟的主教制。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必须面对教会治理的转型。教会治理的美善，不可能低于公共社会的治理水准。但诚实的说，中国教会的治理，低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因此长老会治理模式的意义重大，既是对家庭教会复兴的祝福，也是对未来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祝福。

余杰：另一方面，改革宗在处理与时代和文化的关系上亦有深刻的洞见。

王怡：是的，改革宗主张用福音更新一切文化和关系。有人说，在家庭教会的历史上，有三位前辈分别侧重于道德、道路和道理：王明道先生强调道德，即敬虔的生活；倪拓声弟兄强调道路，形成了小群教会从信徒生活到教会建造的样式；贾玉铭牧师强调道理，即系统的改革宗神学的教导。我们必须回到启蒙运动批判的那个起点，一切学术和文化，都是神学的婢女。真正的文化复兴，建立在神学的传承和复兴之上。向着圣经归正的神学、理智和学术的传统，必要从改革宗神学和改革宗教会中，流着汗，流着泪，甚至流着血的出来。

中国即将到来一个巨大的转型时代，教会必须很深地陪伴、祝福和医治这个社会。远志明最近说了一句话，教会复兴，要有大逼迫，大灾难，和大人物。他说，大逼迫已经过去了，大人物还早得很，那么，教会必须要预备和中国一起承受大灾难。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角逐中，我们必须为真道辩护，让基督教的价值和文化获得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是以个人的声音，

而且是以教会的声音，以圣徒群体中的牧职的身份发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声音。

C.S.路易斯在二战期间，到牛津大学的学生团契分享。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去参军了，有一些在前线战死。那些没有参军的同窗有很大的良心上的压力，追问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读书有意义吗？C.S.路易斯对他们说，这场仗早晚会过去，希特勒注定会失败，但当伦敦上空纳粹的飞机消失后，另一场属灵的大战即将到来——马克思的声音、弗洛伊德的声音，各种世俗的思想和价值都将蜂拥而至。那时，谁可以升空，去参与这场属灵的“不列颠空战”呢？他说，这就是上帝让你们活下来的原因。

这段话曾激励了我。改革宗教会要培养有思考能力的基督徒，未来中国教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也将面临着艰巨的属灵战争。我想，这是上帝为什么在今天的家庭教会中兴起改革宗教会和归正运动的部分原因。为什么在其他地方的华人教会中，改革宗始终是一个边缘的，甚至被排斥的，而在国内却在某个程度上成为渴慕和改变的主流？因为未来的大灾难和未来的华人价值观的主战场在中国大陆。

秋雨之福教会的归正之路

余杰：我非常赞同你这个看法。具体到秋雨之福归正教会，你们一开始并没有“归正”之名，是后来加上去的。加上去的显

然不只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复杂的“归正”的过程。是否可以详谈一下这个过程？据我所知，目前许多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你们的经验可以贡献出来给大家共享。

王怡：在我家的查经班是从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开始的，除了林鹿姊妹外，其他人都是慕道友，所以大家一同成长。我们是新兴教会，没有较多不同的神学立场和属灵传统，这是上帝一个特别的预备。后来，我和同工们一起接受改革宗影响，我们接触的资源都很相似，比如“中国福音会”和改革宗出版社的资料、书籍，和他们的宣教士郑哲民牧师、李锦纶牧师等。我们从团契变成教会，有两三年时间，基本神学立场慢慢形成。还有就是彭强主持的、改革宗立场的神学班，好些改革宗牧师都来上过课，几年下来，主要同工一起去学习。

从二零零八年开始，我们提出教会的年度主题，“从团契到教会”。一间教会，最重要的是教义、教职和教产。因此，我带了两年的信条查经班，一起查考西敏信条等历代信条、使徒信经等，同工在真道上得以合一，就开始草拟信仰告白。其次，我和两位弟兄开始寻求牧养和带领教会的呼召。我们有一年时间一起做早餐祷告会，每个星期六早上，一起用餐、祷告和交谈。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教会的退修会受到官方的冲击。第二天，我们宣告了教会的信仰告白。当时，警察问谁是带领人，我们三个弟兄站出来担当责任，说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说，是在警察面前被按立了。五月二十五日，我们正式宣告成立秋雨

之福教会，接受四大信经和《威斯敏斯特信条》，确认了家庭教会的立场和政教分离的原则，邀请几位传道人，在会众面前为三位弟兄按手。随后，三位弟兄组成预备长老会，开始长老制的准备。

在接纳改革宗教会的信条上，当时教会大约四十人，大部分同工都在本教会聚会和信主的，过去两三年的成长是一同走过来的，因此没有遇到明显的分歧。但隐藏的分歧仍然是有的，后来也带来一些问题。有了教义，有了蒙召的工人，接下来就是建立会友制，挑战弟兄姊妹委身教会，接受信条。这个过程就有了一些不同看法。比如，会友制意味着对委身的承诺、对属灵权柄的顺服、对责任的担当，对教会劝诫的接受。这种公开的认信和宣誓，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有些信徒不愿成为会友，在受逼迫的背景下，在教会宣告自己的委身，确实也会有压力，特别是商人和公务员。在成都其他教会，我们也听到一些异议。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异端？为什么要有信仰告白，为什么要承认信条？为什么要求会友委身？为什么要制定章程？

地方堂会的形成，必然会带来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化。组织化程度越高，对每个人自我生命的挑战越大，在现实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一些张力也越大。大部分同工和弟兄姊妹都在这一过程中蒙福，也有少数人离开，还有一些继续教会聚会，但犹豫着不愿意委身成为会友。我们说，你思考三十年，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总的来说，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过程，就是让外

在的压力和逼迫一直虎视眈眈。上帝保持住世界对教会的压力，教会就忠心了。一旦这个压力减缓，教会就出问题。所以，我真切的体会到，逼迫是上帝对弱小教会的一种特别的爱。

余杰：从团契到教会，是一次飞跃；从广义的福音派教会，到归正教会，也是一次飞跃。

王怡：是的，这是两次转变。后一阶段，主要有两点：第一步，是接受西敏信条，建立改革宗教会的教义规范；第二步，是选立长老、执事，形成教会治理上的长老会体制。这个过程，用了两年，尤其是今年经过一些痛苦的波折，才算慢慢定型。定型的意思，就是在这间教会，信条高于任何人。谁都可能改变这间教会一点点，因为只要一个人的生命被福音改变了，教会就被改变了。但谁都不可能在教会的信条和治理模式上，试图改变这间教会了。

两年来，我们的会众有较快的增加，有些是转会来的，有些是从“三自会”离开的，还有外地迁居来的。这样，教会中开始出现较多不同的意见和背后不同的属灵观。因为以前大家的信仰立场都比较一致，现在则要复杂得多。我很感恩，如果这不是一间归正的和认信的教会，我们就无法面对和牧养这些不同的羊。因为我们面对时，就一定不是用福音的真道，“真理的模范”（《罗马书》二章二十节）和“纯正话语的规模”（《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而是倾向于见招拆招，用世人的智慧和谋算，和靠不住的主观感动。

有人就问，什么采用长老会制？这是一种共和的治理模式。当然，专制是大部分人不接受的，但有人认为民主制、会众制比长老制更好。“一个人说了算”固然不好，但“一群人说了算”难道比“所有人说了算”更好吗？一般中国受教育的人，更多受人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影响，而对长老制在圣约下的“共和”观念比较陌生。同时，当我们谈论教会治理时，制度主义的倾向也比较重。于是，这一期间遇到过很多的冲突。

余杰：长老会体制符合圣经对人性的描述。从政治学上看，它也是保守主义政治观的实践。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切都是比较陌生的。是否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磨合的过程？

王怡：比如有离开“三自”堂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三自，可以自己主领、决定主日敬拜诗歌，组成信徒的财务监督小组，监督三自的牧师。他们来了之后，就问：长老由谁来监督呢？他们下意识的观念，是人民监督政府，会众监督长老。

但这不是圣经的观念。众长老是主在教会设立的牧职，也是教会的监督。在财务管理上，我们也有几个措施，不是信徒监督长老，而是对长老们的爱和保护，因为他们也是罪人。其一，长老会主席不介入财务管理，不在财务单据上签字，其二，长老们的收入（包括在本教会外的收入）及奉献，向教会成员透明，可以查阅。其三，长老们不能接受本教会成员的金钱奉献。教会的奉献及财务，都对会友公开，有周报、月报、季报和年报。去年，我们请主内的专业审计师，向会友大会出具了

审计报告。今年，我们增加了内部审计，推选会友代表和同工代表组成审计小组，对教会的财务运作进行审计。

那么审计小组的职权界限在哪里？这个小组第一次开会时，一个同工提出，既然是代表所有的会众进行审计，这个小组就是一个有权柄的民意机构，可以否决长老会、执事会的预算和决算。他的意见被其他小组成员否定了，因为这违背长老制的原则，审计小组是长老会的委托机构，没有否决权和决定权，教会的决策由众长老决定。唯有他们是主在地方教会设立的属灵法庭。后来这位弟兄因着良心自由，退出了审计小组。

余杰：是啊，从这个细节中就可以看到，在自称“共和国”的中国，人人都要求民主，可是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共和的内涵。

王怡：还有一次，一位同工在会上不服教会的决定，当场就离开了，他通过手机发消息，宣布退出这个“皇家团队”，说这是“主教式的、不民主的管理”。这是很严重的指责，我回应说：你这是发脾气呢，还是决定正式提出对长老们的指控呢？如果是后者，我们三位长老就要作出正式的裁决。后来，三个长老都和他分享、交通。两个月后，这位弟兄在同工会上公开悔改，承认自己错了，向大家道歉。他被重新接纳为同工，我们一起拥抱，这是圣徒群体中真正感人的场面。这种磨合、冲突、悔改、归正的场面，充满了这间年轻的教会。然而哪些没有经历悔改与归正的事件，也更加令人伤心，也令人敬畏上帝的恩典。

教会的章程以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章程作为蓝本，加上对荷兰改革中教会法规，台湾长老会教会法规及一些华人教会如北京守望教会章程的参考。二零零九年，秋雨之福教会遭到政府“取缔”的时候，有人认为，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组织化程度太高，一切像模像样，又要投票选立，又要召开会友大会，太规范了。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地方堂会建造的必经之路。我们愿意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在本地和其他地方的教会，对我们近年来的公开化的地方堂会建造，始终有两种看法。一种是鼓励和支持，认为受逼迫必有祝福；另一种是批评，说我们不顺服，甚至有政治目的，所以被主管教。但最近两年，我看到很多教会的立场在改变。在本地，就有多间教会开始拟定信仰告白、章程，建立会友制，接受威斯敏斯特信条，或购房建堂等。

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就是神学教育。如果归纳我们的改革宗教会的路线，有三句话。第一，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台”，这是美国圣约神学院的院长柴培尔的话。第二，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这是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提姆凯勒牧师的话。第三，是“以植堂为中心的宣教”，这是我们学习救赎主长老教会后总结的原则。如果要加上第四句话，就是“以地方教会为中心的神学教育”。这是我的期待、愿景和梦想，却远远超过我的恩赐、能力和负担。愿我成为在这一代教会中被主使用的瓦砾。

余杰：这两年，秋雨之福教会的人数增长很快，你们考虑过自己植堂吗？

王怡：最近两年，有好些同工和肢体，因着改革宗神学立场，而从其他教会转来秋雨之福。本堂施洗的信徒占一半，转会或重新委身教会的信徒也占一半。后者大致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认同我们的家庭教会立场，脱离“三自会”的捆绑；第二种，是认同我们的改革宗神学立场，而来到一家改革宗教会；第三种呢，是因着认同我们的公开化异象，或被一间公开化的教会吸引和震动。

教会在二零一一年春节后，刚刚增加了下午堂崇拜。上午堂聚会约一百九十人左右，下午九十人左右。在外地宣教方面，我们正在德阳帮助一个团契植堂，计划三年内，完成从团契到教会的建造。我们也帮助和支持安徽的一间传统家庭教会归正，转型为独立堂会，已经快两年了。根据美国长老会两百多年的经验，他们的堂会规模，平均是两三百人。这个社区化的堂会规模，代表着乡镇的传统和精神，在现代的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平均人数或许可以多一些，牧师的恩赐也有大小，大致可到四五百人左右。这是我们植堂目标的上限。为什么人数不能更多呢？因为在改革宗的教会观和清教徒的教牧传统，非常看重圣道和圣礼，一是牧职的教导、牧养，一是圣餐在会众中的施行，因此要求牧者与会友之间有日常的生命关系。而超级教会的模式（通常指千人以上的堂会），建立的都是一个庞大的牧养管

理系统，通常都具有轻视牧职，轻视整全的话语教导，轻视圣餐和轻视教会纪律的倾向，但也有特例，如纽约的救赎主长老教会。现在，加上临时领餐的信徒，我们教会快接近三百人了。前几天我忽然发现，有好几位新会友的名字我记不住了。主是按著名字来牧养他的羊的。当牧师记不住会友的名字时，就是堂会的上限和植堂的开始。

余杰：最后请你谈谈，这几年下来，你最大的体会、收获和失败是什么？

王怡：两三年来，我有过许多失败、退后和困扰，也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对主、对人，尤其是对同工们，亏欠最多。有人说，你跑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有人说，你太生硬，有律法主义倾向，我想他们说的问题都并非不存在。有时候，我的知识分子的傲慢、顽固和对沟通的缺乏，这些毛病，都伤害过一些弟兄姊妹。我最大的收获呢，一是在这些错误中，却惊讶和真切的看到，主基督依然在他的教会和他儿女的生命中掌权。福音之道，就是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是在我们的泪水中凯旋的，是在我们的软弱中令人敬畏的。我知道我服侍的这位主太伟大了，主若施恩，我的过犯虽多，却不能改变他对教会的心意。二是在与弟兄姊妹的相交中，生出了在主里的手足之情和父母之心。我知道在地上，不会再有比这更大的奖赏、安慰和鼓舞了。经过一些摸索、思考和实践，我在教会建造上，初步的和最大的领受，就是用最笨的方法建造教会，就是承继

宗教改革“五个惟独”的传统，持守改革宗的神学立场，跟随清教徒的脚踪，依循长老会的治理，以谦卑的心志，“述而不作”。在今天的中国，管它时代、社会的潮流和压力如何，就是老实巴交的按着《比利时信条》确立的真教会的三个标志，来建造一个基督徒社区：诚诚实实在在地传讲圣经，恭恭敬敬地施行圣礼，认认真真地执行劝诫。

主后 2011 年 7 月

余杰对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王怡长老的访谈录

| 2012

我的异性交往界限

各位“总要清清洁洁”（提前 5:2）的弟兄姊妹，平安。

不断有年轻的弟兄问，和姊妹交往的界限。虽然姊妹们不会来问我，按着圣经的教导，关于个人的情感和举止，她们应该去问教会里的“老年妇人”。但我知道，姊妹们也有她们的版本。譬如服装怎么穿，香水怎么洒，耳环戴吗，整容做吗，可以在网上和异性聊天吗？与弟兄的身体保持多少距离，以及怎样的眼神是合宜的。我想，教会里的“老年妇人”（老年的意思是老练，或许年纪比你还小），都比我有智慧，并有切身经验。我愿为她们祷告，求主在教会中使用她们，成为年轻姊妹们的榜样和帮助者。

我也在很多场合，分享过我作为弟兄，和作为传道人的异性交往界限，包含了我对圣经教导的应用。我希望稍作总结，蒙主使用，对弟兄，也对姊妹，都有益处。

小时候，在课桌上有“三八线”，分男女界限，被当作一种“封建落后”的思想糟粕。如果有种界限，阻挡了我们将异性看为尊贵的，与我们有同等价值和灵魂内涵的人；或使我们倾向于藐视上帝在祂所创造的另一种性别中的荣耀，那么，这种界限就是应该被废止的。那时，我们可以合宜地引用关于创造的经文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创 1:27）。并引用关于救赎的经文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 3:28）。

余杰弟兄曾说，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他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不尊重妇女的男人。那些没结婚，却和女人住在一起的；以及那些结了婚，却不和妻子住在一起的；那些挣了钱，就在外面羞辱其他女人的；以及那些不挣钱，就回到家里羞辱自己的女人的。

我以为，男人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也都应该是男性主义者（虽然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这个短语）。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赞美另一种性别，胜过赞美自己。每一个人，都应该敬畏上帝的形象在另一种性别中的临在。每一个人，都应该敬畏基督在另一个性别中的救恩（想想看，那是一个基督

愿意为之而死的性别)。

有人以为，和异性的交往界限，能帮助我们在全然败坏中胜过情欲的试探。这是对的。但我想补充另一个理由，让我尝试着表达得更完整一些：为什么要与异性有“清清洁洁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完全的圣洁，**absolute purity**）的交往界限，

- 因为敬畏上帝（对另一个性别的创造和救赎）。
- 因为惧怕自己（对另一个性别的邪情和侵犯）。

第一个理由意味着，即使你认为自己君子坦荡荡，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异教徒的境界）。那么，你仍然需要以某种界限，去表达你对另一个性别的礼遇。正如 C·S 路易斯说，当上帝所造的一个人走来时，天使会在空中开道，对着万物说，让开，让开，神的形象来了。

因此，在异性面前，我们需要一种绅士风度，我们必须是一个骑士，因为神的形象在她们里面。这不是一个令弟兄们沮丧的理由，而是一个令弟兄们斗志昂扬的理由。让我再重复这个理由：异性交往的界限是对上帝的敬畏所必须的。

在列出我个人的交往规则之前，我还要就第二个理由补充一点，免得我被视为一个律法主义者（尽管这种指责总是在所难免）：

不是有交往界限的人，是律法主义者。而是没有交往界限

的人，才是律法主义者。因为律法主义的意思，不是敬畏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是以为自己守得住律法，或以自己管得住自己的心而自义。那么请问，是那些自以为管得住自己的心的人，会遵循异性交往的界限呢；还是那些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我无法胜过自己的情欲”的人，会遵循异性交往的界限呢。界限的存在，表明我们是多么需要恩典；界限的消除则表明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完全，已经不需要恩典了。

最后，我列出下面的交往准则，多年来我曾和妻子一起分享、讨论这些做法，甚至为此有过很多争论，直到我们不断被赐予合一，信任，和欢喜快乐的心。我相信我所教导你们的原则是符合圣经的。但我个人的具体交往规则，对你们来说，的确只是参考性的。在不同背景、文化和生命的处境中，我相信上帝对我们有更加细微、体贴和自由的带领。如果你认为我的某些规则过于严厉或拘谨，那只是说明我可能是比你更加败坏和软弱的人，我比你更需要基督的恩典保守，尤其考虑到我所蒙的传道的呼召时，就更是如此。

- 1、不与女性单独合影，不与妻子不认识的女性保持联系；
- 2、不在旅馆中单独过夜；不在外地单独与女性见面；
- 3、使用家庭共同名片，使用夫妻共同邮箱；
- 4、随身携带妻子的照片，在任何场合不摘下婚戒；
- 5、不向其他女性抱怨妻子，在网络或公共空间中也是如此；
- 6、不谈论女性的相貌外形，不置身于这样的场合；

- 7、不单独乘坐女性的汽车，不在服侍中与姊妹二人同行；
- 8、不在关闭的房间与女性交谈，不单独辅导姊妹的情感和婚姻；
- 9、不与姊妹长时间通话，不使用即时聊天工具；
- 10、与妻子共同拟定每周、每月的日程安排；
- 11、乐意接受因遵守这些界限而增加的经济成本。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约翰·牛顿）的仆人王怡

2012 年 11 月 2 日

| 2013

重要的少数： 长老会在中国的角色

各位天父所爱的归正的儿女，平安。

下面，是我上周在美国长老会对华宣教论坛上的演讲概要。

首先，请允许我以尼哥底母来形容整个中国。三十年来，“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改革开放），从灵生的就是灵（福音运动）。

其中，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在港台和北美华人教会处在边缘化的，被误解，甚至被排斥的改革宗信仰和长老会思想，最近十几年来，正在成为中国城市教会复兴和传统教会转型的主流方向。几个月前，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在他的

报告中指出，改革宗教会在中国已有 500 万信徒。美国有九个长老会，其中最大的 PCA 有 30 万信徒。台湾的长老会约有 20 万信徒，韩国的长老会有 300 万信徒。我们看见上帝作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东亚的泛儒家文化圈，正在成为全球改革宗长老会的中心地带。

我的一位改革宗同工说，秘密警察曾找他喝茶，说，以前我们研究灵恩派，后来发现他们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现在我们开始研究改革宗，研究长老会。因为我们发现，英国和美国的革命，韩国和台湾的转型，背后都是长老会。警察问他，你们到底怎么看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呢。这位牧师就翻开《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十三章给他看。他很敬业地研究了足足二十分钟，然而叹一口气，说，如果是这样，那是最好的。

其次，请允许我，将教会历史上的复兴区分为 A 类复兴和 B 类复兴。

我用三个指标，来界定两类复兴。第一，与世界历史的 A 类转折相一致的复兴是 A 类复兴，与世界历史的 B 类转折相一致的复兴是 B 类复兴。第二，A 类复兴伴随着强烈的神学复兴，因为只有神学的复兴，才能回应和引领世界历史的转折。B 类复兴以祷告和灵性的复兴为主，因为缺乏神学的复兴而行之不远。第三，A 类复兴的现象，是在福音大能中令人瞩目的悔改归正和对教会的委身。大复兴即大悔改。B 类复兴的现象，是以决志祷告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奋兴布道运动，和以现代敬

拜，灵恩追求和主观经验为重的教会增长运动。

A类复兴，与世俗社会的精神气质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必然带着十字架的印记，同时也具有影响，颠覆和塑造时代精神的力量。代表时期：前尼西亚-后尼西亚时期的复兴，德国和瑞士的改教运动，苏格兰、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北美的第一次大复兴和长老会传统，及最近二十年尚待观察的加尔文主义在北美和东亚的复兴。

B类复兴，与世俗社会的精神气质一致或同构，因此要么带着成功神学的印记，要么远离世界，无法回应时代的危机。此类复兴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受制于社会已形成的价值观及其文化形式，无力塑造、更新社会核心价值及生活方式。代表时期：芬尼以来的第二次大复兴，20世纪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五旬节及灵恩运动，及非洲复兴运动。

我有三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正在面临的改变，是世界历史中的A类转型。第二，中国正在发生的复兴，是与改革宗神学的复兴相伴的、教会历史中的A类复兴。第三，教会历史和世界历史显明，改革宗长老会在A类转型和A类复兴中，将承担“重要的少数”的角色和使命。我们与其他宗派和肢体的关系，不是彼此竞争的关系，更不是批评论断的关系。事实上，“重要的少数”这一概念，将帮助我们对自己在中国的角色，有更为宽广的认识。我提出两个命题：第一，面向中国教会，长老会要承担牧养性的祭司角色。祭司的主要职能就是教导上帝

的律法。第二，面向中国社会，长老会要承担先知性的使命。先知的主要职能就是指责罪恶，宣告应许。

这一“重要的少数”的自我认知，也将塑造和调整我们的宣教策略。面对“长老会不宣教，改革宗不传福音”的不公正的指责，我发现长老会有一种焦虑症，当我们被这种焦虑症所驱使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在领人信主的数量和跨文化宣教的规模上，去和其他宗派起争竞之心，从而偏离了长老会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优势，也污染了我们侍奉福音的动机。

我的事奉和我的教会的历史都很短，但我们所认信的古旧福音，恩典的教义和长老会的传统却很长。在对改革宗信仰的确信，和对一个政治、文化和教育都全然败坏的中国社会的委身中，我求主赐予我时间、精力、同工和资源，使我完成从他恩惠的福音所领受的一生的使命。我用下面这五个一，来表达我终生的使命：

- 1、牧养一间本地的改革宗长老教会；
- 2、建立一家本土的改革宗神学院；
- 3、创办一所基于改革宗信仰的基督教大学；
- 4、建造一个在华的改革宗长老会宗派；
- 5、写作一套基于改革宗信仰的汉语作品。

重要的少数，既指向当前的几十年，也指向千禧的国度。彼得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用一句中国成语来

表达彼得的末世观，“说时迟，那时快”。

最后，请允许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这篇发言。指望当天
的工作当天就得到回报的，是钟点工。指望按月得到回报的，
是雇员。指望按年得到回报的，是职业经理人。指望 5-10 年得
到回报的，是企业家。指望 50-100 年得到回报的，是教育家。
指望 500-1000 年得到回报的，是改革宗长老会。

在回国途中为你们祈祷的主仆王怡弟兄

2013 年 1 月 10 日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一、神权高于政权

1.莫让现象遮望眼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崇尚权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一切的权势，甚至我们每个人所盼望得到的也是权力。在这个权力的社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谁的关系铁、谁的后台硬、谁的爸爸是李刚。有一位牧师说，他前不久回国来，跟一帮他的老同学在一起吃饭。老同学们在饭

桌上纷纷夸口的就是自己的关系，就是自己认识谁谁谁，而且呢当场就要打电话，“我马上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谁谁谁打电话”，“我马上跟中央组织部的谁谁谁打电话”，“我马上跟最高法院的谁谁谁打电话，那是我哥们儿”。这位牧师说，那我就等着他们一个一个把电话打完。最后牧师说：“我认识的比你们认识的都大，现在你们打完了，我来打电话。”他说，“你们都听我来祷告。”感谢赞美主！

我们活在一个权力的社会里面，就好像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梦。巴比伦或者是尼布甲尼撒，他好像一棵大树，这棵大树甚至全地都可以看得见，它不仅养活了全地的人，甚至所有的飞鸟都从这棵大树来得食。我们中国也有句俗话，叫“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会以为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所依靠的后台，我们的权势，是一棵大树。在整个东方的文化里面，我们都会用大树来形容有权势的人，或者用大树来形容这世上的一种权势。有一位弟兄在儿童节那天被警察带走，他说他被警察带上车之后，就跟警察说：“你知不知道我是个杀人犯，我杀过两个人，在我以前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曾经两次让妻子堕胎，我是一个杀人犯，所以我要来发这个单张”。那个警察听了之后，也觉得很有道理，就说：“唉呀，没有办法，我们都靠共产党养活的”。这位弟兄跟他讲，你不是共产党养活的，你是靠自己工作，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这就是活在这一个权力社会，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里面的渴望、我们里面的恐

惧。

2. 君王之心主掌管

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很有意思，第四章的开头跟第四章的结尾，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对至高神的颂赞。其实这个故事的中心并不是在讲但以理的故事，也不是在讲尼布甲尼撒悔改的故事，而是一个上帝跟皇帝之争的故事，在尼布甲尼撒王朝的后期，到了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达到一个最高峰，而经文的焦点，你始终要知道这是耶和华上帝的故事。这是耶和华上帝在祂的百姓被掳，在祂的百姓因着罪，被赶出耶路撒冷，被交在尼布甲尼撒手中时，耶和华上帝仍然要继续显明祂不变的应许和祂至高的主权的一个故事。在尼布甲尼撒王朝内，在巴比伦这世上的国度最强盛之时，甚至是那人间的金像的金头极辉煌的黄金时代，上帝仍然折服一位异教的君王，使一位心高气傲的地上的万王之王，一个不相信耶和华独一上帝的君王，去宣告上帝的能力和祂永恒的国度。这才是这个故事最让我们惊讶的一点。

就好像在新约时代，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在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之前，最清楚地宣告了耶稣的神性和祂弥赛亚身份的是谁呢？是邪灵，邪灵清清楚楚地喊着说：神的儿子，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甚至使用邪灵，为祂来做见证，显明上帝至高的主权，显明上帝救赎的恩典遍

于祂所创造的整个受造界。

同样，在以色列被掳时期，上帝也使用尼布甲尼撒来为祂作见证。所以当我们以耶和華神为中心来看但以理书时，我们会看到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一个解梦的故事，所显明的不是但以理的智慧，所显明的是神的智慧。在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烈火当中，不是来显明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的高风亮节和他们伟大的信心，乃是显明神的拯救。同样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也不是来显明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王之间的这一场的角逐，而是显明神的审判。所以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里面，连续三章的故事都在讲耶和華上帝在异邦异教当中，怎样去安慰祂自己的百姓，怎样使那被掳的百姓，仍然去依靠那一位曾经应许他们祖宗的耶和華上帝，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仍然是一位掌管着整个人类历史洪流的上帝。上帝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所导演的一系列故事，看上去似乎是东方官庭里面的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但以理跟另外一群术士之间一个官庭争斗的故事，或者是一个伴君如伴虎的君臣之间的故事。

不是！实际上这是一个上帝彰显祂的智慧的故事，这是一个上帝彰显祂的救恩的故事，这也是一个上帝彰显祂在历史当中的主权和审判的故事。所以神的百姓因着神向他们所展现的智慧而敬拜信靠这一位神；神的百姓因着这一位神在烈火当中向他们所展现的救恩而仍然敬拜信靠这一位神；神的百姓因着神在尼布甲尼撒，这个世上最强大的君王和帝国中所彰显的审

判和祂的大能大力而仍然可以信靠跟随这一位上帝。

3. 恐惧源于无知，骄傲带来审判

在第二章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王为什么不把他的梦讲出来？而在第四章里面，你看到，王把这个梦讲出来了，他没有用这个来测试他的手下的忠心，但是我们又开始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社科院的同行们，既然梦都已经讲出来了，他们怎么可能解不了呢？因为这个梦，其实是相当地简单，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在他自己的梦的叙述里面已经将这梦的主题讲了出来，就是这一句，在第四章里面三次反复出现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祂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甚至祂可以赐给极卑微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古代的君王的统治跟制度下面，谁是王呢？王生的才是王，你爸爸是康熙，是雍正，你才是王嘛，对不对？所以，王的意思是代表高贵的血统，王的意思是代表那个王室的成员。但是神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祂会在王室成员以外，祂会在你们所以为的高贵的血统以外，来拣选极卑微的人。换言之，在地上并没有一个家族是神圣的家族，并没有一种血统是神圣的血统，并没有一个王的后代他天然地他当然地就是王，除非耶和華上帝把王位赐给你，把国赐给你。所以这一句话，尼布甲尼撒描绘他梦的时候出现，在但以理讲解这个梦的时候出现，最后，在这个梦应验之前，从天降下的声音又如此说。而尼布甲尼撒真的照这个梦所说的，他的国位离开他，他从世人当中被赶出，他与田野的兽同居，

与牛一样吃草，变得像禽兽一般。

在短短的这一章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主题，这不但是第四章的主题，也是整个但以理书的主题，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各位，当尼布甲尼撒把这个梦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甚至在这个梦里面，神已经启示给他，那一个我们叫做中心思想的都已经讲出来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你会很怀疑，那些术士那些用法术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他们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呢？他们不是不明白，他们是不敢讲。

二十年前，有一位作家王小波，他写了篇很有名的文章，这篇文章叫《花刺子模国信使的问题》，他说在古老的中亚，也是一个东方帝国，叫花刺子模国。这个花刺子模国有一个奇怪的风俗，就是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高升，凡是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就会被送去喂老虎。这个国家的国王他错误地相信，如果我奖励那些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来到；如果我处死那些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够减少坏消息。但是最后呢，这个国家灭亡了。

王小波在这个文章里面说，我们一直以来都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君王是如此，我们的老百姓也是如此。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看罗素写这个《西方哲学史》，写了《西方哲学史》之后，他不会说国王看了以后有什么意见我主动地做一些修改，但是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写完了之后，

1949年共产党执政，他就主动提出要修改，要符合新的社会跟政治的形势。所以他就讲，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养成的一种习惯就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要迎合上面的想法，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说话是基于我们对君王的权势的惧怕，是基于对我们自己的利弊的衡量。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花刺子模国，我们就是那一些的信使，我们没有办法说实话，我们没有办法诚实。我们说在共产党的天下，没有人可以诚实，我们说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说谎。

约翰加尔文解释说，为什么尼布甲尼撒最后才来召见但以理呢？因为但以理在之前显然有过成功的解梦的经验，甚至他已经称他是术士的领袖。约翰加尔文这样子揣摩说，因为尼布甲尼撒自己知道自己的梦是一个凶兆。所以各位，不只是那些术士不敢给王解这个梦，其实王自己也懂这个梦，因为中心思想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王自己知道自己的梦准是一个凶兆，他也知道他再受挫于但以理所敬拜的那一位神，他知道自己又要输。所以他最后才找但以理。

但是那通国的术士没有人敢告诉他，我们从但以理听到这一个梦的时候的惊惶，也可以稍微地察觉出来，因为这一个梦很清楚地指向：王啊，你的时候到了，你就是那大树，全地的人都在你的大树下面好乘凉，全地的人都靠你来养活，你是他们的父，你是他们的王，你是他们的神。然而至高者要夺走你

的位，至高者要叫你知道你不过是人。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说：一个认为自己像神的人应该变成兽，好叫他认识他只不过是人。所以王啊，这样的命运将会临到你，因为你认为你是神，所以你将变成比人更不如的兽；所以，神要赐给你一颗兽心，因为传道书里面说：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你将被神夺走你身上的神的形象、尊严和荣耀。当你想与神同等的时候、想与至上者同等的时候，从人的位置向着神来攀登的时候，神放在你里面的人的尊贵、人的自由也要被神拿走。尼布甲尼撒其实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梦的意思，但是他不敢相信，他也不愿意相信，就好像他需要从那些术士那里得到一个印证，可是那些术士们不敢跟他讲，那些术士们听了那个梦，也很清楚知道这个梦在讲什么：王啊，你的时候到了。他们不敢讲，因为这是一个花刺子模国，因为在这个国家说坏消息的人要被杀头，因为在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趋利避害，所有的人都俯伏在那眼睛看得见的权势之下，所以没有人可以告诉一位国王，其实你没有穿衣服；没有人可以告诉一个想成神的王说：你将成为兽。没有人敢告诉这个鼎盛时期的巴比伦王朝，甚至在某个意义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的国王说：至高者要将你从王位上拿下来。但以理告诉了他，但以理很惊惶，但以理从这个梦里看到了耶和華上帝对尼布甲尼撒的审判，虽然这不是最终的审判。

第四章跟第三章不一样，第三章里面有宗教逼迫，第四章里面你会看到尼布甲尼撒没干什么坏事，并且他对但以理和他

三个朋友挺好的，甚至他高升了他们，相当给耶和華神面子了。第四章，我想这也是让但以理感到惊诧的地方，耶和華神的审判不是指向尼布甲尼撒的某一个具体的罪行，如同他造金像一样，乃是指向他的骄傲，乃是指向他不是在危害神的百姓的身家性命，他乃是在危害神本身的主权，换言之，各位，他犯了煽动颠覆宇宙政权罪。因为他不承认那一位宇宙当中至高的君王，因为他骄傲，如同曾经被他所灭掉的推罗一样，有何城能够像推罗一样强盛呢？圣经里面也曾用地狱来比喻推罗，他心高气傲，就想与至上者同等，甚至圣经直接以那一位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来形容推罗的国王，他曾经是那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曾经是那被造的圣天使，然而他却堕落了，因为他想与至上者同等，所以推罗王啊，先知发出预言说，耶和華神要将你交在巴比伦手中，所以巴比伦将那无比繁华的、在他之先的东方帝国推罗消灭了。而尼布甲尼撒王啊，如今这命运再一次降临到你。

各位，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一个一个的帝王兴起来，一个一个的朝代被交在另外的朝代的手中，你野蛮，有比你更野蛮的，你强大，有比你更强大的。一个一个的王国被灭在他更强大的世上的权势和武力之下，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这甚至就是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

然而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超越了一切之上的，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千古保障”，

但以理书给了神的百姓一种安慰。唯有耶和华上帝是我们千古的保障，是我们的居所，祂要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诗篇 90：1）。祂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祂使这世上最狂妄的君王在祂的面前屈服。

我们看在这一章里面，从尼布甲尼撒的口中称到神的时候有几个。在第 2 节里面他称为“至高的神”；在第 8 节里面，他说但以理的里头有“圣神的灵”；在第 37 节里面，他最后将颂赞荣耀归给那“天上的王”。如果我们考查原文，尼布甲尼撒所用的这几个名称，差不多都是对巴比伦所敬拜的那一位神的称呼。一位异教的王在称呼那一位至高的神的时候，里面包含着异教的概念，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假设他是一位中国的君王，被神管教的时候，最后他可能会说“浩天上帝”，他会说“上天是至高的”，或者他会说“浩天上帝是尊贵的”，因为天上的王，在巴比伦就是称呼巴比伦所敬拜的那一位叫马尔杜克的神。圣神的名，如果你看英文和希伯来的原文，你会发现祂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是指众神，是一个多神的神圣的名。到第五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伯沙撒王和他的太后，也都是用这样的称谓。他的意思就是，但以理是一个相当通灵的人。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上帝曾经使一些异教的君王折服，这并不代表说，他们认识圣经当中，向着亚伯拉罕和摩西启示祂自己的那一位耶和华上帝。有一位神学家说，他们还没有从一种相对的一神论走向一种绝对的一神论。我们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清朝的康熙写过许多所谓颂赞耶和华上帝的诗歌，但从历史的记

载来看，这一位君王并没有真正地归信主。我们都很熟悉的几句“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凭神子通”等。这也不表明这位王真的是被耶稣基督所得着。但是我们却看到相当奇妙的就是，上帝在异教的君王当中也使他们有所折服，使用他们来为祂做见证，虽然他们所用到的是他们偶像崇拜的词汇，是他们巴比伦的神的神名，并且其中一神跟多神的背景在里面其实是相当地混合。

二、至高者在历史中掌权

1. 大树荣美也枉然

那我们来看这个大树的比喻，在以西结书第 31 章，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埃及，也被比喻为一棵大树，耶和華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枝条荣美，影密如林，极其高大，树尖插入云中。众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围流，汊出的水道延到田野诸树。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的诸树，后面说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荫下居住。”好一棵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大树啊！

就像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梦，甚至在以西结书第 31 章里面说，连神的园子里面的树都没有它荣美，连神的伊甸园里

面的树都嫉妒它，因为神使它枝条繁多成为荣美。然而，它因为高大就心骄气傲，所以先知预言说：耶和華说我必将它交给列国当中大有威势的人，必要将它的枝子折断，必要使它的树尖不再插入云中，使那些有势力的也不能够自立，他们在世人当中要与下坑的人一起被交与死亡到阴府当中去，主耶和華如此说：它下到阴间那日，我要使人悲哀，我要为它遮盖深渊，使江河凝结大水停留，我要使黎巴嫩为它凄惨田野的诸树都要因它发昏，我要将它下扔到阴间，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它们也要同它一起下到阴间。所以同样的先知的预言，同样的耶和華神对列国的咒诅和审判，临到了尼布甲尼撒。我们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也被称为一棵树，一棵葡萄树，神所栽种的一棵葡萄树，神甚至说：那埃及的大树，那巴比伦的大树一时荣美繁华，连我神园子里的葡萄树都不如他。

2.生命树下向安然

我们也看到生命树，在创世记和启示录里面出现，在创世记，因着人的堕落，这棵树消失了，这棵树隐藏不见，这棵树与我们隔绝了，我们只能看到：主啊，生命树不见了，我要到哪棵树下面去乘凉呢？我要靠哪一棵树得活呢？我们只看见世上一个一个的帝国，一种一种的权势，一棵一棵的大树，我们看不见生命树。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在启示录里面生命树再一次出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

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大树底下好乘凉。神的儿女要依靠它而活，神的儿女从它得食物，神的儿女从它得医治，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祂的仆人都要侍奉祂，也要见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3. 皇帝上帝不一般

我们曾经说但以理被剥夺得非常彻底，但以理被尼布甲尼撒，剥夺了姓名，剥夺了身份，剥夺了血统，甚至可能被剥夺了性别。然而我们看到在第四章里面，尼布甲尼撒比但以理被剥夺得更彻底，尼布甲尼撒被剥夺了理性，尼布甲尼撒被剥夺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尼布甲尼撒成为兽。尼布甲尼撒请但以理为他解梦的时候，但以理就曾经劝告他，如果你施行公义，如果你断绝罪恶，如果你怜悯贫穷，耶和华神会收回祂的审判也未可知。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 13 章里面所讲的：凡地上的权柄没有不出自于神的。那刀剑的权柄出自于神，却交给地上的君王做什么呢？要君王赏善罚恶，因为神要来审问你是否赏善罚恶。所以但以理对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若是赏善罚恶，你若是运用神所交在你手中的权柄，保护你的人民，施行公义，怜悯贫穷，而不是滥用这样的权柄，要与神同等，或许神不施行祂的审判也未可知。然而，十二个月过后，当他看见辉煌的巴比伦大城的时候，他说，这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起来，要

彰显我自己的荣耀吗？就在那一刻，他的梦应验了，他被赶出如同田野的兽，诗篇 127 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看到尼布甲尼撒王被赶走，上帝夺走了他做为人的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理智。

尼采说：上帝死了。当尼采说，就算有这样一位上帝，我也不承认这位上帝，我们必须杀死这位上帝，自己成为上帝。上帝最后也剥夺了尼采的理智，尼采疯了；上帝最终也剥夺了希特勒一切的希望，迫使他自杀；上帝最后也击杀了毛泽东的长子，囚禁了他的妻子，使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这位独裁者家破人亡。上帝在祂的历史当中未尝没有向我们显出祂的审判来，未尝没有向我们显示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我在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花了好多时间，在九眼桥的旧书摊上还有学校的图书馆里，不断地找一个东西。想看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 1971 年的“571 工程纪要”，关于当年林副统帅的儿子林立果所发动的政变。后来，一直到网络时代才找到这个“571 工程纪要”。我曾经看过很多回忆录，包括一些党内人士的，我也跟一些老右派、上一辈的人分享。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说，在文革的后期，促使人们尤其是党内对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邪恶第一次觉悟的，就是林立果的“571 工程纪要”。

因为这是一个来自于副统帅对统帅的暗杀。他在外面不断

地说：毛主席一句话抵一万句，毛主席都是对的，毛主席万岁！就像你在这里不断看到的“愿王万岁，愿王万岁”。在第四章的末尾，尼布甲尼撒说“愿荣耀归给那活到永远的神”，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但以理书从第2章反复出现的来称颂那一位王的就是“万岁”，开始被拿来用到那一位高于他的上帝。“万岁”，那个活到永远的，他开始承认是那一位上帝。有一位教会史学家，在讲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罗马的人，你是一个从东方来的人，你到了罗马之后，你会非常奇怪，他们在广场上面用到一些词汇来颂赞凯撒，然后你去参加地下教会的聚会，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你会发现在里面他们也用差不多的一些词汇在颂赞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所以他说，凯撒跟基督之争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称谓。但他说，最让你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两个场合看见了一些相同的人，他们在广场上用差不多的话把它归给凯撒，然后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又用差不多的这些话归给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

有一次，我跟一个 80 多岁的老右派交谈，我说：我自己的一个思想的启蒙，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终于找到了，读到了林立果的“571 工程纪要”。那个老右派跟我说：我也是，我最初的启蒙也是读到“571 工程纪要”。他比我大四、五十岁啊！

我为你们读几段 571 工程纪要里面的话。1971 年的时候，整个中国，没有谁看这个国家看得比统帅旁边的副统帅看得更

加地清楚。“571 工程纪要”里面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受到严重地威胁，（在这个工程纪要当中，毛泽东有一个代号——B52，美国的轰炸机，）他们正在肆意地篡改扭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他们的革命对象其实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社会主义的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正在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侵害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认 B52 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他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其实他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913”事件以后，为了将林彪的罪行向全党说明，曾经有一段时间将“571 工程纪要”发放给党内，差不多到局级干部。但是发现，发下去之后，带来的震动更大，又赶紧收回去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在那样一个花刺子模国时代，从来没有人敢用这样的语言，如此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政权的实质和这位君王的实质。如此地令人惊讶，因为它出自副统帅的儿子。所以，整个的意识形态，这一个独裁专制的崩溃实际是从这一个工程纪要开始的。

三、救恩赋予人权

1. 天意人意正相反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是，今天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看一位政治的领袖是一位神，但是我们在用 14 亿神来取代一位神，在我们的商场上面，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开始有一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人不能够成为神，在整个中国，不能够有一个人成为神，我们都要成为神。这就是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我们用个人主义的方式，取代了那独一的上帝，我们都开始成为上帝。我们的神可能不再是政治的领袖，我们的神可能是一位股神，可能是一位商场上的神，可能是一个总裁，可能是一个 CEO。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职业里面、所有的行业里面都建立起自己的偶像系统，所有的传销如安利、玫琳凯都建立了自己的偶像系统。在他们的系统里面最高的人，要在星光大道上刻下自己的脚印。

七年前，有一次我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个牧马山会所和高尔夫球场的所谓上流社会的活动。哇，走红地毯，过去之后，每个嘉宾要用手在上面印一个印子，哇，让你感觉相当 VIP。我想在警察局里面不是也印过吗？为什么在警察局里面按一个印子是相当地屈辱，在这里按一个印子就是成功人士？

所以你知道，人要成为神的结果是什么呢？至少有一个结果，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就是国家虽然没有崩溃，但无数的家庭已经崩溃了，因为一个家里容不下两个神。

我们会看到我们反对独裁，我们不喜欢尼布甲尼撒，但是各位，约翰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由邪恶的统治者和滥用法律的人所组成的政府，是上帝向我们所发的愤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权势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东方的专制的帝国，我们看到权势对我们的压迫，但是我不应该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愤怒。因为真正的愤怒就是这样的政府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

各位，你是配得一位尼布甲尼撒，还是配得一位主耶稣基督？你是配得一位想由人变成神的王？你还是配得一位由神成为人的王呢？各位，我们不配，对吧？我们不配有一位神成为人，我们只配活在由人成为神所带来的邪恶的、专制的、集权的统治之下，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做丈夫的在妻子面前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在儿女面前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做老板做雇主做上司的在我们的下属面前就是这样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是耶和華上帝将以色列地的百姓交在尼布甲尼撒手中，神也是这样将我们交在中国的执政掌权者的手中，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信仰跟这种权势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为什么仍然要顺服呢？我们不是顺服这一个政权的邪恶，我们是顺服上帝对我们的愤

怒。

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这一切是我们配得的，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不配得的。这一棵树是我们配得的，那一棵树，生命树是我们不配得的。从人成为神，不只是我们的君王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家庭里面，人都想成为神。所以我们配得一位想成为神的统治者来统治我们，我们怎么配得一位要成为人的神来统治我们，来爱我们，来救赎我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两种的方向：第一是尼布甲尼撒所代表的，他不但是代表着那东方帝国的君王，他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位，就是从人要成为神。然而神没有任凭我们如此，让你看到救赎历史的方向，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方向——人想成为神，结果神使他降为兽，这是神的审判，这是神公义的愤怒。然而，整个救赎的历史，我们却看到一个比人想成为神更加不可思议的方向——就是神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

2.两种变形常对比

这幅图是著名的英国诗人和画家威廉·布莱克的一幅名画，就是尼布甲尼撒，他代表着人想成为神的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的文化，不只是政治如此，我们今天放眼看去，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已经将我们变成了兽，我们看到人类很多领域的学问和成就都是如此，人想成为神结果却变成了兽。

1915年，卡夫卡因为发表了著名小说《变形记》，被人称

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他描写了一个销售人员，有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昆虫，但是最重要的他不是为自己外形的改变感到震惊，而是接下来他的家人对他的这种变形的一种态度，让他极为震惊。他的家人都讨厌他，他的父亲在家里追着打他，最后，凡是家里面来了客人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他也不想吓到客人，等客人走了他又爬出来，他的全家人都厌恶他，他的哥哥妹妹们也讨厌他。直到最后，他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肯出来，死在那里。

有人说卡夫卡的这篇小说，预言了整个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一个变形记，就是人的异化，就是人在理性主义的成就，科学主义的成就，以及在现代的国家跟集权主义的政治里面，在整个人类二十世纪，人想成为神，人想杀死上帝，人最终沦为兽，人最终沦为比人更低的一种存在。因为当神所赋予人的尊严价值理性和神的形象被拿走了以后人成为非人。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当中有做销售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在吓你们，我也不是在批评你们，为什么卡夫卡在这个小说里会用销售人员来做主角呢？我只是想问你，谁能够救你脱离一个销售人员的噩梦呢？就是在有一天早晨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昆虫，就是在这个时代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到自闭当中，开始死在自己关起来的小房间里面。谁能够救我们脱离尼布甲尼撒的噩梦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尼布甲尼撒的梦不只是他的梦，尼布甲尼撒的梦也不只是

政治上的专制的独裁者的梦，尼布甲尼撒的梦是每一个现代人的梦，卡夫卡不过是将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梦用另外一种形式，一个现代主义的形式把它表现了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尼布甲尼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卡夫卡的小说里面变成了昆虫的那一个异化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的变形记，然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变形记。在诗篇 22 篇中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那一位上帝却走了一条跟尼布甲尼撒和我们完全相反的道路，祂来到我们的当中，祂取了奴仆的样式，不但如此，祂甚至是活在野兽当中，有许多的公牛围绕祂，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地困住了祂，他们向祂张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犬类围着祂，恶兽围绕着祂，他们扎了祂的手，扎了祂脚。

3. 殷勤只为荣耀神

谁能够救我们脱离尼布甲尼撒的噩梦呢？谁能够救我们脱离卡夫卡的噩梦呢？谁能够阻止我们从人走向神的傲慢、无知和最后的灭亡呢？唯有那一位从神成为人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些想从人变成神的人。

在过去的几天，我陪我的孩子看了《侏罗纪公园》，10 年

前的电影，我 10 年前看的时候没什么感觉，是一个很刺激很恐怖的电影，但是这次看的时候，我发现它相当有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味道，它非常清楚地来控诉现代无神的科技主义对人的异化。它在里面非常清楚地说：上帝创造了人，人却杀死上帝，人想杀死他的上帝，所以人创造了恐龙，恐龙最后也要杀死人。人不承认造他们的上帝，人最终将堕落到比他想扮演的上帝创造的野兽更低的位置。我才发现，《侏罗纪公园》充满了一种现代科技主义的末世论，他在那里质疑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主宰对生命的创造，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以至于使人沦落到被野兽吞吃的地步。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他沦落到与田野的兽一起吃草的地步。一个想成为神的人应该成为兽，好认识到他只不过是人。一个不承认上帝的人类，最终应该被野兽吞吃，好叫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命运吗？这不应该是上帝对我们公义的审判吗？然而，怎么可能，有一位愿意从神成为人的，那天上的君王他来拯救我们这些想从人成为神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断绝那一切想与至上者同等的梦想，无论是透过政治，透过权势地位，或者是透过对某种权势的依赖、依附，或者是透过对金钱的寻求，或者是透过商业上的成功，透过你销售的业绩，有的时候是想透过一些犯罪的行为，有的时候是想透过一场婚外恋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有的时候是想透过在人前的某一种的聪明、评价、赞美来与至上者同等。各位，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有

没有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忽然冒出来说：你看这是我大能大力所建立的一切，是为了要彰显我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漏嘴哦，有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了那一位离开祂荣耀的宝座取了奴仆的样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离开了祂的十字架，离开了祂的空坟墓。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祢救我们脱离尼布甲尼撒的噩梦，救我们脱离卡夫卡的噩梦，脱离一个公务员的噩梦，脱离一个销售人员的噩梦，脱离一个教授的噩梦，脱离一个不依靠祢，而依靠一个世上的权势、依靠我们的职业、依靠我们的业绩，虽然我们的业绩没有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城那么大。

主啊求祢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巴比伦，脱离我们自己所修建的巴别塔，脱离我们自己为自己所塑造的金像，求祢使我们来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从神成为人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祂担当了我们的羞辱，使我们从兽恢复为人，使我们从一个在祢的面前悔改的人，成为一个与基督我主联合的人，成为祢称我们是你的儿女的人。

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要成为神，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只要成为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

阿门！

2013 年 6 月 16 日

| 2014

梦与真相：社会篇

第二届大学生营会证道系列

同学们，晚上好！

感谢黄勇老师刚才的分享，从他的生命经历中，可以看到主的福音。福音就是从死亡中把生命拿回来。在苦难中，得到生命的平安和喜乐。就像刚才唱的那首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黄老师分享时好像比较轻松，可你们要知道，他面临了多少次“我不知明天如何”，需要完全把自己摆上。在他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医生会有很多难听的话，说你们这样，会人财两空，所有一切都会失去，工作、前途、积蓄，最后孩子也保不住。不认识神的人也可以唱这首歌的前面部分，“我不知明天

如何”，但你没办法唱到最后，把生与死都仰望交托给那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从死荫幽谷中重新看到生命的意义，甚至从苦难和黑暗中反过来，反思生命的意义。

我给大家放一个短片（略）。香港有两位福音歌手，他们有一首反堕胎的歌，写一个在校女大学生怀孕了。在今天的香港和台湾，有一种现象叫“九月堕胎潮”。九月开校前，医院里有很多女学生堕胎，我不知在中国怎样。这首歌是以母腹中的小婴儿的口气唱给妈妈的，虽然是粤语，但我们能感受到迫切的情感。

我们读的经文里提到罪，关于定罪和不定罪，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不在耶稣基督里的“罪已经定了”。如果我们要从福音来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首先需要看见黑暗和罪恶，我们需要看见世界的虚空，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不但在人间的法庭上有法槌，有审判官，在你的整个人生和整个宇宙中同样有一位审判官，有一位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有一位掌管这个世界的上帝，有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而在这位上帝向我们所传的福音中，有一个刺激我们的，否定我们的，使我们扎心的内容，就是称我们为“罪人”。祂用神圣的法律来定我们的罪，然后告诉我们，什么罪人会被定罪，什么罪人不会被定罪。既然大家都是罪人，真正的疑问，不是为什么会有人被定罪，而是为什么会有人不被定罪呢？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一个在耶稣基督里不被定罪的好

消息。

在去年的营会结束时，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同学邀请两个朋友去参加别人的生日 Party，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有很好的节目、音乐、茶点、酒，他们玩得很开心，认识了很多朋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夜晚，因为其中一个女生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但在那个晚上，Party 结束之后，大家都很开心，在路上，一位同学忽然问她的朋友，说，啊，今天过生日的那个谁，到底叫什么名字呀？对啊，那过生日的同学叫什么名字来着？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来参加大学生营会，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却忘了这个营会的主人是谁。不管是谁介绍你们来的，我要说，是主耶稣邀请你们来的。主耶稣是这个营会的主人，这份邀请函上的印章，是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祂凭自己的宝血邀请你们参加这个营会，邀请你们来认识祂，和认识这群基督徒。

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梦与真相”，让我们先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样评价我们的。在网上流传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对中国人的评价，有十二条：

- 1、非常聪明，但非常相信传言；
- 2、凡事喜欢抢，从出生抢床位，到临终抢坟地，从头抢到尾；
- 3、大事上能忍气吞声，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
- 4、能通过关系办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
- 5、计较的不是公平，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

- 6、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
- 7、自己爽不爽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别人爽；
- 8、不为朋友的成功鼓掌，愿为陌生的悲惨捐助；
- 9、不为强者的坚持伸手，愿为弱者的妥协流泪；
- 10、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
- 11、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愿为大家的不幸怒骂；
- 12、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的小利冒险。

网上还流传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其中预测中国将在 20 年后重新沦为贫困国家。她给出的依据是：

- 1、从申请移民的情况看，中国 90%的高官家属和 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很令人费解！
- 2、中国人不了解他们应该对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 3、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的国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崇拜的就是权力和金钱，自私自利。
- 4、人民大众过去是权力的奴隶，演变成为金钱的奴隶，这样的国家如何赢得尊重和信任？
- 5、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唯有获取权力和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全民

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6、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这样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几个地球才能长期供给？

很多人会说，这些看法不见得公平，有些问题在西方社会也同样存在。不过这些都描述了一个罪恶的世界，中国正在不断崛起，不断繁荣，人民都失去了真正的梦想，这也是“中国梦”的真正原因，缺什么补什么。当习主席提倡“中国梦”时，说明中国已经没有梦想了。无论是统治者，是权贵，还是老百姓，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国家要去哪里。在邓小平时代说，“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叫孙立平，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摸着摸着就摸上了瘾，以至于不想过河了。”整个国家，都在水中央，不想过河，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过河，到底是什么彼岸？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已经失去了异象，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以及我们到底会成为什么？大家都被裹挟在一个潮流里，“踏踏实实地走过场，认认真真地说假话”。

圣经非常直接的，提到人的罪。“罪”带给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思想、意志、情感、理性，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理性上的。我常跟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说，他们会提很多很多问题，那我说，假如你说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答了，假如我的解答会让你很满意，那么你信不信主呢？他想了一想，很诚实地回答，可能我还是不信。我说，这样我就先不回答你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信主，不只是理性上没有想通，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是一个过河过到水中央的罪人。就像毒蝎子过河的寓言一样。有一头河马要过河，有一个毒蝎子跟河马商量说：“你可不可以搭我过河呀？”河马说：“那可不行，我要是在水中央，你咬我一口怎么办？”毒蝎子说：“你想一想，我坐在你的身上，我咬你，我不也得死吗？”河马一想，对啊，就答应了。于是它们一起过河，到了河中间，毒蝎子还是咬了河马，快要沉下去了，河马问：“你为什么还是要咬我呢？我们不都得死吗？”毒蝎子说：“我知道，但我忍不住嘛！”

这就是罪。罪给人带来的就是忍不住，这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与你是不是大学生、大学教授也没有关系，与理性没有关系，就因为忍不住。人的贪婪忍不住，人的自私忍不住，你的绝望，你的黑暗，你的惧怕，内心中的恶念，都是忍不住的。这就是罪带来的沉沦。

《经济学家》是一本著名的英国杂志。这是它去年的一个封面。它说中国梦的实质，就是回到 1793 年。1793 年，英国派出一位大使，来到中国，在康干盛世时来见乾隆，带了很多物品来，愿意跟中国通商。而当时的清朝，一个泱泱大国正处在昌盛时期。乾隆说，我们天朝地大物博，你带一倍的东西来，我们送你十倍，生意就不用做了。所以没有开通商口岸，英国跟中国的第一次外交就此中断。当时的中国还不了解世界，以世上第一强国自居，对外国使者来朝见天朝感到很高兴，很满

足。这篇文章认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想回到 1793 年的自我认知。换言之，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乱局和灾变，重新寻找自己的大国身份，重新问自己是谁，重新来看自己在世界的地位。

但是，“梦”在整个中国文化里，其实是一个不祥的象征。梦在中国的古典词集中，基本上都是贬义词。但在圣经里，“梦”却代表着真实，圣经里讲的梦，都是会变成真的。雅各做梦，梦见天开了，梦见天使上去下来，梦见神所给他的异象。虽然他一个人在那里漂泊，一个人来与神摔交，他还是想走自己的路，不想走神指引的路。但在梦里，神让他看到一个在恩典中的未来。同样，圣经中的埃及法老也做梦，约瑟来给他解梦。在《但以理书》里，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也做梦，但以理为他解梦。梦在整个圣经中，指向尚未成为现实的那个真实的、被上帝掌控的历史。圣经中提到的梦，就是上帝把一个你不知道的明天和你不知道的未来——无论这个未来是给祂的儿女的盼望和应许，还是给世上的帝国和君王的一个警告和审判——只给你看。梦代表着梦里面的事物必然会发生。梦是上帝用来启示和引领人类社会的、超自然的方法之一。

与此相反，在整个中国文化里面，梦从来不代表着真实，梦代表着虚空，梦代表着不真实。在中国的语言和成语中，梦前面总有一个形容词，如南柯一梦，或黄粱美梦。总之，梦前面都有一个不好的词，骂人叫痴人说梦。有人说，习主席提出

“中国梦”，可能对应着“美国梦”。但是，你要知道，在美国的文化里，说“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那是赞扬。在我们这儿，“你做白日梦啊”，那是骂人。在基督教文明中，“梦”有一个最美的意思，那就是一定会成真。不过在中国文化里面，可能最贴切的对应是“红楼梦”。在这本书里，梦的意思就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就是眼看他砌高楼，眼看它楼垮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梦”从来都是这个意思，梦就是你抓不住的东西，梦是你不知道的明天，梦是不会成为现实的，梦是现实的敌人，是水中月，是镜花缘。

在圣经中，也有一个最终成为虚空的梦，那就是从《创世记》11章开始，人类修建的巴别塔。人类构建一座塔，直上云霄，要与天齐高，要传扬自己的名。巴别塔的梦想，用我们一个古代词语来讲，就叫“齐天大圣”，就是要与天齐高。上帝在人类历史上，允许了这个梦做下去，一直做到今天。在某个意义上，这个梦也算成真了，人类通过文化、宗教，通过政治，通过科技，在今天修建了多么伟大的巴别塔，各个国家都在攀比世界第一高楼。而卫星上天，再高的楼都高不过了。人类的确确用我们的话来讲，是建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人类真的成功地制造出了足以传扬他们的名的“巴别塔”。那么，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们要问，巴别塔是虚空的吗？巴别塔就是我们的现实。在圣经中，上帝对这个梦想有一个界定，就是“虚空的虚空”，圣经仍然宣告了一个类似的结局，就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有一位神要审判全地，人类建造的各种巴别塔，有

一天都要被摧毁，要受审判，要被烈火焚烧。所有的历史和时间，都要戛然而止，就像人类个体的寿命要面临死亡一样，整个人类社会也要面临死亡一般的大限，这就是圣经称为的末日审判。

《罗马书》8章1-2节，提到定罪和不定罪，提到一个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评价。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从启蒙运动开始，到当今中国社会，我们都相信这句话，我们都活在这句话的梦中。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一切东西都是拿人的理性、需要、名誉、尊严、智慧和名声来作衡量。但柏拉图讲了一句相对的话：“神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并不认识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不过在希腊的观念中，仍然是有神论的。在新约的年代，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想中，哲学家们认为有一位超越的上帝，或超自然的力量，上帝自己才是万物的尺度。在整个希腊哲学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叫做“认识你自己”。然而我们怎么可能认识自己呢？比如那个毒蝎子，如果它能“认识”自己，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圣经说，除非你认识上帝，否则你就不可能认识你自己。就好像你来认识一台电视机，或一台电脑，除非你认识它的创造者，譬如你需要了解苹果公司，否则你不能了解这台苹果手机。你要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你必须认识到你是被造的，被造之物认识自己，必须认识造他的那一位元，产品需要去认识它的主人。换言之，在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中，就包含了对自我的创造者的认识。你们看一些西方的古装电影，

里面介绍一个人，和圣经一样，都会介绍他是谁的儿子。Son of 谁谁谁。如果世上没有王怡，你说自己叫王书亚，你等于还是没有告诉别人你到底是谁。因为至少这个“王”字是没有来历的。王书亚是王怡之子，这是王书亚认识他自己的、必须的资讯。

启蒙运动以后，我们看到黑格尔有一句著名的话：“国家是活着的上帝。”从黑格尔开始，他的哲学思想影响到马克思，最近这两百年以来的人类社会，有一种最重要的思想，一种最重要的宗教，一种最重要的罪恶，一种垄断了所有社会成员的体制，就叫做“国家主义”。国家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个蜕变。人们不再相信上帝，这意味着人类自由了吗？不，这仅仅意味着国家被提升为人间最高的权威，国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国家本身成为一种“伪宗教”。人们不愿作上帝的奴隶，所以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了吗？不，他们只是沦落为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奴隶。

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相。1949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和共产党所宣称的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伪宗教，是一种邪恶和专制的官方宗教。党宣称自己拥有真理，宣称它垄断了对真理的不同版本的发布权和解释权。它们宣称与它们相反的都不是真理。党甚至把它宣称的真理写在宪法中。它用一种本质上是宗教的方法，而不是现代政治的方法，来统治整个社会。虽然在

事实上，它越来越不能说服人们的思想。但它依然用刀剑的权柄和金钱的诱惑，绑架了中国人的、濒死状态中的灵魂。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谁都有不同的思想。所有人都知道党委书记在台上作报告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所讲的鬼话。但所有人都假装在听，假装他们仍然相信。而党委书记呢，他也知道大家在假装，但他却假装自己不知道大家在假装。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在假装的社会。政府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我们也知道政府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这是一个不断回圈的相互欺骗的社会，在关乎思想、灵魂、生命的意义和信仰这些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相互欺骗。你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就知道，所有道德上的败坏，所有官员的腐败，所有夫妻朋友间的不义，所有的商业欺诈，都只是一个相互假装的社会的恶之花。因为人们已经在最大的事情上说谎，在小事情上说谎有什么了不起呢？如果在关乎灵魂的事情上说谎，那么在关乎肉体的事情上说谎还有什么关系呢？同学们，中国社会真正的、最大的腐败，并不是官员的腐败，不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腐败，而是信仰的腐败。所以，我不是要向你们提一个关于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改革方案或伟大理想。我乃是要告诉你们，如果你没有信仰，如果你的灵魂没有从一个罪恶与谎言的世界中被拯救出来，那么一切关于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改革方案或伟大梦想，都是徒劳的。传道书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那么天下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呢？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弥天大谎。不止骗自己，还骗老天爷。我们自欺，说没有神，不但说没有神，还敬奉各样的假神。我们一边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一边动辄跪在金钱、名利、爱情和共产党的脚前，我们算什么无神论者呢。我们事实上，是有奶便是娘的偶像崇拜者。

在二十世纪，美国有位基督徒的政治哲学家，叫沃格林。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历史是大写的基督”。这正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同学们，你的一生要么是大写的基督，要么什么都不是。在基督徒的一生中，无论发生怎样的苦难，怎样的黑暗，怎样的软弱，怎样乌云密布，怎样山穷水尽，但始终有一位上帝，用祂的儿子来赎回我们的生命和在人类历史中的所有的时间。“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就像英文的单词 His-story，历史就是祂的故事。你有故事，我也有故事，但所有的故事，除非跟耶稣的故事连在一起，否则你就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否则你的故事是虚空的。耶稣基督的故事，一旦活在你的生命中，就成了你的故事。当耶稣基督的故事活在你的历史中的时候，你就有了历史，你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记得小时候，最害怕老师讲一句话，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尼采在启蒙运动中，反对基督教，他这么说：“怎么批判基督教都不过分，这种让贱民升高的精神，庇护了弱者、平庸者和凡俗者。他们应该被自然淘汰，好让世界被超人的意志引导，但基督教却让弱者存活。成为人类虚无主义的温床。”

圣经中，耶稣的确这样说，我来是救病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还宣告说，你们都有病，都是罪人，我来是要救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承认自己有病的人。很多不相信上帝的非基督徒朋友，他们跟尼采的话很相似，他们说，基督徒都是一群弱者，都是一群瘪三，一群屌丝。在某种意义上，你们说对了。真的基督徒，要有勇气在世人面前承认，是的，我就是弱者，就是瘪三。有位牧师叫司布真，别人有次攻击他，罗列了他许多罪状。他回应说，你说得对，但你还说得不够，因为我还有好多罪恶是你不了解的。但我的主了解，所以祂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不承认我们是罪人，福音就会羞辱我们。成功人士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抓住生命中的一切，然而被迫一一放手。如果你渴望成为这样的人，那么福音就与你无关，福音就是一个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因为你拒绝让福音对你构成一种羞辱。耶稣说你不行，你却想用一生去证明自己行。耶稣不只是说我们不行，他真的认为我们不行，所以他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如果你想去证明自己行，结果呢，总有一天你也要亲自死在十字架上。

在最近二百年的人类社会里面，充满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和个人主义的奋斗观。像尼采说的权力意志，超人意志和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包括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和史达林、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就生理的角度来讲，

这些理论的目的，都是要让优胜的人类来继承这个地球，来享受更优秀的文明，而弱者则被淘汰。基督教反其道而行之，却让弱者存活，“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事实上，尼采的批评说出了基督教的实质。是的，基督教就是让弱者存活的，基督教是羞辱强者的。基督教就是对一切达尔文主义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否定，基督教是对那些正在修建巴别塔的人发出一个判决。但这个否定不是在眼前的，所以被否定的人也不以为然。有的基督徒会问，我信主了，但也没有升工资啊？那些没有信主的，反倒是“坏人活千年，好人不长寿”。这个世界表现出来的现状，仍然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个世界，仍然在不断地证明成为超人和强者才能掌控一切。

但圣经宣告说，这是一个假像，这是一个已被神的儿子定罪的假像。我们都害怕被定罪，一个人被另外的人来定罪，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意味着他的价值被否定了。我被你否定了，意味着我活着没意思。如果一个丈夫被妻子说，我看你这辈子都没出息，这个丈夫就觉得人生没有了价值。如果一个学生被别人说，看你将来，就和老爸一样当个保安，他就觉得跟老爸一样是没出息、没价值的人。人是最害怕被别人否定的，尤其害怕被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亲近的人否定。我们都害怕活着没有意义，我们害怕自我的形象倒塌，害怕被所爱的人轻视。然而，一个人要被神来定罪，这正是我要向你们传的福音。当

你被上帝否定的时候，你就从此不再被人否定了。马丁·路德总想要得到被上帝赦罪的确据，但怎么也得不到。他想尽了各种办法，用荆棘扎身体，冬天冲冷水澡，像乞丐一样乞讨，靠被旁人来羞辱，靠他人的怜悯来生活。总之用尽方法，还是得不到内心平安的确据。直到有一天，他读《罗马书》，读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罪人的罪就被赦免，就不被定罪了。据说有一天路德在家，魔鬼拿着厚厚的一本卷宗来控告他，说你犯了这个罪、那个罪。路德（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司布真一样）说，你说的都对，但是还不完全。因为我比你说的更坏，但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受了刑罚，为此赦免了我的罪。他说完了，就把墨水瓶向墙上扔过去，说撒旦退去吧，因为你的控告对我没有用了。

第一，被神定罪，其实是一个好消息。被神定罪，就不再害怕被人定罪。在神那里受到一个否定，就不怕在人那里被不断的否定。

第二，被神定罪，意味着我们将重新获得不菲的价值。《罗马书》8章1-3节经文说，神定这个时代的罪，定每个人的罪，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意思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十诫”至善至美的律法，没有人不嫉妒别人，没有人不自私，没有人可以完全胜过淫乱和情欲的试探，也没有人会不贪财，没有人可以真心尊重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没有人单单地敬拜神，而不去拜各种偶像。

但是，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人，成为罪身的形状，作“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最重要的是后面一句，上帝的儿子成为罪身，成为罪人。古代有句话叫“戴罪之身”，上帝的儿子成为“戴罪之身”，成为监狱中的待决犯，在肉身中来，定罪为罪。上帝高于我们之上，祂可以随意定我们的罪，在万有之上，高高在上地定我们的罪，就像大法官都坐在很高的座位上。

但上帝却在耶稣基督成为罪人的形状，在祂代替罪人承受刑罚的过程中，来定我们的罪。因此，圣经讲定罪的时候，定罪的同时就是赦免。被人定罪就死定了，但唯有被神定罪的同时就是被十字架上的主赦免。定罪的那一位，就是成为罪的形状，在监狱中替我们承受了应受的刑罚的那一位。这就是好消息，当我们抬头看法官时，发现他就是昨天夜里和我们一起在牢房中被拷打的那一位。定你的罪的，就是昨夜替你承受了鞭伤的“室友”。如果一定会有审判，一定会有公义的满足，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呢。

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人一定要被定罪的话，唯一的幸福就是被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定罪。

而祂就是上帝自己。在福音中，赦免与定罪总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也指向人类的两种结局。出埃及时，有两批人走过红海，一批是走在前面的以色列人，一批是追在后面的埃及人。以色列人过去了，埃及人被淹死了。红海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审判，同时又代表着赦免。红海同时代表着拯救，同时又

代表着判决。洗礼也一样，同时是审判，也同时宣布赦免。法官宣布赦免的消息，就是他所宣布的判决结果的一部分。这就是福音。

如果你不承认上帝是一位审判官，如果你不承认有末日的审判和道德的判决存在，你就没有办理理解什么是赦免，什么是福音。被定罪、被审判，与赦免、恩典是同一回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神的公义和爱同时成全的。十字架既是爱的记号，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替我们死了，“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也是公义的记号，因为神的愤怒要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而耶稣为在祂里面的所有人，为神所拣选、所爱的百姓承担了这一咒诅。因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天父对人类的公义的审判和咒诅，的确倾泻在了他的身上。这意味着那些将来信靠耶稣的人，在这一宇宙性的最后审判中，已得到了赦免。

我常给慕道的朋友说，教会里全是坏人，监狱里全是好人。因为监狱里的人都说“我冤枉”，教会里的人都说“我是有罪”。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义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因他做了什么，比别人强，心里纯洁，修养高超，达到一个境界，所以被称为义人。不是，圣经说只有一种人会被称为义人，那就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人。这样的人反而会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称为义人。因为实际上，只有他才是义人。如果他愿意将自己的义，当作我们的义，送给我们，遮盖我们，就像一个暖和的人，

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一个寒冷的人身上。那么，那个本来寒冷的人也可以被称为暖和的人了。

当我们对自己，对这个社会，对人间罪恶充满愤怒的时候，充满了对那些不虔不义带来的绝望和沮丧的时候，对未来的明天不可知而恐惧的时候，只有福音，只有那一个既能定你的罪，同时又赦免的，既允许了这个世界的罪恶存在，又在这个罪恶上带来盼望的福音，能给你安慰，能使你走出校园，能使你进入社会，能使你面对你未知的明天。

再举挪亚方舟的例子，大洪水是一个审判的记号，与此同时，大洪水是不是拯救的记号呢？在《彼得前书》第3章，把大洪水比喻为新约的洗礼。“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挪亚时代的洪水，是审判的记号，也是那得救的记号，被比喻为今日的洗礼。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拯救的记号，也同时对埃及这样一个代表不信上帝的世界审判的记号。

有一位慕道友曾给我讲，你们这样讲太霸道，上帝会审判人，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最终要审判人，要报应人。这个观念太冒犯我，太冒犯人，这个观念让我们不舒服，不尊重我们。有一位牧师就回答说，我理解上帝会审判人的观念冒犯你，但为什么上帝会赦免人的观念就不冒犯你呢？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做错了事要受罚，一个人做错了事要承担责任，这个观念

是一点都不会冒犯人的，你觉得天经地义，这很正常。但在日常生活里面，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这是非常冒犯人的。恩典和赦免其实是真正冒犯人的。在公司里行不通的，在公司，如果你的一位同事在工作中出了问题，还连累大家，把一个专案搞砸了，他应该承担责任，应该赔钱。结果老板没有处理他，老板饶恕了他。你会说，太不公平了。在《马太福音》20章里，耶稣讲到葡萄园做工请工人比喻的故事。耶稣在这个故事中告诉我们，不只上帝审判人的观念会得罪你，上帝赦免人的观念也会得罪你，尤其是上帝赦免了那个得罪了你的人。恩典跟我们人性是相反的，主人说，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是的，我们都眼红。

第一，你不希望我们这个公司或这个社会是有审判的，做错了事要付代价的，做得好要得奖赏的。

但你同时不接受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和你全部的人生最终是没有审判的，是没有定罪的，是无论你做了什么，都没有终极的代价的。不可能！圣经告诉我们，你的一生在整个宇宙当中，与在单位里面一样，是要承受终极的代价的。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代价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所有人都是罪人，不能拿工作中的业绩在审判的时候夸胜。唯有一个方法可以夸胜，在耶稣基督里的，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胜过死亡黑暗，胜过罪恶，承受这个世界的不公和不义的那一位，是唯一在审判当中被赦免的。

第二，宇宙当中有审判，你的一生当中有审判。在道德的意义上，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审判。这个世界并不只是有一些人成立的人间的法庭，没有一个最高的判决，没有一个绝对公义的判决，不会有冤假错案的判决。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一个伦理意义上的，这一真正是非对错终极的、最高的法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人间所有的法庭和审判都不成立，公司的所有规章制度都不能成立。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可以像尼采所讲的一样去生活。让最强的人，让最心狠手辣的人存活下去。这个世界是超人的，是强人的世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恰恰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世界，才是一个充满不公义的世界。恰恰是没有审判的世界，才使这个社会面临真正的胁。

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让审判同时成为赦免的管道，上帝让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无法想像的，也是我们所不配的。这是圣经的启示，不是任何哲学家的构想，也不是小说家的虚构，更不是人的设计。这是发生在我们人类历史中超乎想像的事实。你可以不相信，但你的良心会对自己说，这是美的，这是好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那是因为好到一个不敢相信的地步，他美好，他善到 we 不敢相信。而不是，他坏到一个地步，不是假到一个地步。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应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是活在巴别塔的世界？还是活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世界里面？

你们是要加入或要建造一个怎样的世界？是终其一生建造巴别塔的世界？还是耶稣基督拯救的世界？这个现实世界是充满审判的，充满定罪的，充满风险的，充满责任的，充满了人自己定的法律的，看上去公平，但大多时候不公平。福音把信耶稣的人带进有恩典、有赦免的世界里面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罗马书》8章19-22节，这段经文不但定了我们人的罪，不但讲到人活在罪恶中，更讲到万物。这两节是非常惊人的经文，“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马丁路德讲到这段经文时说，保罗用到一个惊讶的词语来形容受造之物，受造物盼望将来的荣耀，但如今又在劳苦、叹息。受造之物要表达一个被造的目的，保罗在这里用到以一词，受造之物在呼唤，在等待它的被造的目的和被造的意义被显明出来。

如果受造之物有意志，比如手机、房子有意志，这个意志就是要实现它被造的目的。但是这个被造的目的因为人的犯罪被拖累了。这段经文不仅告诉我们生活在充满罪人的世界上，而且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犯罪，万物都失去了意义。万物被造的意义被遮盖了，它们在叹息、劳苦。保罗还在这里关注受造之物的未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更关注现在，他们对受造之物的未来一无所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未来一无所知。他们研究受造物的结构、本质和物理的属性，称之为知识。他们对受造物的目的，受造物拥有全部的属性的意义是什么，对此却一无所知。亲爱的同学们，信仰就是关乎你们所学的所有知识，就

是关乎万物的。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关乎一切受造物最高的和真正的知识，就是它们受造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劳苦愁烦的，被罪污染的，被罪所捆绑的，被人所破坏的受造之物的真正未来是什么。

英国作家 C.S.路易士这样来解释《罗马书》8 章这段经文，你所拥有的，你购买的所有东西都在挣扎，不愿被我们使用。你的杯子不愿意让我拿它去喝水，杯子不愿我们用它喝水，九寨沟不愿我们人去，铁不愿我们拿它去造武器。因为被造物盼望恢复它本来的目的和荣耀。现在是九寨沟历史上最丑的时候，它在劳苦、叹息，等耶稣再来才是九寨沟最美、最荣耀的时候。人们因为没有盼望，在死之前不能不去的 100 个地方，死以前不能不吃的 100 种食物。人生的梦想不是因为人们有梦想，而是人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梦想。不是因为人们有盼望，而是人们没有了盼望。盼望不是盼望那眼睛看得见的，盼望是盼望那眼睛所看不见的。受造之物都在盼望它们的未来。我们呢？我们是有神形象的人，不只是一堆土，一棵树。

教会会有一个姐妹对我说，她在公司的一个会议上发言，公司在讨论加强公司的管理、严格执行公司规章制度、提高赏罚的力度的会议上，她说我们公司缺的是恩典，没有恩典的话，光是赏罚是不能加强管理的。大家听了很惊讶。中国社会这个时代最缺的是恩典，就是被赦免，被饶恕，所缺的是眼睛看不见的未来和盼望。我们缺法制，我们缺公平、自由。我们有各

种各样的社会冲突，有道德的沦丧，暴戾之气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政府、社会、甚至每个家庭当中。亲爱的同学们，相信一位会审判人的上帝，恰恰是社会公义和非暴力成为可能的、真正的源头，是唯一防止我们诉诸暴力的方式。当你看到不公和不义时，当你被伤害的时候，当一位上访者的房子被拆，穷尽一切方式，仍不能有公平的待遇时，怎么可能没有愤怒呢？

前段时间有位上访者来我们教会，他因为上访，被政府人员打断了腿。当我们面对这些，怎么可能没有怨恨呢？你怎么可能不想拔刀而起呢？在过去十年的中国社会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拔刀而起的案件。我们每天在网上和新闻中看到这样暴力之气。有一位作家说，防止我们诉诸暴力和仇恨的方法，就是坚信只有当它源于上帝的时候，才是正当的。就像黄老师所讲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非暴力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相信上帝会有神圣的暴力，就是祂的审判。这个世界在最终的意义，善恶都将得到上帝公义的判决。如果不相信上帝会审判人，如果不相信在我死亡之后，有公义的存在在我死亡之后，有恩典和爱永不止息，有一天爱和公义都将实现，有一个世界是没有眼泪的世界，没有不公义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有义住在其间的新天新地将永远存在。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我们就应该拔刀而起，我们今天就应该学少林武功，习武自救。我们拔刀而起是正义，如果不站起来，正义就无法实现。不相信上帝的人，没有办法杜

绝生命当中的仇恨，一个不相信上帝的社会，也没有办法杜绝循环往复的暴力革命。中国的历史在不断的回圈社会的暴力，不断的回圈仇恨，不断的回圈砌高楼，楼又垮了。相信宇宙当中有一位公义的神，人类才能走出苦难、仇恨和各种不义的愤怒，才能走向真正的爱与和平。

前段时间我看了美国一部关于机器人的电影。这个智慧型机器人来做士兵，士兵有一句台词：“我不相信他们，你怎么能相信一群不知惧怕的人呢？”机器士兵又不疼，又不害怕，在电池用完以前都有能力。亲爱的同学们，没有信仰的人，就像机器人，没有信仰的人，在某个意义上根本就不是人，因为没有惧怕。我不是指不怕死，不怕掉工作，不怕失恋，而是不怕那位上帝，你不害怕在人生当中有一个终极的结果。同样的道理，一个公司的员工，不相信公司有制度，不相信违背制度会受惩罚，不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要向公司、向总经理交帐，那这样的员工怎么信得过呢？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呢？如果一个有灵魂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在宇宙当中存在，他不相信他的存在要向一位永恒的上帝来负责，那么他就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他只是动物意义上的人。

今天的中国很奇怪，一方面社会严重缺乏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个人的权利意识变得日益强大，我们处在一个相当大的反差中。我们有很强的渴望，希望得到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我们的社会又不能尊重和保护我们的权利。

人们总是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热切的渴望。有人说，人生的悲剧有两个：一是你得不到所追求的；二是你得到了所追求的。人们一遍遍地对自己说，自己应当拥有某些东西，我们应该努力拥有它。并且我们值得拥有。于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努力追求那些没有得到（或得到了却没有保障）的特权和利益，就成为中国社会最强烈的诉求和奋斗。

什么叫地狱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结局，有审判，有地狱。地狱和天堂是同时存在的，就像审判和赦免同时存在一样。你不可能拒绝一个，又想要另一个。如果这样，你就等于没有相信基督教，而是把基督教当成了精神鸦片。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就是你在上帝之外，必须拥有它才能感到快乐的东西。地狱就是你在上帝以外必须拥有的偶像。地狱就是你的灵魂处在一种自我中心、自我的迷恋当中，一直活到永远的轨迹。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社会，今天就已经活在地狱中。地狱就是你自由地选择了一个与上帝无关的身份，来证明你自己，你自由地选择了一种与耶稣基督无关的生活方式，来追求自己的人生。而这个选择有一个终极的结果，用圣经的话说，你将沉入地狱，从今日直到永远。

C.S.路易士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是今天活着的时候，跪在上帝的面前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的人。第二种人，是上帝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人。每一个沉沦的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上帝借着祂儿子的

复活，要把一个新的身份，白白地，完全地给你。你却选择了一个与上帝无关的身份。上帝借着祂儿子的受难，为你承受了末日的审判和地狱之苦。你却决定自己亲自前往地狱。

一个好消息是，上帝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上。祂的荣耀，光明，慈爱和智慧，都还没有彻底撤离这个世界。虽然你还不相信祂，虽然这个世界仍然充满苦难，充满眼泪，但这个世界上因为有了福音，因为有了相信福音的人，他们被称为基督的教会。是的，这个世界上，仅仅因为教会的存在，你仍然可以看见福音所到之处，仍有真正的喜乐和幸福，好像荒漠中的甘泉。事实上，这个世界最令我们感到不解的，并不是世上为什么充满苦难和罪恶——因为那是我们配得的，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罪恶之中。然而，最令我们不解的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仍然还有幸福？上帝所造的太阳，直到今天，“照好人，也照歹人”，阳光普照相信祂的人，也普照不相信祂的人。而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就是有一天，阳光将从此不再普照一切不相信上帝的人。

有些人很反感，我们提到圣经所讲的地狱。然而我要说，对那些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们来说，地狱其实也是好消息。地狱意味着你和你的痛苦，你和你的怨恨，你和你的自卑，你和你的骄傲，你和你的罪恶，结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直到死亡也不能分开。在某种意义上，这不就是你追求的结果吗。如果你经历过痛苦，经历过伤害，常陷入一种无力感——你们在大学是这样，以后进入职场更是这样。当你越来越多地看到社

会中的不公不义、腐败、丑恶的事，经历越来越多的情感的创伤，当你因这个世界不断感到沮丧的时候，当你发现有些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而不会变得越来越好。就像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只可能走向衰败，而永远不会再有强壮的身体。而成都的空气品质呢，也只可能越来越糟，直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再次出现明亮清澈的天空。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和基督的救赎，如果你不相信一个超自然的信仰，和另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那么，每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这就是地狱的广告。魔鬼花了大价钱在这个世界上投放广告。在你们身上，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一种产品和文化上投放它的广告，来证明地狱是存在的。而死亡正是那地狱的终极广告。每一个消费了这些广告的人，每一个说“活着就要尽情享受”，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最终都要购买这个产品。很多人用一生来购买地狱，最后如愿以偿，终于“天诛地灭”。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求仁得仁，求恶得恶。人们岂不是得到了他们应得的和配得的吗？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地狱真是个好消息，你不会去见马克思，在那里你谁也见不到。死亡会给你一张金卡，使你成为一个没有上帝的俱乐部的成员。

死亡会给你一个签证，可以无限期地在烈火和硫磺中逗留。一切不信耶稣的人，都自动成为死亡的金卡会员。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甚至具有比当代西方社会更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诉求。这不是因为他得到了，恰恰是

因为没有得到。你是不是在没有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对那样东西的欲望最强烈？我们的惧怕和我们的梦想融为一体，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内心充满了怨恨、苦毒和绝望。有人说，当代中国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大学毕业时已充满了沮丧，不到三十岁就进入了中年，对社会充满怨恨，不到四十岁已渴望早日退休——然而直到八十岁，他们还没有认真想过死亡的问题。

C.S.路易士在《返璞归真》一书中有段话：“基督教最终会带给人一种无法描绘的安慰和喜乐。但是这种安慰和喜乐，不是始于安慰，而是始于我一直在描绘的那种沮丧和绝望。不经过沮丧，就直接享受的那种安慰，对你的人生毫无益处。寻找真理吧，寻求认识上帝吧，这样你或许在经过痛苦和沮丧后找到安慰。而直接寻找安慰吧，那么你这一生就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

开始你得到的是甜的，是不切实际的梦，无论是中国梦，还是你个人的梦。但如果你不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不相信灵魂，不相信一切奇妙的事。尤其是，你一生都在追求真爱，然而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真爱——因为唯有上帝是真爱。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才是真爱。这辈子最有可能为你而死的人，结果并没有为你死——因为在他为你死之前，你已经伤透了他的心。然而，你伤得最深的那一位是谁呢，岂不是你的创造者吗，因为你从不相信祂，你藐视祂，你公开地否认祂，

你在人前嘲笑关于祂的一切，你在生活中背叛祂。可是，最不可能为你而死的人，结果却为你死了。最不可能为你死的是谁呢，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你想过习近平为你死吗，你想过李克强总理让他的独生儿子替你得癌症吗？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你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好消息，现在我却告诉你。

最后，让我引用美国宪法之父麦迪森的一句话：“如果统治者首先不视一个人为上帝的子民，他就不配统治这个人。或者说，仅仅视一个人为公民社会的成员，已经减损了这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首先被视为上帝国度的一员，那他就会被地上的统治者统治得太过分了。”

这话的意思是，如果宇宙中没有一位上帝，人间的统治者就是你的终极的统治者。那么这辈子无论你怎么活，你活来活去，都是一个奴隶。因为你失去了信仰，所以你让自己被统治得太过分了。金钱，权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就仅仅只被地上的君王所统治。如果你不属于上帝的、属灵的和永远的国度，你就仅仅属于一个地上的、短暂的和肮脏的国度。你只配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人们所追求的成功，不过就是在这种统治下得以进入某个特权阶层），你只配活在公司老板的统治之下（人们所追求的成功，不过就是活在全世界最有钱的那几百个老板之下）。然而，亲爱的同学们，难道在你的生命中，就没有比政治权势和金钱帝国更高的、更美好的价值了吗。当你失恋一次之后，你就再也不相信世上有

永不会失恋的爱了吗？以至于你才只不过 20 岁，就必须削尖脑袋入党、给辅导员送红包，或者和教授睡觉。

寻求信仰，寻求那你眼睛看不见的上帝的国度吧。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里，谈到“两种爱，两座城”。他说，人类历史上，有两座城。一座是巴别塔，一座是耶稣基督里的上帝之城。我要传的福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不意味着从此心想事成，不意味着升官发财，不意味着出人头地。而是意味着，从此，你可以在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中，相信超自然的生活，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恩典的存在，相信神迹的存在，相信天使的存在，相信在你的失败和罪恶在，有一个奇妙的恩典的扭转。从此，你也可以在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坚守社群的理想，活在一个有温度、有尊严和友谊的共同体中。所有的基督徒，在神的儿子里面是一家人，是一个不能被拆毁的，永远的家。从此，你也可以在一种反权威的潮流里，尊重秩序的价值，拥有真正的、仅被上帝的善法约束、而不被世界的恶法约束的自由。

从此，你也可以在一种看重权利的诉求中，经历到牺牲和舍己的爱；又在一种追求财富的压力下，获得慷慨与知足的美德。这是一种傻子的梦想吗？这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吗？这是贵族们的精神家园吗？不是！这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正如《罗马书》8 章 31 节所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

2014 年 5 月 1 日

基督教春联

在网上查看了许多基督教春联，大多受世俗文化影响，一是道德主义强，缺乏恩典的教义，二是过分喜庆，使福音显得廉价，三是民族主义情结，比较泛滥。我猜大概都出自三自系统。教会想要印制一批春联送会友。我试着编撰了 26 幅七字联，不甚工整，新年礼物，送给大家。

1.

上联：施比受更为有福

下联：苦与乐倒也无妨

横幅：奇异恩典

2.

上联：信主强如吃肥牛

下联：爱人更胜沐春光

横幅：以神为乐

3.

上联：杖竿引领公义路

下联：活水浇灌自由花

横幅：万古磐石

4.

上联：壮士蓄箭须满囊

下联：葡萄结子终绕枝

横幅：生养众多

5.

上联：惟信久居神之义

下联：愿主长与我相亲

横幅：惟独信心

6.

上联：四季穷达神同在

下联：一世冷暖主先知

横幅：福杯满溢

7.

上联：恩典为年岁冠冕

下联：十架作永恒法则

横幅：以马内利

8.

上联：佳音初闻天使报

下联：福音再现圣徒传

横幅：竭诚为主

9.

上联：是盐是光作见证

下联：一信一洗蒙救恩

横幅：万古磐石

10.

上联：作茧老我辞旧岁

下联：蒙恩罪人迎新年

横幅：与主联合

11.

上联：三一真神父子灵

下联：羔羊新妇信望爱

横幅：荣耀归主

12.

上联：葡萄入榨方为酒

下联：橄榄成渣始得油

横幅：宝血功效

13.

上联：旧恶全随旧酵去

下联：新人总从新恩来

横幅：惟独恩典

14.

上联：十诫为律求恩免

下联：八福虚心望垂怜

横幅：惟独基督

15.

上联：道成肉身钉十架

下联：福临中华进窄门

横幅：天路历程

16.

上联：春为洪荒一岁首

下联：主是宇宙万福源

横幅：古旧福音

17.

上联：新旧两约著千秋

下联：神子十架赎万民

横幅：宝血宏恩

18.

上联：圣言兴旺是正道

下联：世事衰微尽沧桑

横幅：主必再来

19.

上联：因爱称义无结果

下联：赖恩得救有始终

横幅：惟独圣经

20.

上联：俯首耶稣杯中分

下联：仰望基督面上光

横幅：吃喝主话

21.

上联：神爱世人穷无者

下联：帝力与我何有哉

横幅：在地如天

22.

上联：君尊祭司上行早

下联：神国子民下榻先

横幅：与神同行

23.

上联：家居白日青天下

下联：人住救主恩典中

横幅：天父世界

24.

上联：神恩无边作居所

下联：春光有限盼禧年

横幅：千古保障

25.

上联：惟愿这地得医治

下联：但为那城求平安

横幅：君尊祭司

26.

上联：福如秋雨天路客

下联：恩比春风上行诗

横幅：城市之光

| 2015

无伪之信

同学们，老师们，还有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节经文，要来分享的是信心，并且是无伪的信心。保罗说这个信心，先存在于提摩太他妈妈和祖母的心中。然后他对着提摩太说：我深信这信心也存在你的心中。

我先讲一个笑话。上次我们长老会开会的时候，我也跟他们分享了一个关于教育的笑话，说在一所国际学校里面，有一天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来讨论——关于其他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你们有什么自己的看法？然后，一位非洲的同学就举手说：“老师请问什么叫粮食？”又有一位欧洲来的同学就

举手问：“老师，请问什么叫短缺啊？”接着一位美国学生大大咧咧地站起来说：“老师，请问什么叫其他国家？”最后有一位中国孩子胆怯地站起来问：“老师，请问什么叫自己的看法？”

好像很多对中国教育的批评都是这样子，说中国的学生被教育出来都没有自己真正的思想，都没有自己真正的看法，因为他们从小只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的教育从来不鼓励他们去寻求真理。那我想这个并不只是代表有个性，或者是有独立的思想，因为独立的思想的背后是信心。我们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可是我们只是知道一些东西，但我们并不相信它。这是今天我们教育的问题，我们有小聪明，好像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大家很多的小聪明，可是却没有大智慧。

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因此通过圣经，你因信耶稣基督获得了得救的智慧，这是一种真正的智慧。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许多家长让孩子参加很多补习班，从小学习钢琴、小提琴等。虽然很多孩子练得非常好，但他们心里可能真的只想把那架钢琴砸了。我了解到很多这样的家庭中的孩子，他们学到了一些技艺，可是他们没有学到对音乐的爱，他们内心没有爱。他们没有学到在生命中，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或是他们学到的任何东西，其背后都有人与神之间、人与上帝创造的世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中应该有爱与恩典。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考试结束后，尤其是

毕业时，大家就把所有教科书烧了，撕了，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成就，象征我们胜过了教育者的一种成就，就是用一种仪式把我们所学的东西搞掉。因此，我发现今天教育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既不是教学质量，也不是学习时能否记住这些知识点。那么什么叫做古典教育？很多人这样说，古典教育的意思就是你把所学的所有知识都忘了之后，最后还剩下的东西，那就是古典教育要带给我们的。所有你学过的东西忘记之后，你还剩下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他剩下什么呢？他剩下最重要的是无伪的信心，他剩下的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真正的智慧。我真正盼望每位同学，每位家长，你们无论是在思考教育还是接受教育时，都能真正知道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以及最后剩下的是什么。有时候剩下的是很可怕的东西。

我信主已经好些年了，有一次我在家里对妻子说：“今天我来做饭。”然后我就很热心地去厨房洗菜、切菜，我在那里做饭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做着做着，心里想到，正如诗篇四十五章里说的，“我心里要涌出美辞。”对吧？我就开始哼起了一个调子。哼了半分钟后，我才发现自己哼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给自己一个耳光，责问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已经是一个在教会讲道的人了，竟然在厨房里一哼就哼这个。”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这是没办法的，这就是你忘记了所有考试的东西之后，还剩下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从你的脑海里面、内心深处被除掉。

所以我们很感恩。在关于保罗的这一段经文中，我要讲到一个背景，因为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的最后一卷书信，也就是他殉道临死之前最后所说的话。因为在这里他提到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将被浇奠其上。所以他想念提摩太，因为提摩太被称为他属灵的儿子。保罗想念两件事情，第一，他想起提摩太的眼泪，想起他们之间的情感，也许是提摩太与他最后分别的时候，不知将来还能否再见。保罗也常提到自己的眼泪，然后他想到提摩太的信心，他说，我想到了你的眼泪，这是情感，我想到了你的无伪的信心，想到这信心起初是在你的妈妈、你的祖母那里，现在我也深信，这样的无伪信心也在你的里面。

当我读到这里时，我在想，对于各位家长来说，如果我们即将离世，作为父母，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被主接走的那一刻，当你们想到自己的孩子时，什么是你们的最大安慰呢？什么是那时候的深深满足呢？我想，当你们临终时，会想到你们的孩子。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成年，我们就将被主接走。那个时候，你们想到你们的孩子时，那份深深的安慰，那对未来的盼望，是什么呢？

我想，今天你们在孩子的教育中所期盼的，以及对教育本身的理解，是什么呢？我想，那时候，你们会不会想到我儿子已经挣了二十万了？那会不会是你们在那个时候的想法呢？你们现在可能是这样想的。想一想，你们即将临终了，你们要

被主接走了，那未来还有没有意义？

对未来的盼望，一方面是你们自己的未来，你们的信心会告诉你们死亡之后有没有永生；第二个未来是与你们的孩子相关的，对吧？你们的孩子代表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中，在神里面的一个未来。那个时候你们的真正安慰是什么呢？我想，我自己也许像保罗一样，保罗在这里想到的这两样事情，我想也是对我在类似的情形下最深的安慰。第一，我想到他的眼泪，我想到那临别的时候，虽然将来在天上还会相见，可是在地上仍有离别的眼泪；第二，会想到在我的孩子心中有那诚实无伪的信心，有那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洗净的清洁良心，因这一本圣经，使他因信耶稣基督，有诚实无伪的信心和得救的智慧。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用中国的话来说，是“撒手西去了”。当然，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则是“安息主怀了”。因此，在保罗即将安息主怀之前，当想到提摩太时，他心中涌现出两样东西：眼泪和信心。我也想对我们当中的老师们说，这同样适用于你们，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中提到，你要知道你从小所学习的，并且你心中所确信的东西，你也知道你是跟谁学的。

这里的“跟谁学习”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情况。首先，我们知道保罗应该是提摩太的老师，不仅仅是在教育意义上的老师，更是属灵的父亲。因此，我们看到提摩太接受了

两种教育：一种是家庭教育，他从小通过他的妈妈和祖母了解圣经。后来我们得知，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或非犹太人，因此提摩太在小的时候并没有受割礼。后来为了不使其他犹太基督徒跌倒，保罗带着提摩太去受了割礼。尽管他的父亲不是一个信靠耶和華上帝和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的妈妈和祖母却是。她们使他从小明白圣经，这种家庭教育给他打下很好的基础；

然后，第二种教育是提摩太跟随保罗所接受的，保罗不仅是他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老师，同时也是他属灵的父亲。因此，保罗的第二种身份的意义对于所有的学堂老师们来说，你们不仅是这些孩子们了明白圣经和耶稣基督恩惠福音的教师，你们还是他们另一种父亲或母亲，也就是属灵的父母。当你们某一天离世，安息主怀时，你们除了会想到自己生身的子女之外，也会想到你们生命中那些像提摩太一样的人。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说叫做“桃李满天下”，用保罗的话说，你们会想到在基督里做自己真儿子的、真女儿的，你们会想到两件事，它们会成为你们生命中的极大安慰，以及你们面对死亡时的极大祝福，即孩子们的眼泪和他们心中的无伪信心。

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提到曾参加一位教会主日学老师的葬礼，当时出席的人非常多，甚至超过了某位牧师葬礼中的人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许多曾经被这位主日学老师教导过的学生都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长大成人，有些仍然

留在这个教会，而有些已经去了其他地方，这里面包括一些成为了传道人和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都来参加这位他们敬爱的主日学老师的葬礼，因此他深受感动。后来，作者遇到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和他一同留到了最后，在这位老师的墓地前向他敬礼。

这真的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教师拥有非常特别的身份和尊贵，这是神赏赐给他们的，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做父母，担当孩子们属灵父母的角色。正如保罗所说，他们与父母一起同工，共同在提摩太的生命中同工。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妈妈、祖母以及这位属灵的父亲在他生命中带来了什么。

其实，提摩太前后书中提到了提摩太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提摩太：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有点胆怯，在临别时会流泪，这都表明他是一个情感敏感的人。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或者很羞于谈论男人的眼泪，但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爱的情感表达。保罗告诉他不要胆怯，不要让人小瞧你年轻。我们发现提摩太可能在性格上有一些弱点，他敏感，有时性格很软弱，有胆怯的心，他对自己的属灵父亲有很深的依赖。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热爱圣经的人，他确信圣经是他生命中最高的原则，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生命中所有智慧的源泉。提摩太这种无伪的信心，在今天的教育中是最难得的。

我很害怕在教会学校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一天

当他们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时候，他们就把圣经或者是我们的诗歌本拿来，啊，都全部扔到垃圾堆里面去了。我想，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有一个目标，并以此来衡量我们在家庭中和学校中的教育是否成功——我们的教育，就要是让我们的孩子终身热爱圣经！而不是当他们毕业时就开始仇恨圣经，因为在这辈子前十八年已经把圣经读了那么多遍了，以至于这辈子再也不想读了。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

让孩子终身热爱圣经，终身信靠圣经。我们做父母的，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家庭当中，让自己的孩子看见——这个家，是信靠圣经、信靠福音的；这个家在遇到任何问题时，做父亲母亲的都会拿起这本圣经说，答案在这里！而不会在它之外去寻求答案；当这个家庭遇到任何艰难选择的时候，父母都会说，让我们来祷告，神会给我们答案。若如此，你们的孩子就会跟你们一起来经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或者是我的这些老师们，在他们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不单单是他们教给我们的圣经，而且圣经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和最高的原则。

然而，我们今天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我有一年被带到警察局去，我跟那个警察讨论问题，我说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他跟我说：“王老师，你还是学法律的，你怎么这么认真呢？你是学法律的，你怎么这么天真呢？中国的法律能信吗？”所以，你就知道，在中国，基本上所有学法律

的人都不相信法律。恐怕很多学中医的人也不相信中医，只不过中医能够挣钱而已。你知道吗？在中国，很多专业教育中并没有培养人们对这种知识的热爱和相信，他们也不知道这种知识的背后有什么值得去相信的东西。

所以，让我引用一句诗，在文革结束之后，北岛创作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这首诗捕捉了那个时代及直至今日中国社会的氛围。它表达了从共产主义和前几十年革命文化中走出时的一种强烈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名为《我不相信》。

很多人都读过这首诗。我是在大学之后才首次读到这首诗的，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读了这首诗后，我对之前学过的所有东西就不再相信了，这首诗摧毁了我过去十几年所受教育的基础。诗中写道：“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但在他的否定中似乎又带有一种想要相信的盼望。

他写道：“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我不愿意相信人死如灯灭，我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虚空……”但他又该如何去信呢？北岛最终仍是用“我不相信”来表达他的困惑和无力，表达出他想相信，但又找不到可以相信什么的一种人生。这种人生态度、这种文化、这种社会状态……这正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也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从中被脱离出来的社会。我们应该多么感恩，因为我们已被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我最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年轻基督徒的故事，特别是那些我之前跟同学们提到过的。比如香港的黄之峰，你们还记得吗？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打篮球的林书豪。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另一个年轻人。最近，有一位年仅十三岁的中学生诗人朱夏妮，受到了整个学术界和知识界的特别关注。她的母亲和祖母都是基督徒，她也接受了洗礼，她的爸爸是《南方周末》一个副刊的编辑，我们之前的关系也很好，他叫朱又可。

最近，我阅读了一篇由研究中国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所写的文章，题为《诗歌与宗教》。他在文章中提到，诗歌从来都与宗教息息相关。他指出，人类说的第一句话、写的第一首诗，就是向上帝说的话，人类修建的第一间房子便是庙宇。“庙宇”一词是中文翻译，意思即敬拜的场所。因此，诗歌一直和宗教有关，总是在寻求和表达神圣的事物。顾彬说，这样的历史一直延续，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诗歌才与宗教彻底断绝了关系。他还提到，现代中国的诗人经常问他，他们的读者在哪里？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读者所在，但顾彬指出，在今天的德国文学界，人们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当你的诗歌缺乏宗教信仰时，为什么还非要来别人来读你的作品。因此，他认为，诗人真正应关注的不是为什么没有人购买他们的诗集，或为什么没有人读他们所写的诗，而是为什么他们的诗歌已经与一切神圣的事物和信仰切断了联系。你已经不再向上帝说话，那么，人为什么还要来听你的话、读你的诗呢？

顾彬还特别引用了朱夏妮的诗，他说他最近读到了这位十三岁中国女孩的诗，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耶稣和祈祷的描述，有许多与信仰相关的元素。她的诗歌已经出版，其中一首叫《世界@罪恶》，我蛮喜欢，里面描绘了一个充满罪恶但又充满奇迹的世界，这首诗的标题非常后现代，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天还是蓝的，而地流着罪恶的血，世界已经腐烂，又是一个奇迹，声音平静，一切又重新开始了。”我鼓励你们去阅读这位小妹妹（对你们来说或者小姐姐）的作品。

昨天我看到了一句话，我想这对牧师是一个提醒，对学堂的老师们，包括家长们在家庭当中的信仰教育，也是一个提醒。他说：“让福音显得沉闷是一种罪。”所以，对于这个学堂的老师来讲，让圣经枯燥是一种罪。让孩子终身热爱圣经、喜爱研读圣经，这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目标。如果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在我们当中做工的话，就可以使圣经能够帮助他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这些孩子们，他们的一生会不会将圣经的教导作为人生的最高权威与原则？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什么是最高的权威。人的理性是不是最高的权威？专家是不是最高的权威？世俗所流行的潮流是不是最高的权威？在市场上听到看到的那些广告是不是最高的权威？很多时候你会说当然不是了，可是很多时候，它真的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最高权威，因为在你的里面没有

对圣经无伪的信心。

我讲述一个犹太学堂的故事，有一位一世纪的犹太人叫加玛列。人们常常将加玛列一世和加玛列三世混淆，不太清楚《使徒行传》中出现的加玛列是否就是他。他建立了犹太学堂和督学制度，这些学堂遍布各城。有些学者会走访这些城市，检查当地犹太会堂是否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和教会学校。他们到达一座城市后，会要求见到那座城市的保卫者。最初他们会把警卫叫来，但督学指出，不是他们，他们要见的城市的保卫者就是学校里的老师。在犹太人典籍《塔木德》中有言，没有学生的城市终将覆灭。

这对教会而言也一样，没有学生的教会最终将灭亡，终将断子绝孙。今天我们看到基督教在一个方面不断宣教和成长，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在不断地在断子绝孙。甚至在这方面，我们不如犹太社区，更大大不如伊斯兰社区。昨天在教会的主日学中，我提到伊斯兰代表了一种强烈的反世俗文化和价值观。今天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虽然他们采取了疯狂和暴力的邪恶手段，但他们代表了一种强烈的反对西方文明所包含的世俗化运动，这是一种非世俗化的运动，包括他们的恐怖主义，也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

因此，一个世俗化了的教会是不可能向伊斯兰世界宣教的。我们必须在非世俗化方面展示与他们同等的渴慕，一样地寻求真正超越今生肉体的祝福。同时，我们还同样强烈地持守相信

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伊斯兰世界宣教。

所以我说，一间将自己的儿女送往公立学校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教会，怎么可能向着那些宁愿死都要让孩子接受伊斯兰教育的伊斯兰人传播福音呢？因为他们根本瞧不起你的信仰。他们会说，你那算是什么信仰？你根本不会为你的信仰去死，而你想向我们这些愿意为信仰去死的人传福音，然后告诉我们自己信错了？如果你们真的信对了，为什么没有无伪的信心？为什么没有必死的勇气？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为了你们的孩子、为了你们的未来、为了你们的永生，舍弃这个世上的一切，而和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世俗化的文化决战？你们说我们拿起刀剑决战是错误的决战方式，那请问你们又拿起了什么来决战呢？

因此，我们不仅仅是在指责伊斯兰的邪恶，我们还需要看到自己的邪恶。上帝借着伊斯兰的兴起再次提醒今天的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已经堕落到何等软弱的地步！基督教会的信仰混同于这个世界的世俗化文化已经有多么深？基督徒的家长们，他们培养孩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们到底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临终之际，什么是他们对自己子女真正的安慰？而基督徒的子女们，他们到底为什么而学习？

伊斯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反面教材，因为恩典与他们是相反的。然而，上帝借着伊斯兰在审判今天的基督教会，上帝借着伊斯兰的兴起提醒今天的基督教会，也在催逼今天的基督教会。今天的基督教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冒险的，疯狂的，是为

主癫狂的。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专家，我们真的是渴望培养圣徒。我们不仅是给他们小聪明，我们盼望上帝赐予他们大智慧。

我们渴望他们的一生在未来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将来长大留在这座城市，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教会在成都这座城市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远赴他乡，我们希望他们在那里，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都能成为那个时代、那座城市、那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甚至需要在教会内部，向那些自由派和不相信圣经的人作战。

昨天在网上，我看到有个人回复我。当我就伊斯兰问题发表了一句话时，他说：“虽然我们信耶稣，但是不要厚此薄彼，大家都有各自的优点。”所以，他也声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的最后一句话让我非常揪心——“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不要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厚此薄彼。”

这是什么样的基督徒？这是哪门子的信仰？这种信仰是一种完全失去了对独一真理和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自由化“信仰”。我并不怀疑三十年后我们的后代是否还会信主，这一点我没有疑问。但我深深担忧和怀疑的是，三十年后他们究竟信奉的是哪门子的信仰？他们可能仍然相信耶稣，他们可能认为同性恋是正确的，但仍自称为基督徒；他们可能仍然相信通过伊斯兰教或儒家也可以得救，但他们仍自称为基督徒；他们可能还会说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错误，但他们仍然自称为基督徒。

我要讲一个故事，我想问我们塔夫班的同学们一个问题，因为你们现在应该已经具备了为信仰辩护的能力，应该具备在信仰中的思辨能力，以及反驳和护教的能力。去年我在台湾时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位宣教士是一位研究圣经的学者，并且在圣经学会工作，但他属于自由派学者。他在一所教会大学里做了一个讲座，他在讲座中宣称圣经是有错误的，圣经不完全是上帝的默示。然后他的论点遭到了另一位牧师的同台辩驳。这位自由派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请你们也来回答，他说：“圣经怎么可能全都是神的话呢？圣经里面明明还记载了魔鬼的话。”

塔夫班的同学们，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反驳？圣经里有没有魔鬼的话？有的，就是“魔鬼说”、“撒旦说”……，那你们会怎么反驳？有没有谁可以试着给我一个反驳，可以吗？试一下，可以的，你们可以的。有没有谁来，有没有？弟兄先来，弟兄不行的话，神就兴起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弟兄们有没有谁先来试一下？

小弟兄们，试着反驳一下，如果人家这么问你，你随口你会怎么回答呢？没关系，你不一定说我要想得很怎么好我才说，有没有谁试着来，有没有谁来？没有啊？那神就要做一件奇事让女子护卫男子了。姐妹们有没有谁来？是的，回答一下，你会怎么回答？“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有小姐妹现场回答）是的，就给他背出这句就好了对吧？好，这很好，就告诉他，圣

经是神所默示的，因此你说的是错误的。还有没有谁？还有没有谁？你要来回答？好！“在婴儿和妻儿的口中建立能力。”好！“当魔鬼说这了些话，他后面还是有神。”嗯，很好，很好！

当时那位牧师开口即反驳说：“请问你如何知道，你怎么能够确信，那是魔鬼所说的话？若非圣经告诉你，你是无法确信的。若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出自于非上帝之言都是谬误，你又怎能确信那是魔鬼的话呢？连那是魔鬼所说的话，也是上帝通过圣经告诉你的，对不对？”

因此，圣经不仅告诉了我们关于今生的事，还告诉了我们关于永生的事。圣经不仅揭示了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事，还告诉了我们属灵世界的事；圣经不仅记载了关于人类的事，还向我们展示了关于天使的事迹，圣经不仅告诉了我们敬虔天使的事，甚至还揭示了堕落天使的事……这正是圣经中有关魔鬼的话语被记载的原因，这一切也是神想要通过圣经告诉我们的。祂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魔鬼。甚至还要让我们知道，即便在这所教会大学的讲座上，就有魔鬼在工作！是不是？因此，我们应当感谢主。

我想分享几个相关的故事。在纽约，曾经有一段时间，街头布道家频繁出现。其中一位名为查理·金的布道者在时代广场的一个角落展示了他传福音的创意。他在地面上放置一顶高高的礼帽，围绕帽子跳舞，并指着它说：“看，它活着，它真的活着！”这场景有些类似街头杂耍表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围

观，查理突然揭开帽子，露出下面的一本圣经，随即开始向人群传讲福音。

在纽约，曾有一个致力于校园宣教的机构，这间机构向每一位基督徒学生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些学生与非基督徒同学一起上课，于是该机构如此挑战他们——要求他们即使感到难为情，也必须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具体行动是，在任何课堂上，公开地将一本红色封面的圣经放置在所有其他课本之上。该机构鼓励每位基督徒学生签订承诺书，表明他们愿意这样做。

不知道你们，包括我们的家长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刚信主不久时，每次在公共汽车上翻开圣经，总会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至少有过吧？可能有些人现在还有这种感觉。今天结束之后，我们都要悔改。我还要挑战你们，包括我们的学生们，应该开始行动了。你们不仅要有这样的信心，而且要勇于传扬福音。特别是，带着一本显眼的圣经，在任何场合都将它放在一堆课本的最上面。

最后，我想对家长们说几句话，因为今天崇拜结束之后你们需要缴纳学费。基督教教育是一种成本较高的教育方式。在这里，我想引用《塔木德》中的两句话。第一句：“即使为了重建圣殿，也不应中断对孩子的教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卖房子呗，租房嘛。意味着不再购房而改为租房，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仅对于你们家的房子是这种态度，即使为了重建圣殿，也不能停止对孩子的教育。这正是我们教会新设立

这所学校时所立的志——即使不能买会堂，也不能停止办教育，教会与学堂共存亡。因为，若没有对我们子孙的教育，建立圣殿又有何用呢？因此，我们应该在孩子们的心中建立圣殿；

同时，对于那些在经济上有压力的家庭，《塔木德》中还有一句话可以给予鼓励。在古以色列时期还没有印刷术，人们如果拥有摩西五经，即妥拉，那可不得了，因为那是非常昂贵且极难得到的羊皮卷。但拉比们教导说：“为了支付学费，可以卖掉一卷妥拉。”

因此，我想鼓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在金钱上，无论是在时间上、精力上，无论是在家庭其他的各样选择上，愿我们都能付出代价。愿我们一起与主同工，也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与学堂一起同工，将对圣经的热爱，将对耶稣基督福音无伪的信心，祈求神通过恩典的方式培养在我们孩子的生命中。这是我们能够给予他们的最美好、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教育的目的。没有其他教育目的高于此，也没有任何教育目的在这之外。我们会学习很多知识，但都是在这一目的之下，这一目的之内的。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并赞美你。愿在这学堂中的每一位学生都有一位敬虔的妈妈，甚至有一位敬虔的祖母，也有一位敬虔的父亲。求主你让在家庭中的父母向孩子们所展现出生命中的信

仰是又真又活的，它与每一分钱有关，它与每一件事有关，它与每一颗眼泪有关，它与每一次生命中的挣扎有关，也与每一次的欢喜与快乐有关。

求主你为每一位年轻的同学、每一位“提摩太”，都预备他们生命中的保罗。无论是在教会，特别是在这学堂中，他们不仅有教授知识的老师，还有属灵的父亲和母亲。有一天你要记念他们的眼泪，有一天你要记念他们心中无伪的信心。求主使用我们，使用这一间小小的学堂，为你自己造就耶稣基督国度的精兵。

我们都是软弱的，不仅孩子们软弱，老师们有谁不是软弱的呢？家长们有谁不是软弱的呢？甚至牧师和长老有谁不是软弱的呢？因此，我们祈求在圣灵的恩典中教育和被教育。我们真的希望在这里，让孩子们与老师、与父母们一同在基督的恩典中长进，一起在你面前承认：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我每天都倾向于忘记你的恩典，每天都倾向于泯灭我心中圣灵的感动。我常常不信我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一旦有风吹草动我就不信，一旦遇到困难我就不信，一旦面对具体选择我就不信。

哦主啊，怜悯我们。求主你也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仍然也是在神的恩典中成长的蒙恩罪人。因此他们是向我们学习，但他们实际上不是在学我们，而是在学习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复活的耶稣基督。愿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

的那一位主，也在他们的生命中作王，让他们明白不是我们要在他们生命中作王，我们不是要辖制他们，我们乃是要引导他们认识那位统治我们的主，成为统治他们的主。

感谢赞美主，求你帮助这间学堂，帮助新的学期。你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呢？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2015 年 3 月 2 日

以恩慈相待

弟兄姊妹们，平安！

特别问候葛迎锋李冰夫妇及家人、朋友平安！

今天是一对结婚已经十二年的夫妇，他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说出誓言，坚立他们婚姻的盟约。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的好奇，在这十二年当中发生了什么呢？这十二年的故事让我这样来猜测一下：或许是葛迎锋为爱受难的故事，是吗？你是不是在这十二年来常常感觉自己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袍，手上不断地被钉伤；也有可能是李冰为爱受难的故事，在这十二年来你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他们说不是的。他们自己选了这

一首诗歌，叫做“耶稣为爱受难”。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十二年婚姻之后要说出婚姻的誓言是相当的艰难，如果没有神的帮助，这根本是一个神迹。十二年的婚姻，十二年的抗战，大大小小几百场战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战役，比如：到底是先洗脸，还是先刷牙；在街上如何不去看其他的女性；还有买房、装修，这些都是很大的战斗；辞职，生下小孩以后如何喂奶，何时分床，跟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关系。

有一位基督徒的婚姻布道者说，在每一个不美满的婚姻的背后，都隐藏着尚未悔改的罪。昨天晚上我对我的妻子发了脾气，因为她出去买菜老不回来，我晚上要去开会，我着急了，要迟到了，我就跟她有发脾气。你知道她怎么做吗？晚上我在房间里的时候，她走进来对我说：你明天讲道的题目是“以仁慈相待”。我说：是吗？我要讲的是以仁慈相待，就是这一节的经文。我跟你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起“并要以仁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阿们！所以我请我的妻子饶恕我。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这一对夫妻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彼此来饶恕，因为耶稣基督饶恕了他们。

苏格拉底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无论如何都要结婚，如果娶一个贤妻你会很快快乐幸福，如果讨了个恶妻你会成为哲学家。你就看出哲学跟基督教信仰的区别了。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你还可以成为哲学家，而且通常婚姻不幸福的人才会成

为哲学家。但是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你绝不会成为一个牧师或一个好的基督徒。

为什么我会发脾气呢？为什么我们会愤怒呢？在婚姻当中我们常常愤怒，我们没有办法以恩慈相待，我们没有办法存彼此怜悯的心来饶恕。在愤怒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我希望整个宇宙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配合我的计划。当然，如果把宇宙缩小一点，至少我是我的家的中心嘛，我的婚姻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我的计划，我希望一切的事情都是关于我的。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于我的妻子的行为和大脑，而是我把自己放在上帝该在那个位置上面。

他们结婚十二年了，你们待会儿会听到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结婚有十八年了，许多年来我徒劳、沮丧、愤怒的把上帝的国度变成我自己的国度，这就是我的婚姻常常在某些时候显得如此糟糕的原因，因为我在敬拜我自己，我在描述一个王怡为爱受难的故事。我对我的妻子常常充满愤怒，是因为她没有俯伏在我的面前，脱下冠冕来敬拜我、侍奉我，这就是我不能够以恩慈来待她的原因。

换言之，圣经说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但是做丈夫的不能够为妻子舍己，跟妻子的状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仅仅只是因为这一位丈夫，并不真的相信基督为教会舍己。换言之，他并不真正地相信福音。同样的，圣经也教导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妻子不能顺服自己的丈夫，

也跟丈夫的现状没有任何的关系，仅仅只是因为她并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顺服了祂的父神。换言之，只是因为她并不真的信靠福音，而且没有活在福音当中。

今天题目是“以恩慈相待”，它让我们看到婚姻当中的现状。今天是一对已婚夫妇的更新礼，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已婚的夫妇，所以今天下午应该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夫妇，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的一个悔改的下午。我们承认我们的婚姻常常不是由恩典而是以律法来驱动的。我们没有学会一件事，只有在福音中你才能够学会这件事，那就是以恩典或者说以恩慈相待是对待对方的罪的和对待自己的罪的一种真正有能力的方式。基督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祂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正如祂赦免了我们，当主说你们以恩慈相待，这不单单是一个要求，而且祂指出来了，你怎么可能以恩慈相待的真正的动力和来源，而这一个的动力跟来源就是上帝的恩典。

换言之，我们的婚姻当中，如果要除去葛迎锋为爱受难的故事，或者李冰为爱受伤的故事，除非你真正地看到，耶稣为爱受难的故事，否则的话呢，我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会感到我是我妻子生命其中的一个律法主义者，主以慈爱来吸引她，我却以我的律法来惩罚她。我们常常把向自己的配偶所要求的看为天经地义，可是常常基督没有这样要求她。基督说：来，你白白地到我的面前来。但是我对我的妻子说：你要带着许多的东西到我面前来。基督白白地施恩于她，但是我却是她生命

其中的一个律法的颁布者。我的妻子常常不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受到管教，当然，她有的时候也许会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受到管教，但是她常常因为违背了我的律法而受到我的管教，因为我将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

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葛迎锋曾经经历或者是现在正在经历的生命的状态。我相信葛迎锋跟李冰今天都会在上帝的面前来感恩，有一件非常感恩的事那就是做丈夫的在上帝的面前来承认说：哦，我的妻子成为了上帝所使用的来颠覆我的自我中心的国度的一种最强大的武器和一个最坚忍不拔的的器皿。以前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苦难的原因，然而恰恰相反，今天下午我们要来宣告，我们要来见证，这恰恰是来自十字架、来自上帝的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恩典。他们要走到对方的面前，彼此四目相对，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和在你们的见证之下，说出他们婚姻当中的誓言，坚固这一个誓言。他们必须开除他们内心的那一个辩护律师，不再为自己辩护，丈夫要当着妻子的面，妻子要当着丈夫的面，写下他们自己的忏悔录，来表明他们要靠着那一位，在基督里赦免了、饶恕了他们的那一位上帝。他们要立志以恩慈相待，存彼此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

什么是誓言呢？虽然他们是在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结婚的，我们相信，这个婚姻仍是神所配合的，这一个婚姻的盟约仍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不过今天他们要在上帝面前说出这一个

盟约。盟约是什么意思呢？我开始思想到一件的事情，基督宣告说他是为我们而死的，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当基督在两千年前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换言之，祂是为将来的你而死的，祂是为将来的你的犯罪而死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爱是多么的胆大，多么的惊人，多么的肯定，甚至多么的狂热。祂是在我们还没有降生的时候，换言之，基督在我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宣告祂要赦免我们，祂要为我们所犯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配偶犯罪之后，感到自己难以原谅对方呢？甚至长久都不能够原谅对方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对方犯罪之前就已经原谅了他。换言之，如果我们要等到对方犯罪之后再去决定自己是否原谅他，我们爱他已经爱得太晚了。在我们的婚姻的誓言当中，已经包含了一个预先的原谅，这就是誓言的意思，誓言的意思是说，如果将来你得罪我，我愿意原谅你，婚姻建立在一个已经原谅的盟约之上。

所以让我再一次的重复这一句话，在婚姻当中，如果你要等到对方已经犯罪之后再去决定自己是否要原谅他，各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是意味着对方犯罪得罪了你，这意味着你背弃了婚姻的盟约。让我说不是那一个犯罪的人背弃了婚姻的盟约，是那个不原谅的人背弃了他婚姻的盟约。婚姻的盟约就是一个预先原谅的盟约，而这个已经原谅的盟约建立在那

一位为爱受难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上。在我们犯罪之前，上帝预先爱了我们，原谅了我们。所以今天他们要说出这个誓言，就是对对方说：我知道在今天下午之后你还会不断的伤害我，你还会不断的在婚姻当中犯错，但是我今天的这个誓言要说，不要等到你将来犯罪之后、得罪我之后再去决定是否原谅你。你还没有犯罪之前，我就宣布原谅了你。我要原谅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你有可能对我的任何一次的伤害，我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因为那一位基督也是如此而做的。

婚姻当中，其实无论你跟谁在一起你都会很难受，这是我在婚姻当中发现的一个奥秘：你跟一个一直犯错的人在一起会难受，跟一个一直都正确的人在一起会更难受，和一个总是正确的人在一起会发狂。有时候你跟配偶吵架是因为他错，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对，就是因为他是错的所以我们要反抗，正如我们背离上帝一样。为什么我们背离上帝呢？不就是因为上帝总是正确吗？！总是犯错的那一个人令我们绝望，所以我们在婚姻中一直绝望。但是，永远正确的那一位神又令我们抓狂，我们想反抗祂，反抗祂的恩典，反抗祂的律法。我要说的意思是配偶无论是对是错，都不是我们吵架的真正的原因。无论他对还是错，你都一定会跟他吵架，因为你就是那个要吵架的罪人。不被赦免，拒绝上帝的恩典才是我们的婚姻如此艰难的根源。因为我们不真的相信，没有活在正如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

什么是一个好的婚姻呢？一个好的婚姻是在婚姻当中愿

意而且善于常常的对自己说“不”，而不是善于常常对配偶说“我要”。然而各位，这常常违背我们的本性，我不知道你们如何？至少违背我的本性，除非圣灵将那一位在十字架上对自己说不的耶稣基督，不断的赐给我们这些经常对自己说“是”的人。以恩慈相待，爱你的丈夫；以恩慈相待，爱你的妻子，这成为上帝呼召我们在婚姻当中做一切事情的一个命令的总归。不回到这里来，你没有办法为妻子舍己，也没有办法去顺服你的丈夫。如果你没有触摸到这一个福音的实质，你会把丈夫要为自己的妻子舍己，或者妻子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当做是一个你所负不了的轭，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血气能够做到这一点。

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对我说：王怡牧师你常常讲道都太抽象了，我很喜欢听一些牧师讲到最后，他都会给我们几个非常具体的建议，一、二、三，到底要怎么做，但是你的讲道里面经常都不是给我们一、二、三，这个很清楚的要做什么。但是我今天想破一下例，我今天要给葛迎锋跟李冰三个非常具体的以恩慈相待的建议。

从今天婚礼之后，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很简单，一起睡觉。各位，你有没有会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很怪，没有结婚的人常常在一起睡觉，结了婚的人经常不在一起睡觉。没有结婚的人，他们在一起睡觉，他们称之为爱情，但是圣经呢，称之为淫乱；但是结了婚的人为什么常常不在一起睡觉呢？各位，这又算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

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今天很多的夫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不在一起睡觉：因为生了孩子，就跟孩子睡觉，有很多的妻子生了孩子好多年之后就不跟老公睡觉了，就跟孩子睡。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什么叫做成为一体呢？耶稣基督说成为一体的意思就是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什么叫一体呢，这话的意思就是上帝在婚姻当中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她用一男一女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这个叫法人。所以婚姻就是上帝创造了一个法人，你们是一个人。但是婚姻在今天这个社会，常常就是胳膊在床上，大腿还在客厅里，更可怕的是脑袋睡在成都，大腿睡在重庆。有很多的夫妻，为了做生意分居两地；为了赚钱就分居两地；为了陪孩子去读书，他们就分居两地。总之今天的夫妻，为了至少超过 10 个、20 个以上的理由，他们结婚之后都不一起睡觉。所以我要给跟你们以恩慈相待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夫妻以恩慈相待包含了一起睡觉。

第二个更具体，同时上床。你知道今天对很多夫妻来讲同时上床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神迹。他们会说你先睡嘛，我再看一会儿。他们一会儿在看手机，一会儿他们工作，一会儿打游戏，一会儿涮微博。他说，你看嘛，王怡牧师又发一条微博。所以据我自己的观察，今天 100 对夫妻至少有 99 对都不同时上床，

一对夫妻在 100 天当中有 99 天都不同时上床，我不知道你们如何，这是今天婚姻其中的一个极大的危机。所以我给你们第二个以恩慈相待的具体建议就是：同时上床。

第三个，牵手祷告。夫妻无论经历到什么样的软弱、困难，如果还能牵手祷告，就还有希望，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牵手的基督徒夫妻，他们彼此之间牵手还是不牵手都已经陷入到很危险的地步。

所以，你们回顾一下三个建议，一起睡觉、同时上床，牵手祷告。上帝仅仅只在婚姻当中创造了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基督徒夫妻要用自己的亲密来见证这一位耶稣基督，令这个世界嫉妒；基督徒夫妻也要用自己的圣洁，来见证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让这个世界嘲笑我们。所以，愿那一位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的神，赐给你们以恩慈相待的心，赐给你们在婚姻当中的亲密，令这个世界妒嫉的亲密；也赐给你们在这个婚姻当中的圣洁，令这个世界仇恨的圣洁。这样，你们就在世人的面前见证了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你们就在世人的面前用你们的婚姻来讲述了一个伟大的故事，不是葛迎锋为爱受难的故事，或李冰为爱受难的故事，而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上帝的独生子为爱受难的故事。阿们！

最后我送给你们一句话，我也送给在座的所有的夫妻，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好男人是一座教堂。现在我要请葛迎锋弟兄和李冰姊妹从你们的位置上站起来，请司琴给我们一点音乐，

我们低头有一点默想，我们也为这一对夫妻来祷告，记得他们要说出婚姻的誓言是艰难的，是喜悦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来见证上帝在这一对夫妻生命当中的死而复活的神迹，不断更新的神迹，我们一起来低头默想。

2015 年 5 月 16 日

为什么反对“同性婚姻”

一、这是对《独立宣言》的背叛

1

婚姻来自一个创造的奥秘，即人类不是像变形虫一样分裂繁殖，而是从一男一女的结合中产生生命。婚姻也来自一个救赎的奥秘，即基督将迎娶一个背叛他的女子（教会），并替代教会死在十字架上，将她从罪恶与沉沦中赎出。否认了这两个奥秘，就等于否认了生命和救恩。

2

用一种抽象的权利观，颠覆数千年的自发秩序。这不是古典

的自由主义，而是一场法国大革命。不是自由，而是疯狂。“同性婚姻”的立法，挑战了人类立法权的极限，是对宪政传统的背叛，它强迫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婚姻观和良心自由，它指鹿为马，逼着人们称两男或两女为“夫妻”。自由已走向自由的反面。

3

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夫妻”，什么是“父母”，这可以是一个宗教议题，神学议题，哲学议题，社会学议题，或文学议题和语言议题，但绝不应该是一个司法议题。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少数派意见中所说，这个判决是一种重塑社会的激进的革命行动，完全拒绝了司法的审慎，越过了一个人间法庭的权限。法律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边界所在，那么法治，宪政，人权，这些观念就被抽空了价值。

4

在美国《独立宣言》中，至少使用了三个神学概念，来定义和限制“自由”。一个是“被造”（are created），用来界定何为人。一个是“造物主”（their Creator），用来描述在人类一切自由与权利的来源者和赐予者。一个是最后一句话中的“神圣护理”（Divine Providence），用以宣告追求自由的努力必须依赖的保障和应许从何而来。同性婚姻合法的判决，意味着最高法院已彻底背叛了《独立宣言》，即背叛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性来源。这也是德州州长格雷格·雅培以“宗教自由”反对这一判决的

宪法原因。

二、婚姻是公共制度，而非个人隐私

1

我承认，性关系是个人隐私，不是公共制度。但相反，婚姻却是一个公共制度，而不是个人隐私。两个人住在一起，他们愿意称自己为什么，这是他们的隐私和权利。即使我们不同意，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或荒谬的，我们在法律的意义上也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婚姻的定义，是需要全社会的配合和承认的。我们反对的不是同性恋者当有的权利，而是反对法律对全社会的婚姻观和良心自由的强迫。基于我的信仰和良心，我绝不可能将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的同居关系，称之为婚姻。反而，我坚持称之为淫乱。我同意，我无权干涉他们继续这么做，我也不支持通过立法去“纠正”他们的行为。但是同样的，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强迫我承认他们为“婚姻”，为“夫妻”，为任何人类后裔的“父母”。没有人可以强迫我改变我的内心和日常生活中对“婚姻”的定义。这不但是我的信仰，也是千百年来全人类不约而同的、对婚姻的朴素和传统的信念，它可以在公共生活中被讨论，但绝不能被法律所修改。否则，这就是专制和极权。

2

换言之，什么是古典的自由主义立场呢，就是反对同性恋的人群不能“诉诸”法律去改变和歧视同性恋者的选择，而支持同性恋的人群也同样不能“诉诸”法律去迫使全社会承认他们的结合为“婚姻”。因为婚姻制度从来就不是由政治国家的法律来设计的，同样也不能由人类的法律来改变。而这与基督教的“福音”也是相符的。我们坚持认为同性恋不是一种自然权利，而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但我们也坚持认为，只有恩典和真理，诉诸于人心，而不是诉诸于法律，才可能带来有价值的改变。我们也会宣告圣经和上帝对同性恋行为的审判，但我们也同样宣告，这个审判的权柄只在基督那里，而不在教会或世俗国家手上。所以，我们独断吗？是的，我们独断，因为圣经的启示就是独断的。那么，我们不宽容吗？不，我们是宽容的，因我们绝不以私人言论以外的方式，去强制改变或歧视同性恋者。相反，我们努力去爱他们。

3

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长辈，从不告诉任何人他的年龄，包括自己的儿子。最近我母亲过七十岁生日，他儿子知道了，就说，爸爸，怎么她都七十了，你到底多大啊。结果这位长辈便来责怪我母亲，泄露了他的年龄。我对母亲说，他当然可以认为年龄是他的隐私。但我们却没有配合他撒谎的义务。他不能要求全世界都来配合他。他自己这么说，是他自己的事。我

们可以尊重他的选择，但他要求你以沉默来配合他，或要求你也否认自己的年龄，那他就成了一个专制者。同样的，为什么我说“同性婚姻”是一种专制主义，因为它要求全社会的配合。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左派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4

同时，“同性婚姻”作为一项制度，是这个时代由来已久的“去性别文化”，或称“中性文化”的一个巅峰的产物。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抹煞性别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当一个女权主义者说，“你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她忽略了她必须是一个女人，才可能是一个人。同样，我也必须是一个男人，我才是一个人。这就是上帝按着祂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意思。就像 C.S.路易斯说的，你不能说，你穿的既不是长袖衬衣，也不是短袖衬衣，也不是无袖衬衣，但你却坚持自己穿了一件衬衣。当一个职员说，我的老板很强势，很能干，“我几乎忘记了她是一个女人，对我来说，她就是老板”。这不是女性价值的提高，而是人的价值的沦丧。因为“老板、律师、书记、经理”的文化身份，将我们的性别身份吞没了。这是人的异化，而不是人的进化。性别是一个奥秘，性别意味着我们对另一个性别的好奇，敬重，和对自身性别的谦卑。因为你意识到人类无法仅在一个性别中了解生命的奥秘，或彰显上帝的形象。也无法在一个性别中创立婚姻，生育人类的后代。

5

然而，生命的意义、自由和尊严，是与生命的来源和奥秘相关的。斩断这个关系，就等于斩断人的存在本身。而在“同性婚姻”这一人类企图创造的赝品中，失去了对性别的敬畏和面对另一个性别时的紧张、谦卑和神秘感，也失去了对两个性别的结合中所包含的激动人心的，一种更高的生命形态的渴望。“性别”的意思就是性之别，唯有“性之别”才是自然的和先天的，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的奥秘。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和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悲哀的意识到，“同性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性的退化。换言之，“去性别化”的实质，就是非人化。

三、为什么婚姻必须是二人？

1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同性婚姻判决，各州必须去掉“一男一女”的婚姻定义，而保留“二人的结合”这一定义。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少数派意见中指出，今天多数派法官的意见将很快产生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各州一定要保持保持婚姻是“二人之间的结合”的定义呢。他说，“虽然多数法官随机的把‘二’这个数词加了进来，但他们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二’这个婚姻的核心定义可以被保持，而‘男女’的核心定义却不能？从历史和传统的角度来看，婚姻从异性结合变成同性结合的跨越，比从二人结合变成许多人结合的跨越更大，毕竟多妻制和群婚在

世界许多文化中都存在或曾经存在。如果多数派法官愿意做比较大的跨越，很难看出为什么他们不愿做小的那个跨越”？

2

罗伯茨接着说，“我们会很震惊的发现，多数派法官在此案中的大多数论断同样可以适用在群婚上。如果‘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在一起的结合有着同样的尊严’，为什么三个人之间的自愿结合就没有了呢？如果同性伴侣有宪法赋予的结婚权利，同样的宪法推断难道不适用于三个或者更多群婚的家庭么”？

3

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回答，是上帝在《创世记》第2章22-24节中对婚姻和性关系的定义，“耶和华神就用那人（原文为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定义，在整本圣经中重复了四次，一次在旧约，三次在新约；一次在人类堕落前，三次在人类堕落后。这显明造物主对人类的婚姻和性关系的伦理旨意是普遍的和永远的。很讽刺的是，这恰恰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同性婚姻的判决中，仍然坚持婚姻是“二人的结合”的“最古老的自然法来源，即上帝按着祂的形象所创造的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

4

事实上，除非你承认这是婚姻、男女性别和性关系的伦理来源，否则婚姻就没有什么神圣性可言。如果“一男一女”不是婚姻的定义，那么“二人成为一体”就同样不应成为对人类的情欲和意愿的限制。因为“一男一女”与“二人成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婚姻的、紧密相连的和最自然的定义。你不能否定第一个，却试图保留第二个。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是自由的，我们可以给婚姻一个在逻辑上更开放的定义：“婚姻是不同性别的单数个体之间的结合”。意思是说，假如上帝创造了三个性别，婚姻就一定会是三个人的结合。如果上帝创造了十个性别，婚姻就是十个不同性别的人的结合。然而，上帝只创造了两个性别，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也能看出这一点来。所以，“婚姻是不同性别的单数个体之间的结合”，这个更抽象的、逻辑上的定义，就变成了真实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中的具体定义，“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换言之，“二人”必须被保留在婚姻定义中的唯一理由，就是人类只有两个性别，而婚姻与这两个性别的结合有关。

5

因此，婚姻一旦与性别的结合无关，仅仅取决于任何性别的人类个体之间的自愿。换言之，婚姻的定义一旦离开“一男一女”的结合，那么“二人”就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对婚姻的限制。对于三个彼此自愿以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来说（无论他

们是一男两女，一女两男，或三男和三女），美国最高法院从此将无法基于宪法和某种自然正义观，给出任何不与这个判例自相矛盾的理由，去否认他们的“不经正当程序被剥夺的、平等的结婚自由”。如果你说，因为自古以来如此，那么第一，这与你的逻辑矛盾，因为你刚刚篡改了一个“自古以来如此”的婚姻定义。第二，这与事实矛盾，因为一夫多妻制是在不同民族和文化中普遍存在过的婚姻模式。“自古以来如此”的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却不一定是“二人”的婚姻。也就是说，所有民族和文化中的婚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都不约而同地守住了“一男一女”的定义，但并没有总是守住“二人”的定义。这就如罗伯茨所说，废除“一男一女”的定义，其实是比废除“二人”的定义更难的和更荒唐的。如果更荒唐的、更本质的改变已经发生了，维护婚姻是“二人的结合”还有什么意义和可能性呢？

6

如果上帝和圣经却不存在，或并不真实，婚姻就不必是“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上帝和圣经是存在的或真实的，婚姻就不可能是两个同性之间的结合。不过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当多数派法官“随机的把‘二’这个数词加了进来”的时候，在这一数词所隐含的观念里，“同性婚姻”不过是对异性之间的、真正的婚姻的一种模仿。换句话说，正因为真正的“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同性婚姻”也必须是二人成为一体。不然就画虎

不成反类犬了。就像小孩子想穿爸爸的衣服，于是妈妈给他仿做了一件。但孩子叫嚷说，不对，爸爸的衬衣是五颗扣子，我只有三颗，爸爸的衣领是浆洗过的，我的领子是软软的。孩子的意思是说，他感到妈妈给他的，不是“爸爸的那种衬衣”。同样，如果美国最高法院把“二人的结合”也从婚姻的定义中同时去掉，反而会有人叫嚷说，不对，我想要的是和他们一样的，即传统的、真正的、有婚纱的和红地毯的那种“婚姻”。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当同性恋群体追求他们自己的所谓“婚姻”的权利时，他们所追求的仍然是由“一男一女的结合”所定义的婚姻。这和多数派法官的逻辑一样是很吊诡的。他们所主张的，明明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权利，但他们对自己的“权利”的描绘和所依据的蓝本，却是他们所反对的那种传统的“婚姻”的定义和样式。

7

这意味着，“同性婚姻”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孩子般的、过家家式的心愿，而这种心愿如果不受到伦理、信仰和对人类自发自由秩序的敬畏的约束，就成了撒野。必将摧毁整个社会的基本文明秩序。很多支持这种主张的人们，怀着一种真诚的、想要帮助同性恋者的愿望，但他们并不知道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婚姻必须是二人”。如果法律是由人类的欲望决定的。那么“二人的结合”这个婚姻“玩具”将很快就不能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对自由的定义。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往往不清楚自己在支持什

么，也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缺乏足够的敬畏。就像我用一个比喻说的，你不可能打开三峡的水闸，却只想洗一个脸。不冲毁一切，洪水不会罢休。然而我们知道，空中不会再次出现彩虹，而是出现那位驾云而来的大君王。但令我们无限安慰的是，在那之前，恩典的门仍然向着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们开放着，而忏悔和忧伤仍然具有惊人的价值。

2015 年 6 月 29 日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刘晓波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再说什么

高智晟也是我的朋友

虽然我们见面次数不多

许志永是我的朋友

他来过我家

又来教会听我讲道

陈云飞是我的朋友

他的女儿放假了

也习惯了爸爸不在家

刘贤斌是我的弟兄

他在里面给一个小偷传福音
我很久没见到他妻子了
李化平是我的弟兄
和我体重相若
当然我是指他入狱之前
唐荆陵是我的弟兄
第一次在广州见他
他穿着草鞋
陈卫也是我的弟兄
我们只吃过一顿饭
因为客气
他硬着头皮
也听我讲了一次道

李和平是一位好弟兄
前几年
每次出事我都找他
李方平也是好弟兄
和他一字之差
胡世根长老是好朋友
在北京见第一面
在成都见第二面
范亚峰是我的弟兄
也是我兄长

主曾叫我跪在他家的地板上
做了最后一次决志祷告

杨茂东也是我的朋友
虽然许多人认为
我是他的敌人
他的律师隋牧青来过教会两次
和我握了两次手
听说他被带走
我忽然感到手上热乎乎的

冉云飞是我的老朋友
浦志强也是我的朋友
一个朋友坐牢时
我和另一个朋友通电话
后来夏霖也坐牢了
我们喝过一次
当然我是以茶代酒
坐牢的人都惺惺相惜
所以朋友的朋友
也成了朋友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郭玉闪在我书房

谈过一个下午
笑蜀在我客厅
屁股没坐热就走了
王清营多年前来成都
敲过我的门
郑恩宠倒是一面都没见过
但他的夫人刚来过我家查经

谭作人是一个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在江边喝茶
他说
你多保重啊
千万不要进去
谁知进去的人是他
还有些人
必须先成为朋友
出来后才有机会认识
譬如师涛
譬如杨子立
还有些亲爱的朋友
只能在海外约
譬如去美国
约余杰弟兄
去香港

约滕彪兄弟

还有我的朋友李必丰

他居然托人

带了一张纸条出来给我

要我帮他儿子留在加拿大

别回来

还有我的弟兄王炳章

我和他的女儿一道

去华盛顿见过美国参议员

还有杨天水

还有许万平

还有黄琦

他妻子在教会受过洗

还有严文汉 / 进入链子门之前

他是秋雨之福教会的慕道友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北京最多

成都次之

广东第三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基本上都是男的
留下孤儿寡母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我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谈笑有囚徒
往来无鸿儒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我怕什么
如果上帝让我进去了
总有人说
王怡是我的朋友
王怡是我的弟兄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

我们要为他祷告
替他的妻儿分忧

2015 年 7 月 13 日，深夜，
想念朋友

| 2016

王明道在 1955

1

我把王明道 1955 年 6 月发表那篇最重要的文章——他在那年发表了三篇文章（有点像马丁路德在 1520 年发表三篇檄文，在某个意义上，历史学家认为，1520 才是改教运动的真正开始），其中最重要的这篇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以及他随后的被捕——视为中国家庭教会的诞生。

2

这篇长文，是中国教会在 20 世纪最杰出的护教辞。在第一个世纪，教会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涌现出许多护教士，也写了不少护教辞。王明道这篇文章，写得很清晰，既有神学上的意味，也有政治上的意味。他说，“我们相信圣经里面都是神的

话”，而且“没有一句是帝国主义的毒素和毒草”。那么，前半句是神学上的认信，我信圣经的权威和无误，这是我的生命之根。而后半句就是回应政治上的挑战。教会现在被说成西方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一个侵略工具，但我坚持说，不，它与帝国主义无关。我的信仰，不可能在共产党进城之后，变得和共产党进城之前有所不同。

3

王明道这样说，就等于拒绝了政治可以影响我的信仰。王明道是不谈政治的。在一切皆政治的时代，“不谈政治”是一个最强烈的政治立场，这个立场会把大多数人吓得半死。今天有很多教会说，我们要像王明道一样，坚决不谈政治。可他们有意无意地忘了一件事。在今天，不谈政治并没有任何政治风险，教会以为只要不谈及政治，我们就躲避了政教冲突。但在王明道那里，谈政治恰恰是没有政治风险的，坚决不谈政治才是反革命的标志。

4

王明道并不是代表了一个不谈论政治的教会传统，而是代表了一个“拒绝政治可以影响我的信仰”的教会传统。谈论或不谈论，目的都是为彰显信仰本身的超越性。这一教会传统，是在极权主义政治之下，见证和彰显信仰和教会的超越性的传统。

5

总之，在王明道那里，“政治不能影响宗教”，首先是一个宗教立场，而不是一个政治立场。但如果你活在埃及法老或尼布甲尼撒的统治下，却拒不承认政治有改变你的信仰的能力，你的宗教立场在他们眼里，就会变成一个政治立场。

6

所以我说，王明道这篇文章同时具有神学和政治上的双重含义。这就是“护教辞”的意义。先有护教辞，才有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是这一双重立场的产物，即当一个古老的认信在特定的政治历史处境下被宣告出来之后，教会就必须、也只能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7

西方差会在 1949 年以前，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他们与在中国本土教会之间的关系，包括教会治理结构及与西方母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教会跟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之间，这个更大范围内的政教模式和政教关系，那一代宣教士们并没有处理好。或者说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

8

因为有一些更大的社会背景和国际背景的约束。第一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整个西方教会内部的自由派神学运

动，对 1900 年后的来华宣教的负面影响。第二是 20 世纪上半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包括在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的兴起和膨胀。西方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到基督教文明的危机和衰落，因此他们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

9

于是，在 1949 年之前，中国教会已出现一种反对宣教士对教会的治理和掌控的运动，叫自立运动，或者也叫三自运动。最初提出“三自”概念的，是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倪维思。他认为差会要尽快帮助中国教会，实现经济上的自立，和堂会的自治。虽然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一个金钱、文化和社会各层面的落差。但差会的目的不是要填补这个落差。因此不应在经济上给予中国教会过多帮助。也不应将传扬福音和改变中国社会的目标，过于捆绑起来。这也就是说，宣教士来华的目的，是建立本地教会，使本地教会尽快独立，并把他们“托付给神恩惠的福音”。

10

这是合乎圣经的。但自养并不意味着否认彼此的经济帮助，因为保罗不断地鼓励那些稍微富有和平安的教会，甘心乐意地捐助那些贫穷或动荡的教会。而自传和自治也并不意味着对大公教会的教义权威的割裂，因为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是要传给

各地教会去遵行的。

11

按这个标准看，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宣教士来华一百年后，尚未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由本地牧师和长老治理的、自养的独立教会。1907 年的百年宣教大会上，提出这个议题，但动作太慢了。直到十几年后，圣灵亲自在东北和山东等地，引发了复兴运动。尤其在山东大复兴后，出现了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虽然有更多布道家来自福建。

12

这批本土传道人，不过十年之间，就基本上取代宣教士群体，拥有了在中国教会的属灵权柄。这样，自立教会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个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脱离西方差会和脱离主流宗派。在某个意义上，教会的这个潮流，和整个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潮流是一致的。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丁立美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会处，耶稣家庭，这些本土新宗派层出不穷，影响力日益增强。另外还有大宗派中的自立运动的联合，诚静怡是代表人物。到 1930 年代，“中华基督教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教会。差会和宣教士在整体上都不再是中国教会的主导力量。

13

同时，在这一自立运动中，浸信会的独立教会观（即任何一间堂会都是独立的，没有其他任何教会能够对她拥有属灵权柄），也取代长老会的联邦教会观（即任何一间堂会虽然是独立的，但在与其他堂会所组成的身体中需要承认盟约中的属灵权柄），而成为了中国自立教会的主流立场。因为浸信会的教会观，显然比长老会的教会观，更具有一种革命性，帮助中国教会脱离差会和宣教士的权柄。

14

王明道本人，不但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中国自立教会和本土奋兴布道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也从长老会背景转向浸信会传统，坚持认为基督是教会（一间堂会）的唯一元首。事实上，在 1955 年，他是以一间堂会的独立主权，去抗衡整个世俗国家的政治压力。这是很了不起的。

15

然而在总体上，大宗派趋向自由化，基要派趋向原子化，使中国教会在 1955 年出现整体性垮塌，超过半数以上的教会和信徒，在政权面前毫无抵挡之力，大面积地叛教、卖主和瓦解。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能设想一种相反的局面吗？如果

福音派趋向宗派化，自由派趋向原子化，政教关系的属灵决战，是否会有所不同？

2016 年 5 月 18 日

电影里的人生和信仰

CEF 秋令福音营系列之一

同学们，下午好。

我曾经出版了三本关于电影评论的书，在国内南方人物周刊上做了四年电影的专栏，我是希望通过基督教的信仰来看这些电影，因为在当代社会，影视是一种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文化手段。曾经一度在我看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到影视的力量，比语言的力量更强大。对文字有点丧失信心，觉得语言是没有办法像电影，用各样的艺术手段，比如图画、视觉、听觉来描绘那些画面，特别是在现代的好莱坞的电影，通过高科技可以描绘真实的世界，还能描绘各种假想的世界，只要你能够想到的，都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我后来开始意识到，上帝是用语言从无中创造了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并且上帝也使用语言作为启示他自己的最主要的方式，透过旧约和新约，透过

先知和使徒来记载他自己的话语。

你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上帝没有其它办法，没有电影，没有图片，所以上帝就给我们一本圣经，是用语言来写的，如果神今天要开口向我们说话的话，他应该是通过电影或者音乐。但实际上，在上帝的创造和向我们启示当中，文字都具有优先性。因为人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在人的里面，人有神的形象，特别是表达他有一个理性的灵魂，可以对是非对错进行思考、感受，而这里面最重要的媒介就是文字，就是语言，你是通过语言来思想和认识这个世界的。所以实际上，所有的视觉和听觉，能够激起你的感受，给你一幅图画。可是，这一幅图画，这一个故事，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永远都是要透过你的思想当中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和思考。

实际上，在所有的艺术手段里面，还有所有的人，所具有上帝的形象的这种理性灵魂的思考和感受的这个媒介和工具里面，文字语言都具有优先性。因为信靠上帝的话语，所以我慢慢恢复了对语言文字的信心。电影跟其他的艺术一样，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电影都是讲故事的，所有的故事最终都是通过图画、影像、镜头，把它呈现出来的。可是这个故事对你有意义，甚至影响到了你的未来和你整个的生活，一定是能透过语言文字将这个故事背后，真正要表达的意义和精神，把它揭示、归纳出来。

因此我要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每一部电影，实

际上都带着他自己认识人生和这个世界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是一种世界观。而基督教的世界观，跟非基督教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差异，其实只有那么几种。比如，你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和创造，和你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和创造，那么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感受，甚至是对一个故事的描绘就会不一样。我这个人相信有神秘的力量，好多好莱坞的大片里面都有超自然的力量，不过我只是不太确定，只是不太相信圣经所描绘的那一位独一的上帝，上帝一定是圣经中所讲的这位上帝吗？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是相信有神明的，或者我相信上天，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我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世界观。

所以，特别是美国好莱坞所代表的电影工业，基本上都有对电影的分类，就是一种类型片。大部分的电影，都是有类型片结构的，只有极少数的一些电影，想突破类型片做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这个比较危险。所以类型片实际上就是它的价值系统是相当稳定的。当编剧来编这个故事，当导演来呈现这一个作品的时候，你不要期待能够给你一种相当不同的，对你已有的思想，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的了解产生颠覆性的作用，让你产生颠覆，因为它有一种很稳定的价值观。类型片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筛选市场，电影拍摄的时候，你决定要去消费的时候，你决定要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已经对市场，或者对观众做了一次区分。所以当你决定要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了要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去接受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观，

知道它大概的套路是什么。

然后，我要讲的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电影，都是由那么几类的类型片所构成的。而这些类型片的背后，实际上都是有一些非常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模型。因此，当我们去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学会去分辨这一种价值观的模型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只是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实际上，人家在拍的时候，就已经有市场的细分了，他知道你希望在文化、情感上想得到哪一个方面的满足。

实际上基督徒是会将这个世俗的电影背后的价值观，来跟基督教的信仰做比较，带来一个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所以对我来讲，电影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比较的价值观或者评论，我们要去识别在不同的电影的背后的价值观。电影在当代的文化场景当中扮演了类似于宗教的角色，特别是好莱坞的电影。在很多年前，有学者就讲，好莱坞的电影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类似于大概在 200 年前，在新英格兰地区，那些新教徒的后裔，那些在美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当中。每周的礼拜天去教堂参加崇拜，听一篇讲道，所带给他们的功能。

其实今天电影院是一个教堂，对很多的美国人来讲，每周去看了一部电影之后，从电影院里面走出来，走到外面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会告诉自己，我应该再活一个星期，生命还是值得过的。每一部电影实际上都是向着这个世界的一篇讲道，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美国社会里面，电影扮演着

一种取代基督教宗教的信仰，带着类似的一种宗教的功能。告诉你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告诉你你生命当中的问题是什么，然后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在这部影片当中一定有一个危机，这是美国电影非常类型化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在科幻片里面，还是在家庭片当中，都会进入到一个危机，没有危机就没有电影。电影会告诉你，里面的主人公面对危机，他是怎么来解决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它克服而使得人生可以继续的，可以使一些被打乱的，已经被破坏的东西在这部电影的最后恢复次序。

就好像今天上午我讲到，有点类似于创世的那样的一个角色，你的生活，还有这部电影当中一开始出现的一种危机，就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然后他是要给你一个故事，无论他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其实都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重新让空虚产生内容，让混沌产生秩序。这是今天绝大多数的商业影片，所具有的这种类型化的，带着稳定的价值观，带着一种电影的类型化的特点。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在前段时间看到斯皮尔伯格，但他现在已经不是第一线的导演了，年龄很大了。应该是在今年，哈佛请他作为嘉宾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他是用电影来做一个比喻，他讲了自己的生命成长，是怎么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演，但这个别人评价他的。但是皮尔伯格的确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导演。如果是有一个票房总量的统计，据说斯皮尔伯格是人类历

史上票房总价值最高的一位导演，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那么他在里面，讲到电影其中的一个环节，他说，在所有的好莱坞的电影当中，情节的推动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称之为角色定义的时刻。有一些的影片里面，主人公一定会有一种身份的危机，他不知道他是谁，或者说他本来知道他是谁，但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现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会经历到外面发生的故事，其实都是一个诱因。我们永远关注的都是人，电影也是一样，会让这个人进入到一个身份的危机当中，就是他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做了什么来证明我是谁呢？现在电影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危机，他无法证明他是谁了，然后慢慢随着影片的展开，斯皮尔伯格说，我们在电影当中都会设计，不只是一个，有可能是几个，可能是慢慢推进的，就叫做角色定义的时刻。

对于这一个主角来讲，他开始慢慢在角色定义的时刻，知道自己是谁。对一部电影来讲，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不是后面所发生的事。当他一旦知道自己是谁了，比如蜘蛛侠，他开始意识到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拥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能力，这种东西首先给他带来身份的混乱。这种混乱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好的，可能被视为一个怪物，并没有成为一个英雄，他并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所以最关键的不是他后面要做的那些事情，而是他到底怎么认识他是谁。这样子就会有几个角色定义的时刻，他开始慢慢意识到他是谁，开始从这一种跟别人不同

的状况里面，给自己定义一个身份，通过他所做的事来定义他是谁，最后，他要在所拥有的超能力当中，建立一个稳定的价值观。

在蜘蛛侠或者蝙蝠侠的系列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被带进来，叫做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当你拥有一种超能力的时候，不是让你在不同的房子之间飞来飞去，非常好玩。而是当什么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你的责任。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抗拒这个责任，抗拒一种呼召，抗拒一种身份，抗拒他们的独特性或者他们的危机所带给他们的一种对人生的使命。随着角色定义的到来，这种使命和身份，慢慢会确定下来。当确定下来之后，后面的故事就很简单了，开始去拯救地球，进入高潮部分。

但是，斯皮尔伯格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那些怎么去解决危机的故事，而是角色定义的时刻。因此，他就对着那些要毕业的，这些哈佛的年轻人说，人生也是一样的，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时刻是非常重要的，叫做角色定义的时刻。开始使你重新认识你到底是谁，开始使你产生对原来的自我认知，突然出现一种怀疑、困惑和危机。然后，你会重新将自己的身份稳定下来，开始去接受或者寻求你生命中的人生的使命和你的职能。用基督教的话来讲，你会去寻求那一个呼召，特别是在大部分的美国的这种超人电影当中。这是一种后基督教时代的文化，跟所有中国电影是不一样的，不相信一位绝对上帝的存在。

无论是美国队长还是 X 战警，他们的宇宙当中并没有一位有位格的、独一的、全能的和圣洁公义的上帝，但是一定有一种天命的观念。当说到角色定义时刻的时候，在美国的电影所呈现的价值观里面，绝对不会有这样一种角色定义的压力，或者虽然有，但是一定会突破。比如你是张家的孩子还是李家的孩子，是由你的祖先、传统文化、血源，来定义你的角色。这在中国的文化和电影中，你会看到背后有这个东西，美国电影中基本没有，因为美国是个人主义的文化。

所找到的角色定义的时刻是在童年的经历。实际上这个是西方古典文学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童年的经历，然后带出来自己身份的认知，对自己生命当中缺位的那位父亲的寻求，这个是西方文化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母题。而在一种典型的基督教的文化当中，这种缺席的父亲的角色的寻求，一定会最后指向上帝，就是那一位真正的父亲，那一位在天上的父亲，那一位作为你生命当中，和这个世界绝对主宰者的父亲。

在今天美国的好莱坞文化当中，不会最后指向那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但是他的世界观一定是超自然的。这是大部分的美国商业电影背后的价值观。所以在他的角色定义时刻里面，一定是有某一种天命的观念，就是一个呼召。其实中国人有的时候也会这么说，但是没有那种很强烈的价值观的背景，好像上天就是要我去做这件事，好像我这辈子活着，我的使命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好像我这一生的命运就是无法摆脱的。

在美国这种后基督教的文化当中，这种角色定义时刻是非常明显的。在一种后基督教时代的一种天命观，来寻找生命成长，个人成长的一个角色定义时刻，而这个是最典型的美国梦的表达，最典型的一种个人主义的美国梦的表达。我讲到这里是开场白，接下来会看几部电影，介绍其中四种的人生和信仰。

一、无常的人生

第一种是无常的，这在中国电影当中会看的比较多，在美国电影当中，即使有困惑，最后一定会回到一个重新被稳定下来的身份认知，而且绝大部分不会直接指向基督教信仰，但是都带有后基督教文化的特征。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佛教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就是一种人生的无常，是大部分电影作品背后一个很典型的价值观。比如余华的一部小说《活着》，后来张艺谋把它拍成了电影。里面讲到一个人，在过去 100 年，就是中国这 100 年的苦难。从清朝末年一直到民国时代，49 年以后，最后到文革的灾难。

在我们每一个家族里面，其实我们的长辈都有过那样的一生，他们都有故事。如果他是 1900 年出生，一直到 1970 年以后离世，那么从 1900 年到 1970 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好多苦难，变了好几个国家和政权。所以基本上十年整个社会就会天翻地覆一次，人的寿命只有 70 年。在这么一个天翻地覆当中，你一定会产生出无常的这种感受。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不

像在今天的美国，虽然我是要努力，但是我都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基本上不太担心美国社会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真不知道中国再过十年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中国过去这 100 年当中，让我这样说，基本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带着非常强烈的时代的烙印。在每一个时代的人，其实都是提心吊胆的活着，因为中国古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在过去这 100 年加快了，基本上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人生的后二十年。整个中国就没有人知道它会往哪个地方去，像一辆列车，速度很快，经济增长率很高。像前两年有人在网上讲一段话，中国像一架高速行驶的动车，但是应该慢一点。所以，无常是在中国过去 100 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于是，余华在小说里面，表达出这样一种无常的价值观，活着这句话好像就说明了一切，不要去问活着有什么意义，因为活着根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件事情。只要活着就好，好死不如赖活着。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在传统的社会当中，所奉行的一种生存的哲学，在这个小说当中被表达出来。他并不是在写一个波澜壮阔的、六七十年的中国，好像史诗一样的社会的变迁，而是用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来描绘他所经历到的所有的社会变迁。但是在这所有的社会变迁当中，他为什么活了下来呢？实际上是因为他麻木，还有人生当中所充满的无法被控

制的偶然的因素，所以稀里糊涂的就活下来了。最后，这部电影当中的主人公，他一直活到文革结束以后，他就是浑浑噩噩的活着。

以前苏东坡有一句很著名的诗，他自己做了官，然后又被贬，“但愿生儿钝且鲁，无病无灾到公卿”。他希望生一个儿子，比较笨，比较麻木，又比较迟钝，无论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他都傻乎乎的活着，不要像我这么聪明，不要像我这么痛苦。这是他对儿子的梦想。其实《活着》也是想表达这种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我讲一个情节，特别有意思。

这个主人公本来是一个地主，他是个败家子，家里面其实很有家产，但是他迷上了赌博。一直到 1949 年，共产党进城之前的几个月，终于在一次赌博当中，把家里最后一块田输掉了。对中国人来讲，祖屋是要留着的，可是他把那套祖屋输给了一个破落户，本来是个无产阶级，把他的这个家全部赢过去了。可是，当这一切发生了之后，共产党就进城了，进城之后就开始土改。他输了所有家产给那个人的被抓起来了，被当作地主，当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后他就在下面看着，那个人在人群当中，两个人四目相对，那个人的眼睛里面，散发出怨恨，才赢了房子两个月，那种无辜，那种命运的无常，然后他就在下面躲闪，赶紧跑掉，躲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在一棵大树旁边撒尿，听到六声枪响，吓得尿在裤子上面，然后提着裤子，一路就跑回家。他妻子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打了六

枪，我要是不把家里的东西输完，今天打的就是我。

在中国这几十年的苦难当中，似乎是以一种很荒诞的命运，很偶然的机遇，就这么活下来了，而这个作品想表达的似乎就是这样的一种命运，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历史也是充满了太多的偶然。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当中，是没有这种自我实现的，没有这一种强大的美国梦的个人精神的，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面对的都是无常的，你完全无法把握的社会命运，所以能活着就好了，活着就是你最基本的一个寻求。很多中国的影片的背后，其实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无常的思想，他相信宇宙是没有普遍真理的，人生是没有终极意义的，道德也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并不相信一位至高独一的上帝，我们也不相信这一位独一的上帝，是有一个绝对的道德的，美善的，圣洁的，公义的标准。当然也不相信历史是掌握在他的手上，在我人生这些很荒唐的机遇当中，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旨意，他掌管着所有的事。圣经里面所讲的另一种价值观，对于中国人来讲是陌生的，就是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基督徒常常讲的一句话：所有的苦难都是化妆的祝福。路易斯讲的一句话，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上帝透过你生命当中的苦难和痛苦，向你大声说话。你在顺利的时候，神的声音在你的声音当中，太微小了，你听不见。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大了，你内心的那一个自我中心的声音太大了。所以路易斯说，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上帝借着苦难，大声对你说话，你看见了你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你对这个世界还不死心吗？

所以在基督教当中，我们相信，所有的历史掌握在那位上帝的手中。在表面上的荒唐、苦难和偶然的背后是有一个必然，而且那个必然是充满了慈爱的一位上帝，因为他要使人类的历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朝向他所指的方向。他要使他所爱的人去走一条，他自己不知道前面会如何的道路，但是在这一位上帝的手中。好像亚伯拉罕蒙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希伯来书里面说，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更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有一点对他来讲是确定的，在无常的人生当中，是有一个确定的方向的，就是他要去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

可是，神所指示他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并不知道，生命中的一个确定性，是他要去往耶和華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也要走一条耶和華上帝所指示他的一条的道路，虽然他并不知道明天如何。很多的基督徒喜欢唱一首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着我的手”。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是没有的。那么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相信背后的那位上帝，你的人生真的是无常。

经过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迁的人，你不可能不相信你的人生是无常的。你不可能还以为你是可以抓住你的人生的，因为有太多的苦难，有太多的偶然。甚至好像 20 世纪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社会，存在主义哲学兴起的时候，他们从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废墟当中，他们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

的时候，最深的一种哲学的思考就是他们重新看到了这个无常。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主义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跟中国古老的佛、禅和道的智慧是比较类似的，因为他们看见了人生中的荒谬，整个世界历史的荒谬。在刚刚进入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时候，卡福卡就已经听到了现代火车的那种轰鸣声，他要压碎一切。所以他在变形记当中，就已经描绘了这种荒谬感，就是人在这种现代的社会会被异化，他会活在一种荒谬的人生里面，甚至最后他会失去人的自我的认知。最后就像变形记里面一样，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这个小说实在有点像一个先知的预言，预言了整个人类 20 世纪所有的苦难，因为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整个西方社会都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黄金时代。我们的科技已经很进步了，环球旅行已经不再是问题，甚至人开始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可以掌握这个自然界的力量了，这是 19 世纪末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的普遍的心理。

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了整个西方一个新的废墟。所以就开始认识到人生的荒谬，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又远离基督教信仰，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主义的荒谬。可是经过像美国的婴儿潮的一代，然后到了互联网的这一代。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历史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从来没有人会真的吸取历史的教训，所以 21 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几乎跟 20 世纪初的欧美差不多，因为随着智能手机、电脑技术的发展，几乎人类的科

技进步，跟社会的变迁，又来到了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和给我们的一个无限前景的空间。人类几乎是像 20 世纪初一样，开始对人性本身，对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本身，又有了很大的一个自信心。而且这种自信心，对于美国来讲，也是建立在已经开始远离基督教信仰，不需要有一位绝对掌控一切的上帝，我自己可以掌控。

但是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恐怖主义的兴起，对欧美世界人性的自信，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的自信的力量拆毁与打击，我们不愿意看见他继续膨胀，但是目前看上去似乎还会继续膨胀。但是也许有一件事情是好的，那就是上帝总是使用痛苦、灾难来作为他的扩音器。当人类每一次忘记了之前的苦难，再一次走向骄傲，再一次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让人类再一次经历到无常的人生，再一次经历到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这种的灾难，我们希望人们能够悔改归向上帝。

周星驰拍的美人鱼，开始的时候我倒是很想去看一看，我们知道这个是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童话是非常典型的，他的背后都有非常强的宗教信仰的特征。可是我很失望，因为他实际上是把美人鱼变成了一个环保主义的童话。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美人鱼的，后来有了美人鱼。但是这个美人鱼已经不再是安徒生童话中的美人鱼了，而是现代进化论和环保主义下面的一种美人鱼。美人鱼是猿猴变的，因为猿猴变成了人，这就是进化论。但是变成人的时候，有两类，一类

在陆地上，变成我们现在陆地上的陆人；还有一类，他们都跑到海里去了，这就是所谓的美人鱼。

所以看到那里的时候，当我知道美人鱼是猿猴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值得过了，太没意思了，因为他实际上否认了一切的童话。今天中国很多的电影在学西方的电影，在技术上学美国的那种魔幻大片，但是美国很多的电影的背后是有超自然的世界观的。在中国社会，第一，超自然的世界观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说不定不能够通过电影局的审核。第二，缺乏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基础，所以实际上，无常的人生又开始慢慢变成一种唯物主义，把一切的魔幻，把一切的童话都来做唯物主义的改编。近年来一些华语电影当中，其实非常让我觉得沮丧。你以为他在写一个神话，其实到最后他会给你一个科学主义的解释；你以为他在写一个童话，其实到最后，他会摧毁这个童话，给你一个唯物主义的解释方式。

二、偶像的人生

第二种叫做偶像的人生。中国经历了自我的崇拜，对领袖的崇拜，对国家的崇拜。今天在中国大部分的电影当中，以前有这种主旋律的电影。里面有领袖的，个人的国家的崇拜，现在的大部分商业电影当中不再有这些了，但是呢，其实他们只是置换了一种方式。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会这样讲，没有人是不崇拜的，崇拜是上帝放在每个人内心当中，最深的灵

魂当中的需要和满足，不单单是感情的需要，不单单是我想有个家，是我的生命中一定需要崇拜，我需要有一个高于我的，把我自己交给他的那位，要么是上帝，要么是偶像。

所以，没有人是不拜偶像的，要么是相信独一的那一位真神，要么在他的生命中有各种的偶像。也就是在你生命中一定有谁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在中国古代，是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我们的上一代，你们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像我的父母这一代，他们是毛主席万岁。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什么万岁呢？在我们四川，很多人会说老婆万岁。但是对很多的人来讲，实际上是金钱万岁。到最后是市场万岁。你需要永恒，你需要不朽。

实际上对领袖的、国家的崇拜开始在中国社会转成什么呢？第一，对民主文化的崇拜，今天中国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有的，在网上有很多人讲五毛，或者讲毛粉，还是有很多的人有传统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崇拜。但是更多的人在中国有一种很强大的价值观，就是民族主义情节。有那么多的人起来反美反日，但是你知道他们没有人是真正在反美的，因为反美的人后来都到美国留学来了。游行的时候都去参加了游行的，考研的时候都还是考到美国来了。包括很多人在网上揭露那些反美的官员们，我们的外交部长，他们一方面反美，另一方面，他们的孩子都在这边读书，可能就是你们的同学。

就像在今天的中国，有一种虚假，但是总是会激起民主文

化的崇拜。这个只不过是原来的毛主席万岁，在今天的一个转向而已，当然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不在乎中国崛起和民主主义。我的崇拜很单纯就是指向市场上的一个明星，家里挂着的就是那个明星的照片。我就是专门跑到上海或北京，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今天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崇拜开始放在社会当中的一些成功的人士身上，放在名人的身上，放在明星的身上，包括在大学当中。

我之前在大学教了 12 年的书，在做牧师之前，如果请一个学者来作一个讲座。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人来，但是如果来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作一个讲座，人山人海。有一次北大教授钱理群，来作一个关于鲁迅的讲座，讲完了有一个同学就站起来说，钱老师，请问你今天这个讲座跟我们将来找工作有什么关系？钱教授就想了一下说，真的没有什么关系，你其实可以不来听的，不过还是有关系，我的这个讲座听多了，可能将来找工作会更不好找。

其实信仰不是要有助于你找工作，真的信仰可能会增加你找工作的难处。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你如果认真坐下来要想一些东西，人到底是什么？人的一生到底意义是什么？人死就如灯灭吗？我能够确定我活到 80 岁吗？我到底在追求什么？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赛跑？你就会发现，这严重影响你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甚至会让你不容易找到工作，因为他让你痛苦。为什么要读大学？读大学是为了找工作；为什么要考研？

推迟就业，为了更好的找工作。但是大学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吗？其实不是为了找工作。在欧洲中世纪出现大学，大学是跟职业教育直接相反的一种教育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的目的是要掌握一门技艺，然后去工作的话，那个叫做接受职业训练，而不是上大学。上大学主要是针对那些将来毕业后不需要找工作的人，就是贵族，他们不需要找工作，所以他们去上大学。他们上大学干什么呢？思想人为什么活着，思想哲学的问题，信仰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上帝是谁，我又是谁，什么是死亡？

所以在英国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私立教会学校，叫做伊顿公学。今天在中国也开始办了，但伊顿公学现在已经变得很世俗化了，但是在以前是英国最古老的培养贵族跟统治者的一个学校，接受很好的信仰的训练。有一家人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伊顿公学来，伊顿公学的校长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个家长就天天催着他问，校长，你到底要培养我们家的亨利，将来要做什么呢？他从来对那些愚蠢的家长，回答问题总是不客气的。然后那个妈妈就说，你当然将来要培养我们家亨利成为一个商人，校长说不是。你要培养我们亨利将来从政吗？不是。你将来要培养我们的亨利做律师吗？不是。然后妈妈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回答我，你们学校到底要培养我们家的亨利将来做什么。他就笑着说，太太，只用一句话，我们主要是教他如何思想死亡。这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有没有读大学，你都会知道 18 岁的时候，青春的时候，你总是会思想这些问题，人活着是为什么。但是在今天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已经不再思想这个问题了。大学是你一生当中最应该来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来思想的话，基本上以后就没有时间来思想了，你马上就会跟着这个世界的轨道和游戏走，如果你将来不太顺利，我觉得还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将来很顺利的话，你随着这个世界上上了他的轨道，一直到 45 岁才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然后你重新来回想，我这 20 多年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我盼望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来思想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有思想清楚，我盼望你们出去工作之后不要那么顺利，不要那么快找到工作，不要那么快升职，不要那么快赚钱。因为那样子，你有可能要等到五六十岁再重新来思想，看见你所走过的这一条路的虚空。所以在今天最重要的是对个人的崇拜，对自己或者是对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的崇拜。

三、如梦的人生

第三种如梦的人生，梦幻的一种人生，这是佛家的一种观念。就像我们讲的虚幻，“一切有为法，如幻影泡沫”。

美国大概在 20 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偷天情缘》，也叫《土巴鼠日》。有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个节日叫土

巴鼠日，那天都会庆祝，有一个记者到那个镇上去采访，当天正好是土巴鼠日。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忽然沦陷在那一天当中，每天早晨起来都是土巴鼠日，他永远都在那一天。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走不出来，就好像被关在这一天里面了。那么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去思想人生的意义。他想尽各种办法要摆脱这一天，比如到了晚上，就爬上 20 楼，然后从上面跳下去，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在床上。他又开车去撞车，被关在监狱当中，第二天起来还是在床上。他永远都无法脱离这一天，但他忽然慢慢想清楚了一件事，如果没有明天，如果明天还是今天，实际上在一个终极的意义上讲，你没有明天，因为你的明天只不过是今天的重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因为你做事情是没有后果的。他一开始很烦恼，但是后来想明白了，这真是一种自由的人生，意味着我今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没有后果，第二天起来就会重新开始。

但是他慢慢又发现，这是一种他想要的自由吗？他觉得这种生活没意思。他又开始决定要做个好人，因为永远都是在那一天，所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全都知道。他到餐馆里面去，他知道五秒以后那个服务生东西会掉在地上。他赶紧抓住时间，马上跑到一棵树下，等到一分钟之后，那个小孩会掉下来。然后赶紧又跑到公路上去，待会车子可能会相撞。他像蜘蛛侠一样，在他永远都在的那一天当中，开始做一个好人。他谈恋爱的时候很有意思，今天遇到一个女孩子，问她喜欢什么，第二

天是同样的一天，他告诉她，我特别喜欢某个东西，那个女孩子说我也喜欢这个。她喜欢什么音乐他就去学，过了两个月之后，还是同一天，他告诉那女孩，我很喜欢那首歌，那个女孩子说我也很喜欢。

《夏洛特烦恼》也表达了这个，很有意思。有一个人一事无成，毕业十年了，他很喜欢原来班上一个最漂亮的女生，但是她没有跟他结婚。他却跟班上的另外一个女生，他并不喜欢她，那女生很喜欢他，所以他后来跟她结婚了。他最喜欢的那个女生要结婚了，他就想到她的婚礼上去大闹。他就租了一辆车和一套衣服，结果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的妻子却跑来了，这婚礼上一团糟。他忽然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又真的不像是梦，他回到了 1997 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年，他刚刚上高中，那时候他 17 岁。他发现他在那个地方可以重新开始，这一次要追求那个女孩子。他很喜欢音乐，忽然发现原来汪峰、周杰伦这些人都还没有出来，所以他就开始写他们的歌，成为超级明星，然后又娶了他最喜欢的这个女孩，最后功成名就，挣了几个亿。

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在网上关注王宝强的离婚案。这个电影是去年拍的，但是基本上跟王宝强的剧情一模一样。他发现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助手，跟他的妻子发生了婚外恋，他决定退出歌坛。他又去找他原来的这个妻子，他开始怂恿他们班上另外一个人去追自己的老婆，这样他好去追另外一个人，但现在他却去找这个同学告诉他，我把一切都给你，你能不能把

她还给我。他忽然发现，他想重新去生活。最后他终于从那个沦陷的时候出来了，忽然发现他的妻子才是最好的，这个是一种如梦的人生。

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传统里面有很多。比如黄粱一梦的故事，甚至包括红楼梦。红楼梦不是说你在做梦，红楼梦是说你的人生的实际上就如同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天，今天就是不值得过的。如果没有明天，连今天也没有意义，这就是梦幻如梦的人生所要告诉你的。你不能够单的说我要抓住今天，不关心明天。今天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的一句话：我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但是圣经要告诉你的就是，如果没有天长地久，你根本就没有拥有过，连曾经拥有也是梦幻。实际上是虚空的虚空，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如果这 70 年或 80 年的人生是今天的话，有没有明天呢？死亡之后有没有明天呢？如果没有永生，如果死亡之后，人的生命灵魂，他所热爱的一切，或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消失毁灭，那么今天也是不值得过的。这就是圣经对这种如梦的人生，对这种不相信在死亡之后的永远的生命，或者是永远的苦难的这样的人生的一个彻底的否定。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明天今天就没有意义；没有永远，连曾经都没有意义。很多的人说，至少我曾经爱过。我就告诉他，你从来就没有爱过，如果你现在失去了这个爱，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曾经想去爱，但是你没有爱，你没有拥有过。

我以前常常讲一句话，在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堕落的一句台词：我那一段感情。只有香肠才是一段一段的，爱绝对不是一段一段的，爱要么是一生一世的，爱要么是直到永远的，爱要么是永无止息的，要么爱连一天都没有存在过。你只不过是在梦里，你只不过是梦醒了，你的人生只不过是虚空。你不可能靠过去的回忆活着，你不能够假装骗自己，我曾经拥有爱情。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拥有爱情，因为一开始你们就活在谎言里面。你们曾经说过山盟海事，现在却分开了。所以从你们说山盟海事的那一刻起，你们的人生就是虚幻，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而这样的一生真是没有意义。但是那样的爱是存在的吗？那样的爱是真实的吗？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刘德华唱的一首歌《老天爱笨小孩》。但是，对我来讲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老天真的爱笨小孩吗？老天真的爱失败的人吗？老天真的爱软弱的人吗？真的爱有罪的人吗？如果这是真的，那多么好，好到我无法去相信，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跟我做了什么，成功或者是失败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不是真的，只不过是一种梦想，如果基督教所讲的这一切只不过听上去都挺好，但是我并不相信是真的，那么你就活在你的不相信当中，而你的不相信其实就是虚空，就是束缚，就是地狱。

在美国今天的大部分电影当中，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二元论的世界观。什么叫做二元论呢？就是善恶相争，中国传统叫阴

阳，在希腊的文明里面，叫善跟恶二元的相争。他们并不相信一位掌管一切的上帝，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甚至有善神和恶神。你会看到美国这些年大多数的超人，漫威动画里面的人物，基本上都是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这是希腊的思想，后来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称之为洛斯蒂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宇宙观，不是唯物主义的。相信有隐秘的力量，却不属于这一位独一的上帝，而属于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这是典型的希腊思想，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善和恶之间相争，但是善恶最终如何并不知道，要靠这个英雄自己的努力。美国今天的文化越来越是这样的一种二元主义下的英雄的文化，美国梦被集中的表达为，就是你要成为蜘蛛侠，你要成为钢铁侠。美国社会当中那些边缘人士，那些原本被歧视的人士，现在都被表达为 x 战警、变种人，他们的权利需要被尊重。他们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本来是歧视，但是现在是他们身份和能力的象征，是这个社会的多元的一种象征。

其实所有的这些漫画故事，都是在表达美国社会这些年来的一种思想的变迁，实际上这种洛斯蒂主义，就是相信物质世界是暂时的，但是有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善跟恶是二元对立和相争的，人就是要努力做一个好人，要努力实现自我，使善的那一面能够胜过恶的那一面。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其实不是相信基督教的，而是相信这样的一种宗教，当然这个比中国好，今天中国人连这个宗教都不相信。因为他们完全没底线了，连

最基本的善都已经不相信了。

今天最典型的不相信耶稣的美国人，主要集中在加州地区、好莱坞、纽约、曼哈顿，还有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里面，他们代表着美国社会的这种最典型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好人，有修养，有知识，有道德，也希望能够向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个好人，就像我上午提到大兵瑞恩一样。他们最后是用我是一个好人来自义，来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被拯救的人。有人做过调查，今天很多的美国人，他们从小其实是在基督教文明的一种文化影响下长大的，但是他们并不接受那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大部分的人会认为，我相信有一位上帝的存在，我将来会上天堂。我是一个好人，我在努力的生活，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这是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种道德主义的二元主义，这种宗教在本质上是道德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而这种基本上是美国今天非常强的一种世俗的精神，集中体现在美国的这些电影当中。最早的是从星球大战开始，在 70 年代末星球大战的时候。星球大战是科幻片，但是你注意到，星球大战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并不是科学主义，而是他的神秘主义的世界观。星球大战里面最厉害的，不是科学技术所生产出来的武器，而是绝地武士。他们很像日本的忍者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或武术大师。他们相信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种神秘的原力，是超乎科技之上的，不是通过科学技术和试验获得的，而是人在他的心灵

当中来获得的，而这样的人只有极少数。而这极少数的人成为绝地武士，他们有点像星球大战里面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也比较像他们那个世界当中的先知、使徒和守护神。

在现代的话，绝地武士就是被复仇者联盟当中的那些超人所代表，他们的背后都是相信宇宙当中有神秘的原力，而那个原力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所以，星球大战是一个人性的英雄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悲剧。阿纳金拥有这个力量，成为最优秀的绝地武士，但是他受到原力黑暗那一面的影响，最后变成黑武士，走到黑暗邪恶的那一面。可是到最后的时候，跟他的孩子之间的那种人里面最深的一种爱的情感，使他在毁灭的时候，似乎开始觉醒，似乎又开始走到善的那一面，所以善恶之间是会摇摆的。

人生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去做一个道德主义的英雄，就是去克服你生命当中的恶的那一面，去做一个美善的人，这是美国电影所表达出来的一种道德主义的立场。美国电影从来不会旗帜宣明的宣扬很恶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道德主义的，一定会带领你走一种英雄主义的道路，所以看了一部电影之后，你会觉得还可以再活一个星期。在 60 年代、70 年代出现这个系列，实际上是对那个时候美国的文化，就是一种反基督教的，开始追求人的权利，民权运动之后，这样一种道德主义的文化的很典型的反应。所以当超人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海报，那个超人的斗篷，就被画成是耶稣的形象。

实际上，最新一集的这个超人，很多人说他表达了耶稣救赎的故事，甚至在美国有很多教会，推荐鼓励弟兄姐妹们去看那个。耶稣变成了一个高科技的耶稣，他是一个外星人，他是比我们更高的，然后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他为我们死，甚至受到整个世界的误解。外星上来的人就是撒旦，另外一派的人，他们说，你们把他交出来，结果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类，居然把拯救他们，一直在保护他们的这个超人交出去了。这一幕像不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因为不再是一个上帝替代我们流血，来拯救我们的代赎的故事，是一个用武力，用道德的努力来感动我们的宗教。

所以在今天的美国，你很难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把这两个宗教分清楚。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是也相信超自然存在的道德主义的宗教。这两个很容易混在一起。而今天很多的美国人，实际上不是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信的是那一个道德主义的宗教，在大部分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当中表达出来的，有超自然背景的道德主义宗教，实际上是科学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一种结合。

所以在今天有一种很重要的运动，就是新纪元运动，美国好莱坞受到新纪元运动很大的影响，大部分美国科幻电影的背后，其实都是新纪元运动思想的一个影响，多过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最后一种是讲到有使命的人生，就是用魔戒和纳尼亚来做分解，但是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世界是因你的话语而有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没有任凭人类沉沦在自己的堕落、孤芳自赏、自我的满足和自我中心里，你舍弃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主啊，这个世界有各种版本的福音，这个世界的每一种的故事，甚至每一种电影的类型片，都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福音，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出了问题，都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给了我们重新来定义我们是谁的一个身份认知的时刻，最后也给了有勇气继续活下去的结局。

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分辨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在这一切故事的背后，反映了信仰当中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在寻求的。在他们给我们的答案里面又彰显出来，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截然相反的那个部分。求你使我们能够用基督教的信仰，能够用整全的世界观去学习反思，并批判今天这个世俗社会当中一切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向你有一个祷告，求你不要任凭这个世界向我们传福音，而是要让我们向这个世界传福音。主啊，因为我们常常向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比重是很小的，但是这个世界却用扩音器和很复杂的声音，不断向我们传福音，以至于使你的教会远离了你的道，使你的儿女们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却远离了你的道。我们里面更多的是受世俗文化的影响，胜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胜过圣经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的帮助和怜

悯。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谢谢大家。

2016 年 9 月 26 日

| 2017

何时反抗？何时顺服？

“黑暗不能胜过光” 马太福音证道系列之四十五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我听到一个美国的牧师讲的教会的一件事。他说，美国的教会，外边都有很大的停车场，所以车位很重要。离得最近的那些车位呢，都是留给访客的。会友们呢，都要把车子开到最里面去，出来要走最远的路。所以他说，在一些教会当中就有一些常客，一些受洗的信徒，为了少走路，就迟迟不加入教会成为会友，这样就可以享受访客的待遇，就一直可以把车停在外边比较近的地方。因为一旦成为教会的成员，就只剩下责任

了。我想这是现代人很常见的一种心态了。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当中，首先，我们不是要他们尽责任，他们是享受权利。但是基督徒呢？作为教会的成员，却是首先要看到责任，而不是看到自己的权利。这与现代的文化呢，其实是蛮相反的。

一、基督是掌管一切却甘心放权力力的君王

我今天要讲两点，第一，耶稣是知道一切并且掌管一切的君王；第二，耶稣是倒空一切，放权力力的君王。前后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里，彰显了耶稣不可思议的大能力，就是再一次彰显，好像他曾经可以斥退风浪，那么他也可以赶出鬼来。他面对这一个他所创造的世界万物，甚至包括灵界，他都具有这个能力。他说一就一，他说二就二；他说是就是，他说不是就不是。万物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但是，后面的这一个故事呢？就是人家要来收这个丁税了，或者叫殿税，我们却看见彰显的是耶稣如何放弃他的权利。头一个故事，看起来主很威风，他的门徒都不能够赶出这个鬼来，那他说，你们若有信心，连大山都可以挪移。如果说前面的这个故事是如何地令人振奋，那么后面这个故事呢，就如何地令人憋屈。前面的那一个故事让人觉得跟这样一位主，真是威风得不得了。我好想有这个能力，禁食祷告，然后把鬼赶出去，命令风，风就可以停；命令鬼，鬼就出去。可是，后边这一个故事呢？不是君王，而是君王下边最小的，一个最低的公务员来叫拿钱来，他就拿钱来。所以，这之间好像有一个反差。

而在这两个故事的中间，却是耶稣第二次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在第十六章，当彼得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第一次向他们预言：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天复活。那个时候彼得站出来反对说——万万不可如此。后来，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在山上见到了耶稣登山变相的荣耀，就是在那受苦之后复活的荣耀预先被他们所看见。下山之后呢，在第十七章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一个反高潮。如果说上山是一个高潮，那么，在这里有点像文学上讲的一个反高潮。下山之后，悲剧、贫穷、疾病、失败、无能、惧怕，包括鬼也压我；然后，凯撒也压我，无论是眼见的人间的权势，还是看不见的灵界的势力，总之，我们都好像是被压的，我们都是失败的。以至于主发出这样的感叹：唉，“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那人直接说：我找你的门徒，你的门徒没办法医治我的孩子。耶稣直接给出了原因——就是不信！在这个不信又乖谬的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多久呢？到后来回答门徒时也说：因为你们不信，你们的信心太小了。多小呢？显然小得比芥菜种的种子还小。

我们分享这两点：在前面的那个故事里面，耶稣是掌管一切的，耶稣是知道一切的君王，即使在后边那一个顺服在上掌权者的故事里面，耶稣甚至也同样地彰显了他对万事万物的掌管。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小朋友会不会特别关注故事当中的一点，就是耶稣怎么知道那条鱼里有一块钱呢？耶稣怎么知道彼得钓上来的是那条鱼呢？好奇妙啊，就好像耶稣怎么知道那

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有五个丈夫呢？耶稣怎么知道彼得他们在船的左边或是在船的右边，就可以撒网捕获那么多的鱼呢？耶稣基督彰显了他的不可思议的能力，耶稣基督彰显出他晓得所有的事情。

二、反对纳税的动机，顺服纳税的秩序

你看彼得和收税的人的对话，其实耶稣不在现场的。你看彼得的回答很有意思，因为马太的记载非常的干脆，只有一个字：你们的夫子纳不纳税？纳！只有一个字，多的话都没有。纳，很生动，很干脆，很简单啊——纳！然后耶稣就问彼得说，好像耶稣在场一样，耶稣说：彼得，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说要纳呢？彼得认为要纳，是出于对世上权势的惧怕。耶稣反对的不是要纳这个最后的决定，因为后来耶稣也纳了。耶稣反对的是彼得纳税的动机。为什么人家要你纳，你就纳呢？因为人家是王啊，因为这个世上君王的权势在彼得的心里面。

难道彼得还不知道耶稣才是王吗？他已经宣告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已经看见了耶稣登山变相显出那王者的荣耀。但是，当一个小小的税吏，公务员里面最小的那一个，级别最低的那一个，来到他的面前，问他：你们夫子纳不纳呀？纳！好像他没有在山上看到过耶稣基督的荣耀，好像他没有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像他那个认出基督的宣告对他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影响、对他面对这个世

上权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影响。彼得的反应，还是他起初没有遇见耶稣基督之前的反应，还是没有认出耶稣是基督之前的反应，还是没有看见基督的荣耀之前的反应——和世人的反应一样：纳！

所以，耶稣要指出来的是，彼得啊，谁向谁收费呢？君王向自己的儿子收税吗？如果你是皇太子，皇太子会纳税吗？当然不会了，所有的人在君王的时代，他都有这个常识，君王的儿子是不纳税的，因为纳的税都是归他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在四卷福音书里，只有马太记载了这件事。为什么？因为马太是税吏。马太特别知道收税这件事，他分得清楚哪一种税是丁税，哪一种是关税。丁税就是人头税，是按人来的，而且是按男人来的。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按照你家有几个男人，有几个丁，所以丁税就是按你家里有几个男人来收这个税了。但是，这个税收起来，是特别为了圣殿。犹太人为了圣殿，有点像什一税啊，你是要把耶和华所赐给你的一部分拿出来，为圣殿所用。所以呢，这也叫做殿税。耶稣就问彼得说，谁是这个圣殿的主人呢？收这个殿税是来干什么的呢？不就是修这个殿吗？不就维护这个圣殿吗？那么，谁是殿的主人呢？起初在旷野当中的会幕，还有后来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当献殿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停在和充满这个圣殿，圣殿就成为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但是，当被掳归回之后，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在这个大希律王所修建起来的圣殿当中，彼得，你什么时候见过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大希律

王修建起来的这个殿里面，从来没有耶和华的荣光在里面充满。至圣所里面，甚至也没有那约柜，因为约柜已经失落了。而你在山上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在哪里，在谁的身上，才是那个真正的殿！

你明白这一切，你还认为你的主，要缴殿税吗？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不需要纳税，所以他否认了彼得说“纳”这个态度背后的原因和动机。但这个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但是，耶稣又说“纳”！为什么“纳”呢？为了不触犯他们。为了不触犯这些在上掌权的人，为了不触犯这些按着神的许可，给了他们这样收税的权利的人，为了顺服神所许可的这样一个人，神还在忍耐这样一个人的秩序。

三、神迹彰显君王的能力和十字架的降卑

耶稣在纳的方式上，给了彼得一个教训。同样的，为什么他让彼得去钓鱼呢？因为彼得是渔夫嘛。想一想，如果你是卖包子的，耶稣会怎么说？耶稣不会让你去钓鱼啊，耶稣会说，你把那包子的笼揭开，随便拿一个，里面有个钱，你拿去交吧。无论你是做哪个行当的，你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耶稣基督再一次地向你显明，他掌管万事万物，他在所有的领域当中都为王。然而在所有领域里都为王的这一位，放弃他为王的尊严、为王的权柄、为王的能力，他要彼得去交这个税。但是，他交税的这个方式，也是一个神迹啊！要让彼得知道，

那是那一位知道一切、掌管一切的君王，愿意倒空他自己，愿意放弃他的权利。所以，前面一个故事，是彰显他的君王的大能力，后面一个故事彰显的是君王的十字架，而我们常常在这之间是颠倒的。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对这两件事情，其实我都是很挺挣扎的、很难接受的。第一，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我很难相信和接受，在那一个医病和赶鬼的故事当中，说主耶稣基督掌管着一切的灵界的力量，他彰显了那个真的叫做呼风唤雨的能力。对我来讲，有点挣扎：真的吗，信靠他的人就有一个在属灵的权势面前，宣告得胜的力量和地位？这一点对我来讲，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后边这个故事呢，对我来讲也有点挣扎：凭什么要交啊？凭什么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啊？凭什么要顺服一个不义的政权呢？所以，这两件事情都对我构成了挑战。在前面一个故事里面，我不认为我有那样的权力、我有那样的权柄、我有那样的能力。但是，在后一个故事里面，我不认为我要放弃，我不认为我要顺服；我认为我有权利，我认为我有那个力量。

所以，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以前分享过，我常常，甚至借助一些象征性的事件，来表达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比如说，不遵守红绿灯信号。我在那个路口的时候，虽然是红灯，但是一看——没车，我就过去。后面那老太太就指着我说：“唉唉唉”，然而我不理她，因为共产党是一个不义的政权，所以，

它对我没有权力，想过就过。虽然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不敢反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做主；在这个事情上，成为一个象征——我在这个政权面前，我是自由的。我不听它的，它没有什么资格让我听它的。在很多年里，我就用我在红绿灯面前的这个自由，来表达我在权势面前的一种反叛的精神，一种似乎独立的地位。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后边这个故事里耶稣基督的那种自我的放弃。我也没有办法理解，在属灵的势力面前的那种的胜利。因为，耶稣在后面的故事里，他是不是受到了羞辱呢？他是不是被瞧不起呢？是的。

首先，这些收税的人在迦百农。迦百农在福音书里面，是耶稣行神迹、奇事和大能最多的一个地区。耶稣如果是在其他的地区，不能够被称为是夫子 and 拉比的话，至少在这座城，他行了太多的神迹奇事。他的教训传遍了这个地区，包括这些收税的人都应该知道。但是，他们却来问：你们的拉比要交税吗？你注意他的那个口气，他不是带着一个疑问，或者他搞不太清楚，说你们的拉比到底是可以交，还是不可以交？他并不是谦虚地来求问：是不是要交啊？他实际上那个口气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交。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情，在所有的殿税里，祭司和拉比是不需要纳税的！因为祭司和拉比就是侍奉圣殿，侍奉圣殿的这位神和他赐下来的妥拉的。所以，祭司和拉比不需要交税。因此，这些人来问彼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跟着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是拉比吗？当然，他们听过他的教训，他们也见过他行的神迹，“我知道你跟随的这位啊，是很厉

害的，不过，宗教局没有批呀！”耶稣毕竟不是一个有执照的拉比，所以，到底应该不应该交呢？还是应该交。所以，你知道吗，这些人还是按着以色列人的宗教制度来办事？我听过他行的神迹，我听过他的教训，我也可以称他是拉比，不过，公事公办——毕竟宗教局那个地方没有发执照、毕竟是个野传道、毕竟是一个没有执照的遊方布道，也没有正规院校发的执照、没有宗教局盖章的。所以，你们夫子还是得交税！他们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对耶稣来讲，是不是一个羞辱呢？是不是一个不尊重呢？

然后彼得说：交交交。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很难顺服。该有信心的地方，我们很难有信心；该顺服的地方呢，我们很难顺服。在过去一些年里，宗教局和公安局都叫我王老师，最近这几年都改口了，叫我王牧师。但是，毕竟在法律上，这是一个没有执照的非法传道人。对吧？到了某一个时候，来一趟，那还是得公事公办。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们的拉比还得交钱。耶稣在这期间第二次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这一次，门徒没有出声反对说不可以。他们这次呢，“大大地忧愁”，他们还是不太明白这件事，这件事和前面那一个赶鬼有什么关系？这件事和后边的交税有什么关系？十字架所表现出来的降卑，令人憋屈到什么地步，或者前面的故事令人振奋到什么地步，后面那个故事就令人憋屈到什么地步！

四、基督在灵界作战却在人间受死

但是，我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所表现出来的降卑，耶稣基督在对他的这种羞辱和不尊重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在人间权势面前降服的态度，令你憋屈到什么地步，就显明耶稣爱你、在乎你到什么地步！他说为了不触犯他们，干嘛不触犯他们？凭什么不触犯他们？他们都触犯你了，你为什么不知道？他们触犯你是不对的，你触犯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倒过来了吗？不能够触犯你的人，他触犯了你。然后，不应该被触犯的人说，我不要触犯他们！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的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到一个地步说：我太不堪了，我真的太坏了，我真的没有信心。然后，我怎么都改不好，我犯了罪悔改了，我又再犯！然后，有时候你生出一种自暴自弃，甚至你会开始往深处说，神真的在乎我吗？耶稣基督真的在乎我吗？连我都不在乎我自己呢，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走了、都不在乎我，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瞧不起我。我自己都觉得我烂泥扶不上墙。连我身边最亲人都说：我看你肯定改不好，我根本对你有没盼望了。然后，你心里会生出来那一种想法——那一位拥有奇妙的能力，那一位拥有至高地位的主，他怎么可能还在乎我呢？他怎么还可能相信我、带领我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一点，我举一处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七节，我认为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的前后两个故事。主在那里说：“儿女既有血

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著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一段经文说，神爱的是人，不是鬼；神救的是罪人，不是天使。神在鬼的面前、耶稣基督在鬼的势力面前，一点都没有妥协，反而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在灵界，他与魔鬼作战；但是，在人间，他却顺服人间的权柄和忍耐悖逆的罪人。你明白这一点啊，因为他救拔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在鬼的面前，一点都不客气哟，但是，他在顶撞他的、悖逆他的人面前，却客气得不得了、却忍耐得不得了。他凡事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尽诸般的义。他说，且让他们这样行吧，且让我们该交就交吧。他忍受屈辱，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宣告，让门徒大大地忧愁，因为门徒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在灵界作战，却在人间受死。他彰显在灵界的那不可思议的能力，但是，比他那在灵界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不可思议的爱、不可思议的顺服、不可思议的受辱和不可思议的放弃。

对照门徒的态度，在前后两个故事里边，为什么在下山之后会有一个反高潮呢？在这些门徒的生命中，第一个故事，门徒面对灵界的势力，他们无能，他们赶不出去这鬼。第二个故事，门徒在人间的权势面前惧怕。在灵界的势力面前无能，在人间的权势面前惧怕，这是我们生命的本相。在可以放弃的时

候，我们舍不得放弃；在应该顺服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愿意顺服。在必须反抗的时候，我们不敢反抗；在需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怯于作战。我们就是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真是苦啊，我外边被世上的君王统治，我里面被魔鬼撒旦统治。在魔鬼撒旦面前，我没有权柄；在外边的君王面前，我也没有权柄。当然这是人的普遍罪性，但是有人对中国人的罪性有两句话的评价，我小时候就一直听说。第一句话呢，叫“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第二句话呢，叫“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如果是属灵的征战，如果有人损坏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说算了，退一退吧，忍了吧。如果有人损坏了你的利益，不干，这笔账一定要跟他算清楚，不能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所以，这也是门徒在这前后两个故事中反映的：与人斗其乐无穷，与罪斗节节败退。彼得认为耶稣应该纳税，是出于内心对权势的惧怕，是出于对内心自我利益丧失的惧怕。耶稣宣告，作为神的儿子，不需要纳税。但是，耶稣又表示，作为人子，作为一位降卑的人子，他愿意纳税。所以前面一个故事中彼得说要纳，跟后面一个故事中耶稣说要纳，虽然看起来都是要纳，但是你能够看见本质上的不同吗？彼得认为纳，是出于内心的惧怕，是出于一个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是出于一个不自由的灵魂。后边耶稣说纳，是出于十字架的爱，是出于他的降卑、他的怜悯、他的忍耐。不需要纳税的那一位，出于对世人的怜悯而纳税，而忍受世上权势对他的藐视。不应该被杀的那一位，出于他的恩典，而走上被杀的十字架。

五、基督的爱让我们甘心放下权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愿意这样对你说，愿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听见耶稣基督对你说的三个字，那就是——我爱你。你这一生最大的渴望，就是渴望听到这三个字。你常常不能够确定，没有安全感，在彼此相爱的人之间，虽然你就想听到这三个字，但是听到了之后，还是不确定，你需要每一天都反复地听到。盼望神藉着他的话语，让你听到这三个字。神说：他在乎你。耶稣透过放弃他自己的权利，对你说：我爱你；耶稣透过隐藏他自己的荣耀，对你说：我爱你；耶稣透过他走向十字架，甚至透过他对人间权势的一种顺服，用洪亮的声音，用打雷的声音对你说：我爱你！你都不在乎你自己了，他在乎你！你觉得你身边的人都不在乎你了，他在乎你！他在乎你到了这样一个憋屈的程度。

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讲过一句话，叫做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什么是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呢？什么是顺服人间的环境和制度呢？如果是出于内心的恐惧，如果是出于对君王的惧怕，那是耶稣基督要否认的；那不叫福音当中的顺服，那叫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今天在中国社会，有多少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今天的社会充满了因怕死而做共产党的奴仆的人。是吗？今天甚至在教会当中，有许多因怕死而做共产党的奴仆的人，而做了一个不公义政权的奴仆的人，而做了一个与罪恶一起打滚的人，而做了一个在公义面前不敢

发声的人。因为，他是奴仆；因为，他活在恐惧当中。但是，什么是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呢？耶稣基督是因为什么，来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呢？耶稣基督是因为什么，来要求跟随他的人、来顺服你生命当中的一切不公不义的环境呢？是出于十字架上的爱！爱就是陪他走第二里路；爱就是陪这个世界走第二里路；爱就是陪着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走第二里路。律法是第一里路，走了，你说我尽力了；恩典是第二里路，为了爱对方，为了不绊倒对方，甘愿放下权力，甘愿承担责任。

现代文化，其实是一种律法主义的文化，就是权利第一，权利优先于责任的文化；以每一个人的不愿意放弃的权利，成为这个勇于私斗的一种文化。但是，福音的文化呢，是一种恩典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面，让我说，责任是优先于权利的。不然的话，你就会因为想享受访客的待遇，而不愿意成为教会的成员。群体是优先于个人的，这不是对个人的压制，而是恩典的驱动带来了陪他走第二里路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同工就分享说，面对警察，面对政府，面对宗教不自由的这种环境，每一次不是恨的挑战，而是爱的挑战。以前我们说过上访者团契，张国庆弟兄讲，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若是警察叔叔来了，迎接他的是福音。这一个爱的挑战，是更难的——在爱里面陪他走二里路。所以，这两个故事里我们有一个区分：在空中的掌权者面前，你必须是一个战士，你是一个属灵的战士，你一丝都不能退让！耶稣基督说，由于你们信心太小，小得比芥菜种还小。有人说，我祷告啊，我生的病还没有好。旁

边的李姐妹就说，因为你信心太小，你要有信心，你的病肯定会好！信心不是指到你的病一定会好。圣经在什么地方，给了你这次的病一定会好的确据呢？那是一种盲目的信心。

信心大，是指信心的对象——你信的那一位主，他有神爱子的荣耀，他是弥赛亚。他不胜过地上的君王吗？他不胜过地上的一切权势吗？他不胜过鬼的势力吗？他不胜过你里面罪的势力吗？他如果胜过这一切，你的信心就是指向他的。当对他有信心时，就说，鬼都可以被赶走。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你难道不相信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中国上空的邪恶的势力吗？他已经击败了魔鬼撒旦的势力吗？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王就不是地上的王，而是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阿们！中国的魔君，如同在但以理书中说波斯的魔君，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统治中国的就不再是空中属血气的恶魔，也不再是地上专制的君王。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死，胜过了这个国家上空的魔君！

六、对主的信心让我们勇于属灵的争战

耶稣的意思，对他的门徒说，你有这个信心吗？你信我吗？你如果信我，哪有属灵的势力可以统治你呢？哪有罪恶的权势还能够捆绑你呢？哪有世上的君王的势力，今天再加上一个，就是公司里面资本的力量，可以辖制你、统治你，使你一生因怕死或者一生因怕穷而做奴仆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

空中的掌权者面前，我们是属灵的战士；在人间的掌权者的面前，我们是受苦的仆人。我们活在地上，在一个平面上来看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人都搞不清楚，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纠结：什么时候反抗，什么时候顺服？什么时候妥协，妥协是可以的吗？什么时候抵挡，抵挡是可以的吗？在平面的关系上，你永远看不清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看到一个和灵界的关系，你必须在垂直的关系上来看。为什么勇于私斗，是错的呢？当张弟兄和李弟兄之间有点疙瘩，就好像在营会的时候表演的节目，借了钱没有还。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你们俩发生这个争吵，你们俩发生这个摩擦。这个摩擦是什么呢？这个摩擦放在世界上几十亿当中，这算什么？这个根本连战斗都算不上，这个根本就是私人斗殴。但是，如果你在这事情上看到了属灵的争战，你发现在这件事的背后，天使也在场，魔鬼也在场，空中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全都在场。你就发现这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你明白吗？你所遇见的这件事情就是星球大战。因为，所有受造界里面的几路人马，全都出场了，魔鬼也在，天使也在，主也已经得胜。这是一个与罪的争战，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这是星球大战，你参与了那一场世界大战。所以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非常令人可悲的是，他没有看到自己是在属灵的争战其中的一个士兵、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举几个例子，我们怎么去分辨什么时候反抗，什么时候顺服呢？有时候警察来到教会，假如提出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你们的牧师，每个月到宗教局去参加一次学习；然后，投

票选举长老、牧师的时候，候选人名单先报给宗教局。只要做到这两点，你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完全不管。第二，如果没有这两点的话，没收一些财产，赶出会堂，再不服的话就抓起来。这个时候教会怎么办？弟兄姐妹会不会这样想：王牧师，要不你就去一次吧，不然这几十万就会被没收了，房子就给我们收走了。你就去一次吧？前段时间看那部电影，《沉默》，有一个同工就问我：“王怡牧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人家拿着刀说，你如果否认信仰的话呢，我就把你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放了；你要是不否认信仰的话，我把你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全都杀了”，然后，那个同工说：“王牧师，你会怎么办呢？”我说，这是好大的试探啊！我怎么回答？你希望我怎么回答呢？弟兄姐妹，你希望我怎么回答呢？你希望我怎么做呢？“王怡牧师，你不能够否认，我们死了就死了”；“王怡牧师，你就认一次吧。我家里还有 80 岁老母呢，我的孩子刚刚出生呢”。所以，什么时候反抗，什么时候顺服，是很难的。哪一个是可以服从的，哪一个是不可以服从的？什么是可以陪着走第二里路的，什么是必须坚决的斥责和坚守的？有的时候，甚至很难去判断。政府有权没收我们的一切财产，即使它是滥用权力，它也有权。你明白这件事吗？上帝将刀剑的权柄给了它，它要没收，就没收；它要把我们赶出去，就赶出去，因为自有神要审问它。

所以，神让我们在这些涉及到肉身利益的事情上，一概是顺服、放弃和承受。但是，主没有赐给他们天国的钥匙。记得

吗，第十六章，天国的钥匙给了谁？给了教会。是宁愿每个月到宗教局去参加一次学习，还是宁愿所有的财产全部交出去呢？教会永远——在 2000 年的教会历史上和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永远都面临着这个挣扎和选择，一直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各位，怎么做呢？你们说，教会应该选哪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未来的丈母娘给你提两个要求。第一，买一套房，送 10 万元的彩礼；第二，不买也可以，以后不能全职去侍奉，不能到教会去聚会。你选哪一个？我那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广告，很有意思——买一套房，有这套房就可以叫妈；没有这套房，就只能叫阿姨。那他怎么办？不买也可以，得答应，以后绝不能被王怡牧师忽悠了，呼召你去全职侍奉，绝对不能去全职侍奉。哪一个该顺服，哪一个该反抗？哪一个是不能退让的属灵的争战，哪一个是可以放弃的肉身的利益？你去思想，你去看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

七、透过肉身的顺服彰显灵魂的自由

有一位德国的作家黑赛，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宁可毁灭肉体十次，也不可伤害灵魂一次。主在登山宝训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宁可舍弃百体中的一体，也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宁可缺一只手，缺一只胳膊，缺一个腿进入天国，也不可沉沦在地狱里面。福音带给我们的是灵魂的自由，肉体的顺服。耶稣基督在肉体的顺服当中，呈现出来了灵魂的

自由。耶稣基督在灵魂的自由当中，带出来了肉体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它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上，怎样来呈现出我们是一群信靠耶稣的人，是一群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人呢？怎么来呈现出基督徒是一群灵魂自由的人，而不再是一群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呢？那就是透过肉身的顺服，肉身的受苦，来彰显我们灵魂的自由。

所以彼得晚年，回想起这一幕，因为这一幕对他太深刻了。他又是打鱼的，用这么一种特定的方式，让他的夫子去交了丁税。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到十五节，老年的彼得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老年的彼得教导教会说，你们要顺服，人家说纳不纳？你说纳。但是，这个时候的彼得的纳，他要求教会的纳，和他起初说的纳，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你们是为主的缘故，你们是为良心的缘故！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说：你们为良心的缘故，你们为着灵魂自由的缘故，来顺服世界上对你们的不公不义。因为神的旨意是叫你们行善，因为我主耶稣基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了和给予了我们灵魂的自由。老年的彼得这个时候所说的顺服，不再出于对地上权势的惧怕，不再出于对自己的权利的不可放弃的爱护，而是出于对那位天上君王的顺服。这让我信主之后，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不会因今天中国的社会有不公平，今天中国的政府是有专制的，就不

遵守红绿灯信号。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知道，我顺服的是那一位大君王，他才是掌管中国社会的君王。每一个十字路口真正的掌管者，不是穿黄马褂的大妈，也不是后面的警察，而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阿们！

所以，什么叫你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呢？专制也要顺服吗？奴隶制也要顺服吗？好像这个意思听上去就是要顺服啊！反过来这样说，如果有任何一种制度或者环境，是基督徒绝对不能顺服的，那就证明那种制度大于福音，那就证明那种制度或那种环境已经构成了一种对福音的障碍。如果不把那种障碍除掉，福音就不能够传扬，福音就不能够统治人心。所以，必须先把那个障碍给拿掉。如果有任何一种环境，任何一种制度构成了对福音的障碍，那它就大过福音和福音的统治。当彼得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就表明：福音超越于人的一切制度；福音要在人类历史上进入一切的制度；福音不需要那个制度发生改变，才能够产生果效；福音在一切的制度下都可以统治人心；福音在一切的制度下都可以拯救灵魂；福音在一切的环境之下，都可以带给人自由。

所以一个人无论生在什么环境下，无论生在什么制度下，无论遇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他都不能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选择。福音告诉他说：不，你有选择！你应当信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福音的统治，对于神的儿女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成立，可以在任何的制度下成立，这就是人要顺服

一切的制度，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天国可以在任何制度下扩展，不需先要挪去这个障碍，天国才可以扩展。真正的障碍不是人间的制度，也不是君王的权势，真正的障碍，基督已经说了——叫做不信。在奴隶制度下，神可以得回人心，拯救被掳的灵魂。在奴隶制度没有改变之下，一个奴隶可以得着灵魂的自由吗？难道说，我们要像那首歌唱的那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难道说，如果我们不先打碎这一个奴隶制度，那么就没有人能得自由？而是说，在奴隶制度不被改变之下，一个奴隶可以因福音，成为这个世界上一切统治他的奴隶主都没有的那个自由的人。他自由地被别人奴役；他自由地被别人借了钱，没人还；他自由地在公司里受到委屈，别人都升职了，他没有升职，就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自由地在这个世界上，接受亏损。阿们！这就是福音，要在今天彰显出耶稣基督能力的方式。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听到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就大大地忧愁呢？还是你愿意听到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并且知道他已经从十字架上复活了，你就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呢？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挪去了真正的障碍——就是你的不幸。耶稣不是因为环境污染而走上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因为社会不公而走上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因为贫富悬殊而走上十字架的；耶稣是因为你不信而走上十字架的！阿们！

所以，真信心，在我们里面产生出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

就是在属灵的争战里成为勇敢的战士。我们不再私斗，但是勇于公斗、公战，成为勇敢的战士，绝不妥协，勇往直前，连大山也要为这样的人挪开，连小山也要为这样的人迁移。阿们。你记得我们唱的那首歌吗？（与大家一起唱）“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这是一个结果。在属灵的争战当中，成为勇敢的战士。耶稣基督复活的旌旗，他赐下旌旗，让教会为他扬起。第二个结果，就是在肉身的境况当中，成为谦卑、退让和忍耐的人。可以放弃的就决不坚持；可以顺服的就决不反抗。跟随耶稣基督，陪着这个世界走第二里路！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一位荣耀的，你是那一位有至高的荣耀能力和权柄的。万事万物被你所创造，万事万物被你所掌管。连一条鱼，甚至连一个细胞，甚至连一个基因，主啊，都在你的掌管当中；连一个分子，都不会迷了路，都要按照你说的命定的方式运行、行走。连大海的浪，主啊，也不能越过你为它拟定的界限。君王的权势，也不能够越过你为他所拟定的界限。人的罪恶，主啊，人的罪恶，你都要使用来成就你的义，但是，人的愚怒，你却要止住。主啊，你随意地在万物当中，按你的旨意行事。这样的一位君王和神，却是如此地在人间受到藐视，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相反的一种人。我们在涉及自己利益的时候，绝不肯驯服、绝不肯放弃，但是，在涉及到你的荣耀、你的圣名的时候，我们却怯懦放弃、没有勇气，与这个世界妥协、与我们内心的罪妥协。我们回到埃及，我们回到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主啊，求你改变我们！你的福音怎样改变彼得；你的复活的能力，你怎样来到门徒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怎么对着门徒吹气，让他们受圣灵；你怎样差遣你的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他们得着复活的生命；你怎样藉着教会所受的逼迫，将他们差遣到地极，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这些你曾经在你的教会当中所做过的奇妙的事，求你在我们当中再做一次！你曾经在你的仆人、儿女的生命当中，叫那惊奇的事如何地发生，求你今天再一次地叫那样惊奇的事在我们当中发生！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2017年5月7日

社交媒体的第一个试探

各位在圣灵里彼此连接的弟兄姐妹，平安。

先说，我认为智慧手机和社交媒体，是一样好东西。上帝赐给这个世代，一种前所未有的人际关系的模型。是透过人人手握一部智慧手机实现的。自媒体的出现，特别在中国，几乎在事实上打破了报禁，甚至部分打破了社禁。在知识的获取上，智慧手机使文化上最边缘的地区和个人，也能零落差地跻身于世代的潮头。而在人际交往上，社交媒体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和多层次的“城邦”。“网红”一词表明，每个人的言行，都可能被偶然发大，而成为一个庞大社群的焦点。同时，这也造成了一种新的身份焦虑和自我证明的冲动。而自拍，

通常是缓解这种焦虑、满足这种冲动的，一种普遍和似乎无伤大雅的疗法。

而一个最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智慧手机，同样使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福音，在当代中国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以直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能力。但令人沮丧的是，过去的十年间，很多基督徒显然并没有善用这种能力，成倍地传扬福音；反而利用这种能力，成倍地羞辱了主名。

因为，社交媒体同时产生了一些属灵上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关于这个题目，我曾写过两篇牧函，但我仍然和你们很多人一样，忽略了这些属灵的试探，足以演变为信徒生命和教会社群中的信仰危机。

大约八年前，约翰派博牧师有篇著名的讲道，叫《iphone带来的属灵危机》。2012年初，教会QQ群里，第一次出现了弟兄姐妹间彼此恶劣的言语攻击。我写了一篇牧函，《我们为什么上网》，其中介绍了派博的这篇资讯。后来在一次会友群争吵中，蒋蓉师母将这篇牧函，重贴在群里，希望大家安静，反思。但事实上，我们夫妇不久便退出了会友群的服侍，而将这项事工留给了其他长老。现在看来，当初这个决定是非常不智慧的。

2012年底，我写了另一篇牧函，《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讨论这个议题。这篇牧函后来被更名为《基督徒如何面对新媒

体时代》，被收录在普世佳音 2015 年出版的《教会如何使用新媒体》一书中。有点令人沮丧的是，这篇文章在过去几年，被华人教会和信徒引用的程度，远超过在本教会会众中的影响力。

我还在反复思考这个题目，也在一些场合举到一些被社交媒体试探的例子。直到我看见这种试探的可怕后果，几乎充满了半间教会。我觉得有必要列出一些社交媒体带给我们的试探，和大家一起反思，彼此勉励，彼此认罪。

今天我要思考的第一个试探，是权威的丧失。

我很少加入教会侍奉以外的微信群。但有两个知识分子的群，为着福音的缘故，我加入在其中。但不久前，这两个群，一个是不信主的公共知识分子建立的，一个是信主的知识分子建立的，群成员都是教内外的知识界精英人物，大多都以自由民主的信奉者自居。这两个群也以“充分的言论自由”为标榜。但两个群最终都陷入冲突与失序，先后经历了“群主退群”和宣布解散的命运。

大约十五年前，我担任过几个国内知名的思想类 BBS 的版主（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这个名词了），也创办过几个网站。在这些经验中，我了解到一件事，就是缺乏正当的程式和有力的主持人，就不可能有一个平台的思想活力。人人拥有一个终端，并不代表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威。在平等的权威下，是没有

社群可言的。通过我过去的法学经验，我也了解了一件事，世上言论自由度最高的场合有两个，一是法庭，一是议会。在这两个场合，发表任何言论（只要不是谎言和诽谤），都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不过，这两个最“自由”的场合，恰恰同时也是对言论发表的格式、程式和秩序，要求最严格的。

我的意思是说，对任何一个社群而言，程式上的权威和限制，恰恰是真正的思想活力和自由的条件。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一些弟兄姐妹不能完全理解《马太福音》第 18 章的意义。耶稣很明确地给出一套“程式正义”的要求。或给出一套发表意见的合法程式。在某个意义上，耶稣似乎不太关心“实体”上的对错。就如在摩西律法中，强调“两三个人的口”，但任何人的经验都知道，一个人也可能是对的，三个人也可能是错的呀。

主的意思，是让我们信靠祂自己。信靠主的人会遵守游戏规则。遵守游戏规则，不是行为上的“义”，而是以信为义。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也不是一种道德修养，而是因为顺服之人相信，“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举例说，你若相信耶稣复活了，你就让人打你一巴掌。因为被打一巴掌的人有福了。你若相信基督掌管着生与死，你就不怕死。你若相信耶稣为你成为贫穷，你就不怕穷。凡此种种，都是“信”的结果，而不是道德修炼的结果。

对权威的尊重和对程式的遵守，也是如此。

在社交媒体上，人人既是接受者，又是发布者。人人都获得了一种设置议题的主动性。这对我们内心的自尊、自主是一种极大的满足。这种满足带来一个试探，就是对权威和规则的藐视或忽视。要么权威不在场，人人都是话事人。要么外在于我的权威被每个人的自我意识自动遮罩了。意思是说，社交媒体，前所未有地强化了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平台或社群。虽然大家处于一个平台，但每个人都将自己假想为中心枢纽。当你拿起一份报纸阅读时，你不可能以为《纽约时报》或《南方周末》是以你为中心的。但当你进入一个群时，你会下意识地把这个群的中心人物，设置为你自己。毕竟，那是“我”的朋友圈，毕竟那是我自己的手机。我进入，或退出；发言，或潜水，都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

同样的，在一个小组聚会中，哪怕只有十个人，你也知道，发言要尊重召集人或主持人的意见和裁决。不然，小组就无法形成。然而，在一个即使有几百人的群里，你也认为自己“有权利”畅所欲言。是的，社交媒体的确给了我们一种限制最小、自由度最高的社群沟通方式，但如果基督徒不在这种方式中学习尊重权威和规则（就是在这种方式中相信基督主权的在场），这种方式就可能摧毁一个社群。

让我再提及一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严重地缺乏社群。而教会几乎是官方体制以外的、唯一保持活力与秩序的庞

大社群。微信和 QQ（及其他社交工具），对于那些毫无结社能力的单独个体来说，多少还具有一点“虚拟结社”的功用。我的意思是，即使他们在一个社交群里，毫无权威和秩序可言；但因为线上下，他们更加没有权威和秩序。换言之，对一个空气稀薄的社会而言，社交媒体的社群性，仍然是高于现实生活的。但对教会来说，这个局面却恰恰相反。社群塑造的能力在社会是顺差，在教会是逆差。也就是说，在面对面的教会社群中，人们多少是尊重权威和秩序的。在小组聚会中，敢于胡乱发言甚至扰乱聚会秩序的人，少之又少。但到了网上，同样一群人，却忽然变成了“属灵的无政府主义者”。

为此，我要向你们重申，秋雨之福教会在《堂会规章》中所列出的，对网路平台的理解和约束。其中第十六章《堂会的网路交往公约》的第一条说，网路空间不是虚假的或非真实的，基督徒所面对的仍然是具有上帝形象的个人，基督徒的使命仍然是爱上帝，爱人如己，通过爱心的话语和行为，成为造就圣徒的管道。但自网路世界诞生以来，基督徒的团契相交及在公共领域见证面对新的挑战。在网路世界中，具体的圣徒变成了笔名与文字，许多在网路上交通的基督徒也不自觉地把有血有肉的网友及弟兄姐妹化成一个符号、一个思想，因此导致各种不当的言语，互相伤害，不荣耀上帝，不造就肢体的事情出现。

第二条说，本堂会开辟的网路平台，包括福音性的平台（公众微信、微博、微信群、网站及网路电台等），及会友彼此交

通的内部平台（如会友 QQ 群，教会内部论坛等）。其中，内部论坛或群的设立，仅对本堂会友开放，会友应以实名或群内众所周知的 ID 加入。

这意味着，我们认为，教会建立的教会成员的社交媒体群，是小组和教会的真实社群的延续，因此，神在教会设立的权威、规则和牧养，将同样延伸到社交平台。譬如，章程约束会众，在教会和小组中，未经牧者同意，不应公开向其他信徒推荐属灵资料，那么同样地，在社交群里也不应该如此。

所以，堂会规章接着说：

堂会设立任何网路平台，应由一位长老担任督导，并设置管理同工。

网路平台的成员（以下简称成员）应以顺服掌权者的心，遵守一切不违背《圣经》教导的法律、法规及善良风俗，教会平台的管理员有权对使用者在网路平台发布的资讯进行监督、提出批评或进行必要的删除。

成员不应在网路平台发布侮辱、歧视、论断他人的言辞；不应以轻慢、不敬的语言提及上帝、《圣经》和教会；不应在内部网路平台公开评议教会的决议，批评教会的事工（对教会事工及同工个人的意见和批评，均应按着《马太福音》第 18 章 15-18 节的原则和程式提出）；不应披露、议论他人的隐私、缺点和不为人所知的过犯。

成员不应发布任何普世教会所确认的异端思想，及任何藐视《圣经》权威性、否认三位一体、质疑主基督的神人二性、贬低十字架的救恩、否认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立场，及公开反对本堂会认信之信仰告白、《治会章程》及本规章的言论。会友持有上述观点或在信仰上有重大疑惑的，应私下与所在的小组同工或牧师、长老联络，或按《马太福音》第 18 章 15-18 节的原则和程式提出。

成员在网路平台上发生争吵的，与在其他场合发生争吵一样，争议各方及知情者均应本着《马太福音》22 章 39 节“爱人如己”的原则，及《马太福音》第 18 章 15-18 节彼此劝勉的原则，以恒久忍耐并存温柔的心，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并彼此饶恕。必要时，向管理员、所在团契的同工及督导长老请求调解和裁决。

我曾建议几个住在一起的弟兄，只有三个人住在一起，就应选举一位弟兄担任室长，建立属灵的权威和秩序。这不是说他可以决定任何事，而是授予他一定的许可权，来担任一个“议会”的主席。譬如执行室规，裁决争端，带领或安排“家庭敬拜”等。平常兄弟姐妹约着一桌吃饭，如果超过三五个人，我也建议大家推选一位，担任这顿饭的一个主持人。小到点菜，大到议题的转换和对发言的把握，都由他来作临时的主持和裁决。有时，有人会冒出来主动担任这一角色，免得大家各说各话，各开各会。这时，一顿饭通常会吃得比较有意义。甚至，我建议哪怕几个兄弟姐妹约着一道出门，也应该推举一位，成为这

次出行的召集人或主席。其他人就得着一个机会，来学习顺服和跟随。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建议你们，在任何社群的交往中，随时随地，都“因信”而学习对一种属灵权威和秩序的尊重。以至于这种顺服和尊重的操练，成为一种可以在这间教会结出美好果子的生命经验。如果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这样操练，有一天，你们当中就会有人被推选出来，成为教会议会的一个成员，“好好照管神的教会”（提前 3:5）。并且，当这种生命经验被带到社交平台上时，就能说明我们在手握终端时，胜过一种手握大权的自我中心的试探，包括身份的焦虑和宣泄的冲动。

下一周，我要外出服侍。盼望回来时，再和你们谈社交媒体带来的另一个试探。

深望和你们一同胜过试探、得胜有余的弟兄 王怡

主后 2017 年 7 月 29 日

社交媒体的第二个试探

各位常在线上相见、灵里相交的弟兄姊妹，平安。

这周我去长春，和一群长老会的牧师们团契。我们登上长白山顶，了解到天池，有四分之三属于朝鲜，四分之一属于中国。我意识到，自己站在一个虚拟的界限上。天池里的鱼，属于哪个国家呢。它们好像比人自由，竟不需要护照与签证，一会儿在中国游，一会儿又在朝鲜睡。

人就不自由了。所以围绕着这一片，有许多北逃者的苦难故事。甚至成婚、生子，偷偷住了十几年的，又被拆散，遣返。人间的界限，有性别、阶级、金钱、教养、血统，等等，而其中最大的界限，就是以刀剑来守卫的国界。

所以，“无国界”，就成了人类渴望一个更大、更自由的价值共同体的代名词。参加藏区医疗短宣的一位弟兄对我说，参加“医生无国界”组织，去非洲行医，一直是他的梦想。十几年前，我去法国，拜访过巴黎的“大赦国际”总部。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个人权无国界组织。还有“记者无国界”组织，也有我熟悉的一些朋友。大约在 2005 年，互联网的自媒方式，从 BBS 时代，转向博客时代。那年，我创办了“王怡的麦克风”的第一个博客版本。一年后，这个博客被政府关闭。在关闭当周，“德国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举办的“世界博客大赛”，宣布授予我 2006 年度的“记者无国界特别奖”。

网络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无国界”。意思是，人类相信有一些价值，超越了性别、阶级、金钱、教养、血统，乃至国家和政治制度的任何界限。而一切超越界限的价值源泉，在基督徒眼里，就是上帝的主权和基督的福音。从这个角度说，我再次重申，社交媒体，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伟大事物。因为在人与人之间，上帝使我们拥有了突破一切与福音相反的界限的媒介。因此，为了福音的自由，而使用社交媒体。利用社交媒体打破一切与福音相悖的人与人的界限，就是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说，教会可以被称为“福音无国界”组织。一个律师弟兄的简书被关闭了，他写到，“执照，是拿来吊销的；简书，是拿来关闭的”。这就是基督徒活在世上，使用世上一切工

具，又不被这些工具所定义的态度。我使用互联网，进行私人的写作与传播，已有近 20 年历史，历经不同的互联网媒介时代。到目前为止，我的各类自媒体账号，已累计被关闭了大约十五次。而“秋雨之福教会”自 2006 年开设网站、开设博客，开设电台，直到开设微信公众号，到目前为止，累计被关闭也已超过十次。网站封了三次，博客封了两次，电台封了五、六次。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意思有两个，第一，社交媒体带给我们最大的试探，是关乎你使用社交媒体的目的。“荣耀上帝，并以祂为乐，直到永远”，是否你在网络世界中的存在意义？“基督是主、恩典为王，背负十架，奋兴福音”，是否你利用社交媒体，寻求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目的？

尽管你在线下，属于一间叫“秋雨之福”的基督教会；但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中，不属于一个叫“福音无国界”的组织；那么，社交媒体带给你的试探，将层出不穷，难以计数。上网的目的不被改变，上网的试探就不可能胜过。

我要说的第二个意思，也与界限有关。一旦福音塑造了你的目的和动机，福音中的“自由”，就有两个定义。一个定义是对界限的打破。自由总是意味着打破界限。智能手机的出现，是人类传播史上对界限的最大打破。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天池边，生出人不如鱼的感慨。因为鱼可以北逃，人却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对信息的自由传播的限制和迫害，是反自由的，也是反福音的。

然而，自由的另一个定义是对界限的保护。自由总是意味着对最重要的那些界限的保护。一百多年前，严复译穆勒的《论自由》一书，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这个短语表达了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意思是说，自由亦是通过对界限的定义而获得的。

现在，我要讨论的是，社交媒体在“权威的丧失”之外，带给我们的第二个试探，“界限的丧失”。

特别对中国人来说，网络使我们忽然获得了一种公共的话语权。但

我们从小就缺乏相应的公共生活的经验。我们或兴奋地不知所云，或紧张得语无伦次。就像你第一次出席你从未出席过的场合，要你讲几句话。你根本不知道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讲，讲多讲少，才是得体的。这种情形下，即便我们心存良善，我们的言语也很容易越过界限，伤害他人。因此，每一个使用社交媒体的基督徒，都需要向主迫切地祈求和学习，“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的智慧。

在圣经中，有三个在福音中被保护和设立的最重要的界限。正因为其他的界限都被福音打破了（可以被打破的界限，就是对福音而言无关紧要的界限），这三个界限才被凸显出来，指向创造和救赎的秩序（它们是不可被打破的，就是对福音而言不可或缺的界限）：

一是上帝与人的永不改变的界限；
二是两性之间的永不改变的界限；
三是教内教外（信与不信，拯救与审判）的分别为圣的界限。

在基督徒的社交媒体中，常常被罪诱惑和打破的，也是这三个界限。

今天先说第二个。牛津大学有一份关于婚姻与社交媒体的调查报告。研究者发现，频繁使用多种社交媒体的夫妻群体，对婚姻的满意度，比没有频繁使用多种社交媒体的夫妻群体，低 14%。如果你使用社交媒体，离婚的可能性将上升一倍。如果你使用两种以上的社交媒体，离婚的可能性再上升一倍。另一份来自美国婚姻律师协会的报告显示，最近十年，在离婚协议的文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证据来自 Facebook。

一方面，社交媒体甚至成为了色情行业的工具，使已婚者和未婚者受到情欲试探的机会，都大大增加；成本却大大下降。几年前，一家婚外情网站上千万客户的注册资料被曝光，一位有名的美国牧师被发现是这家网站的长期客户，他被迫辞职，公开悔改，婚姻也摇摇欲坠。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增强了撒旦的搜索功能。我相信撒旦若不借助互联网，他本身也没有能力让你偶遇旧情人。然而现在，只要你愿意，输入你的初恋对象的名字，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对方并取得联系，已成为一种高概率事件。

最后，社交媒体最大的，对信徒群体在两性关系上的试探，就是它公开地、和貌似坦然地，跨越了两性之间“清清洁洁”的界限，营造出一种“暧昧”的文化。“其实并没有怎么样”，成了撒旦试探我们的口号。从“其实你不一定死”开始，这就是魔鬼的口头禅。但对很多丈夫来说，与异性的“私聊”，似乎是一种安全的寻求慰藉的方式。甚至对一些单身姊妹来说，与弟兄的“私聊”，也是一种安全的、慰藉自己的孤单和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方式。并且，大家都会保护性地，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其实并没有怎么样”。

渴望得到异性的点赞，成了很多人流连在社交媒体中的隐秘动机。渴望在婚姻以外，得到异性的关注，使朋友圈中充满了一种对异性的撒娇。在与异性的私聊中，正大光明地使用一些亲密的用语，成了一种新的小心翼翼的调情方式。甚至，社交媒体开始“牧养”出一批新型的基督徒。在他们眼里，那种强调男女之别的、老派基督徒的做法，已经显得过时了。

几年前，我在朋友圈，见一位姊妹发牢骚，说自己的丈夫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生日也不给自己买礼物等等。我就给师母说，你要给这位姊妹打电话，告诉她这么说，非常危险。因为，这等于告诉全世界所有认识你的男人，你现在很寂寞，很生气，很需要安慰。我知道，还是那句话，“其实并没有怎么样”。但这是一种公开的对婚姻的背叛。是将两个人的生命破口，不但公开展示给他人看，也是公开展示给魔鬼看——请记

住，若没有你的帮助，魔鬼并不是全知全能的。

过去，夫妻之间难免有口角，会生气。甚至在言语上说出背弃婚约的话来。但在我父母那个时代，他们都是关起门吵架。现在，社交媒体带来一个试探，就是将家庭与家庭外的界限模糊了。有人不满人家“秀恩爱”的行为，但似乎没有人对那些公开批评自己配偶的人，表示不满。此消彼长，更叫我们落入极大的试探。

说得直接一点，我劝你们中间的已婚者，恩爱公开秀，牢骚私下发。我也劝你们中间的未婚者，拒绝任何已婚的异性，在你面前抱怨他们的配偶。不是秀恩爱，死得快。是发牢骚，死得快。因为发牢骚是一件需要辅导的事，每当我们说出我们的愤怒、忧伤和一切负面情绪（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的第一选择，是跪下来向主祷告。第二选择，是一种隐秘而安全的团契关系，把你的情感带到敬虔的辅导者或同伴面前，让他们帮助你，回到主面前。而最糟糕的、最不应该的选择，就是打破婚姻的界限，而诉诸于社交媒体。

还有一次，我批评一位弟兄，要他改变与姊妹相处的方式。他争辩说，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这通常是“其实并不会怎么样”之外的，另一个魔鬼的试探。我告诉他说，对姊妹的爱，恰恰是通过界限和距离来表达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包含了一种对妇女的敬爱。骑士们极其尊重妇女，特别是那些已婚的夫人们。在某个意义上，骑士热爱那些夫人们。因此，他们对妇女

保持了一种得体的，甚至是恭敬的距离感。

这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弟兄与姊妹之间的友爱，首先是一种尊敬之爱。合宜的界限，恰恰是我们在基督里、表达这爱的隆重的方式。对尚在基督以外的异性，更是如此。

我能在一些会友身上，陆续看到一些明显或不明显的，因社交媒体而产生的两性关系危机，包括已婚者，也包括未婚者。我也看到一些夫妻的宝贵尝试，譬如有对同工夫妇，他们一直共用同一个社交媒体账户。另一对夫妻，他们甚至共用一部智能手机。我没有让大家效法的意思，但我珍惜他们的做法，相信他们的心在神眼里看为宝贵。

我为此切切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按着“清清洁洁”的原则，在网络交往上不越过性别与婚姻的界限，胜过撒旦散布的谎言。不要让社交媒体的试探，激发我们内心的贪婪与诡诈，污染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属灵情谊。求主让我们知道，“男女有别”，不是一种礼教的捆绑，而是上帝创造的奥秘和救赎的秩序。不要贪恋他人的妻子和丈夫，不要期望在异性心目中获得一个不该由你来占据的位置。求主使这间教会的已婚者，不要保持在网络上与异性的私下交往；使这间教会的未婚者时常警醒自己在网络上与异性的私聊，是否已越过了清洁和亲密的界限。若不必要，就不要频繁地给异性写信、发消息。倘若可行，就在社交媒体上紧闭嘴唇，不说一句毁坏自己和他人婚姻的话。

愿这间教会的弟兄们，都如歌中所唱，“我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众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愿这间教会的姊妹们，都如诗中所写，“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盼望主日与你们相见的仆人 王怡

2017年8月4日于空中

十字架与文化使命

2017 年中国福音会三化异象大会证道

赵天恩牧师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统摄性的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什么叫统摄性的文化？即是与我们日常生活切切相关的，用圣经语言就是与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息息相关。基督教信仰是在上帝所存在整个世界共同体里所发生的一切事。圣经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意思是说，万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万事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飞鸟在天上飞，动车开动。人会说，当然啦，人要出行，工人要挣钱，等等。圣经告诉我们，万事的最高意义就是神要使爱他的人得益处，是为了教会，是为了救赎计划。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统摄性的文化。

可以这样对文化使命作一个描绘。福音使命是关乎称义的，罪人在神面前如何称为义人，我们的得救到底在乎谁，到底是在乎我所作的，还是在乎基督为我作的。我们所传扬的是称义。中国人说，人活着要良心无愧吗？但是，圣经说没有一个人的良心是坦然无愧的。因为所有人都要面对一位造他并且统管万有的神。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的良心是可以用他自己的行为洗干净的，没有一个人会因着自己内里的良善心里感到平安。所以，福音的使命告诉我们，唯有耶稣用他在十字架的舍己，可以使我们的良心得到平安，能够使我们活出起初神造我们时所赐的那个有理性的灵魂。称义是关乎那个有神形象的受造物，他的生活、动作、存留的全部意义是什么。文化使命是关乎成圣的。

首先，让我用《罗马书》12:1-2 来讲这个问题。前面保罗用了整整十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人是全然败坏，无论犹太人、希腊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义人，统统败坏。唯独因着基督的恩典，唯独因着上帝的作为，我们借着信心这个管道，才能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在《罗马书》11 章的最后（34-36），保罗发出惊叹与赞美，说：“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保罗的意思是说，福音在本质上不是道德主义的，不是奖赏，福音在本质上是说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代替。当这个福音传讲开之后，保罗从 12 章开始，一直到 16 章，讲述了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的生活，一个重生之人的全部生活、动作与

存留。保罗说，他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这个身体不是指仅仅一个肉体存在，而是包括该人全部的日常生活，是他肉身的全部生命。这一切要在基督里当作活祭献上。文化基督化，就是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晓得，不是仅仅理性上晓得，更是用我们的生活、行为、存留来晓得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可以说，文化是关乎对上帝启示的响应。对上帝启示的响应，要么是顺服，要么是悖逆和扭曲。在《创世记》3章，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该隐的后代创造了非常繁华的文化，城市的文明，吹拉弹唱等音乐艺术的成就，现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动作、存留都打上了一个印记，那就是堕落的印记，那就是对神的启示以及神放在人心里道德律的扭曲与违背。这个时候，在基督耶稣以外，人类的文化是堕落的文化，甚至神所创造本来是要诉说神的荣耀的诸天，传扬神手段的穹苍，但是因着人的堕落，天地万物也成为堕落之人来表达自己的自义、快乐、情感的物件。因此，人的文化夺取了神的荣耀，甚至剥夺了万物被神创造的意义。《罗马书》12:1告诉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重生的人，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开始有了一种不同文化的样式，因为他们的信仰开始塑造他们的生活、动作与存留。因此，基督徒、教会的生活、动作、存留开始恢复了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这种万物被造的意义，受造之物如今劳苦叹息，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的时刻。因此，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就是基督徒因着信服福音，神的大能浇灌在

他身上而产生出来新的文化生活的样式。如今这种新造的人产生新的文化。这个新文化的特质就是开始恢复对上帝启示的顺服，从对上帝启示的扭曲开始转向对上帝启示的顺服。

其次，文化使命与人本身的定义有关。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造的，世界的文化，教会以外的文化，乃是亏损了在人里面神荣耀的形象。因此，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他的举手投足便开始恢复在他里面的神的形象，以至神的荣耀透过他的生活（这个生活不单单是每个主日来教会敬拜神，不单单是他每天有一个小时跪在上帝面前的祷告），透过他的生活模式，透过他面对每一个人时的举止行为，透过他的言语和他手所作的一切工，他的全部生活要么是亏损神的形象与荣耀的样式，要么是开始恢复神的形象与荣耀样式。这种样式，这种成圣的样式，我们称之为适合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形态。

第三，《腓立比书》里常用一个表述，与新造的人相对应，就是“行事为人”。你们过去的行事为人，是一个堕落文化的一部分，是亏损上帝形象与荣耀的，是扭曲、悖逆上帝启示的；现在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原文中的这个“行事为人”，在整个希腊文化里面，包含了人类的文化形态之意。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文法、语言，与我们对希腊文化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学习语言，其实也在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在希腊文里，“行事为人”不是说个人的人品，不

是从个人角度，而是一个城邦的概念，即基督徒构成了一个城邦，构成了一个圣约的子民，构成了一个国度。所以，文化是有群体性的，文化是指一群人的生活、动作、存留形态。

现在，让我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即十字架与文化使命，十字架与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所呈现生活、动作、存留。基督徒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群新造的人，开始了顺服上帝启示，在这个堕落世界里所呈现出的一种文化。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教会的文化使命一定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一定是在十字架颠倒当中所呈现对这个堕落世界文化的颠倒。

《启示录》11:7-11，诵读。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在福音书里，讲述了神的儿子，为我们受苦。他为什么要为我们受苦？整个福音讲述了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如此受害，被杀，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显明了基督必须受害，是神荣耀的救赎计划，基督受害，为要拯救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彰显了上帝奇妙的恩典与大能的作为。所以，整个福音书的焦点是基督必须受苦。从《使徒行传》到《启示录》所有的书信，让我们看到的是教会必须受苦。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讲到了两个见证人。这里的焦点不是一千二百天有多久，不是三年半有多久，焦点是在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复活，升天，直到再来，这之间主使用他的教会，使用他的教会成为他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之见证在地上的一个继续。因此，这段经文讲的是教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当教会传

扬基督必须受害的福音时，教会的行事为人，形成他们动作、存留的基本方式，跟他们所信的那位主，成就他福音的基本方式，是相同的，那就是：死而复活。这里经文说，这两个见证人起来传福音，如同他们的主一样被杀；而且他们的主在哪里被杀，他们也在那里被杀；他们的尸首在地上三天半，也如同他们的主那样复活。他们被杀之时，世上的人欢喜快乐；他们复活之时，世上的人恐惧害怕。

所以，整个教会的行事为人，整个教会的动作、存留，乃是对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福音的效法。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在教会里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重演，更不是在救赎意义上，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上要添加什么，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里面，让我们看到教会传扬福音的方式，以及教会信靠福音所得的成圣结果，就是走十字架道路。教会必须被打死，才能重新活过来。教会在地上所拥有的一种力量，教会使得神的儿女的生活、动作、存留被改变的那个力量，就是十字架的力量，就是死里复活的力量。因此，当我们说到教会文化使命时，我们说的乃是一种反文化，一种因着十字架使得这个世界原先所以为、所宣扬、所繁荣的一切文化以及有那些文化而来的价值观，和文化中的世界观、逻辑、规则和潜规则，都在十字架面前被颠倒。教会在世上所经历的是：打死，然后复活；世界所经历的是：欢喜，然后害怕。

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

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这里的意思是说，今天，整个世界的文化，按照灵意来说，叫作所多玛文化，叫作埃及文化。中国文化是埃及文化，美国文化是埃及文化，中世纪文化、十九世纪文化以及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文化，都叫作埃及文化，都叫作所多玛文化，而且教会受害，必须是应当的，就是因为他们活在埃及文化当中，活在所多玛文化当中。接下来，说，“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里的意思有些费解。耶稣是在被哪里钉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这里却说，耶稣是在所多玛、埃及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教会殉道的地方。请注意，启示录对耶稣之死的描述，跟福音书的描述略有差别。福音书对基督受害的描述，是在描述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在宣告基督真的死了，基督真的复活了。所以，基督的死，与基督的复活，都是历史事实，在上帝所拣选犹太地和耶路撒冷，地球上那个真实的地方，与生活在那里的那群选民的真实文化紧密相关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在启示录里，描绘基督之死是非历史性的，这并不是说否定其历史性，而是说是超历史的。这里说“按照灵意来说”，这表明不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被杀这件事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具体时间与具体地点，而是说耶稣之死是发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发生在整个人类悖逆神的堕落之中。

我用这样的对比，是要说明，基督之死发生在哪里，会影响我们对所处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看法。我是住在成都的。假如有一个人在成都去世，我们会说：某某死

在成都。但是，如果有一个上海人或东边人到成都来死了，我们会说，某某死在四川了；如果一个美国人死在成都，在美国人看来，他是死在中国。如果一个法国人生活在成都，后来死了，那里的人会说：他死在亚洲了。耶稣是从天上来，我们会说：他死在耶路撒冷；死在地上；他死在这个世界里；他死在所多玛；他死在埃及。因此，这段经文告诉，耶稣基督就是死在成都的，就是死在北京的，就是死在华盛顿、巴黎……的。

这段经文将耶稣基督的被杀、复活与他再来之间的整个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也将耶稣基督被杀、复活、升天直到再来之前的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作为一段时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教会在这期间的使命是什么？什么是我们所说十字架与文化使命呢？就是说，耶稣的死里复活颠覆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文化以及我们生活、动作、存留的基本态度。这个世界的逻辑就是挣钱，就是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那么，什么是教会的文化使命？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在他财产、职业以及凡与金钱相关的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活、动作、存留呢？不是追随这个世界关于财富的文化，而是在十字架里。

《哥林多后书》八章中，保罗在讲到奉献时，有一节经文说到了整个财产的神学，即基督徒在世上与金钱相关生活的最高意义，那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你们在他里面成为富足，所以我们应当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住在他的富足

中，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贫穷，愿意活出与这个世界的金钱文化所不同的一种文化——施比受更有福，用贫穷来彰显在耶稣基督里的富足。十字架完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种藐视，对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种反对，因为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反对十字架的。这个世界是相信眼见为实；是用数字来衡量人的价值，数字越大，价值越高；是用人的行为和道德来衡量人的地位以及他的现在与将来。十字架颠倒了这一切！十字架用死亡来衡量生命，用卑微来衡量尊贵，用贫穷来衡量富足。

那么，对于一群新造的人，一群在圣灵重生的恩典中所形成新的行事为人标准的人，我们来看这时的文化使命。很多人误以为，靠着神的恩典，基督徒过积极的生活，一个信主的人，靠着神在他身上恩典，便成为世上最富足的人，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人群，他吸引这个世界的人，使人们认为信耶稣的人能在世上成功，这就是我们教会文化使命。我们在政治上这样，便取得优势地位，在经济上我们为主做一个有钱人。

不对！这是对文化使命的极大误解，甚至是把福音已经颠倒的再一次恢复。教会的文化使命，就是教会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这个堕落的所多玛、埃及文化里，活出一种与埃及文化、所多玛文化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反文化。这个世界看重金钱，教会呈现出来的行事为人不看重金钱；这个世界敬畏、惧怕权势和刀剑，教会呈现出来的文化就不是说我一定要拿到

权柄，拥有刀剑，而是呈现出可以被刀剑所杀的一种真正反政治。在末后的世代，教会一定会反映出极强的政治性。什么叫政治性？教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里运作，便与这个更大的共同体的权势以及其中公共生活的逻辑，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对抗，事实上的相反，事实上的针锋相对，事实上的属灵争战。这场争战，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是一场宇宙性的属灵争战，就是撒但，那个红龙，那个魔鬼，它要逼迫那个妇人所产的孩子，它要逼迫教会，所以教会在地上与魔鬼撒但所展开的属灵争战，必然呈现为文化层面上的战争。在这次文化战争中，什么样的文化？婚姻，家庭，教育，政治，经济，等等，在这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中，要么是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十字架的功用下，呈现出一种看万事如同粪土一般的行事为人，用他们的卑微来彰显一种真正的尊贵，用他们的贫穷来彰显一种不能为这个世界所夺走的财富。所以，基督徒不是一定要争取进入上流，一定要在经济上成功，才叫文化使命。当然，也不是说做基督徒一定要贫穷，才能更加彰显他的文化使命。而是说，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在乎他的钱多钱少。贫穷的基督徒，可以用他们的贫穷来彰显一种大有能力的行事为人；富足的基督徒可以用自己的慷慨，看万事如粪土，千金散尽，喜欢耶稣基督再来。这就是基督徒在财富问题上，因着十字架而带来的文化使命。在教育上、政治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社会也是如此。

在一个文化上的基督教王国，从全球范围而言，正在结束，

正在过去，包括美国。当我们谈到文化使命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要建立一个文化上处于主流地位的基督教王国，我们乃是在一个末后、多元社会里谈教会和基督徒群体生活的样式，如果他们真的信福音，便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动作、存留，当作活祭献上，所形成的行事为人，所形成的一个新的城邦是什么，这时所呈现出的一种文化形态与色彩，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对抗气氛，所呈现出来的与这个堕落的世界文化格格不入，到底是什么。教会的文化使命，就是在这个敌基督文化中，传讲一种格格不入的文化。这个格格不入，不是指在某件事上格格不入，不是指在普遍恩典意义上我们完全不要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切，因为有很多是上帝普遍恩典的产物，教会完全可以使用，世界里一定有教会与世界共享的文化内容，但是，教会的文化使命是说，与世界共享文化内容的那些重生之人，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是否彰显出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文化质量。我们之后会展开来将怎样不同的文化质量，包括从末世论和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教会文化使命的文化质量。

最后还想分享一点。在《腓立比书》3:20 和《哥林多前书》以及其他地方，保罗不断地提到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徒的受苦和十字架之间的关系。有一位牧师作了这样的对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与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的慷慨就义，有什么区别，甚至包括教会历史上那些殉道的圣徒。我们看过丁道尔的殉道，看到过初期教会游斯丁等那些殉道士的殉道，看过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清教徒的殉道，甚至中国教会的殉道士，他们

殉道时真的是一种视死如归，是一种慷慨就义，是一种喜乐。这一切画面，是否很美？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殉道时，是否比耶稣更加豪迈，更加无畏？如果我们在教会里，看到有一位被杀时，如同耶稣那样呼唤：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并且大声哀号。我们会不会有点瞧不起，说：这算什么殉道者？怎么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看看主耶稣，他从客西马尼园一直到十字架上，都是苦弱，甚至哀伤自己与天父之间隔绝了。我们又有看到，当耶稣问门徒“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彼得说“我们能”，但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不能喝”，这是指着救恩而言的。唯有基督的死，是与救恩相关的；唯有基督的死，是我们称义的基础，因为他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救赎。耶稣基督又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刚才说不能喝，现在又说也要喝。前面说，我的十字架不是你们能被的；现在又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耶稣前面讲的是称义，后面讲的是成圣；前面讲的是救恩论，是在救恩的意义上，基督的受苦，任何人都不能参与。基督的受苦，是在宇宙中最孤独的事件，是宇宙中因着我们这些与主隔绝的人，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被带到天父面前，与天父联合。基督与神的联合，即如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所说“父啊，在万事以先，我与你共享的荣耀”，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联合，他却为我们承受了分离和弃绝。基督的受苦，是他为我们所承受的与父分离的苦楚；他却说：你们也要受苦，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受苦，在任何意义上都与救恩论无干，乃是在基督的复

活里来分享、参与他的受苦。这就是基督的被钉十字架，跟基督之后所有信靠他和在他里面的殉道者，为主的名殉道，无论是被钉十字架，还是被火烧，被刀砍，这二者之间的迥然差异。基督被杀时，他是孤单的，是被弃绝的，是流泪、哀号的。而所有因信基督而受苦的人，在受苦中所经历到的，不是分离，而是联合；不是大声哀号，而是充满了至高的喜乐。有一位牧师说，基督的死里复活，顺序是：基督先要被杀，受死，进入阴间的权势，践踏死亡，胜过死亡和阴间，然后复活，升高；这是基督的整个降卑到升高（腓立比书 2:6-11）。那些在基督里重生之人我们的顺序是相反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先经历降卑，然后升高；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先被杀，然后复活，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先复活，然后再受苦。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被他拯救，分享他复活的生命，乃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受苦而得到神给他复活的奖赏，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已经复活的人。复活的人，才能有受苦的能力，开始有了在受苦中彰显复活生命的文化的力量。

容我再总结一下。基督是先被杀，然后再复活。所以，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所经历的是绝对的苦难和与父的分离，被父的弃绝。而在基督里，信靠基督，在他之后受苦的所有基督徒、所有殉道者，他们是先复活，然后再受苦。所以，当他们受苦时，甚至当他们殉道时，他们的属灵经历与基督的属灵经历完全相反，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完全相反的慷慨就义，无畏的就义，荣耀的就义，充满喜乐的

就义，英雄般的就义。新约教会的第一个殉道士司提反就义时，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有什么不同？因为他看见天开了，那位已经降卑，已经升高的耶稣基督，在天上向他显现，而且从他天上荣耀的宝座上站起来，迎接他受苦的仆人。这就是启示录 11 章所描述的那两个见证人。今天教会全部的行事为人，全部的生活、动作、存留，是带着在基督里复活的力量，而走在受苦的道路上。所以，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他们不需要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才能颠覆这个世界，他们不需要成为政治上的精英才能改变政治。基督徒是要通过受苦的方式来改变政治。基督徒是要通过受逼迫来颠覆逼迫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反文化的文化使命，就是反政治的政治。有一次我在派出所里，警察问我：你是不是用宗教搞政治？是不是要颠覆国家政权？我就问他：祷告算不算颠覆国家政权？他想了一下：对呀，基督徒要祷告，要向神祷告。我说：“我在家里经常祷告，说：主啊，求你伸手颠覆这个政权，求你使你的荣耀早日彰显出来，早日伸手审判地上的不义，求你改变这个国家对你教会的抵挡。”我就问那个警察：“如果祷告也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话，我经常用祷告颠覆国家政权，我信主多少年，我就在祷告中颠覆了多少年。”他说这个不算吧。我说：哦，这个不算啊？这个不算，我可能颠覆不了政权，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这意思是说，神想什么时候颠覆这个政权，神就在那个时候颠覆这个政权。神的时间没有到，教会在这个地上影响、改造这个世代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承受神在这个世

代所加给他们的一切处境，并且在这个处境当作勇敢地持守，以祷告颠覆地上那个政权。我告诉那个警察说，两千年来，教会每一次用祷告颠覆地上的政权，全部都成功了；后来凡是用祷告颠覆的政权，没有一个不被颠覆的。

《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最后讲到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最典型的用祷告颠覆地上政权的模式，最典型的用十字架力量来呈现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那里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我们天天在神面前祈求，愿神恩典的国度天天在我们当中扩展，愿撒但邪恶的国度天天在我们当中消退败亡，愿上帝荣耀的国度早日在我们当中降临。阿们！

2017 年 9 月 12 日

保守主义与文化使命

2017 年中国福音会三化异象大会证道

犹大书是圣经普通书信的最后一卷。刚才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整个末世的氛围。比如，这里说到，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耶稣也说过，末世必有假先知、假教师出现，甚至有宗教的文化出现，能行神迹奇事，迷惑人心。在使徒书信，尤其是后半部分的书信中，表明了初期教会前三十年到初期教会后三十年的历史，从当时的观点来看，地极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域，甚至有人说保罗想通过罗马进入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在大海的另一边，那里就是地极了。福音已经传遍了当时的地中海四界。从文化上讲，福音进入了文化。在初期教会的后三十年里，世界文化也进入教会。因此，犹大书里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信仰与文化、福音与文化的争战场面。

一些书信里都提到里初期教会出现了异端。异端的产生，一般都是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启示，在向其他文化和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福音的反向影响。为什么中国政府对福音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特别敌对三化异象。基督教中国化，是整个中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中国的政治文化、专制文化、马列文化、儒家文化等等一个庞杂的体系，这些文化进入教会，要影响教会。当这些文化与教会的部分信息结合之后，异端由此产生。

初期教会第一阶段，按照《使徒行传》1:8 的记载，教会等候圣灵降临，便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之后便进入异教文化的希腊，最后达到罗马。这期间，当教会以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为中心时，出现了第一波的异端——基督教犹太化。当时，要么是犹太教基督化，要么是基督教犹太化。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但是，外邦人是否要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犹太人，才能作福音意义上的基督徒呢？到底是基督教犹太化，还是犹太人基督化，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使徒行传》15 章，在耶路撒冷大会上，在教义上有了一个结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至少在之后的《加拉太书》第二章里有所记载。彼得和巴拿巴是反对基督教犹太化的，他们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支持大会决议的，他们也坚持犹太人基督化，而不是相反。可是，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看到，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一群犹太基督徒，那些人坚持基督教犹太化，彼得和巴拿巴感到有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罪，当然可以换一个说

法，是文化的压力。当他们受到族群、血缘的、文化的压力时，福音的理念，他们当然相信，但是面对压力，开始动摇了。所以，保罗说：我一看他，与福音行得不正。这里讲的就是行事为人，指彼得行出来的是与福音不符的文化，是反福音的文化，即他本来肉身中的文化，世界的文化。基督徒重生、称义，并不能代表不再受反福音的文化影响。比如说，两个中国人，一个信主，一个不信，很大时候你能很容易区分信主的与不信主的，就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行事为人有新生命的样式，比如，他们的婚礼、葬礼都不一样。可是，还有一些场合，一群中国人在一起，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还有一群美国人在一起，里面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如果你发现两群人中，信主的是一伙人，不信主的是一伙人，这就说明我们的文化使命做得很好。一般都会说：信主的中国人和不信主的中国人是一伙的，信主的美国人和不信主的美国人是一伙的。把他们区分开的第一要素，不是福音，不是信仰，而是文化。彼得，让人一看，就是犹太人，他的行事为人特色，他的身份，大过在他身上的福音所带给他新的身份。因为福音在他身上尚未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福音进入希腊，随后又进入罗马。这时在教会史上，出现了第二波的异端，即基督教罗马-希腊化。到底是希腊要基督教化，还是基督教要希腊化？在初期教会大约两百年时间，已经看到与希腊基督化相反的结果：基督教希腊化。那是初代教会的主要异端——诺斯替主义。诺斯替是希腊哲学思想，并加上

一些东方的神秘主义，跟他们所听到基督的福音结合之后的产物，即福音进入不同的文化，世界的文化也进入教会，甚至扭曲了教会对福音的服侍。所以，这里提出了警告，正面来说，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即回到以圣经为本，以圣灵的工作为基础，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怜悯，以怜悯为王的这个信仰，把这个信仰与很多形形色色与之似乎相似，却根本不是的各种文化，区分开来。区分过程中，有些人有疑心，有动摇，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存怜悯的心，要去救他们。这个“救”里面，救包含了我们所说的文化使命。

因为当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与福音相偏离时，教会的福音工作也必然带有护教学的特征，即保守主义的文化使命特征。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文化使命，首先是十字架的印记，其次是在宏观上，整体性的末世性，第三个护教学的特征，即一种保守主义的、护教的文化特征，即文化争战。必须与他们争战，攻破人心中一切坚固的营垒。就是指，人心中受到世界文化塑造而产生根深蒂固的心思意念，要被神的道剖开。一方面是说，主的道大有能力，可以剖开人一切的心思意念，并且攻破人心中一切的营垒；另一方面，福音指如同一个极其复杂的手术，需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工作，不可有任何差错，进入文化的深处。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那种世界文化，被称为火。

文化使命，是一个拯救的工作。“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衣服也当厌恶。”世界的文化，就是沾满了情欲，被称之为火。

圣经教导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在一个末后的世代，文化对教会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强烈，充满了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福音传入任何一个文化里，传入中国文化，传到今天，我们面对的争战是什么？与福音使命紧密相联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福音化以及文化基督化之间的争战。我在这里提到一种保守主义。有人说，保守主义不是非常明确地依靠主的力量，甚至是人性中一种比较模糊的文化倾向。比如说，中国有一句古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人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景仰。怀旧也是一种文化，很复杂。保守主义是与这个世代强烈的进步主义、求新相反的文化倾向，即求旧。新的有价值，还是旧的价值？慢一点好，还是快一点好？迟疑与审慎，是愚蠢，要被淘汰，还是优质？西方的保守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讲，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是整个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激进主义全面改造社会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的背后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开始产生于对基督教的质疑，对上帝话语的质疑，对上帝话语的基础上所形成基督教王国的质疑，便产生出一种以人为主，是被神的话语和教会权柄压抑了上千年人灵性的力量、人自尊的力量，一个井喷式的爆发，从思想运动到政治运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欧洲，人类第一次产生出一种过去人无法想

象，现在人却耳熟能详的东西，即整个社会可以按照一个理想或者一个设计师的蓝图，打破再重新建造。社会不是慢慢形成的，社会对超自然上帝的护理失去了敬畏，社会可以是一个技术性工作，如同家里装修。整个社会有两千年历史，现在全部打烂，按照一个理念重新建造，好像装修似的，好像新的家一样，便有了更好的文化，更好的政治，更好的法律；通过革命和暴力，重新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从法国大革命起，世界开始建立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激进主义的社会最强大的文化。我们不可认为这个文化跟我们没有关系。之前，用多年前的老怀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今天你用昨天刚刚发布的一款新手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价值取向完全一样，文化氛围也完全一样。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思想。这种保守主义通常珍惜并且倾向于渐渐逝去的基督教文化，因为整个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是出于对基督教的反感，而保守主义是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出于对激进的进步主义深刻的怀疑。

中国人经历了这百年反复的革命，经历了反复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造，今年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仅是基督徒，开始深深地怀疑人是否可以用一种权力，用一种理想，把整个社会重新建造一次。启蒙运动催生出法国大革命，西方从此走上一条去基督教化的道路，甚至是反基督教化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法国大革命之后，又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发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本来是关于自然界的假设，慢慢变

成了一个最强大的世界观。上帝创造万物，人类堕落，耶稣基督拯救，将来新天新地这样一个大故事，被另一个故事取代。那个故事叫进化论，那个故事叫万物在偶然中发生，是在一种不可知力量下的突变。那个假设本来是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这时变成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弗洛伊德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架构，产生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设想，产生出希特勒，从左右两个方面对整个人类社会重新进行塑造，甚至在今天西方的自由主义、环保主义等，同样是要按照一个理想重新塑造一个人类社会，同性恋也是按照一个价值理想来重新塑造社会。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个进步主义的共同特征，都具有与保守主义相反，与基督教相反的文化特质。

欧美国家故事可以分成两大段，一段是一千七百年的福音化故事，当然这个福音化故事里面有文化反过来对福音化的侵蚀与扭曲；另一段是最近三百年来来的一个异教化的故事。我们今天虽然反对基督教中国化，但是今天即全球范围来讲，还有一个比基督教中国化更危险的事实，就是基督教美国化。基督教在文化上是相当的美国化，以至于我们听到一些观念时，需要费劲地辨别那个观念到底是基督教的，还是美国的。举例说明。很多人都提到说，1900年，作为一个转折点，十九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和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十九世纪早期来华的宣教士，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保守主义的基督教文化特征，基本上不会将西方文化与他们传讲的福

音看作一回事，他们希望把福音带给中国。为了有助于把福音带给中国，他们也会介绍一些西方文明，帮助中国提高教育。但是到了 1900 年这个转折点时，西方的自由神学兴起。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认为，单单带给中国人福音是不够的，中国人要接受福音，必须要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文化。所以，使中国成为被西方自由民主更新改造的国家，与中国人接受耶稣基督，在很多宣教士那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在 1900 年之后来华的宣教士中，比例上有了极大的转变。在十九世纪来华的宣教士中，百分之七八十是直接从事福音工作的传道人，即直接从事传讲福音并且牧养教会的工作；二十世纪之后来华的宣教士中，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百分之六十是从事教育、医疗、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文化使者，直接从事福音传讲、建立教会，服侍教会的越来越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本土教会大复兴，山东教会大复兴，东北教会大复兴，出现了一大批本土传道人，因此形成了本土的基要派教会，本土的保守派教会。从那时起，中国教会主要的教牧领袖，主要的传道人、布道家，以及有影响的牧师，不再是西方宣教士，而都是保守派的本土领袖。而这些保守派的本土领袖，都是 1949 年以后中国家庭教会最主要的领袖，和最主要的被逼迫，走十字架道路的末世圣徒。很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纪之后来华宣教士，已经没有任何一位著名的牧师了。

在本土牧养教会的，都是本土牧师了。西方依然有大量的宣教士在中国，他们在差会里占据职位，但是，没有一位在牧

养中国教会了，外国宣教士在中国教会没有一位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教牧领袖，所有宣教士加起来都不能超过倪柝声、王明道、计志文、宋尚杰等中的一位。中国教会在 1949 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受现代主义、现代文化、现代性进步主义文化影响的一批教会和教会领袖，其实这批领袖在教会里属灵的地位与权柄都不是太高。而另外一批保守势力，与这个世界的潮流以及德先生赛先生疏远。到了 1949 年，法国大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所催生最强大的毁灭性的世界文化，就是共产主义，而中国的进步主义以及德先生赛先生所催生最邪恶的势力达到了顶峰，那就是共产党。1949 年之前所形成基要派和现代派，是不同的教会文化；在今天中国教会有两个不同的基本形态，那就是文化基督化，和福音中国化。教会的文化和教会的行事为人所形成的基本形态，与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凡是紧扣，与时俱进，还是与格格不入，保持着一种批评精神，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战场。当然，从最简单的信仰来说，教会里姐妹们所穿的裙子，比世人所穿的，总是长一点点。也许有人说，这个不重要，这个算什么，欧洲社会是这样，美国社会是这样，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封建，那么落后？这就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现代性。

今天教会的文化使命就是呈现出这种具有保守性，有距离感的战场。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文化形态。在今天的欧美社会，文化全面世俗化，甚至丢掉了信仰，实行一种完全被扭曲了的政教分离，如此伊斯兰在这样的社会里全面复兴。这个世界在

文化上已经全面地去基督教化。中国教会也是面临着三大现实：一个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凡事看重对权力的要求；二是以反宗教为特征的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的权威，这个权威在教会里不断地反对圣经的权威性；三是不断地反权威的平等主义，却又寻找、制造新的权威。我的意思不是绝对地全部反对这一切。但是在这末世期间，教会的文化使命，又称之为福音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便成为教会这一群人的行事为人所呈现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婚姻家庭层面，完全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的文化格格不入。在知识架构方面，在整个生活方面，教会呈现出来的是清晰的、明确的、坚决却有活泼生命力的保守主义文化。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死人的活传统，和活人的死传统。今天教会的文化使命，就是如圣经所说：他们死了，却依然因着信在说话。死人的活传统，在我们身上，因着十字架，活泼而又能力地与世界现代性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张力，呈现出一种矛盾，呈现出一种保守主义的行事为人，成为教会文化使命。

感谢主，我们已经完全展开了对文化使命的理解，有三点，第一，十字架印记的特征；第二，宏观的末世论特征；第三，保守主义的文化特征。求主在这三方面带领中国教会。因为中国教会在受逼迫中依然带有下面这些特征：一、对圣经的绝对依靠与信赖；二、强烈的末世论倾向，同样包括在伦理道德、婚姻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形态上，保守主义的特征，盼望中国教会在复兴的同时，在向西方学习不断提升我们对圣经的领受和

神学教育的同时，保守这三大特征，并且在中国社会里活出以十字架为中心教会的文化形态，强烈而活泼的末世论文化形态，以及对现代性保持批评的保守主义文化特征。求主保守我们！

2017年9月12日

末世论与文化使命

2017 年中国福音会三化异象大会证道

我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21:3-8

神在这段话里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末了。正如《诗篇》开篇即向我们描述了两不同的人 and 两种不同的结局一样，这里也有两种人。一种是，神要求主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神的子民，直到永远。这在旧约中神与他百姓立约以来的关系；“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这是从旧约一直到启示录不断重复的话。第二种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的第二次死，这样一个永远的结局。这里所描述的，其实就如律法所规范我们全部的生活、动作、存留的一样。文化跟律法是有关系的。背离上帝的律法，和尊崇上帝的律法，所出来的是不同的文化形

态。归于无有，归于永远的死的，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很有意思。很多人说，在中国社会，如果不说谎，不做假账，不遵守潜规则，你就寸步难行。**GDP**就是今天的流行文化。今天的文化就是用**GDP**来衡量的，今天的文化就是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等等。有人说，今天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由离婚率来看的。今天中国大城市的离婚率很高，和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而农村还是很低，所以，城市的文明程度高于农村的文明程度。淫乱、拜偶像在中国**GDP**里都占有地位；“一切说谎话的”，在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占据了很大分量。整个世界的文化，是一个不信的文化，是一个淫乱的文化，是一个说谎话的文化，是一个与神的律法相悖的生活、动作、存留所形成的行事为人。

整个启示录给了我们一个超时空的描绘。这里没有区分具体的地理世界，具体的时间，即主后哪一年，而是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描绘，这时，我们会发现教会在这个末后世代的文化使命。我们已经讲过，福音使命对应的是使人称义，文化使命对应的是新造之人的成圣生活。有一个命题，即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统摄性的文化。第二个命题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文化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末世性的生活。在教会里，很多人认为，文化使命是与某一种特定的末世论，尤其是与一种乐观的、过渡性的末世论相连，因此在教会基要派神学中，他们基于特定的末世论，比如时代论对启示录关于历史进度的

理解，于是反对教会的文化使命，持一种圣俗两分的生活方式。

我在这里要将与十字架为中心的文化使命相关的主题，即末世性的文化使命。教会在今天的文化使命，就是在于她对于由圣灵重生之人的行事为人，不是与一种乐观的末世论必然联系在一起，而是一定与一种宏观的末世论联系在一起。不是乐观的末世论，而是宏观的末世论。乐观的末世论，就是一种过渡性的末世论。加尔文用这样两个概念来表达今天这个世界跟那个将要来到的新天新地，跟那个将要来到的世界，以及我们将要成为完全的永远生命，这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概念，就是连续性和断裂性。可以说，在教会中各种基要派的信仰，更加重视今天的这个世界，当然包括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与将要来到的那个世界，二者之间的断裂性，一种极其强烈的断裂性。圣经中都多处描述这种断裂性的决绝程度，比如：天地都要废去，天地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融化，它表明的是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另一个世界将要来到。一个去，一个来；一个死，一个活。好像一个大舞台！

换一个舞台，这个比喻可以延伸一点。有一个舞台，第一幕演完。这时剧场的灯熄灭，一片黑暗。这时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工作人员在忙碌着。一会儿，灯亮了，舞台上换了幕布，变成了另一个舞台。从一个物质性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全新的舞台吗？其实还是原来那个舞台，你还是坐在那个剧场里，怎么叫又换了一个舞台呢？因为这个舞台跟前面的那个舞台的

布局完全不一样，是第二部了，是一个全新的舞台了。基要派比较强调今晚看的这出戏，第二部与第一部之间的断裂性。完全是一个新的舞台，接下来的故事要在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场景里展开，跟前面那个场景是断开的，是重新开始的，一切都不一样了。自由派的神学与教导比较强调现在这个世界跟将要来的那个世界之间的连续性，他们会告诉我们，今晚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剧场，无论灯光的调整，无论舞台上的布局、场景有什么不同，其实还是同一个舞台。圣经中有多处描述了这种连续性，比如：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耶稣真实的死，耶稣的被杀、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都表达了耶稣死亡的真实性，但是，当基督复活以后，有一件事，即复活的耶稣基督居然带着肋旁的伤口，还有手上的钉痕，就如多马所说“除非我亲手探入他肋旁的伤口，和手上的钉痕，我总不信他复活了”，因为多马知道耶稣事实地死了，我常想，多马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太重视这个连续性了，是否太强调耶稣基督被杀的那个事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复活后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为什么还要带着他死亡时的那个死亡的印记呢？我会认为多马的想法和要求相当不合理，如果复活的耶稣站在你面前，没有伤痕，更容易理解，因为耶稣基督必须被杀，是一个奥秘，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复活的基督身上居然带着死亡的印记。

有时候听到大家说起将来永远的生命时，甚至会问：我是单眼皮，复活以后会是双眼皮吗？我小时候摔了一跤，额头上

有一个疤痕，等我复活时还有这个疤痕吗？我们都会希望将来的生命是一个完美的身体。可是复活的基督身上永远带着伤痕与钉痕。启示录里没有称耶稣为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知道，启示录用的是—种超历史的描绘方式，不像福音书进入真实的历史时间，可是在启示录里耶稣通常被称为“被杀的羔羊”。我们认罪悔改，归入基督后，都不愿意被称为：曾经吸毒的王弟兄，曾经犯奸淫的张弟兄，等等。是的，一切都过去了，都被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了。可是主耶稣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上帝，他的降卑是一个惊人的奥秘，是上帝的恩典，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要降卑，为什么必须受害。天离地何等的高，东离西何等的远，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这个我明白了。可是他复活之后，他已经升高了，不再是那种降卑状态了，但是没有回到他原来未曾降卑之前的那种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却是永远带着他曾经被杀，曾经死亡的印记永远的神。所以，复活基督的身上，显明了今天这个世界，与将来那个永恒世界之间的连续性。

可以说，基要派过于重视断裂性，所以，他们极其强烈地反对文化使命，极其强烈地反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动作、存留所呈现出的文化形态，认为这没有意义，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只有信耶稣，只有称义才有意义。从而忽略了成圣本身的文化性、统摄性、整体性，甚至在福音使命中的见证力量，以及与这个堕落世界的文化争战。所以，他们的末世论是分离主义的末世论，圣俗两分的末世论。他们反对文化使命，就是基于这样断裂性的、悲观的，将今天这个世界与将来世界

完全一分为二的末世观。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在十九世纪之后，自由派强调连续性，以至忽略了断裂性，忽略了在连续性与断裂性之间十字架的颠覆性，就是反文化的文化，通过受苦彰显出复活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的复活给了我们受苦的能力，而且改变了受苦这件事的意义。如果没有复活，没有先受苦再复活，这样的受苦就是道德主义，这样的受苦就是世界上道德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复活能力中的受苦，成为那一个将要来临，现在已经来到那个世界在我们当中真实存在的一个文化标志。未来已经闯入现在，这就是教会末世性文化使命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基要派过于强调断裂性，所以反对文化使命，以至走向分离主义。自由派过于强调连续性，便使他们的文化使命也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那就是社会福音。在改革宗神学和改革宗教会内部，一些右翼，特别是持有两国论的右翼，他们也比较倾向于基要派重视断裂性的文化使命立场，而内部的左翼左派们，比较倾向于甚至让人分不清楚他们与自由派对社会福音的参与和强调而产生的那个果效，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区别是什么？第一，教会所谈的文化使命，是否以十字架为中心；第二，教会所谈的文化使命，是否是末世性的文化使命。可以说，过于乐观的末世论是自由派，或者说，倾向于自由派的，容易导致一种在这个世界以内国度实现的末世论。我们说过，末世性的文化使命，不是乐观的末世论，而是宏观的末世论。宏观的末世论是断裂性和连续性相平衡的，是未来已经闯

入现在。未来在我们这里成为一个被新造的现实，超现实的现实，超现实正在成为现实，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你活在现在，你就同时活在未来。举例说明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十世纪有两部重要的基督徒作品，CS 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以及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这两部作品，好像童话，或者说魔幻小说。首先，描写超自然的世界；其次，带有强烈的末世论，这个世界在书中被描绘成如同启示录所呈现出的一场末日大战。《纳尼亚传奇》读完时，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二战之后，伦敦因为受到纳粹的空袭，有一个家庭就把四个孩子送到乡下去。孩子们在乡下进入了一个很奇妙的世界，纳尼亚世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不但是未来闯入到一个看起来物质主义的真实世界，孩子们在这两个世界了穿梭。真实世界很难糟糕，看起来很快就要灭亡。孩子们在纳尼亚世界里好像做梦一样，正美妙得很时，蒙醒了，便又回到现实时代。这次，狮子王阿斯兰说，这次你们就留在纳尼亚里了，因为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出车祸死了。这时，你才发现，这本书事实上在将这个世界里家破人亡的故事。还在战争时期，整个国家没有希望。世界的悲剧，国家的悲剧，轮到了这个家庭的悲剧，全家人都在车祸里丧生。如果你不用纳尼亚的手法，如果你不用这个童话的、超自然的、末世性的手法，而是用现实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方式来写，那么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即二战期间，一个家庭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国破山河在，但全家都死光光了。悲剧啊！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小说，中国人经历

了太多的苦难。这就是基督徒在世的可以说苦难吧。他们死亡时，柏林还没有被攻克。

基督徒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行事为人，是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一种末世性的文化。请问：创世记第一章里，上帝给亚当夏娃的使命是什么？修理看守，治理这地，生养众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都要这样做的。修理看守，照料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人是神的形象，通过人生活、动作、存留，我们的行事为人、举手投足，神的形象遍布整个世界。在亚当夏娃堕落后的这个世界里，在耶稣基督用他的死里复活，用他的十字架带来救赎的这样一个被救赎但是尚未完全的世界，一个将要过去的世界，一个奴隶的文化是什么，与治理这地的文化有什么关系。

现在很多人对文化使命有一种误解，因为不是从末世论的角度，没有死里复活和十字架，这样的文化使命，比如说，一个奴隶，现在信了耶稣，他要参与文化使命，归根到底，就是治理这地的使命。除非废除奴隶制，除非他成为自由人，当选为议员，就可以发挥很多影响。今天在美国有许多福音派的基督徒右翼，他们认为文化使命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过去三十年里，他们焦点放在影响华盛顿上。其实，不是说影响华盛顿不对，而是说，十字架和末世性的信仰，意味着一个奴隶不一定要成为自由人，才能治理这地。一个奴隶，一个信了耶稣的奴隶，可以继续做奴隶，却可以参与治理这地。作为一个在世

界上被统治的人，通过他的被统治，参与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治理。如何参与？通过他的生活、动作、存留，通过他的行事为人。通过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所产生出来反文化的文化力量，反政治的政治力量。这个力量，有一天，在教会两千年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废除了奴隶制。请注意，废除奴隶制，并不是文化使命的判断标准，或是要达到的目的，耶稣基督在他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专制统治？肯定会有！只不过是另外一个面貌出现。连民主制度在西方正在变成新形态的人类专制制度。文化使命的实质，对整个世界文化主流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是一个可能以数百 years 计甚至上千年计的过程，但是文化使命是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的行事为人所呈现出将来的世界闯入现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在某个意义上，一个顺服耶稣的人，在他内心单单信靠神，绝不信靠其他任何受造之物的，拥有圣灵所赐灵魂自由，在他的生命里，在他的行事为人中，就已经废除了奴役。或者说，在他生命中已经包含了一种最终要废除奴隶制的文化力量。

末世性的文化使命，既不同于强调断裂性的基要派立场，也不同于强调连续性的倾向于自由派的立场，把末世放在这个世界以内实现。十九世纪后半期之前，教会的系统神学对末世论有一种狭义的观点。什么叫末世论？知道系统神学的都知道，是讲神论、基督论、人论、启示论等等，最后才是末世论。所以，在传统神学里，末世论只是里面的一个主题。这就是一种狭隘的末世论理解。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的信仰里，大部分

时间都与末世论无太大关系，好像这是只有得了绝症或者 65 岁以后才会考虑的神学问题。但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改革宗神学里，开始慢慢地出现了一种整体性的、宏观的末世论。

举例说明。《马太福音》24-25 章，耶稣的橄榄山讲论，被称为福音书中的启示录。门徒问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请注意，这里的“降临”一定不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为什么？耶稣曾三次预言了他的受死，而门徒对耶稣的受死不理解，并且对耶稣宣告说他死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也不理解，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他们都无法相信这件事，更不用说升天，以后再来了。他们问耶稣：你复活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吗？甚至耶稣升天时，他们还在远远地望着，天使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门徒根本没有耶稣还要再来的概念。但是，请注意，耶稣在他后来的讲章里，他的确大部分是在讲他第二次再来。

如果我们把从旧约到新约的启示，如果我们把神在历史中所预备并逐渐展开的救恩计划，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就会看到，在这个救恩计划里，在他拣选百姓以及百姓的盼望中，这个盼望归根结底可以描绘为“耶和華的日子”，即旧约百姓的盼望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末世或曰来世的盼望。那个盼望被称为“耶和華的日子”。只有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神的启示，

特别是在达到启示录时，我们才能清晰地区分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耶稣的门徒以为耶稣的第一次来，就是他们所盼望“耶和華的日子”。那个“耶和華的日子”实际上是一个大而榮耀的日子，成全和得勝的日子，所以，他們根本無法想象耶和華的日子怎麼是受苦的日子，怎麼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日子。耶穌的门徒按照旧约里“耶和華的日子”来理解耶穌基督的第一次来，所以应该是一个榮耀的、完全的、得勝的日子。在某个意义上讲，这并没有错。因为耶和華的日子，一定包含了榮耀、完全、得勝。“降臨”本身，就表达了這個意思。降臨，就是君王登基，君王坐在榮耀的寶座上，那個就叫作耶和華的日子。但是，旧约的百姓，包括耶穌的门徒，他們所理解的“耶和華的日子”，是一个整体，所以，不能說他們所等待耶和華的日子就是耶穌的第一次降臨，也不能說他們所等待耶和華的日子不是指耶穌的第一次降臨，而是指第二次再來。实际上，旧约所启示耶和華的日子是指从耶穌的第一次来到耶穌基督的第二次来，这期间整个都是耶和華的日子。今天的教会过于对耶穌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作了太強烈的区分。这个区分没有错，这个日子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从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被釘十字架，死里復活，升天，到他第二次降臨，整个都是末世性的世代。我們活在末世当中，我們的文化使命是末世的文​​化使命。耶穌說，他这次来不是为审判，而是为拯救；再來是为审判，要用他口里的道进行审判。是的，我們可以区分耶穌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但是，要注意，我們需要综合，要把耶穌第一

次降临，即道成肉身的降临，和他第二次大有荣耀的降临，与他的众圣徒一同降临，当成一次性的降临，这个一次性的降临就是末世性降临的两个阶段。当我们这样看时，末世就是一个宏观的末世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新造的人之后，他的全部生活、动作、存留都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与印记——十字架。保罗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歌罗西书 1:24），“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加拉太书 6:17）。

所以，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基督徒所创造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新文化，首先一定是带着十字架印记的文化。第二，基督徒所创造的这个文化，一定是带着强烈的末世论特征。如果一个基督徒，无论他是在职场，还是在教会服侍，或是什么地方，都会有人观察，最后，基于他全部的生活、动作、存留，使得观察他的人得出这样的想法：活着真美好，真想再活五百年。那么，这个基督徒的见证就是一塌糊涂，他的见证与福音书完全相反，因为他见证出了这个世界的成功人士，见证出了他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使得他人想在这个世界生活。那么，什么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世上美好的见证呢？让人看见这个人的全部生活是思念天上的事。如果有人看见了这个人的生活，就非常渴望高于现在生活的生活，使人渴望一种与现在世界一切文化格格不入的更高的文化，甚至与这个肉身的生命格格不入，而是要在将来实现的那种荣耀，即要让人看见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纷纷脱落，也从我们

身上看见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盼望，这种盼望使人不再害怕。如果跟这种人在一起，跟基督徒在一起时间久了，都不再怕死了，反而认为将来的生活比今天更美好。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去过九寨沟、夏威夷，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把那种末世活了出来。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里讲到神的国度时所说，愿神恩典的国度，就是福音的大门打开，神的国度天天扩展；愿魔鬼撒但的国度在我们中间天天败亡；愿神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这个祷告非常美！

前面说的都是改革宗的末世论观点。今天是神恩典的国度，将来是神荣耀的国度；今天是神恩典的国度是撒但的国度之间重迭。在某个意义上，的确可以作这样的区分。但是，末世也是一个整体。永恒的国度，荣耀的国度，正在我们当中，因此，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呈现出这种末世论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向着永生而活的渴望，因此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对这个世界的唯物主义文化和物质主义文化，崇拜强调理性的文化，惧怕死亡的文化，以人的行为、道德对人盖棺定论的文化，是一种颠覆。而这种末世性的文化常常通过受苦的道路呈现出来的。

教会在今天这个世代的文化使命，不是由改变我们所处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比如说，有一天，中国的文化、政治、商业、教育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基督教文化改变，甚至基督教文化成为主流，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不是用来评判教会文化

使命的标志，因为极有可能，西方经过一千多年文化上的基督教王国，也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代人中，甚至是基督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不会恢复文化上的基督教王国、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价值观以及基督教对上帝的启示有正确和顺服的响应，极大地塑造和引领全社会的文化潮流。我们必须知道两件事：首先，这是好得无比的，无论恢复多少，10%，20%或30%，它都表达了对将来那个上帝国度的预演。因为将来有一天，基督要统治万有，万有都要呈现出神荣耀的文化，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将呈现出建立在与神的正确关系上，建立在对神的话语完全的顺服之上的文化形态。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基督教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哪怕非常微乎其微，都是在表达将来那个完全的美好，那个美好是我们人类的盼望与希望，而且是神必然要实现的。其次，今天我们衡量教会的文化使命，不是根据今天引领社会、改造社会文化的结果和程度，而是用十字架和末世论来判断。比如说，如果基督徒在中国仍然受逼迫，仍然被人藐视，是否必须改变这个局面，才能彰显出教会的文化使命呢？不一定！怎样才能彰显教会的文化使命，怎样才能使教会对社会文化构成颠覆性的影响呢？很简单，教会作为被这个世界所藐视的人，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是否构成了对这个世界的否定，一种在对抗当中的存在，一种在张力当中的同在。世界可以不信耶稣，世界可以藐视教会，但是他们无法把教会看作不存在。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认为这个不信的文化

是繁荣的，那么，教会对他们而言，就是让他们讨厌的苍蝇，是他们所藐视的粪土，我们使他们活得不自在。

举例说，以斯帖书中，末底改的文化使命，居然使得整个京城都向之下拜的哈曼，愤愤不乐，对妻子说：末底改一个人不拜我，让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

哈曼因为仅仅末底改一个人不拜他，便觉得自己的存在没有了价值。你可以这么说：末底改啊，末底改，你可把全以色列害苦了，哈曼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摧毁了哈曼的人生价值，便要灭绝以色列。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因为你一个人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统治者想灭掉中国所有的基督徒，这个就叫作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但以理在巴比伦也是如此。他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击毁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徒末世性的文化使命，是的，一个人，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就足以摧毁整个世界抵挡耶稣基督福音的文化。阿们？阿们！！

2017年9月12日

在巴比伦上小学

家长们、同学们，下午平安：

今天上午是我们大学的开学礼拜，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在巴比伦上大学》，今天下午是小学的开学礼拜，我要和大家分享《在巴比伦上小学》。

一、诗篇中的巴比伦

这首诗 137 篇，应该算是哀歌。诗篇中还有一个分类，叫咒诅诗。特别是在最后的第九节，你看到在那哀叹当中，甚至到最后成了咒诅：“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

前面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1980年英国的圣公会召开主教会议时，他们做出一个决定——删去诗篇137篇的最后一节。因为这节经文无论是对我们的孩子、还是对我们的家长来说，都太难了、太吓人了。我不知道，在家庭礼拜的时候，父母带着孩子读到诗篇137篇中最后的8-9节，是否明白这是在表达什么呢？

诗篇137篇描述的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回忆从前被掳时，曾经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他们现在已经被掳归回了。其实，这里有一些张力。比如说，一方面巴比伦并不是那么不好，巴比伦其实是繁荣昌盛的地方，是城市文明的代表，是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帝国。就像今天说到北上广，或者说到伦敦、巴黎、纽约，你不会说我曾经在纽约的这个哈德逊河边坐下，一想起成都就哭了，你不会，你巴不得去呢！但另一个方面，它又是旧约诗篇当中的咒诅对象。

我们是新约的教会，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137篇的时候说：“哎，好了，这个咒诅已经过去了。”虽然我们不至于像圣公会一样决定把它给删掉，但是我们会感觉不那么紧张，这个是已经过去的。很多慕道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也常常会有这样的念头：“哎，旧约当中的耶华上帝是难免充满了公义和愤怒的一位上帝，但是新约当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那一位满有慈爱来拯救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的一种紧张感可以稍微缓和一下。

二、启示录中的巴比伦

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里面，再一次提到巴比伦与耶路撒冷的针锋相对，这样的针锋相对不但没有缓解，甚至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宇宙性的征战，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的变迁及其结局的一个启示。在那里说，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一边是基督的新妇——教会，而另一边是那属于魔鬼撒旦的，牠所扶持的大淫妇；一边是教会，一边是世界。启示录说，整个世界的基本剧情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对抗——光明与黑暗，教会与世界，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将同时并存于世界历史的舞台。但是启示录到了最后告诉我们，最终他们要被分开，一个永存，一个灭亡。

对基督教教育来讲，当谈到启示与文化的关系时，在教会的历史上常常有一个很著名的提问，或者是命题，说：“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什么相干？”我们应该在一种整全的、圣经的世界观下，用上帝的普遍启示、绝对无误的启示来看待信仰与文化的关系。我们不会那么绝然地说，在一个层面上没有关系，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两者有关系，我们不会简单地说“耶路撒冷跟雅典完全没有相干”。

对基督教教育来讲，其实有一个真正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耶路撒冷与巴比伦有什么相干呢？”这里就会带出来一个显得很矛盾的问题，叫做：各位，在巴比伦来上学堂。

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七至二十一节讲到巴比伦最后的结果：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贵就归于无有了。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她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这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啊，这北上广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珍宝成了富足，她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然后，第二十节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她欢喜。因为神已经在她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启示录第十八章的这几节经文，就是对诗篇 137 篇中最后一节经文的重申和成全。启示录最后宣告，神如何来报应巴比伦，巴比伦如何地灭亡——拿她的孩子摔在磐石上的，就有福了。哦，这原来不单单只是一个旧约诗篇当中的咒诅，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已经过去了——哦，不是的。在启示录中最后的宣告比诗篇 137 篇中最后的咒诅还要尖锐，这个画面被描绘得更加的惨烈。

接下来，第二十一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

在新约时代，在整个世界历史的结局，诗篇 137 篇的咒诅仍然要成就。耶路撒冷与巴比伦至终没有任何关系，至终是光明与黑暗泾渭分明。人类历史上的两座大城，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文明，所代表的人的灵魂、人的生命、甚至是人的文化，

所走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至终要被如此清楚地、如此惨烈地、如此令人敬畏地，让人俯伏在地上说：哀哉，哀哉！

三、在巴比伦上小学

可是到这里，你回头说，在巴比伦上小学，如何成为可能？那是不是一件好危险的事情啊？是不是一件主不喜悦的事情？把我们的孩子从公立学校带出来，我们不到公立学校上学，是不是这个还不够呢？还得离开成都，找个地方买块地才行呢？在巴比伦上归正学堂还是有风险的，这最终还要分开，孩子得去什么无人区，孩子得到沙漠里面去……

1、是否得罪神

不然，第一，我们怎能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我们怎能在巴比伦唱耶和華的歌呢？活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抵挡上帝的文化和城市当中，如何能够来从事基督教的教育，来养育神的子民呢？

第一个张力是说你能不能在巴比伦上学呢？你能不能在巴比伦唱锡安的歌呢？在巴比伦敬拜上帝，在巴比伦学习如何做一个寄居者。在巴比伦学习做一个思念家乡的客旅，到底不可行呢？诗人在这里似乎是在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启示录最后的结局似乎也在说，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完全没有相干。

第二，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在那里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巴比伦的门口的时候，他们的确怀着这样的忧伤。诗篇 137 篇就是在回忆他们起初的忧伤，那个时候他们甚至犹豫到一个地步，别说不敢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巴比伦的公立学校，就连进入巴比伦这座城，他们都根本不敢。所以，他们站在城外犹豫，站在城外就悲叹“哀哉”，站在城外根本还没进去就在流泪了。脚迈不出去，迈出去的话，是不是得罪神呢？是不是进入巴比伦就意味着背叛了我的信仰呢？

2、神的旨意

这个时候，神就透过先知耶利米写信给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还有他们当中的首领，上帝的意思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上帝在经文中说，你们进去，你们进入巴比伦。进去干什么呢？你们不但要进去，而且要在里面成婚、养儿育女，使你的女儿嫁人，使你的儿子娶妻，并且要在那里面栽种，还要在那里面修房子、建造、栽种，买房子也是可以的。这个过程就是说，你要进入巴比伦去并在其中生活，这里面包含了教育的过程，因为经文中说：“你要使耶和华的子民在这座城里不至于减少。”甚至在那里说到：“你要为巴比伦求平安。”

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和诗篇 137 篇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矛盾？有很大的张力？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申命记第六章——我们称之为“教育的大宪章”，似乎仍然可以在巴

比伦继续，甚至必须在巴比伦继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上帝的子民在巴比伦这座大城里面不至减少。而且还要在信仰上延绵，带着对上帝的救恩和未来应许的盼望。

所以，这里有一个张力，有一个矛盾。

3、教会与巴比伦

第一，在巴比伦，你怎么能唱耶和華的歌呢？从属灵的意义上说，巴比伦与教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因为我们的父是耶和華神，他们的父是魔鬼撒旦，那我们不应该爱上巴比伦。

第二，神似乎对被掳的以色列人说，在巴比伦你要继续唱耶和華的歌，在巴比伦你必须从事基督教教育，你必须要按照圣经教导你的子民，你还要生养众多。你必须生活在其间，为这一座大城求平安，因为好叫你们在这座大城当中敬虔度日。神似乎是说，信耶稣就是要活在巴比伦这座城里面，要活在仇敌当中。而且还要去爱仇敌，为仇敌祷告求平安。

各位家长，巴比伦与教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关于我们的寄居状态、客旅状态的矛盾。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的矛盾，也是很多教会学校的矛盾。也是我们的孩子们在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的矛盾——他们在教会中长大，但教会又是在巴比伦。所以，这也是他们一生当中要去经历的挣扎和矛盾。

当时诗人写诗篇 137 篇的时候，第一，他们已经回到了耶

路撒冷；第二他们之所以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是因为当时巴比伦其实已经灭亡了，被波斯灭了。所以古列王才下令，以色列人可以回去。

经文中所讲的“巴比伦啊巴比伦，你将来要灭亡”（诗137:8）。巴比伦不是已经灭了吗？这首诗是对巴比伦发出来的咒诅，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场景，不单单指向已经灭亡并土崩瓦解的那个东方大帝国。虽然直到今天，这东方的大帝国还是一个兴起、一个灭亡，一个灭亡、一个兴起，此起彼伏的，仍然统治着我们。这个地方的“巴比伦”的确已经指向在启示录当中所代表的、与上帝敌对的那个世界，与神敌对的世上的万国，世上一切不信神的、愚顽人说“没有神，没有神”的那些文化。它终有一天将被神的公义所审判。

第九节经文中的“婴孩”，是指后裔。这个咒诅听上去，就是断子绝孙的意思，巴比伦要断子绝孙。在福音当中，神赐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好消息，是神赐给在巴比伦寄居的、神的百姓们的盼望，那一个敌对上帝的国度将没有后代。

各位，这是不是我们的盼望？这是不是福音赐给我们在肉身上忍受今生至暂至轻的苦楚，忍受这个世界一切不公不义的盼望？眼看着罪恶滔天，眼看着不义胜过了义的世界，甚至因着我们的信仰而受到委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受委屈就够了，想到我的孩子将来因为信了主还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做父母的好像有点不舍得。但是这一个咒诅，真的是给

神的百姓的安慰。总有一天，抵挡神的文化将要灭绝，无论它一时之间聚集起来了多么大的财富，甚至无论它一时之间有多么令人敬佩的聪明和智慧，他们都将没有后裔。

四、在巴比伦上教会学校

C·S 路易斯讲到这一首诗篇的时候，说了一句似乎有点灵意解经的应用，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巴比伦的邪恶。”我想，这是基督教教育所处在一个挣扎当中。各位家长、各位老师，我们里面有没有属于巴比伦的那个部分？大多是有的。我们的孩子，他们正在慢慢地长大，他们活在这个双城记里面，他们内心里有没有一个属于巴比伦的部分，正在慢慢地长大呢？有的。所以路易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自我，那个自我就是巴比伦所生的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路易斯说，把我们里面那个坏蛋摔死，这样做的人就有福了。

我延伸他这样的应用，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关键。对于基督教教育来讲，最可怕的一幕是什么呢？是将来找不到工作吗？是发现你们的孩子最后有一科学得不太好吗？不是。基督教教育最可怕的一幕是什么呢？是没有摔死那个坏蛋，而是在巴比伦上学的结果，上了几年学最终使我们的孩子成为了巴比伦的孩子，这才是最可怕的。这是起初让我们的孩子离开公立学校，我们想避免的。

可是，让我说一句话。第一，你确实已经把孩子送到教会来读书来了；但是第二，仍然是在巴比伦上学，是在巴比伦上教会学校。

1、教会跟随耶稣进入巴比伦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一个在巴比伦不能够唱耶和華的歌，和那一个要进入巴比伦，在巴比伦栽种、生养、教育，使神的子民不至减少，两者之间的张力怎么化解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不是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被掳来到了巴比伦，而是耶稣来到了巴比伦。

各位，耶稣是在巴比伦被钉十字架的。甚至让我这样说，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道成了一个巴比伦人，道成了拿撒勒人。甚至彼得在彼得前书 5:3 写信给散居在亚细亚各处的教会，他称自己是“住在巴比伦的”。他说：“那住在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安。”读到这里我明白了，我们不只是在巴比伦上小学，在巴比伦上教会学校，而且今天主的教会就是在巴比伦的主的教会。

昨天讲道的时候，我提到曾经有一个北京的传道人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在信中说“在罗马的弟兄问你安”。我一听这话就想，哇，这个神学太正确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强烈而健康的末世论”。彼得明明是住在罗马，但是他落款的时候说“那住在巴比伦的问你安”。这个传道人他明明是住在北京，他跟我说“那住在罗马的问你们安”。

所以，我想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我们来建立这样的
一个观念——我们是在巴比伦上学，教会进入了巴比伦，但是
教会却不属于巴比伦。教会蒙召进入了巴比伦，但是教会蒙召
却是与巴比伦分别。因为教会的主、教会的元首进入了巴比伦，
教会的元首被钉死在巴比伦，也复活在巴比伦。这就是福音的
奥秘带给我们在巴比伦从事基督教教育的奥秘。

教会跟随耶稣的脚踪，耶稣进入了巴比伦，所以今天新约
的教会会众也散居在巴比伦的世界成为寄居者。基督教教育在
本质上就是寄居者的教育，是一个流亡人群的教育，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不让孩子们上巴比伦公立学校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孩子，
他们受教育的结果不是要他们爱上这个世界，而是要他们思念
家乡。

2、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所以，今天我们开学了，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家庭，学堂
和家庭，老师和家长，我们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一学
期要让我们的孩子们思念家乡，而不是爱上巴比伦。

我想对老师们说：无论你们教孩子们什么，无论你们怎么
教，最后你们若是让孩子们爱上了巴比伦，你们就彻底失败了。
家长们也是一样，无论你怎样教自己的孩子，无论你为他提供
怎样的条件，无论你是怎样努力地工作，无论你是在家里面花
时间怎样地和他在一起，可是如果最后你们乃是让你们的孩子

爱上了巴比伦，你们就失败了。你们的孩子在教会中就慢慢地成为“习惯了在巴比伦唱耶和华的歌的宗教徒”，教会学校的教育就会沦落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教育。

所以让我这样说——虽然听起来很吓人，但是这只是一个类比——摔死那个巴比伦的孩子！摔死那个巴比伦的孩子！在知识上、在价值观上不要让巴比伦的文化选择我们的孩子，进入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祭主。如果巴比伦在我们孩子的灵魂中又生了一个孩子，我说得难听一点，那我们的孩子就叫僵尸。换成你们熟悉的一个词，就叫做“被巴比伦洗脑了”。害怕被巴比伦洗脑，正是我们不让孩子去上巴比伦公立学校的原因，洗心才能够对付洗脑，只有死而复活的基督，才能对付巴比伦的僵尸。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对各位说，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的，不要让这个世界寄居在我们里面，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习一切的技巧，但是愿所有的家长、所有的老师都可以一起说，耶路撒冷啊，若是这些孩子们忘记了你，情愿他们的右手忘记技巧。阿们。

我们希望训练孩子们的听、说、读、写，一切的才能，但是神哪，耶路撒冷哪，我们的孩子们若不纪念你，若不看你胜过他们在这座巴比伦大城当中所最喜爱的，情愿他们的舌头贴于上膛。阿们。

愿每一个家长有这样的心，愿意在神的面前如此祷告；愿

每一位老师有这样的心，愿意在神面前如此祷告。

家长们，你们愿意吗？你们敢在巴比伦上教会学校吗？我巴不得你们愿意，因为如果不愿意，这首诗对我们来讲就是咒诅。因为它宣告了那不愿意之人的最后的结局。就如彼得所说“你的银子和 you 一同灭亡吧”（徒 8:20）。这一首诗就等于在说“你的巴比伦和你一同灭亡吧”。如果你们愿意，我相信你们愿意，是因为你们相信耶稣来到了巴比伦，阿们。你们相信你们的主曾经进入了巴比伦，而且是背着十字架进入了巴比伦；你们相信耶稣在巴比伦替代了我们，死在巴比伦，甚至我们也相信他在巴比伦这座大城里面复活了。

所以各位，一个方面我们拒绝巴比伦，我们不要沾染巴比伦的世俗气息，我们不要与它混同。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又要说，我们不要怕巴比伦，不要过于惧怕巴比伦。巴比伦是如此糟糕，如此邪恶的地方，但是在如此邪恶的地方，居然还发生了复活的事，耶稣基督是在这里复活的，这就是福音的奥秘。

福音宣告了这个世界的败坏，也宣告了我们的败坏。但福音又说，这个败坏的世界，是可以被转化成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人是如此地败坏，以至于他不可能靠着他自己的任何努力而得救。但是这个不可能靠着自己的任何努力而得救的人，却可以被转化为得救之人，因为耶稣在我们中间的复活使这样的转化成为可能。

所以，在整个基督教教育的焦点和盼望是什么呢？仍然就是信耶稣，阿们。相信基督复活的大能，相信他的十字架，唯独因为耶稣。我们的教育唯独因为耶稣，我们的教育唯独为了耶稣基督，并他的教会，阿们。

要么你和主的教会一同长存，要么你和你的巴比伦一同灭亡。为此，教育的内容一定会包含对巴比伦的认识，因为我们是在巴比伦的教会学校，所以我们一定会，我们的孩子也一定会学习认识巴比伦。巴比伦的建筑，巴比伦的哲学，巴比伦的商业，一切在上帝普遍启示下的巴比伦学问，我们的教育会包含对巴比伦的认识，但更重要的，是对耶路撒冷的认识。

3、记念与忘记

这首诗刚才我们读到的这几节里，还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词汇也呈现出了一对张力。那就是“记念”和“忘记”。诗人是不是不断地在说记念什么，然后又忘记什么；如果不记念什么，宁愿忘记什么；宁愿忘记什么，都要记得什么。在“忘记”和“记念”之间，不断地有一个张力。

我想问同学们，你们今天开学了，上学期学的内容是不是很多都忘了？没关系，教育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记念”和“忘记”之间的一场战争。我学了这么多，我就是记不住。那我就这一点说，教育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本该记念的都忘记了，本该忘记的都记住了，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最糟糕的结果。基

基督教教育最高的智慧，就是让孩子们记住他们应该记住的，忘记他们应该忘记的。在“记念”跟“忘记”之间，“记念”其实是一个圣约的用语，也是一个法庭的用语。

最后我想说，老师们，家长们，让孩子们忘记他们不需要一辈子记得的东西，让他们记得他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的东西，阿们。因为神不会忘记。如果有一天神要考试，你要记得的，你津津乐道的，最后神不考，因为神不在乎。但是你忘记了的、你不在乎的，最后神在乎。记念耶稣所在乎的，忘记耶稣所舍弃的，这样的人有福了，阿们。因为这样的人虽然活在巴比伦，但巴比伦却不能夺走他们的后代，阿们。教会的后代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巴比伦的，阿们。世界在我们里面成长，主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成长，摔死在我们里面那个巴比伦的孩子，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在巴比伦来建立教会的学堂。你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尘埃、没有眼泪、没有污秽、充满了公义圣洁的地方来建立我们。主啊，你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甚至是有仇敌如同狮子吼叫，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在这样子的一座巴比伦大城当中，你带领你的教会，走这一条追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一座巴比伦里面，我们既不要不唱耶和華的歌，我们在这座城里面，与这一座城

的文化弃绝。但是我们又进入这一座城，我们又在这座城里面生养众多，用神的话语教导属神的儿女。

愿我们的孩子不爱上巴比伦的繁华，愿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愿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爱上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度，思念那将来天上的家乡。感谢赞美主，求你赐给老师们、家长们和孩子们，在这新的一学期当中新的恩典，新的因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智慧。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2017年9月18日

十字架和垃圾场

各位在教会中“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平安。

这个月真叫“多事之秋”。从十一营会开始，“十架神学”就在我们中间，似乎叫一切都加快了节奏。这两周停顿了牧函，非常抱歉。感到有千言万语，想和你们交通。又有时不我待、又万废待兴的感动。以斯拉记的 9 章 8 节，是从 2009 年开始，主常常激励我的一处经文：

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 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

当时，以色列重建圣殿，重修城垣。2008年大地震，2009年教会在被取缔中建堂，这节经文成为主使我看见教会稍微复兴的异象。其实，家庭教会过去这几十年，常常从以色列被掳归回的记载中，得着鼓励。小敏的诗歌，《在这仅存的年间》，《走余下几里路》等，在我初信时，颠覆了我对现实的认知。如我在营会上所说的，家庭教会的传统，凸显了“福音的末世性”或“末世性的福音”。

教会通常有三种，对现实的看法。一种说，船正在下沉，除了抢救灵魂，其他的事都没有价值。一种说，船没有下沉，尽管破烂，但救赎的能力已托起了它，最终天国要成就在这条船上。第三种说，船正在下沉，但仍要擦拭乐器，甚至演奏一曲。将来会有一条全新的船，但并非与这条船和我们在船上的生活，全无关系。

在某个意义上，因着福音，现实的确已经毫无意义。所以，如果我们立刻死去，或者时间立刻结束，也没有什么可惜。

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因着福音，这毫无意义的现实，也变得有了意义。只要我们还未死去，或者时间尚未结束，每一秒就要珍惜，因为唯独藉着信心，无意义的现实与永恒有了关系。现实，如今是永恒的一个倒影。

所以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第三种。世界这艘破船，的确正在下沉。你休想在船上建立天国，也不能把船当家。但船上

的一切，如今都是永恒的倒影。我们只有在这条旧船上，体会新船的样式。信心是关键，但信心需要一个舞台。信心就像一位伟大的芭蕾舞演员，在一个破烂的舞台上起舞。在某个意义上，只要舞蹈是伟大的，舞台破烂有什么关系呢。在另一个意义上，你可以想象有一天，这位伟大的舞者，在伟大的舞台上起舞时，该有多么荣耀、璀璨。然而，上帝说，这支舞的价值，现在必须在破烂的舞台上呈现出来。

再打一个比方。很多人看过这个报道。纽约地铁里的一个实验。Joshua Bell，站在地铁内，演奏了巴赫的6首曲子。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音乐家，他手中的那把小提琴价值350万美元。两天前，他的一场音乐会的平均票价是200美元。但现在呢，在45分钟的地铁音乐会上，有超过2000人经过，大约有20人停留，一共给Joshua Bell的帽子里扔了32美元。

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就是站在地铁口演奏的、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一群艺术家，世界认不出你们来，但你们的价值，恰恰就在被世界认不出来当中，得以显现。你们就是在垃圾场跳芭蕾的、一群伟大的演员。这就是垃圾场的意义。因为你们注定要被住在垃圾场附近的人当成疯子。因为有你们，所以垃圾场成为了新天新地的影子。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评价你们（来11:38）：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在营会上，我们被断水断电，显明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前往香港参加神学会议的弟兄姊妹，一一被当局约谈，威胁，调查，显明他们也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丁书奇弟兄，在机场被警方按倒在地，在 24 小时的讯问中被刑求，反铐、强光，不让睡觉，都是令人恐惧和痛苦的做法。这显明他也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但福音最奇妙的一点，就是耶稣来到垃圾场，让垃圾场也有了意义。耶稣成为仆人的样式，让仆人也有了意义。耶稣进入屈辱和死亡，让这个世界中的屈辱和死亡也有了意义。

这就是我说，第一，船的确在下沉，第二，这条下沉的船仍然有意义的原因。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特别想提醒你们的是，属灵的争战是剧烈的。就撒旦的作为来说，也是肮脏龌龊，面目狰狞的。多年来，政府都在寻找这间教会的破口，也在搜罗我的堆积如山的材料。甚至暗中挑唆和制造教会的破口。各种蛛丝马迹，各种流言，我都一直有所耳闻。教会最近也了解到一位已离开教会的前会友，实为有关部门的线人，一直在信徒中散布谣言。

一些事情，时间到了，就要显露。还有很多事情，直到见主面，才会知晓。一切都是为了在破烂的舞台上，显出信心的价值来。所以，关键的是，如果你心中没有爱，你就会成为魔

鬼利用的工具。如果你对教会、对牧师和同工充满了埋怨，不能在福音中面对，你就早晚有一天，会沦为撒旦拆毁教会的工具。在《迷人的共同体》一书中，作者说，他去了外地服侍，但非常想念狄马克牧师和国会山浸信会。但他接着说了一句令我动心的话，“我们不是只怀念狄马克牧师和他的讲道，而是思念从他的讲道孕育而出的共同体”。

这成为了我最近的祷告，我盼望有一天，别人提到我的服侍时，不是抽象地提到我的讲道和文字如何，而是具体地提到，我这卑微的服侍所塑造和影响的那个“福音的共同体”，也就是你们。

以前，作为知识分子，我曾误以为将来的冠冕将主要由我的文字构成。但后来蒙召传道，我才了解到保罗的心，因为他称腓立比教会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又论到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

各位，想到有一天，我要将你们戴在我的头上，说，看哪，这群人就是我一生的喜乐和荣耀。这真是美极了，是做梦都不敢想的。那么，就让我 and 你们一起，去地铁口卖唱，和你们一起在垃圾场跳舞吧。

让我再提醒各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府。他们的目的不只是管理社会秩序，而是要垄断垃圾场和地铁站的意义。所以，在垃圾场跳芭蕾，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在地铁口

拉小提琴，就要被警察按倒在地。然而，这也是垃圾场的意义的一部分。上帝许可了他们的雄心勃勃，是为了增加信心的价值。基本上，演出环境越糟糕，教会的演出就越具有“末世性”的意义。

所以，让我们安静等候，并积极行动。让我们因着敬畏上帝的计划，而对政府意图控制心灵和敬拜的作为，保持一种骑士般的尊重。因为尊重上帝为你安排的对手，就是尊重上帝。有时，我们行为上服从，但内心不认同。

有时，我们行为上不服从，但我们不藐视。

这样，日出祈祷，日落安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是的，船正在下沉。但我们在六日之内，勤于擦拭乐器。在主日开始歌唱。

愿与你们一同“如羊进入狼群”的弟兄，王怡

主后 2017 年 10 月 21 日

进入白宫的路德

“宗教改革沉思录”之十三

176

500 年来，人类的价值观，沧海桑田。

就今日而言，谈“人性”，基本上等于“任性”。谈“神性”，基本上等于“神经”。

基督论的钟摆，用了一千年，使神性压倒人性；又用了不到半个千年，使人性压倒神性。

不在神性之下的人性，就是任性。不能进入人性的神性，就裁断于人性之外。

177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必须成为信仰的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十字架才能解开，“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这一神义论的千古困局。

178

我们能够期望，自己的命运会比上帝的儿子更好吗？

在十字架之外生活，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消费者的意思，就是不能忍受任何的不便。

曾经在国外，一次乘飞机，不小心在座位上，与邻舍的手腕轻微触碰。尽管我立刻说了声，对不起。但对方的神情，似乎受了一次仅次于大屠杀的严重冒犯。对我这个从小在拥挤的公车和菜市场生活的人来说，感到十分惊讶。

这并非什么文化冲突。或者说，这并非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而是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的冲突。或者说，是古典的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的消费者文化的冲突。

179

现代文化的根本罪恶，就是期望过一种比上帝的儿子更好的生活。

一种不能忍受任何的不便的生活理想，意味着对十字架的否定。

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观点，这种过一种比上帝的儿子更好的生活期望，就是“媚俗”。

我感兴趣的是，现代文化，是怎么一步步说服我在飞机上的那位邻舍的。现代文化这样告诉他：现在他正在遭受一次仅次于大屠杀的、对他的个人隐私权利的严重冒犯。

180

很难想象，一种由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所塑造的，清教徒（Puritan）的文明，竟然会走到这样一个唯独人性（任性）的地步？

181

意思是说，十字架的神学，和上帝主权恩典的教义，基本上与现代文化的一切事物，都对立起来了。并且，这种对立的程度，一直被教会低估。

事实上，这种对立的程度，足以和当年的耶稣与以色列社会的对立程度相提并论。

在那个与基督的十字架对立的社会中，耶稣不惜得罪了全社会每一个人。

182

在美国，川普（Donald Trump）总统的上台，带来了基督教与现代文化对立关系的，一次卷土重来的认识。

为此，川普也不惜得罪了全社会每一个人。就此而言，他必然成为基督教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然而，川普得罪全社会每一个人的方式，与耶稣得罪全社会每一个人的方式截然相反。

183

换言之，川普的上台意味着，教会本身，已经失去了得罪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勇气和力量。

因此，川普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成为了一部分教会所盼望的，又成为了另一部分教会所厌恶的。

归根到底说，川普从白宫发起的“宗教改革”，是一种没有十字架的神学、和一种背叛了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在美国不断失败的必然结果。

184

从竞选开始，川普在美国社会所张贴的，就是一份声讨世俗社会的“九十五条论纲”。

当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致德意志诸侯》一文中，以“信徒皆祭司”的名义，鼓动那些握有刀剑的政治家们站出来，维护教会的纯正与圣洁。

500年后，川普反过来，他鼓动教会站出来，支持他获得刀剑的权柄，用以维护教会的纯正和圣洁。

185

从这个角度说，最近两年在美国社会所发生的，是一场后现代的宗教改革的变奏曲。

同性婚姻合法化，相当于世俗社会颁发的“赎罪券”。在道德的堕落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川普，是一位有刀剑的马丁·路德。连体型和脾气，都有类似之处。支持川普的教会，变成了没有刀剑的政治家。

186

然而，这场社会化的伪“宗教改革”，是一场将十字架完全排除在外的、“不能忍受任何不便”的激情。

让我引用卡尔·楚门（Carl Trueman）的话说，“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认为一切不出于恩典的活动，基本上都是非基督教的。而所有非基督教的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悖逆神的形式”。

187

我再说，福音与现代文化是几乎对立的。现代文化，意味着一个“自我满足的福音”。而福音，意味着对“自我满足的福音”的否定。

188

换言之，比堕落本身更堕落的，是意图以一种不需要十字架的方式，去解决人类堕落的问题。

189

如卡森(D.A.Carson)所说，我们厌恶色情活动吗？是的。那么，在某些伊斯兰地区，一切色情活动和色情刊物，受到了比在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更严格的控制。但在那里，你也几乎听不到福音。因为福音所受到的管制，与色情活动类似。

190

喔，对一个宗教改革的后裔来说，这真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一个色情和福音都能够自由传播的地区，和一个色情和福音都受到严厉控制的地区，哪一个更符合宗教改革精神的？

191

一个简单的回答：这是个伪问题。因为这两种情形都不符合福音。我们只是接受，而不是选择。接受是不可选择的。选

择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基督徒是否应该去促成一个使色情受到更严厉控制的社会，但这样做是否会削弱福音在这个社会中的力量？

同样，基督徒是否应该去促成一个否定同性婚姻的政治社会，而这是否会削弱福音在这个社会中的力量？

192

卡尔·楚门说，健康、财富、快乐“这三件事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三座金牛犊”。

今天，与宗教改革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现代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为一种反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文化。

色情、专制和同性婚姻，带给教会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才能改变它们。而是如何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再次彰显在一个与福音全面对立的文化中。

193

既然，福音是堕落的唯一的仇敌。那么，堕落在程度上的变化，不是为了加增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难度，而是为了加增我们信靠十字架的程度。

也就是加增我们在苦难和软弱中的喜乐程度。

194

现代文化的兴起，意味着十字架的迫切性，更甚于宗教改革时代。

十字架的福音，意味着反对福音作为一种疗法，反对福音作为一种魔术，也反对福音作为一场革命，更反对福音作为一种娱乐。

十字架的福音，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一种不能忍受生活中的不便”的理想，必须放弃一种过“比上帝的儿子更好的生活”的权利。

195

500年后，世界场景已不可避免地多元化。福音释放了每个选民的良心，而代价就是，从此使每个罪人的良心，都获得了背叛福音的权利。

十字架意味着，在现代文化中，进入主流社会是一个幻像。融入主流文化是一个陷阱。

宗教改革的精神，意味着教会在现代文化中，必须成为非主流的主流，和非政治的政治。

福音必须在场，这是我们与一切基要主义者的区别。在场的目的不是统治，而是见证；不是改变主流社会，而是不被主

流社会改变；这是我们与一切社会福音派的区别。

由白宫发起的“伪宗教改革”及其教会的支持者，之所以终将徒劳无用，是因为人们还流连于一去不返的“基督教王国”，活在一个反十字架的幻像中。

196

现在，如果永生是真实的，永生的赏赐，就必须通过“生活中的不便”和一种“与上帝的儿子相似的生活”，彰显在一个拒绝永生的现实中。

现在，如果称义是真实的，称义的地位，就必须通过我们继续被这个世界判为不义，而使十字架的公义，彰显于一个不义的现实中。

197

我的意思是，川普并不是一位古旧福音信仰的保守人物，而是一位美国“公民宗教”或国家宗教的保守人物。

在川普与希拉里（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之间，假如我拥有美国国籍，我将毫无疑问地投他的票。

所以，我的质问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基督教右翼对他一厢情愿的和无原则的热爱。因为他们意识不到，古旧福音与美国“公民宗教”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意识不到，改

教 500 年以后，上帝正在做一件大事，就是将“Gospel of Jesus Christ”与“Gospel of American”分开，如同将空气以上的水，与空气之下的水分开。

因此，作为“奥秘事的管家”和“福音的执事”，福音派教会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又将这属灵的责任，投射到了一位进入白宫的、不适格的“马丁·路德”身上。

198

总而言之，作为“美国福音”的基督教，其主要特征，是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的基督教；是一种过度与现代性结合并为此辩护的基督教；也是作为最后的和最低版本的“基督教王国”的基督教。

今天，无论美国，还是全地，教会需要的，不是一位得到选侯庇护的马丁·路德，而是一位作为“十字架神学家”的马丁·路德。

教会需要一位走在流亡路上的马丁·路德，和一位被自己服侍的教会驱逐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因为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大于先生。不然，还有什么方式，能将那位走在流亡路上、又被自己的教会驱逐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大有能力地见证出来呢？

政教冲突的属灵益处

各位蒙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的弟兄姊妹，
平安。

保罗论到婚姻时，他的个人意见是结婚不如独身。不过他并不是从婚姻本身在创造和救赎中的意义而说的。就是说，他并非否认婚姻和生养的价值。而是说，我劝大家“安常守素”，是“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结了婚的，要安常守素，不求离婚。没结婚的，也要安常守素，不求结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始终不要为自己、为妻儿、为世物挂虑，而要“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林前 7:26-32）。

当我们论到信仰与这世界的一切冲突时，这段经文都表达

了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凡事都要在一种强烈的，“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的末世论下来观看。而且，凡事都要在一种强烈的，“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的渴望中来讨论。

没有这种强烈的末日感，你怎么想都是空。没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你怎么说都是错。

有会友向我提出一种担忧，就是在政教关系紧张的时期，教会处于一种备战状态，会有损日常的牧养。我理解他的担心。但我对他说，军队通常都是在备战和演习中完成日常训练。而且备战越迫切，训练效果越好。对教会来说，没有属灵争战，就没有日常牧养。因为，一方面，争战本身就是主对门徒的牧养方式。另一方面，一切牧养的目的就是为着争战。

我见过太多的华人教会，是在备战与演习的缺乏中，灵性渐渐死去。魔鬼在主的教会中，藉着逼迫，杀死千千；藉着逼迫结束，杀死万万。

所以下面，我想和你们分享的，是今天对这个议题的 20 条默想。就是政教关系的冲突，会给教会和基督徒带来什么样的属灵益处。临到教会的政教冲突，如何成为上帝亲自牧养我们的方式：

1、逼迫的可能性，测试自己是不是一生因怕死而作奴仆的人。福音是否真给了我任何制度和环境下的，自由而尊贵的心？

2、因为我们的畏惧，总是显出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奴性。而政教冲突，是一张对我们体内的奴性残留量的试纸。

3、逼迫显出刀剑权柄的存在，对教会具有的另一重价值。就是上帝以十字架，来确立教会与世界的边界，并向另一端的世界显出福音死而复活的大能。目的是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地下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现在晓得神百般的智慧。

4、政教冲突，可以帮助我们辨别，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一切顺从，到底是出于奴性的屈服，还是出于主爱的忍耐。是向着一个强大政权的投靠，还是如羊进入狼群的勇敢。因为一旦惧怕弥漫开来，那我们无论作出何种反应，都绝不是出于爱。

5、区别在于，出于爱的顺服，会使我们在面对政府最低层的工作人员的合法行为时，也能尊敬他如君王。并使我们在面对国家最高领袖的不义行为时，也敢于视其为独夫民贼。

6、这也测试出，我们在骨子里上，是否仍然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顺服比自己强大的，和藐视比自己卑微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绝不是圣经所赞许的顺服，而是一切卑贱之人的标志。

7、只有当你能顺服比自己卑微之人时，你对那比你强大之人的服从，才是圣经所讲的顺服。同样，只有当你能藐视那拥有生杀大权之人的不义时，你对那比自己卑微之人的责备，才脱离了你自身的卑贱。

8、政教冲突，以一种最尖锐的方式，把这个区别活生生地标示了出来，使我们不能掩盖，不能冒充，也无法再伪装。

9、这也能测试，自己是否因着基督，而拥有了一种高贵而自由的品质，就是圣经所讲的，对“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信赖与顺服。这种顺服构成一种保守主义的气质。就是知道何时顺服，也知道何时反抗。而这两者，都出于对神圣秩序的降服。

10、因此，逼迫测试你是不是一个福音的保守主义者。当一个顺服上帝的保守主义者顺从政府时，并不会助长邪恶，反而限制了邪恶。当一个顺服上帝的保守主义者反抗时，社会的心灵秩序也不因此被颠覆，反而因此被坚立。

11、因这个缘故，当基督徒顺服政府时，那些积极改变社会的民主派人士，起来责备我们是帮助政府维稳的保皇派。而当基督徒在政教冲突中顺从神、不顺从人时，又被那些为肚腹而活的实用主义者，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12、这也试炼我们，到底看重世人的评价还是看重基督的赞许。政教关系的冲突，比其他任何冲突，都更全面地显出教会与世界的对立和区别。这使一个基督徒的几乎一切社会关系，都无可躲藏，而被逼到阳光下被世人重新评价。政教冲突最显著的益处之一，就是让身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可以继续悄悄地作门徒。

13、因此，历史上每一次政教冲突，都是神国戮力前进的

时刻。它要求一切基督徒，取消休假，回到神圣的岗位。在这个意义上，保罗所说的“安常守素”，就是指基督徒在世上的、一种“待命”的生活状态。政教冲突的来临，总是结束了一种虚假的和平状态，重新显出宇宙性的属灵争战的真相。而在这场争战中，真正的路障与拦阻，从来不是世界和政府本身，而是罪与怕在基督徒生命中残留的权势。

14、因此，每一次政教关系的冲突，都是上帝洁净祂的教会的时刻。如家庭教会老前辈所说的，“松一松，为广传；紧一紧，为拣选”。在逼迫中，主将假信徒逐出教会，将假教师暴露出来，并使一切没有合法蒙召的传道人，失去他们吃教的机会。

15、测试自己是不是一个为福音癫狂的人。因福音而面临死亡威胁时，你才知道自己到底为谁而活。因福音而面临失业的危险时，你才知道自己到底为谁打工。因福音而可能失去财富和地位时，你才知道自己这一生，到底在为玛门癫狂，还是在为福音癫狂。

16、因此，政教冲突的一大益处，就是大大降低了我们对自己属灵生命的高估。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一切问题，都是由此而来。就如基督若不被捕，彼得就不知道自己不行。基督若不被杀，门徒就不承认自己不信。活在安逸中的信徒，总是误解了自己的敬虔。绝对温度下降，我们才能感到寒冷，进而渴望光明。

17、逼迫和逼迫的风声，使我们真正有机会与朝鲜、中东和全世界其他地区受逼迫、杀害、关押和羞辱的教会认同。免得我们傲慢地藐视那些为主殉道的宣教士，又对那些为主癫狂的儿女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有哀哭的经验，才能更深地与哀哭的人同哭；有捆锁的危险，才能更深地与受捆绑的人同受捆绑。

18、政教冲突，也是一切成功神学和个人主义的最佳解毒剂。上帝藉着它显明，信仰在本质上是两个国度的关系，而非独善其身的灵性。政教冲突显出了社群的危险，譬如 100 个基督徒在一起，比 20 个基督徒在一起更危险。一群有牧师和长老、有宪章和选举的基督徒，比一群松散的、轻轻地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基督徒更危险。但上帝恰恰藉着这种危险，显出了社群的价值，原来基督国度的焦点，在于社群，而不在于我个人。原来地上的政权最害怕的，不是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基督徒，而是一个神掌权的圣约共同体。

19、因此，政教冲突的最大益处，是使我们与一位被审判的基督联合。凯撒的焦点，不是问你信耶稣吗（他们往往说，你信耶稣我们不管）。凯撒的焦点是问，你所信的那位耶稣“祂是王吗”？逼迫使我们得着一个机会，向世界作出和主耶稣当年一样的回答，“是的，你说祂是王”。这样，我们就让警察撕裂衣服，说，这样还说啥子呢，他们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20、因为，政教冲突是福音的本质决定的。政教冲突意味

着十字架，十字架意味着政教冲突。在美国，可能是以教堂大屠杀和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两种极端方式呈现出来的；在中国，则是以秘密警察、关押、取缔、边控、威胁房东及思想言论控制等形式呈现出来的。十字架是世界和教会之间的界牌。从这边到那边，要从十字架上走过去。从那边到这边，也要从十字架上退回去。

愿能与你们“看万事如损失、受苦为小事”的弟兄王怡
于主后 2017 年 11 月 9 日

历史是大写的基督

本文是王怡牧师为唐崇荣国际布道团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至二十日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纪念研讨大会”的讲稿，因会议前王怡被中国政府限制出境，会议上由参会的陈彪牧师代读此文。

尊敬的唐崇荣牧师，诸位牧师、长老，和诸位弟兄姊妹：

我以《圣经》歌罗西书第一章 15-20 节，这段伟大的基督论的经文，来分享这个伟大的主题。我借用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沃格林的一句名言，来归纳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他说，历史是大写的基督。从挪亚以来，上帝容许了人类历史的继续。挪亚之约意味着，历史是由上帝书写的，并且上帝用历史来书写祂的救恩。因此，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因为一切历史都本于

祂，依靠祂，也归于祂。不但宗教改革五百年的历史如此，新教入华二百年的历史如此，中共建政以来逼迫基督教会长达六十多年的历史如此，并且将来的历史也要如此。因为历史的中心是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不只是矗立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各他。启示录第十一章说，所多玛和埃及，是基督钉十字架之处。意思是说，基督的十字架也矗立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同样，基督的十字架也矗立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

教会的秘密武器：祷告

保罗说，就是乖僻的主人，你们也要顺服，如同顺服主一样。这六十年来，教会在中国，一直顺服在乖僻的君王手下。一方面，三自教会顺服得太过头了，顺服变成了臣服，忍耐变成了效忠。这样，教会就失去了崇高和超越，教会对乖僻的臣服，使自己也变成了乖僻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家庭教会始终顺服这个政权，从未造反，从未骚乱，从未煽动颠覆共产党的统治。我有一次被抓到派出所，国保问我，你有没有颠覆政权的行为。我说，请问祷告算不算？我常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们受压太重，你能不能伸手，叫这个政权一夜之间瓦解。还是你要叫法老的心刚硬，在将来显出你的荣耀和能力来。我说主啊，你在中国有千千万万儿女，都巴不得这一天早日来到。我就问员警，请问这个算不算以祷告颠覆国家政权。他想了想，说，这个不算。我说，啊，那就没有其他方式了。因为这是教会的秘密武器，是教会的原子弹。正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祷告的

能力和管道，所以才叫我们顺服那乖僻的统治者。我就把歌罗西书一章 16 节背给他听：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 he 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一 16）有解经家说，这里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是当时的民间宗教中对天使或其他灵界势力的一个官职表。所以保罗后面也特别提到，不可敬拜天使。在古代的一切非基督教的社会中，人们都假设天上的属灵秩序，和地上的政治秩序一样，有一个层级。大官管小官，大神管小神。所以按着中国人的民间宗教来说，就是从弼马温到天蓬元帅，从灶王爷到玉皇大帝，基督都超越这一切。这些是假的，基督是真的。这些是人的想像力的极致，基督是上帝的启示的极致。

三自教会不相信历史是大写的基督

三自教会的问题，是不相信中国的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尤其是不相信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同样是大写的基督。如果你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基督作为创造主的超越和崇高，相信上帝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的护理着宇宙中一切至大之事和至微之事，你就不可能接受宗教局对教会的教导和牧养的任何审查，不可能接受在教会的聚会中让不信主的共产党干部讲话，不可能接受统战部对牧师资格的认定，不可能接受爱党

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是上帝呼召牧师的条件。上帝是叫我们在忍耐中顺服，不是叫我们唱起歌、打起鼓来拥护。你若是相信作为救赎主的基督，相信自己在基督十字架的宝血中得了赦免、洁净和重生，你就更不可能接受政府组织我们的牧师一起学习习近平的讲话。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主的仆人真信这一段经文，他就是打死也不可以接受这些事情。

上帝有至高的主权，有至高的救恩计划。这恰恰是我们可以顺服，姑且活在天上地上一切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之下的充份理由。如果一个人在本质上是被一位死而复活的君王所统治的，那么他暂时服在乖僻的政府之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如一位敬虔的妻子如果在本质上属于基督的新妇，并与至高的主宰之间有个人的真实而活泼的生命关系，那么她顺服一位乖僻不讲理的丈夫，又有什么损失呢？因为既然今生至暂至轻的苦楚，不能有益于我们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么今生这至暂至轻的统治，也不过是被蚊虫叮咬而已。

就像毛泽东自己说的，小小寰宇，几个苍蝇碰壁。世界没有一万年，所以世界争夺的是朝夕之间。一切人间的理想，都需要在死亡之前兑现。但基督爱我们超过一万年，基督爱我们也早于西元前。十字架打破了一切理想都必须在死亡之前兑现的这个诅咒。惟有那些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他们可以在卑微中活着，却无比尊贵。可以在贫穷中活着，却无比富足，甚至可以在死亡中活着，而不是在活着的时候死亡。

现代的圣经学者发现，这段经文其实采用了诗歌体。因此，它和腓立比书二章 6-11 节，以及提摩太后书三章 16 节一样，都是伟大的基督颂。腓立比书的基督颂，是颂赞基督从至高降为至低，又从至低升为至高。因此，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就是福音中两个惊人的转捩点。信耶稣，就是活在这两个转折之中。福音的能力和圣灵的充满，就是看这两个转折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痕迹，如土地被犁深深的犁过，如一张纸被反复的对折，如一方印被刻刀狠狠的雕过，不可能不留下痕迹，甚至也不可能再被还原。所以保罗大胆的对世界宣告，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然而，今天的中国政府，中国文化，中国的多数知识份子和民众，仍然在反覆搅扰我们，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见我们身上耶稣的印记。他们看得还不够多，不够深，不够久，所以他们还不相信这个印记是擦不掉的。他们以为，中国人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基督徒只是中国人脸上的一团泥。只要再加把劲，就能把我们洗干净。就算不能彻底洗干净，也至少要把我们洗成一个“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督教”，洗成一个中国化的、儒家化的和党化的基督教。

而歌罗西书中的这段基督颂，是另一个脉络。是从创造主到救赎主。15-17 节，赞颂基督是与父同工，也与父同质、同权的创造主。一切都是借着 he 造的。奥古斯丁特别说，既然是一切，那么显然时间也是借着 he 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也显

明，基督的受生而非被造，也是在时间之外的。如尼西亚信经所说，他是万世以先为父所生，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创造主。这就是历史是大写的基督的意思。

惟有基督的血所立的和平直到永远

福音的奥秘，就是那位大写的基督，变成了小写的基督。他不变成小写的，我们就不能得救。而他一旦变成小写的，世界就认不出他了，这就显出世界的盲目。所以 18-20 节，就转为颂赞作为救赎主的基督。保罗在对一位宇宙的基督、大写的基督的颂赞之后，忽然提到了基督的死。说他的死，成为一切死而复活之人的原因，也成为那首先复活的。死在这里很突兀，将不可能连在一起的两件事连了起来，就是创造主和救赎主。这里有两个首先，在创造中他是首先。现在，在拯救中他也是首先。这里也有两个万有，一个是在创造中的万有。万有不是自然就有，而是被造而有。一个是在救赎中的万有。人类堕落之后的万有，也不是自我治愈的，而是被救而治愈的。

这样，和腓立比书一样，保罗最后将颂赞的焦点，落在了十字架上。“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 he 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一 20）

有一次，我给带我走的警员传福音。我说，在一九四九年，

你们用流血的方式建立了这个政权。后来在一九八九年，你们又用流血的方式保卫了这个政权。将来呢，将来你们失去这个政权，还是可能要用流血的方式。而这不就是中国几千年来不断循环的历史吗？没有人能走出这个历史的回圈。但圣经说，耶稣的血，可以走出这个循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让一切都与自己和好。既然说一切，自然包括了中国人，包括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我说，我向你所说的，是一个直到永远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在今天，并不要求土地、刀剑和一切权势。反而愿意把自己降卑和顺服在地上的刀剑和权势之下。如果你要用今天的这个政权，去压迫这个永远的政权，这段经文已经宣告了结局是什么。历史是大写的基督，不是大写的习近平。如果你们承认人的灵魂，人内心深处的罪恶，人的信仰和永远的结局，都不属于你们这个政权的管辖范围。那么，我们巴不得一直顺服你们，巴不得你们一直统治中国，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因为换一次政府真的很麻烦，也很危险。

“国家主权”成为最大偶像

亲爱的弟兄姊妹，接下来，我要根据这段经文，指出教会与世界关系的两点。

第一，是启蒙运动以来，“国家主权”的兴起，成为了五百

年来人类社会所敬拜的最大的偶像。根据十六世纪意大利学者博丹的定义，主权的意思是指国家具有一种“永远的、最高的和不被其他任何权力约束的”本质。历史的进步主义，造成了这五百年来在世俗政治中反对基督主权的各种革命。换言之，宗教改革之后的西方社会的主要变化，就是对歌罗西书一章15-17节的否定。用沃格林的话说，就是在现代性的成就中的，人的自我显圣。

而这是改教运动没有处理的议题。因为从十六世纪改教时期，直到一六四六年威斯敏斯特信条时期，或对欧洲而说是直到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期，欧洲的政治秩序，都被理解为一种受到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律法约束的，或承认和尊重一种更高的灵魂秩序和属灵权威的政治秩序。认为地上的各个国家拥有人类社会中最高的和永远的单独的权威，完全是反基督教的一种现代观念和产物。因此，对威斯敏斯特神学家们来说，国家本身，从未被视为对一神崇拜的最大威胁，和未来世界中的最大偶像。

当美国宪法的前言宣称，我们美国人民，根据“造物主”所赋予的自由，结盟为一个国家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根据一神崇拜而建立起来的，自愿将国家权力置于更高的灵魂秩序之下的国家。因为美国宪法中的“造物主”一词是单数形式，是唯一的一位。

难以传扬“直到永远的政权”的福音然而今天，只有英国和

美国，至少在宪法的传统和名义上，保持着改教时期的观念，即将国家的统治，放在一个较低的位

置，即放在一种更高的永远的统治之下，承认上帝的治权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性的来源。除此之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某种主权至上的近代国家观念的产物。

我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这个变化对教会的最大影响，就是教会在最近在二百年来所传的福音，愈来愈忽略了这段经文的 15-17 节，而只传 18-20 节的福音。换言之，我们不传一位宇宙的基督和永恒的基督的统治，而只传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的救赎。教会甚至日益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如何避开 15-17 节而只传 18-20 节的神学叙事和传播技巧。而将教会的福音，改造为主权国家这个庞然大物之下的一种准福音。所以，我们可以向一个一个单独的人传福音，却很难向一个国家传福音。

我们很难告诉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你错了，你不是宇宙中最高、永远和不受限制的主权者，你只是上帝暂时容许你存在的、在祂之下的、一切行为都要受到最后审判的管理者。这导致今天的教会，不断将福音心理学化，不断将救赎的意义缩减为心灵的医治。我们很难去传“一个直到永远的政权”的福音。在圣诞节前夜，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甚至难以高声宣告，来看哪，政权要担在祂的肩上！

今天教会面对最大的敬拜战争，不是对关于崇拜中唱什么

歌的讨论。而是一场旷古烁今的国家主权与基督主权的敬拜之争。在中国，这一敬拜战争，如此鲜明地体现为：是否在会堂唱红歌，是否在会堂挂国旗，是否参加政治学习，是否拆掉教堂顶端的十字架，是否可以入党，是否要戴红领巾，是否可以集体敬拜上帝，是否为十八岁以下的少年施洗，等等。

福音未彻底去掉我们的君王崇拜

我要指出的第二点，就是中国的统治者和中国人对统治的理解，自古以来，直到二〇一七年，从未受到一神崇拜的约束，对国家、政府和领袖的崇拜，也从未被对基督的崇拜所打破。我甚至要说，即使在中国家庭教会中，歌罗西书一章的 15-17 节，也没有被我们深深的信服，以至于对共产党作为统治者的恐惧和怨恨，至今深深捆绑着我们。不但捆绑三自教会，同样也捆绑家庭教会。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确顺服了掌权者，但我们的顺服，更多不是出于在基督里自由的良心，而是出于和国人一样的恐惧和对肉身利益的担忧。同样，我们里面的怨恨和冷漠，也和国人一样，阻拦了我们对传扬福音的火热的心。因为我们有一个癫狂的统治者，所以我们就很少有人在中国为福音癫狂。实际上，在中国，坐牢的基督徒还不够，因为信耶稣而掉工作的人还不够，因为传福音而进派出所的人还太少。因为公开聚会、敬拜而被政府查封的教会也少的可怜。殉道者的数目还没有填满，大丈夫的心志还不够坚强，中国教会该受的苦还受的太少，

中国教会能受的苦也还没有受够。主给我们的太多，我们给主的太少。因为福音还没有彻底去掉我们对君王的崇拜。因为你怕谁，你就在崇拜谁。

而我们勇敢地承认吧，我们就是怕共产党。信徒怕失去公职，牧师怕失去会堂。男人怕赚不到钱，女人怕生孩子罚款。谁最害怕教会受逼迫呢？不是信徒，因为教会受逼迫，信徒可以转去另一个教会。最怕教会受逼迫的就是牧师和教会领袖。因为教会受逼迫，他们就要失业。而重新开始是难的，重新开始需要重新悔改，重新顺服，重新被圣灵充满。所以最可悲的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中，最怕共产党的不是信徒们，而是牧师们。

当年，康熙曾为天主教会题字：“万有本原”。这似乎是对歌罗西书一章 15-17 节基督作为万有主宰的回应。然而康熙却不承认，基督也同样是他的皇权的本原，也构成了对他的统治的限制。所以从他开始，中国禁教了一百年。

这段经文表明，作为创造主的基督，主宰一切。但作为救赎主的基督，却降卑至死。因此在这两者之间，上帝以祂的救赎之爱，给了世界一个空间，让世界上并存著两个秩序，一个是上帝的秩序，一个是魔鬼的秩序。这两个秩序反映在地上，一个是基督秩序，一个是法老秩序。而十字架，是这两种秩序的边界，是将现在的世界和将来的时间连接起来的唯一的道路和天梯。

基督秩序与法老秩序之间

从出埃及开始，上帝国度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拓展，都与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帝国互相对应。摩西时代对应着埃及。被掳前后对应着亚述、巴比伦和波斯。沉默时期对应著希腊。新约时期对应著罗马。法老也有很多名字。在巴比伦叫王，在罗马叫凯撒，在中国叫皇帝，在二十世纪叫元首，在中国叫总书记。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法老秩序，这个秩序的核心特征，就是以人为神，或以国为神。

人类历史上，只有欧洲在基督教化之后的一千年间，基本上消退了这种法老秩序。在欧洲，至少在理论上，无论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著基督的王权而掌权，也都承认自己是在更高的基督主权之下掌权。换言之，在中世纪，君王的秩序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基督秩序的一部份。而这就是“基督教王国”的真正意思。

宗教改革，是这一基督教王国的观念和实践被打破的开始。当福音的个人意义重新被发现之后，世界恢复了它不信的真面貌。然后，英美社会在清教徒的努力下，逐渐建立了另一个版本的统治秩序，介于基督秩序和法老秩序之间，就是英美意义上的西方宪政与共和。

而最近一百年西方社会的重大变化，就是法老秩序在西方

现代国家秩序中的复活。实际上，从十七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以来，这种被称为利维坦的国家怪兽，即一种逐渐摆脱基督教的约束的法老秩序的升级版，就一直在英美宪政与共和的传统中同步增长。换言之，法老秩序是西方在宗教改革之后，在一种最弱版本的“英美基督教国家”模式中隐藏著的一套病毒程式。而法西斯和苏维埃，是这套病毒程式迄今为止在西方社会的大爆发。

但在中国，这套否认上帝主权的法老秩序从来没有崩溃过。因为当埃及、巴比伦和波斯都烟消云散之后，中国在当今世界就是这套病毒程式本身。上帝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几场革命，几场惨烈的战争，和几个政权的跌宕起伏，来破碎这个古老而罪孽深重的民族。今天，在 18-20 节的意义上，中国数千万之众的家庭教会，包括部份三自教会中的信徒，可能已经构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福音派教会。但在 15-17 节的意义上，基督秩序尚未在全域影响这个庞大族群的灵魂，法老秩序仍然强大，以一种辖制灵魂的权势，辖制著中国人的内心，事实上也极大的削弱了教会传扬福音的能力。

为中国教会的祷告

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上帝还在忍耐我们，我们又有什么不能忍耐的呢。既然上帝在这一百多年来，将华人抛撒在万国之中，岂不是显明中国的基督徒、马来西亚的基督徒、

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督徒，我们虽然在福音使命中爱著自己所在国家的灵魂和社群，但我们最终并不属于我们所在的国家，而属于一个永远的上帝的政权。是的，我们属于一个基督用祂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建立起来的，叫万有都要与上帝和好的国度。而我们真属于这个基督国度的记号，不是我们的成功、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名声，而是我们身上有耶稣十字架的印记。一个涂不掉、擦不掉也抹不掉的印记。

为这个缘故，有人为主赚钱很好，有人为主坐牢更好。有人为主活著很好，有人为主死了更好。

主啊，求你将未来的中国社会赐给你的教会，不然就带我离世与你同在。主啊，求你赐下大复兴给你在中国的教会，不然就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主啊，求你兴起一大批忠心于你的国、你的政权的僕人，去迎接前面新一轮的逼迫，不然就使他们失去会堂和会堂中的高位。主啊，求你拣选多得数不过来的宣教士、植堂者和布道家，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走遍中国的各城各乡，直到将福音充满中国的每一所监狱和看守所；不然就夺走我们的房产、学位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免得我们有一天仅仅拿著这些东西去见你。主啊，求你使我们有钱出钱，有命出命，在中国社会中，消极不合作，积极传福音；不嫉妒恶人，也不惧怕有势力的人；不唱巴比伦的歌，不拜尼布甲尼撒的像，也不与罪恶击掌。主啊，求你垂听孩子这迫切而不完全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

2017 年 11 月 20 日

宗教改革与中国文化的挑战

宗教改革 500 周年纪念讲座

引言：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

我刚刚在神学院上完中国教会史课。我先引用一句话，来看基督教的信仰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碰撞。刘晓波在 1989 年 8 月出版的《狂妄必遭天责—论中国文化道德沦丧的致命谬误》当中，提出一句很触目惊心的话——“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1989 年的悲剧发生的时候，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很难听到这样的话，因为，刘晓波本人并不是基督徒。

从 1807 年马礼逊来华到 1989 年，不到 200 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化的主流知识分子的口中，刘晓波思考和面对中国鸦

片战争以来 100 多年屈辱的转折和苦难的历史时，他说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这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他说“没有”、说“不”，你会感受到他的情感并不是带着盼望，而是一句悲叹，是在绝望当中的呐喊，是从“89 血泊”中所发出来的呐喊。但是，他没有指向对十字架上耶稣宝血的盼望。

所以，无论是刘晓波本人，还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 200 年来的知识分子，以及近几十年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断地有人归主，但是，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整体上来讲，对于上帝、对于基督教传到中国，他们的情结仍然是相当地复杂，里面满含了向往、怀疑、痛苦和眼泪等各样的情感。

刘晓波在 1989 年说出“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这句话，表达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来华之间长达千年的纠葛；也表达了宗教改革之后，马礼逊来华 200 年期间纠缠的关系。让我们来看新教入华以后，英国宣教士麦都斯在 1823 年用中文写的三字经。他说：“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从唐朝到马礼逊来华，差不多 1200 年历史，这是基督教信仰进入中国的一个漫长序曲。在这个序曲中，基督教三度来华，但是，都没有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扎下根来。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在 1807 年之前的三度来华中，实际上基督教信仰都没有对中国的文化构成足够的挑战。这些景教的宣教士、天主教的宣教士，都没有勇气，

也没有力量，在基督福音的焦点与中国的文化之间构成尖锐的挑战。

实际上，从唐朝贞观年间（公元 635 年）景教第一次来华，一直到 1807 年马礼逊来华之前，这 1200 年的历史，与其说是这些来华的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构成了挑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文化对来华的基督教构成了挑战。中国的文化，用柏杨的话说比较难听，叫做“酱缸的文化”；或者用比较好听的话说，叫做“有容乃大”，就是任何东西丢进来，最后都会变成我的一部分。

你看，佛教来了。佛教产生于印度，其本身就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文化之间有很多同质的地方。因此，佛教进来以后，就可以把你“化”进来。而且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受到了中国道家思想很深的影响。当然，反过来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佛教的异质化程度还不够高。

今天，中国政府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你不要以为是习近平的突发奇想，或者是他提出的一个对教会的新政策和新态度。实际上，当你去看历史，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漫长历史是一个失败、拉锯和挣扎的过程，你就知道了一切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实际上都是中国文化以不变应万变，来回应一切外来文化的长达千年的策略和能力。

中国武侠小说中，有一种“化功大法”，无论你是崆峒派，

还是武当派，只要你进到我的体内，我都有化功大法，就是把各家各派的内力，都吸到我里面来，我就变成了武林中的高手。不过，这些内力在我里面，还是会导致一些冲突，虽然我把它压在里面，但是，总有一天会崩溃。

到今天为止，我们看见这个“化功大法”似乎还运行得不错。佛教来了，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任何一个外来的宗教，都会经历这个宗教的中国化，那么，基督教也不例外。马礼逊之前的1200年期间，每一次基督教来华，最终都是被“化功大法”化掉了。每一次基督教来华，最终都不是对中国文化构成了尖锐的、决定性的、转折性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挑战，被迫妥协、被迫通融，甚至去寻求中国文化的用词来与中国文化交流、共融、融合。

所以，到了新教来华，麦都斯的三字经说：“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这就是刘晓波所悲叹的——“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

一、从“礼仪之争”到“百年禁教”

那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历史。1807年之前，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百年禁教的时期，就是从康熙的时候开始的。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华，比马礼逊还早一点，不过，他来华不是代表教会，而是代表英国来朝贺乾隆80大寿。这

是中国传统，叫做天朝的朝贡体制——万国来朝。马戛尔尼带来了很多的礼物来朝贺，同时也提出希望能够通商——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

乾隆很高兴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都有人知道我，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都有人来朝贺我们天朝，而且还想和我们通商，这也是很开心的事，是可以答应的。但是，发生了一件外交上礼仪之争的事件。中国人说：你见皇帝，咱们的礼仪是要三跪九叩。马戛尔尼说：这个不行，绝对不可以。我代表一个国家，我是国家的公使，我不能够在另一个国家面前下拜。中国人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朝拜体制，我们必须当你是天远的附属之国或者番邦来见天朝。但是，马戛尔尼说：不，我们是平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我们是敬拜上帝的，我们是不跪人的，我们连父母都不跪的，我们自己的君王也不跪的。第一，我代表我的君王，我的君王不能来跪你的君王。第二，我在我自己的君王面前，我都不跪，都不会用这个礼仪。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基督教文明带给中国文化难以接受的根本观点，就是敬拜上帝还是敬拜皇帝的问题。如果有一位上帝，就意味着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虽然也有尊卑，也有在上和在下的差别，在下的仍然要尊敬或者顺服在上的，但是，在上帝的面前，这种人间的差序格局却不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平等和尊贵的位置。

那么，这个反映在基本礼仪上面的观念，就与中国文化中

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对人的敬拜——对皇帝的那种崇拜——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在这一点上，你会看见，英国的公使来华无非就是做生意嘛，就是赚钱嘛。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只要你跪，那么万国的荣华就给你嘛。但是，马戛尔尼说：我不干，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于是，乾隆皇帝就说：那你回去吧。我们天朝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与你做生意。结果，马戛尔尼就空手而返。

这是中西交流的一个失败。这个失败和基督教信仰还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仍然触及到了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本质冲突。如果你说，人主要是看重利益的，那么，你会看到乾隆和马戛尔尼在这件事情上，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太意气用事了！太意气用事了，生意第一嘛，谁和钱过不去呢？无非就是跪拜嘛，不跪就算了，这是从这边（乾隆）来讲；或者从那边（马戛尔尼）来讲，跪就跪嘛。但是，在这个决裂中，你看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与基督教文明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似乎有着非此即彼的冲突。

如果一个英国的公使过来和中国皇帝打交道的时候，因为跪拜而决裂了，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再往前，从利玛窦开始，那些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他们是怎么在朝廷为官的呢？是他们已经成功地对中国的帝王崇拜构成了足够的挑战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妥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人家一个公使在这个问题上，都可以把

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利益放在一边——不跪就是不跪，回去就回去！但是，教会的宣教士却有太多的妥协。

当时，礼仪之争还没有发生在国家的层面，而是发生在民间生活的层面，就是关于祭祖和祭孔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如果信了耶稣，相信了“太初有上帝，独一的真神”，那么，他将怎么面对他家族里面的祖先崇拜呢？在私人生活中是祖先的崇拜，在政治生活中是帝王的崇拜，在文化生活中是孔子的崇拜。按照中国传统来讲，就是有一个政统（政治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和道统（道德的正确性和权威性）的体系。在道德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是跪拜孔子；在政治的层面，是跪拜皇帝；在私人生活的层面，是跪拜祖先。

所以，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体现为三个层面的跪拜：私人的层面、文化的层面和国家的层面。礼仪之争，其实还没有发生在国家层面。如果天主教的宣教士够有骨气的话，第一年就应该像马戛尔尼一样，与中国的皇帝发生非此即彼的、非伤即死的冲突。但是，天主教的宣教士在这个时期回避了这个冲突，所以，从来没有在国家层面发生关于帝王敬拜的冲突。

不过，慢慢地，因为信耶稣的人——天主教徒也慢慢地多起来，有士大夫，也有一些普通的人，他们每一天、每一年都要面对家族日常生活层面的冲突——祭拜祖先。你知道，就算是到了 200 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

一些乡村，一个人信了主，在这个层面与家族的冲突仍然非常地尖锐。

清明节，你怎么办？家里人要烧香，你怎么办？家里人要祭祖，你怎么办？家里有祖先、去世亲人的牌位，你怎么办？过年了，让你来点一根香、放一排祭品，你怎么办？直到今天还这样，那你就可以想象，200年前的冲突是多么地尖锐。因此，利玛窦，包括整个天主教的耶稣会都采取了一种通融的态度，就是这些不算敬拜，不算拜偶像，不算违背上帝的律法，不算违背十诫的第一、第二条戒律，所以，他们允许中国的基督徒可以参与祭祖和祭孔的仪式。

前段时间，我读到法国的帕斯卡尔在《致外省人信札》这本书里对耶稣会的批评。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不过他听到了，他在书里讽刺了这种基督教中国化的走向。因着宗教改革的冲击，在天主教的内部也有好几波不同的、我们总体上称为反宗教改革的宗教改革，也有对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包括在信仰上的一些刺激。在这些刺激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接近新教信仰的教派，叫做杨森派。杨森派被称为天主教内的一次回归奥古斯丁的恩典教育的运动。所以，也有很多历史学家说，杨森派好像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加尔文主义者。但是，他们没有发展起来，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被法国的国王和罗马的教宗联合剿灭了，有些人被杀头了，有些修道院被关了。

帕斯卡尔作为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科学家，当时是杨森

派的一个重要的神学上的发言人。他的《致外省人信札》是用那个时代比较常用的书信方式写的，其实是一个论辩集，是杨森派用来与耶稣会所代表的天主教传统教义进行争辩的。在争辩中，他用到一个例子，他说，天主教有一个很强的，我们今天叫做道德主义或者叫做功德的称义观。所以，他们在中国，他们在印度（他没有提到日本，其实都差不多），他们在那里发展出来一种什么样的宣教策略呢？就是如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哪个国家的文化中是被藐视的，他们就会在那里回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只传扬一位荣耀的上帝以及西方文明的科学和知识。

我觉得帕斯卡尔的这一断言和评论，基本上可以总结从景教到 18 世纪马礼逊来华之前基督教入华的历史。甚至他还提到一个非常令人讽刺的事情，他说，听说他们在中国是这样做的——他们如此诡诈地教导中国的基督徒，将一个耶稣的十字架悄悄地放在里面的衣服中，然后再去参加祭孔的仪式，就会在内心把敬拜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话说得很刻薄，但是说得很真实。换言之，如果换成一句中国的话，就是“酒肉穿肠过，基督心中留”。这是帕斯卡尔对当时的一个评价。那么到了 1720 年，为什么会产生出礼仪之争呢？因为之前天主教来华的宣教声音，都是被耶稣会垄断的，其他的修会不能来。到了那个时候，其他的修会如道明会，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来了。当然，耶稣会的研究者说，他们来

了有点嫉妒耶稣会的成就，想要抢占这个传教市场。这是修会之间、罪人之间的争夺。

但是，这些道明会，还有其他的修会来到之后，他们在信仰上更加保守。当然，耶稣会就说：你们刚刚来，你们还不懂啊。你们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你们不知道不这样做的话，基督教在中国是根本站不稳的，是一定会被赶出去的！你们刚刚来，你们血气方刚，你们瞧不起前辈的工作，你们就在那里指指点点。

道明会的这些人一来就说：不行，一个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这样！十诫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是一个敬拜人的文化，敬拜孔子、敬拜皇帝、祭拜祖先，与基督教的信仰之间是绝对不能两立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归信基督，就应该弃绝这样的敬拜。耶稣会对此回答说：开玩笑！你只知道读书，你不知道中国的处境是什么！如果这样，还传什么福音呢？如果这样，不是全部都被杀头了？

这些道明会的人，就到梵蒂冈去告耶稣会在中国乱搞。然后，梵蒂冈进行了调查，开了会，最后教宗下了一个命令：祭孔、祭祖，虽然还没有提到跪拜皇帝、没有提到国家政治层面，还只是在文化与生活的层面，但是，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与基督教的信仰直接冲突的。归信耶稣的中国人，就应当弃绝祭孔和祭祖。

教宗就派了一个公使，将这个命令传达到中国。当时是康熙皇帝，康熙和乾隆一样，就大怒了——你爱来不来！听说康熙还写过几首基督教的诗，所以，耶稣会的人就说，本来康熙都要皈主了；康熙一旦皈主，中国就是一个基督教王国了！康熙都是慕道友了，差一脚就要进了！结果教宗禁令这样一来，康熙就下令禁教，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去了。由此，闭关锁国 100 年！

康熙那个时候，虽然下了命令，但是执行还不是那么严格。雍正上台之后，执行就非常严了——凡华人信教者，一律处斩。所以，我们称为“禁教百年”。从 1720 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然后沿海才有五口通商；宣教士才合法地进来，可以在沿海五个地方建立会堂。这期间大概是 120 年时间。中国闭关锁国，将整个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完全地赶出国门，长达 120 年的时间。

二、新教以非法和卑微的方式进入中国

你就知道，马礼逊来华是在这 120 年中间，是禁教期间来华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从景教来华一直到元朝的也力可温教，一直到明朝的耶稣会来华，都受到国家级的高规格待遇。一般都是在钓鱼台吃饭，一般都是在中南海开会，一般都是在午门外接见，一般都是由副总理级别迎接。甚至景教来华的时候，是宰相房玄龄亲自地到郊外，

迎接阿罗本进入长安城——这是总理级别的待遇。

基督教前几次来华，都是合法的，而且都是高级别的待遇，都与官方有蛮好的关系，而且这些宣教士也都致力于与皇室之间建立很好的关系。皇室给了他们很高的待遇，比如说阿罗本，就是景教来华的宣教士，被唐太宗册封为护国大法王。这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级别是很高的。但是，每一次来华都是北上，去到都城，要集中在皇帝的身上，而没有对中国文化构成挑战。当然，对此我会讲到一些例子和典籍。

可是，当马礼逊来华的时候，是非法的。马礼逊来华建立的教会是家庭教会。马礼逊来华是非法的，他上岸就是非法的，他要来学中文是非法的，他要来传福音更是非法的，他要来翻译、出版圣经更是非法的。总之，马礼逊来华，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这与我们今天的家庭教会一样，从头到尾都非法。

我们感谢主的是，当时，基督教信仰的十字架焦点，对一神论所带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偶像崇拜以及在文化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道德自义，构成的最尖锐的挑战，是通过非法状态、是通过卑微的道路进行的。

这有点像保罗去罗马。不过，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和当年保罗去到罗马，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其实导致了非常复杂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他是把

真理带到那里去，告诉他们说：噢，你们不知道真理，我来告诉你们真理。你们有一位未识的神，不知道他是谁，我来告诉你们——他是“太初有上帝”的那一位神。

但是，保罗是从一个文化和政治都边缘、落后的地区，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地，去到罗马，就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就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文化的中心，也就是这个全世界敬拜的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弱势的文化，向着一个强势的文化传福音。弱势文化向着强势文化传福音，所传扬的福音本身又是一位降卑的耶稣基督，他以苦弱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彰显一种被这个世界看为是无能的真正的能力、被这个世界看为是愚拙的真正的智慧。因为，罗马人认为他比你聪明，罗马人认为他比你有能力。你是一个完全在人家面前无能的人，然后正好也向他传一个无能的能力；你正好在人家面前是一个卑微的、被人家看为是愚拙的人，非得向人家传扬一个被看为是愚拙的真正的智慧。所以，这个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福音传扬，正好与这个福音的实质相对应，就是这种福音的实质是卑微、是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保罗到罗马的方式是怎么去的呢？他是被罗马士兵护送去的，他自身是处于非法状态的，他是被押去的，他是带着镣铐去的。福音，是带着镣铐进入罗马的。

福音高于一切地上万族万国的文化。真正力量的彰显就是——福音常常是带着镣铐的。福音是带着卑微的样式进入到一

个优势的、高傲的文化中，以十字架的方式来构成对那个文化的挑战。保罗就是用这种方式把福音带到罗马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从景教一直到天主教的耶稣会，他们不是这样的。西方向中国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艰难，是反过来的艰难，就是他们是优势文化向着劣势文化传福音。向你传福音的那个人，本来就比你能干。他是有能力的，向你们这些无能的人传福音；他是聪明的、有智慧的，向你们这些愚拙的人传福音；他是文明的，向你们这些野蛮的人传福音；他是开放的，向你们封闭的人传福音。

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文化上的样式。这个样式，老实说就是太漂亮了、太体面了！所以，当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来传“有一位上帝”。但是，中国人说，哦，有一位上帝，这个我不是很在乎，但是，那个布谷布谷的自鸣钟，太奇妙了！然后，利玛窦又带来一张世界地图。哇，世界地图，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我们太愚昧了，我们真的是太愚昧了！

所以，当你没有去认识福音之前，你首先就认识了天文、历法。哇，人家老外算的历法就是准，我们以前的历法都算错了！哇，他们各个方面，包括所有的学问，都比我们强！他们代表的的是一个优势的文明。

让我们这样讲，有很多人说，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与北美华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话不是我们讲的，是北

美的华人自己讲的——他们说：在我们北美，我们是坐着花轿进天堂的；在中国，他们是背着十字架进天堂的。

那么，福音来到中国，在马礼逊来华之前的 1200 年期间，基督教都是坐着花轿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来到中国，都带着一连串的陪嫁，带着好多的陪嫁。你知道，富裕人家的女子出嫁，除了把这个女子给你，还要给你好大一堆东西。有的时候，很多人是因为那堆东西，才娶这个女子的。穷苦人家除了这个女子，其他什么都没有；除非你是真要这个女子，因为除了这个女子，其他也没什么好要的。

有的时候，如果陪嫁太多的话，就会有一个麻烦。麻烦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麻烦就是，你到底爱我呢，还是爱我们娘家的这些东西？所以，当福音传到中国来，它带了太多的陪嫁来，它带着整个西方的文明，它带着那一切的优越感、一切的成就，使得福音不是以一种卑微的方式来进入的。

可是，到了马礼逊的时候，有了一个翻转。从马礼逊之后的福音来华，不再是向北、向北、再向北。北，代表着帝王所在。从马礼逊来华，特别再到后来的戴德生，你就看到，新教在中国是向西、向西、再向西，是不断地往内地走，不断地往边缘走，不断地往底层走，不断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把焦点放在攻下中南海、把焦点放在让皇帝信主。你怎么让皇帝信主呢？除非皇帝逃难的时候，否则的话，你就要带一大批嫁妆，才能够进去给皇帝传福音。

所以，当新教的马礼逊来华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罪犯的身份来华的，因为他一上岸就是偷渡客。为什么 20 年后，他要被迫地加入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得到一个翻译的职位呢？因为，只有东印度公司当时取得了特许的进入中国的合法身份，他才摆脱了偷渡客的罪犯身份。

三、中国文化敬拜的核心是人、国家和权力

刘晓波说中国人没有上帝。新教的宣教士一来，就把上帝的圣经以中国传统的三字经方式告诉你——“自太初，有上帝”。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传统中的上帝。

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一定是与神的关系。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一定都是关于这个文化中的敬拜。我想指出一点，就是任何一种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像所造的，人的里面一定有敬拜的渴望。人一旦形成了一个群体、国家，一旦发展出一种文化，这个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他在这种文化中对上帝的认识，包括对上帝的错误认识。

我这里说的上帝，不是说圣灵所启示的那一位上帝，就在中国文化中。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所以，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只要人里面有神的形象，人就一定

会去回应、去渴慕、去揣摩、去认识那一位独一的上帝。任何一种文化的特征，都是基于对所认识的那一位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建立起来的敬拜。这就是这个文化的核心。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来看中国传统中的上帝。虽然中国的典籍中有“上帝”这两个字——“昊天上帝”，但是，实际上什么是中国传统中的“上帝”呢？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核心的人与神呢？或者用中国的话说，人与天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基于中国人对天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敬拜。

没有敬拜，就没有文化共同体；没有敬拜，就没有政治共同体。任何的一种统治，一定建立在敬拜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一定建立在人与天，或者人与神的关系上面。

那么，针对这个关系，我讲三点。我认为，整个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什么是它的神？我们不是来问，中国典籍中有没有圣经中的上帝？我觉得这个问法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所以，我们真正地来问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对一位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向他说：你要信神，你要信真的神，你不能拜偶像。那位朋友可能对你说：我不信，我什么都不信；我也不烧香拜佛，我也不信你们那个基督教的上帝，我什么都不信。然后，我们就对他说：不。你一定是信什么的！按照圣经，人要么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要么是敬拜假神。真正的问题，不是你什么都不信；真正的问题，是让我们来谈一谈你生命中的神是什么。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神、都有他的敬拜，而这

些在圣经中视为——偶像崇拜。

所以，当我们对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和他一起或者帮助他来找出他生命中的偶像是什么。个人生命和国家生活一样，都是建立在敬拜之上的。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到现在为止，你既然没有相信耶稣、你既然没有相信圣经启示的那一位上帝，那么，什么是你现在生命中的敬拜？你在拜什么？你是拜你妈还是拜你女儿？你是拜钱还是拜官？你肯定有拜的东西，我们要找出你生命中的假神来！

面对中国文化的时候，也是一样，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典籍当中出现的“上帝”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圣经中所讲的上帝，而是说中国文化中的那个假神是什么？中国文化核心里面的那个敬拜是什么？

1、以人为帝

第一，是以人为帝。很多时候，我们有提到上帝，但是，其实在古代的典籍中，提到“上帝”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地方并不太多。如果只提到“帝”，不加“上”，那么，“帝”在中国远古的典籍中次数是更多的。在远古的时候，那个“帝”不是指“皇帝”，而是指“上帝”，就是指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这里的“帝”，是指到天，是指到上帝。所以，在中国的远古典籍中，说“帝”还是说“上帝”，其实都是在指他们所认识的那一个朦胧中的神。

因此来讲，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秦的文化到了秦朝的时候，就开始以人为帝。以人为帝，其实就是以人为神。在儒家的传统中，将人以帝，以天子，甚至以帝为圣。儒家所讲的圣人，真正的圣人，或者最大的圣人，是什么呢？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孔子，而是帝王。

中国儒家传统中，真正的至圣是谁呀？尧舜禹，直到周文王。“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带来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个词，与“政教合一”比较类似，叫做“君师合一”。所以，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帝”代表着政教合一，就是精神权威的祭司和政治意义上的君王领袖，是合为一体的。所以，中国的皇帝与欧洲的君王，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欧洲的君王，就叫君王。君王就是政治意义上的领袖，是王的意思。但是，在欧洲从来没有君师合一的君王概念。如果君师合一了，就叫皇帝。如果君师合一了，用今天的话讲，就叫国家主席兼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几千年以来，直到今天，这是最根本的东西，从周文王到习近平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最大的梦想，不过就是做周文王而已，就是做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典范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那个系统，就是政教合一、君师合一、以人为帝、以帝为圣。真正的大圣人一定是王，真正的大儒乃是三公。古代三公，相当于现在的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三公乃是大儒，这是儒家一直以来的传统。对于上帝这个词，余英时先生在考证里说，上帝在中国的典籍里，并不代表一个具有人格化位格的独一神，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泛神的文化中，特别地指向帝王的神圣来源。也就是说，地上如果有个人是皇帝，那么，皇帝的祖先是谁呢？皇帝的祖先，当然是血缘上的祖先，往上数，数到最后，还不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皇帝的权威性、神圣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皇帝的祖先不过和你我的祖先一样——以前都是一起要饭的，那么，为什么他是皇帝了呢？大家以前一起要饭，为什么他的后代就是皇帝了呢？

所以，中国的皇帝是一个宗教概念，这个就是我说的中国的皇帝和西方的君王截然不同的地方。皇帝本身是一个敬拜的概念，是一个宗教的概念，他一定有神圣的来源。皇帝一定有一个神圣的、从天而来的来源，而不只是从肉身推到一个乞丐。那么，这一个来源，就是上帝。

实际上，就古代的中国来讲，家家户户都有家神。你家都有祖先的敬拜，你家都有家祭。那么，皇帝也有他的家祭，他的家祭就是祭上帝。所以，让我这样讲，最初上帝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只不过是人间帝王的一个家神。上帝是皇帝家的神，与你何干？根本和你没关系！

但是，与你建立关系的是这个皇帝。或者可以这样讲，在中国的那个崇拜系统中，地上的那个皇帝，是你与那个遥远的

上帝之间的中保。他是通过这个中保来治理和统治的，你也是通过这个中保来敬拜那一位上帝的。所以，中国古代的上帝，从来就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上帝。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真实的上帝，是皇帝。他是天子，只有他可以祭天。在中国的古代，如果有人敢祭天，那就是谋反。你说，今天过年，咱们祭一下咱们王家的列祖列宗吧。这个是合法的，对吧？你说，今天过年，咱们祭一下那个上天——“昊天上帝”吧。这个就得满门抄斩。“昊天上帝”是你能祭的吗？你姓赵吗？你不姓赵，这神就和你没关系！

所以，皇帝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其实是一个中保。如果有一位遥远的中国的神，那么，皇帝才是那个中保。因为帝王在地上是高于世人的，所以，上帝也是高于诸神的。因此，上帝只不过是泛神的文化中，特别地指向君王崇拜的一个概念而已。

2、以国为天

第二，就是以国为天。我们提到天朝的心态，天朝的体制。老实说，前几天我在教中国教会史课，人们一定会提到关于宣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中的作用问题。但是，我一直比较反对这个说法，因为我认为，南京条约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而不是不平等条约。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平等条约，因为就像马戛尔尼和乾隆一样。

人家大英帝国，也不是后妈养的；人家大英帝国也是在全世界响当当的；人家到你这里来，想和你平等一下——咱们是平等关系啊。你说：去去去，谁跟你平等！中国传统的天朝观念下，没有平等的观念。这是天朝与番邦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天朝的皇帝如果是天的代表，那么，谁跟你玩平等的游戏啊！

实际上，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承认自己是万族当中的一族，是万国当中的一国，并且只能作为战败国，来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个平等条约。在中国历史上，从孙中山、毛泽东开始讲不平等条约，他们所讲的不平等，是指到内容上对我不平等，因为——你割地赔款嘛。但是，实际上，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有的国际平等条约中，战败国一定是割地赔款，不会因为内容上是割地赔款，就说这个条约本身是不平等条约。明白这个意思吗？

因为，如果他们仍然处在不平等中，就根本没有条约。你看中国古代，如果我们打赢了，谁和战败国签条约？直接把你妈卖了，把你女儿送到官窑里去；把你们家抢了，然后再把你放在监狱中，过二十年能够把你特赦出来，就算是好的了。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和战败的人签条约的观念。你战败了，你就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可能有条约呢？你都打败了，生死都要由我宰割！条约，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所以，人家打赢了你，然后想和你签条约，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咱们以前打赢了别人，也没有签条约。而且，咱们要是没有把他们打败，也绝不和他们签条约，因为咱们是天朝！

实际上，南京条约意味着，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平等的主权国家行列中的第一次平等条约。至于割地赔款，那是战败本身的结果，而不是代表这个条约的平等关系。为什么你不接受它呢？因为你是天朝的体制，除了以皇帝、以人为帝，以国为天，这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神话。这个神话，从中国古代的秦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今天你看共产党，要提的也不是共产主义了，它都不好意思讲共产主义的伟大复兴了。对吧？它脸皮都没那么厚了，现在，它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整个国族的神话，古代的帝王崇拜和现在的国家崇拜的结合，是中国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这样讲，基督教尚未动摇这个核心，尚未动摇中国文化最核心的这个部分。

但是，上帝借着 60 多年来的家庭教会，上帝借着马礼逊卑微的方式，向中国传福音，开始了这一个动摇的过程。之前的 1200 年，基督教都没有真正地对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开始进行挑战。从马礼逊来华，从戴德生卑微地向西宣教，从中国教会 1900 年庚子事变的受难，从中国家庭教会 60 多年来的受逼迫和受苦的过程中，这样的挑战才开始进行。如果我们持

续地受苦，并且在受苦中无法被连根拔起来，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对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最根深蒂固的核心，开始构成挑战。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够对这个古代的帝王崇拜与现代的国家崇拜相结合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一个肿瘤，构成挑战的，唯有家庭教会，当然，也包括天主教会的地下教会，就是广义上的基督教。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只有基督教构成了挑战。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对它构成挑战；民间团体，从来没有对它构成挑战；其他被中国化的外来宗教，从来没有对它构成挑战；儒家或者中国文化内部的变革和更新，也从来没有对它构成挑战。

3、以权为神

第三，以权为神。帝王崇拜和国家崇拜的必然产物，就是权力崇拜，就是以权为神。在中国，对皇帝、国家、权力这三个的崇拜，就是根深蒂固地辖制每一个中国人灵魂和生命的文化 DNA。这个文化 DNA，在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重生得救的人那里，开始被破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自己，我们都会说——破得还不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破得还不够。那么，上帝借着这一些重生得救的他的儿女，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上的破除，也还远远不够，但是，这已经开始构成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最尖锐的挑战。

所以，我讲中国文化的核心，从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从中国人对神的认识，以及因此建立起来的敬拜来看，2000 年文化的核心，用一句话概括——2000 年，制制皆秦制也。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主义与皇权专制。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你就会对中国文化过于美化。当然，往下的层面去看，儒家有没有一些在伦理方面美好的地方？道家的思想有没有比较高超的部分？然后再到器物的层面，再到制度的层面，或者再到文学和审美的层面，有没有美好的地方？当然都有，当然都有！

这个民族一定是有上帝的普遍恩惠在其中的，但是，上面的概括，才是它的核心。就好像该隐犯罪之后被驱逐，他的后代开始建立了第一座城以诺。那里的文化繁不繁荣呢？吹拉弹唱，什么都有；建筑、艺术、美术，什么都有。但是，因为这个文化的实质，是传扬人的名，是抵挡对上帝的敬拜，是以他们自己的骄傲为神，是以自己为神，所以，神彻底地摧毁了它！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模式，就是今天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一党专制。从这一点来讲，一千四百年来，中国没有变过！如果你看文化的其他层面，请问：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一千四百年前的中国的每一个层面，是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变化！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文化里的核心，

其实是一成不变！

如果看不到那一个一成不变，你就会高看了那一个欣欣向荣的变化、那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你的整个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归回到对独一上帝的敬拜；你的整个的生命的实质，就没有办法归回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恩典的统治。这个恩典的统治，首先征服你这个个人，然后通过教会，也慢慢地通过上帝大能的手，掌管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

四、中国文化始终把基督教视为异端

让我举两个例子。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基督教在大约 1400 年前，唐朝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就已经来到中国。我举碑中的几句原话：“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碑文说，因为景教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所以一下子传播得很厉害——因为有政府的支持，马上就“寺满百城，法流十道”。包括当时的成都，也是景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在城西有很高很辉煌的大秦寺，就是景教的寺庙。但是，景教慢慢地就产生了文化的冲突，这里记载的就是与佛教和儒教的冲突。“释子用壮”，“释子”是指佛家的和尚。“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中，“先天末”是公元 713 年，而“东周”与“西镐”指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在中国古代，这就是指洛阳和长安（西安）。洛阳和西安在今天来讲，就是像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大城市。这个地方引用到中

国的传统典籍《论语》，“下士”是指儒家，这里当然是对儒家藐视的提法。因为《论语》中说，“上士闻道，就勤而行之。”就是上士听到道以后，就说我要去行啊。“中士闻道，若有若存。”中士听道后说，好好好，知道了，我还有事，也不说是也不说非，总之，与我没什么关系。下士闻道呢，就哈哈大笑，就嘲讽你。

所以，到了“先天末”的时候，儒家的人就起来攻击景教的教义，就开始嘲笑、诽谤和藐视，所以叫“下士大笑”。“释子用壮”，这是《易经》中的一句话，叫做“君子用罔，小人用壮”。“小人用壮”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小人动手不动口。小人说不赢了，就开始骂了。持强就是这个意思，持强不一定是真动手，也包括气势上骂人，总之，就是血气上来了，他就不好好和你谈。

所以，碑文在这里说，景教来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就引起了和佛儒之间的冲突。佛儒就联合起来，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诽谤、攻击景教。基督教在中国 1400 年了，其实都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异端。

今天，我们中国有“邪教”这个词，法律上有“邪教罪”。在中国古代，当然最常见的邪教，广义上来讲就是白莲教。有时候学者用这个白莲教，来指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切被视为非法的各种民间宗教的名称。

中国以儒教为正统，那么，在民间就有非法的邪教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就叫做白莲教系统。历朝历代很多农民起来革命的时候，都是白莲教系统。为什么呢？中国古代的所有农民革命，一定是宗教性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宗教性的，帝王崇拜和帝王统治本身就是宗教性的。所以，你如果要打败他，要改朝换代，也一定是宗教性的。没有宗教性，你不可能改朝换代。刚才我们不是说过，你不能祭天吗？所以，对农民革命来说，咱们今天祭天，那就表明造反了。因为你开始祭天，就表明你要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就是造反，天子就这样变换的。

所以，从康熙到雍正禁教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出一个概念，叫做“邪教”。而那个时候的邪教，是指天主教，也就是基督教。“我中华正教也”，有邪教就有正教。所以，今天我们来问，为什么说以邪教罪来打压宗教，是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呢？作为中国的政府，你凭什么说人家“邪”呢？有邪教就有正教，那中国的宗教是什么呢？就是它自己嘛！它只有以自己为正教，它才能来定邪教嘛。

中国 1400 年来，都是以儒家文明为正教，所以，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或者雍正开始禁教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叫“护教”。我们今天教会要讲护教学，但是，中国从康熙以来一直到今天，也在讲“护教学”，今天共产党员讲“护教”的用语叫“保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 100 多年来，甚至是 1400 年来，自己本身都是宗教性的，所以，它一定都有护教的意思，它要将它的正统之外的宗教都定为邪教。因此，基督教与佛儒之争持续了 1400 年时间。义和团运动完全是民间宗教和白莲教、佛教的民间形态的一个大融合。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大融合。然后，到前些年新儒家起来，包括北京大学 10 个博士联名，他们都要抵制基督教，抵制圣诞节。在这里，你都会看到这一个 1400 年以来的异端与正统之争。

再看碑文的一段话，就更有意思了。这里讲到天宝初（公元 742 年），就是唐玄宗的时候。“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疋，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这个，就是（今天中国政府）“五进五化”的开始；这个，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开始。

自从景教来华，基督教就一直是三自爱国教会，你明白吗？三自爱国教会不是从共产党才开始的，共产党也是被中国文化核心所塑造的，虽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外来的，但是，共产党都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哪个共产党员不是中国人啊？整个共产党，实际上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产物，并不单单只有马列的意识形态，那个是披在身上的一件外衣。

所以，三自教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们建了景教的寺庙，然后就叫大将军高力士（什么大将军，不过就是个太监），然后将“五圣写真”送去。我刚才讲，圣是什么？圣就是皇帝。

皇帝为圣，这就是中国最核心的文化的敬拜。那么，“五圣”是什么意思呢？是从李渊开始到那个时候的五个皇帝。不但现在活着的，连死了的都来了。你们年龄大的，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吧——马恩列斯毛，“五圣写真”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我们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就好多地方都开始挂习近平的像了，现在开始要将红旗插进教堂了，将来有一天，他的画像可能也要挂上教堂。

那么，当年罗马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这帮祭司还是非常的一神论，从而对罗马的政权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罗马的政权也是什么呢？凯撒崇拜。凯撒崇拜之下有宗教自由，你们爱信什么样的神，你们愿意信 100 个神，我都不管，只要你要加上凯撒崇拜。诸神万神，都在凯撒崇拜之下。

所以，罗马建立了一个万神庙。凡他征服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神就会拿到万神庙去。万神庙就是今天属灵的中国政协，各个地方的三教五流、七老八贤的全部都进来，成为政协委员。所以到二世纪初的时候，罗马的万神庙里的神，有人统计说，真的超过了一万个。当时有种说法——罗马城里，平均每个罗马公民都能分到一点几个神。

所以，在这个万神的多神的世界之上，罗马是以凯撒崇拜来统领一切。只要你承认凯撒崇拜，你们自己的宗教我们就不管。罗马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么做的，这种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行

得通，只有到了耶路撒冷行不通。罗马帝国说，我们允许你，你的这些自由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把“五圣写真”——只是现在活着的那个凯撒的写真——挂到你的圣殿里去。结果，这种做法就遭到了公会的殊死抵抗。

这样的事情，在本丢·彼拉多上台之前，前面好几个总督和他们发生了很多次。曾经有一次最剧烈的，就是一帮祭司站在圣殿的门口，堵在那里不走，不让你能够把那个凯撒的像挂进去，因为那是亵渎一神的。罗马的总督就命令士兵用标枪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刺死。但是，后来仍有太多次猛烈的反抗，到本丢·彼拉多的时候已经很温和了：我们给你们划一块圣殿区域，你们自己建立卫队负责治安，我们不管，我们的人也不进去。凡是罗马人，罗马军队，如果越过那条线，就是违法。这是非常优待你们了。这是一个宗教特区了。

所以罗马人，有的时候也很委屈，你得理解他的用心啊，因为他如果不信神的话，他会觉得很委屈：我们已经很宽容了，我们在帝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这里一样对你们这么好，你还要我们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和共产党一些干部打交道，他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够宽容了呀，你还想怎么样？在他们的理解里面，已经不错了！悠着点，已经可以啦，你还要怎么样！

一神的崇拜就是要打破这个政主教随的帝王和国家的崇拜。这个打破，不是说我们上街去打破，不是说我们用那个或

这个去打破，而是通过福音的传扬和十字架的道路，通过教会的受苦，慢慢地——当然上帝也掌管整个普遍历史——慢慢地去打破。

这里碑文的马屁拍得很厉害：“龙髯虽远”，其实这人都已经死了嘛。“弓剑可攀”，就是丰功伟绩还永远地留在我们心中。“日角舒光，天颜咫尺”，那不是在讲耶稣，不是在讲他虽然离得很远，但是实际很近；他这里讲的是，皇帝是“以马内利”的皇帝啊！“天颜咫尺”，那就是把“以马内利”给挂进来了。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实际上 1400 年来，基督教未曾对中国文化构成真正的挑战，就是因为他一直降伏在，或者自愿地妥协在帝王崇拜之下，成为三自教会、成为爱国教会，一直和其他外来宗教一样，伏在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下面。

那么，唯有最近 60 多年来的家庭教会，我们不挂靠、我们不登记、我们不挂“五圣”的像，我们愿意为此承受逼迫、屈辱和藐视，活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地位。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这个，也是我们信福音的方式。

阿罗本在公元 641 年的时候，其实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但是，这个文献因为后来唐武宗灭佛，（景教受牵连）就一直躺在敦煌这个地方，因此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他写的就叫《一神论》，可惜这个一神的观念，在 1400 年的基督

教在华史中，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也没有知识分子读到这个东西。

你看，文献的第一段非常清楚——“万物见一神”。这句话好有气魄！“万物见一神，一切万物，既是一神，一切所作若见；所作若见，所作之物，亦共见一神不别。”这个就叫“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他用到了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一句经文。“以此故知一切万物，并是一神所作。可见者不可见者，并是一神所造。”这就是《尼西亚信经》所讲的“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之时当今，现见一神所造之物，故能安天立地，至今不变。”这个是景教一神论的核心，尽管还没有到基督教救赎的那个核心，可是，如果这个一神的观念在中国强有力地进来，那么，将在帝王崇拜之间构成非此即彼的争战。

可是，这个争战 1400 年来并没有发生，而只是一个漫长预备。直到马礼逊来华，直到宗教改革的信仰来华，直到二十世纪，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以人为神，以帝王为神，以权力为神，这三大崇拜仍然没有改变。当然，从传统社会来讲，我们说的政治层面的帝王崇拜，文化层面的孔子儒教的崇拜，私人层面的祖先崇拜，这三个东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后面两个虽然已经慢慢地在消退，但是，还是有非常强大的民间文化的基础，仍然存在着一些文化层面的变形。尽管如此，在国家层面的那个崇拜，完全没有被改变过。

五、新教对今天中国文化的三个根本挑战

所以，让我这样来总结今天新教对中国文化的三个最根本的挑战。

1、一神论对偶像崇拜的挑战

第一，是超自然的独一神论，对国家主义的一党独裁这一本质上的偶像崇拜，在国家政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这一个挑战没有完成。这一个挑战很大程度上很难通过卑微的弱小的教会来完成，乃是由上帝在历史中的反复地击打而进行的。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神的手在这种崇拜上面，反复地击打这个国家，反复地击打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反复地击打这个国家的政权，反复地击打这个国家的命运，直到今天。

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一个方面要更多地与中国所经历的每一次的苦难感同身受，与中国人一同地承受这个中国历史中的苦难，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确知道我们的悖逆，除非神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击打，否则，超自然的独一神论无法摧毁这一个本质上的偶像崇拜！

2、救赎论对自我称义的挑战

第二，是唯独恩典的救赎论对道德至上的儒家传统和实用

主义的世俗生活的挑战。中国整个的文化在生活和伦理的层面，本质上是一个行为主义和律法主义的称义系统。一是帝王崇拜的崇拜系统，二是道德行为的称义系统。在这个称义的系统里，以人的道德的成就和行为，包括这个行为的可测量来称义；到了民间社会，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来自我称义，而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恩典。

中国 80 年代的新儒家学者里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后来信了主，就是郑家栋。大概在一年前，我在一次讲座中特别地引用了郑家栋老师的一些看法。郑家栋在 80 到 90 年代，是中国最早兴起的一批新儒家学者中的一位，但是，后来他为什么信主了呢？他在个人私德上面出了很大的丑闻，但是，我们关心的不在这里，因为这是公共的事件。

对于儒家传统，为什么我们说一个方面这是道德的称义？为什么鲁迅说翻开 2000 年的礼教的历史，只看见了一个词——“吃人”？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神所赐的律法本身是圣洁的、纯全的，可是，律法本身并没有为你提供当你不能够遵循这律法的时候，救赎之道和出路在哪里。这律法本身不能够拯救人。所以，中国的道德文化的实质是说，你可以讲得很漂亮，你可以提出很好的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事情——就是当人做不到的时候，就没有出路。当人做不到，也没有人做得到的时候，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他们一定是死路一条。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女性如果失贞，她的结局是什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下面，她有没有出路？她没有任何出路！甚至很多的时候，不是她自己犯罪，有可能是被强奸。就算她是被强奸，就算她完全是一个受害者，在 2000 年的中国儒家文化中，有没有出路？没有任何出路！

这就是儒家文化最可悲和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说它的道德理想不对，但是，它带来了一个称义的系统，那个称义系统一方面带来了那些以此称义的人的狂傲自大，另一个方面又带来了对于芸芸众生的一种道德的统治、一种道德的捆绑、一种道德的绑架，一直到最后——完全没有出路。

所以，郑家栋也一样，作为一个儒家的学者，他自己在私德上出了问题，他就在整个的中国知识界混不下去了。你明白这一点吗？他没有翻身的可能。他无论怎么懊悔，他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在中国文化中，做一个中国人是绝对不可以失足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绝对不可以失足，一失足就成千古恨，永远没有翻身的出路。

这就是道德文化的可怕！为什么？因为没有恩典、因为没有救赎，不可能再被接受了。所以，郑家栋在儒家圈子里混不下去了，没有人能够接受他。只有耶稣能接受他，只有在基督那里，给一切的穷乏者、给一切的失足者、给一切的受害者、给一切在道德面前的失败者，提供了恩典和出路！

在教会的历史上，你可以看到，奴隶起来成了教宗，杀人犯起来成了牧师。哇，这样子的事情太多了！在中国的文化中，这是绝对不可能想象的事情。没有恩典的闯入，这个道德自义的文化，是没有办法翻转的。

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忏悔？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中，为什么经过了文革，仍然看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中国，忏悔就死定了！在中国的文化中，就算别人知道了，你都不要说——不承认，就不承认，打死都不承认！这样，你才混得下去。忏悔的结局，就是你死定了，就是你彻底出局。

3、教会论对集权社会的挑战

第三，是教会观——圣约社群论，对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社会的挑战。基于血源的宗法社会，是中国的传统社会，那么，今天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没了，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社会，其实这是一盘散沙的“流民社会”，按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说法，应该是“有国家而无社会”。

中国的传统是有国家而无社会。当然也有一些“社”。社这个词，鲁迅的短篇小说《社戏》，就是写中国传统的那个民间庙会，但是，它不是一种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公民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除了宗法社会——就是基于你的家族体系之外，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是没有民间社会的，是没有公民之间的自由

结社的。不论或男或女，无论是山东人还是广东人，山东人都去山东商会，广东人就去广东商会。没有四川人和山西人都在一起的，没有自主的人和为奴的人都在一起的。商人就去商会，劳苦大众、卖苦力的，就去码头工人的青帮。大家各去各的，没有一种突破了血缘，不在皇权的统治之下而建立起来的一个自由人的自由的生命共同体。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个东西。传统社会没有，今天也没有。

今天中国的社会，你想想，除了家庭教会以外，在中国社会中，哪里可以看得到完全脱离共产党的统治辖制和官方系统之外的自由人的自由结社呢？哪里有？完全没有！连同城一起聚会，现在要被抓；连微信群主，就要被抓。

第一个层面是在国家崇拜系统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在称义的伦理系统的层面，而第三个层面是在社会结构的层面。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从古代一直到今天，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已经140多年了，仍然没有任何的变化。除了官家，就没有其他家，哪怕是做生意。中国今天的私人老板，可以自由结社吗？也是不能的，一样要挂靠才可以的。不挂靠，仍然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没有改变！

所以圣约社群，所以一间一间的教会，在这里面什么人都有。有大学教授，也有上访者，有害过人的，也有被人害过的。以前我们教会很感恩地说，有国民党的后代，有共产党的后代；有当过红卫兵砸过人家的，也有以前被红卫兵砸过的；有老板

也有雇员。哇，他们在一起，他们在主里跨越了社会血缘、宗法，还有权力、知识这一切的社会分层。只有教会在中国社会，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个跨越一切社会文化分层的真正的社会。

1842 年鸦片战争之后，只有五口通商，宣教士只能去这五个地方。在 19 世纪后半叶，到了 185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天津条约》，到了 1860 年的《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把整个内地向宣教士和西方人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内地任何的城镇，可以置买房产，开始宣教护道。

所以，从 1860 年到 1900 年的义和团中间的 40 年中，教案不断。那个时候的教案，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时候教案的冲突，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主要冲突，不是在第一个层面与清政府的冲突。在清政府那里，因为打了败仗，所以还是比较宽容的政策，不想搞事。而且地方官员呢，如果出了这种教案，通常情况下还是会把这帮刁民拿来骂一顿，息事宁人。那么，到 1900 年就不一样了，官方和民间全部合立起来了。

在那 40 年中，主要的教案都是这样爆发的。乡绅是反教的主力。什么是乡绅？就是读过书，但是没有考中进士的。在中国文化中，书读得一般、中等成绩的人，应该就是构成中国民间社会的主力。这个就叫乡绅。所以，乡绅一般都是当地有文化、有道德、有体面、有声望的这样的人群。为什么乡绅是反教的主力呢？乡绅出来反教，民间的老百姓一呼百应；然后发生问题之后，上级的官员把他们压下来。基本上是这个模式，

一直到 1900 年，上面就不压了，上面就开始鼓动了，然后，上下一起反教了。

为什么乡绅是那 40 年中的主力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层面。你想想，在一个传统的村子里，是乡绅统治的，官员也是不进来的，背后是宗法社会，是血缘社会。那么，现在有人信主了，来了一个宣教士，整个乡村里的社会结构都被改变了。还有整个民间的宗教，那个时候有迎神赛会、庙会。秋收了，整个村都要有各种民间的宗教仪式。

按传统，家家户户都是要摊派费用的。家家户户都要摊派，就是这家信耶稣的，他说我信了耶稣，我不参加这个活动。这个冲突就很大啊——你敢不出钱啊？而且民间的精神领袖也在发生变化。原来去祠堂，现在去教堂。祠堂旁边多了一个教堂，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冲击。

所以，在那 40 年中，冲突还没有到达国家的这个层面。在社会结构的层面，最强烈反教的是士绅阶层，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的。新教对中国文化的三个根本的挑战，第一是神论，就是超自然的独一神论。第二是救恩论，唯独恩典的救赎论。第三是教会论，圣约社群的教会论。这三个挑战，冲击了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地方，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结语：求主扭转、更新和掌管中国文化

我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本来想反过来再讲一个，只好放到以后了，就是中国文化反过来对基督新教的挑战，也包括我对宣教本身的一些反思。列文森——他与费正清都是美国汉学界最重要的人物——在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本名著中，很仔细地分析了基督教为何在中国失败。这本书写在 50-60 年代，他看到了 1949 年共产党的得胜，看到了 50 年代的三自运动，然后一直看到 66 年的文革，所以，在他那里看到的是——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机会看到 80 年代的时候，突然冒出来几百万的基督徒和大量的教会。所以，他在书中分析说，140 年的宣教史，为什么带来中国文化的抵挡？为什么带来中国文化中那么强烈的反教的精神？为什么到 49 年、到 50 年代和 60 年代带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他不信主，不过，他有很多的观察。这个是反过来的挑战。

我这个讲座的题目叫做《宗教改革与中国文化的挑战》，其实这是有点歧义的。事先是想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改革、新教入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挑战，就是我刚才讲的。另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身对于这个宣教本身的挑战，对于这个现代的基督教本身的挑战。因为这是一块硬骨头，硬骨头就挑战你牙口好不好？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就停在这个地方。

我想用两段经文来结束。当保罗去传教的时候，我们说保罗是以卑微的方式，用弱势文化进到强势文化中。我想请你们

和我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第 2-4 节）阿们。

我们愿，这也是我们的心志——我在中国的文化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下面，我们真的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但是我们讲神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也不妥协那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依靠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的教导：“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第 16-17 节）阿们。

我们求主在中国继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就是将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这是上帝掌管整个中国的历史而做的。而这个新皮袋不是说，要把中国文化和社会都否定掉，而是当一个文化的核心被扭转的时候，当那一个敬拜系统、称义系统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的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被扭转之后，中国文化在下面的低一点的层面里，上帝的普遍恩惠才会被更新。

那个时候我们也一样地说，唐诗宋词真的也很美，我们在文化上也是享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汉语中的那种中国人文化的意义。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与“多一个中国人少一个基督徒，还是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样的新酒与旧皮袋的冲突，唯有在神的那里，他能够更新，他能够掌管。我们在神的面前向他祈求。阿门。

我们现在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独一的神临到这一个偶像林立的国家和民族。主啊，那一个甚至超越的、将来的、永生的盼望，临到这一个实用主义的、以今生为重的伦理社会的文化。主啊，那一个帝王的崇拜，那一个集权的专制，仍然辖制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主啊，我们求你可怜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将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我们，不单是在这个体制下面的老百姓，而且也是在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个人，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一样地被这权力辖制到可怜的地步，被帝王的崇拜、权力的崇拜辖制到可怜的地步！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用你的大力打碎，主啊，你继续地打碎。主啊，你在过去 100 多年中国历史上所做的，求你继续地做下去，求你使我们仰望、忍耐、等待你大能的作为，而愿意以受苦的、卑微的、耐心的方式来等待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求你因此来激励我们当中，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代

职的同工，无论是每一位基督徒，主啊，我求你在今生来使用我们，让我们的心为你的国度而跳动，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为你名奔跑！让我们痛恨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痛恨那一个罪人的中国文化在我们里面的那些各样的残留，求主你打碎那里的一切的偶像，求主你来除掉那里面的一切罪孽，求你来拆毁那里面的一切隔断的墙！感谢赞美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2017年12月9日

| 2018

我对时局和教会使命的三个意见

第一、对时局和教会使命的神学意见

任何一个时代的局势，都不取决于它在经济、政治或文化上的任何指标，而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世代与主基督的福音的关系。任何一国之政府与散居在该国的基督教会的关系，都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现状与将来的关系。并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上帝永恒的国度与一个短暂的地上政权的关系。如诗篇所言，“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诗 33:10）。

一国之政府，对待神的教会和神所设立的仆人的举动，都是一个宇宙性的外交事件。政教关系，在本质上是超自然的外交关系。地上的政权必须意识到，任何政权都是短暂的，任何

权力都是有限的，任何领袖都是要死的。这样，国家的法律和行爲，才会有最起码的谦卑，在短暂之上，敬畏那更高的、永恒的统治；在有限之上，敬畏那完全和至高的、掌管一切灵魂的权柄；在必死的命运之上，敬畏和仰望那永远的、被救赎的生命。

教会在任何政权下，所传讲的福音，都应包括上帝的律法对该国政府及其一切权力的、充满怜悯的警告。教会必须对外宣讲，一切权力都属于上帝，也来自上帝，得到了上帝的许可，也接受上帝律法的限制。教会必须告诉在上的掌权者，废王、立王的权柄和时机，在于耶和華。教会尤其有责任，警告那些逼迫和限制上帝子民的信仰自由的政府，它们正在得罪一位至高而公义的上帝。它们的行为，正在为自己堆积地狱的烈火。教会必须有勇气向一个作恶的政府宣告，上帝已经按着祂的大怜悯，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预备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救赎之路。就是神为世人舍弃了祂的儿子，使教会的元首和君王耶稣，在人类史上最强盛的政权——罗马帝国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自己全然无辜的血，洗净了一切信祂之人的罪。

教会必须反复地、多次多方地告诉中国政府，福音的传讲和对耶稣的敬拜，是对一切政府权力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限制。政府有责任保证教会和基督徒，自由地、和平地宣讲这个福音，政府不能对此施加任何干预，而必须将信或不信的结果

留给每一个公民的良心。政府也有责任保证教会和基督徒的集体敬拜和其他宗教活动。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地上短暂政权的权力，不能干预、限制和取消这一永恒的自由。否则，整个政权及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恶人，都必将承受上帝真实而可怕的审判和诅咒。

教会和神的仆人，必须为着这样的传讲，反复地、多次多方地承受代价，甘愿接受政府的逼迫和武力的控制。教会说服任何一个政权敬畏上帝的方式，就是以顺服和受苦，来胜过刀剑和强迫的力量。直到刀剑与强迫，在基督徒的信仰和良心面前，一次次显出它的无能，一次次走向最终的败亡。

第二，对时局的具体意见

据此，我必须宣称，中国政府对待主基督的教会的态度，是邪恶、野蛮而粗暴的。并且，最近几年来，这一邪恶、野蛮而粗暴的态度，正在加剧和变得越发刚硬。这一态度，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和整个政权，陷入越来越大的危机之中。换言之，加紧对基督教会的逼迫、限制和打压，不但不能缓解政治的压力和危机，反而是诸多社会危机积重难返的根本的、和属灵的原因。

我必须指出，中国掌权者的下列举措，不但不可能得到一切向主忠心的教会和信徒的认同，并且无论一时之间如何

看似有益，若不悔改，停止，敬畏那位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们终将遭受到上帝对这个政权无情的和可怕的报复，上帝必按着教会所遭受的苦难、藐视和压力，加倍地击打在恶势力的身上，使这个时代的繁华和强盛，一夜之间如水冲去，化为烟云。

1、中国政府自从江泽民时代以来，不断强调和推行“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国策，强化意识形态上对基督教会的控制。这一做法的实质，是意图重新树立一种“国家宗教”，使整个政权处于与基督敌对的状态。作为基督教会的牧师，我必须指出，这代表着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会的宣战，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对教会的态度上，倒退到了接近于文革的时代。

2、中国政府近年来努力推行和扶持的“基督教中国化”政策，以及对“政主教从”的中国传统的强调，以及因此而来的拆毁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在教堂内外安装摄像头、“五进五化”等政策、以及对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和教会教育的打压等，都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不但全面违背了中国宪法、赤裸裸地取消和侵犯基督徒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是一系列直接向基督宣战的敌对行动。

3、中国政府近日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强化了上述两个层面上对教会的敌对态度。一是意图以打压教会来重树“国家宗教”，二是意图以国家强力来扭曲基督教信仰。这部恶法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失败。

因为国家全面改革的失败，必然首先呈现为政教关系的失败。而政教关系的恶化，将决定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因此，这部控制宗教的“自我宗教化”的恶法的出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这个政权若不悔改，改变它对待基督教会的态度，这个政权就已进入了或长或短的最后的历史阶段。

第三，对教会使命的具体意见。

在这样的时局下，教会的首要使命，是放胆无惧，无论得时不得时，积极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不是在这样的时局下后退，而是在这样的时局下向前。不是以前公开聚会的，现在转入秘密聚会。而是以前秘密聚会的，要赶紧转入公开聚会。公开聚会的，要加快建立新的教会，培训更多忠心的仆人。教会必须为逼迫和复兴的来到，预备承受代价，重新走上家庭教会的前辈们所走过的十字架道路。

其次，教会必须守住基督国度和大使的位分，以属灵的外交关系，来面对国家对教会的敌对态度。教会应明确拒绝接受《宗教事务条例》的管辖和权柄，勇敢宣称这是一部违反圣经和违反宪法的恶法。在这部恶法面前，如彼得和众使徒一样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 5:29）。

为此，我呼吁，一切以各种理由仍然留在三自系统中的神的仆人和上帝的百姓，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勇敢

地离开埃及法老的辖制，尽快地，迫切的，和坚决的离开三自系统吧。为此不惜付出舍弃教堂、舍弃工作的代价，因为这是主喜悦的，是好得无比的。我也必须向神在中国的百姓发出警告，当这个政权向着主的教会举起刀来的时候，以任何理由留在三自系统内、与这敌基督和出卖弟兄的罪有份的人，都难免上帝的遗弃和公义的审判。

最后，感谢主基督，因为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的人民和国家的惩罚。中国政府对上帝的无知和对教会的侵犯，并非单单出于政府工作人员本身的罪恶，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共同体的罪恶的必然反映。我们每一位中国的基督徒，也都在这一罪恶的结构和机体当中。因此，教会的使命，是为了这个国家公开而真诚的悔改，替我们的同胞和统治者向上帝祈求祂的怜悯，好叫祂的审判，因着祂的怜悯而被推迟，甚至因着中国的悔改和复兴，而后悔不降所宣告的灾祸，也未可知。

我更加赞美主，因祂将在基督里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赏赐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好叫教会有机会与全社会一起承受时代的危机和来自强权的压制，而使基督复活的生命，因着教会在死的形状与基督联合，而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动，以至于信靠耶稣的人，将因着今天一大批中国家庭教会甘心走上十字架道路，而多得数不过来。

愿荣耀归给三一上帝。愿神的恩典临到黑暗悖谬的中国社

会。

主后 2018 年 4 月 13 日

——摘自《基督是主——论政教关系》

关于成都 5.12 教案的声明

本文由王怡牧师起草，主后 2018 年 5 月 15 日发布

2018 年 5 月 12 日（礼拜六），是“四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成都市有关部门组织了数千警力和公务人员，针对本教会当天预备在会堂举行的晨祷会和特别聚会，对本教会预备前来参加聚会的数百基督徒，采取了大规模地侵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法行政行为，包括非法扣押、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闯入会堂、非法暂扣会堂及教会图书馆大量圣经及属灵书籍和印刷品、非法殴打被扣押信徒等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从头一天晚上开始，到当天晚上结束，本教会及其布道所，共有王怡牧师和李英强传道 2 人被传唤 24

小时，有不少于 228 位弟兄姊妹，其中包括孩童、婴儿和老人，在没有涉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被警察在教会楼下强行带走，非法扣留。另有 33 位弟兄姊妹被警方及社区、网格员等软禁在家，不能外出。另有来自其他教会的 19 位弟兄姊妹，也在现场被警方强行带走或被限制在家。当天被警察非法扣留及非法限制在家的基督徒（含少数教会慕道友）总数，不低于 262 人。

这大概是近年来，成都发生过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法扣押公民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性事件。

第一，这一大规模的非行政行为，乃是针对一间教会在自己会堂内举行的宗教聚会，并不涉及任何有可能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妨碍治安管理的行为。

第二，这一大规模的非法羁押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乃是发生在本教会的当天聚会尚未举行之前，所有被羁押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基督徒公民，都是在他们尚未进入会堂、聚会并未开始之前被非法扣押或限制的。

第三，整个针对教会信众的非法羁押行为，及针对教会会堂的非法检查行为，整个过程中，教会没有一位主要同工，收到过任何部门出具的任何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既没有来自民宗局的譬如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取缔非法宗教场所或非法宗教团体的行政决定，也没有来自警方或其他联合执法部门的任何

行政决定。

本教会认为，这是针对基督的教会和信教公民的一次公开和赤裸裸的迫害。名为“联合执法”，却无法可执。此次行动的决策者和直接负责人，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51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的自由，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此罪的，应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教会认为，成都 5.12 教案在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规模、手段和影响上，都十分恶劣、广泛和严重。并且在 5.12 教案中，还存在大量的程序违法和其他违法行为，少数信徒甚至受到执法人员极其严重的侮辱和殴打。

同时，在 5.12 之后，这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还在有恃无恐地继续。5.13 的主日崇拜，仍有 20 多位弟兄姊妹被政府人员软禁在家，或仅仅因为去教会聚会，而在路上被扣押至派出所。本周以来，也有超过 10 位在学校、公务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弟兄姊妹继续受到约谈，被单位和社区要求和威胁不准参加教会聚会，甚至被单位要求辞职等。

本教会决定，为着福音和良心的缘故，我们将针对 5.12 教案，采取一系列检举、举报、控告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和刑事

自诉等法律手段，也陆续发布相关法律行动的简讯。来向社会、政府和一切有着上帝形象和尊贵的人类，公开指出这迫害教会、侵犯和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罪恶，不但是违背法治的，更加是上帝所憎恶的。也藉此向涉案的成都市数千公务人员及全社会提出对这一邪恶罪行的、来自上帝和圣经的警告。因为经上宣告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诗 2:10）。悔改吧，因为人的灵魂如此宝贵，也因为上帝用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的宝血，为一切愿意向祂悔改的人，提供了白白赦免的恩典和永生的救赎。

教会的职责和使命，就是以一切和平的方式，向全社会传扬这恩惠的福音。这其中，包括了法律手段的使用。就如耶稣及保罗，都曾使用罗马的法律，在被迫害和被审判中提出抗辩。然而，我们并不怨恨任何执法人员，包括涉嫌犯罪的决策者和负责人。我们期待他们中间有人悔改信主，远胜过我们期待他们得到法律的制裁。在任何时候，教会都愿意就我们的信仰，而与政府部门有和平的对话。在任何时候，教会都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和和睦的可能，而放弃一切在法律上的合法诉求。然而，若我们因此而在将来可能遭受更大规模和程度的打压和迫害时，愿基督帮助我们，使我们靠着祂的十字架，在反教会的强权面前，能够绝不妥协我们的良心和信仰。

因为信仰是无罪的，而福音如此珍贵。让天使和世人都因我们而看见圣洁的救主和福音的荣耀，这是教会存在的唯一的

根基和理由，也是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最高目标。“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 11:36）。

成都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

主后 2018 年 5 月 15 日

牧者联署： 为基督信仰的声明

本文由王怡牧师起草，发表于主后 2018 年 8 月

我们是中国的一群基督徒，被至高的上帝拣选，成为祂卑微的仆人，并在各城各乡作基督教会的牧者。

我们相信并有责任教导世人，一位又真又活的三一上帝，是宇宙、世界和地上各族的创造主，人应该敬拜上帝，而不应敬拜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相信并有责任教导世人，上自国家领袖，下至乞丐囚徒，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公义的审判，若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救赎，人人都将永远沉沦；相信并有责任教导世人，那位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的耶稣，是全球教会的唯一元首，是全人类的唯一救主，也是

全宇宙永远的统治者和最高的审判者，一切信祂、向祂悔改的人，上帝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国度。

从 2017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来，到 2018 年 2 月该条例执行以后，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在公共敬拜和信仰实践上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程度不一的逼迫、藐视和误解，甚至包括各种企图改造和扭曲基督教信仰的行政措施。其中一些粗暴的举动，是文革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如拆毁教会建筑的十字架，粗暴干涉基督徒家庭悬挂、张贴的十字架和春联等信仰表达，强迫和威胁教会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强迫教会悬挂国旗或歌颂世俗国家、政党，禁止基督徒的未成年子女进入教会和接受信仰教育，剥夺和取缔教会和信徒的自由聚会等。

我们认为这些诉诸公权力的不义之举，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政教冲突。这些行为违背了人类的信仰和良心自由、也有悖于普遍的法治原则。我们有责任告诉掌权者和全社会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一切压制和对基督教会的一切迫害，都为上帝所憎恶，并必将受到上帝公义的责备和审判。

我们更有责任向掌权者和全社会传扬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人类的救主和君王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罪人而曾被杀，埋葬，并以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因着爱和怜悯，上帝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一切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预备了赦免和救恩。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

可以从任何罪恶中向主悔改，归向基督，敬畏上帝，使个人得着永远的生命，使家庭和国家蒙受上帝慷慨的祝福。

为信仰和良心的缘故，也为中国的掌权者和全社会的属灵益处，并最终为着上帝的荣耀、圣洁和公义，我们向中国政府及全社会作出如下声明：

1、在中国的基督教会，无条件地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和启示，是一切公义、伦理和救恩的来源和最高权威。任何政党的意志、政府的立法和人的命令，若直接违背《圣经》的教导，损害人的灵魂和反对教会所信仰的福音，我们有责任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也有责任如此教导教会的全体成员。

2、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始终仰慕和决心走基督的十字架道路，也乐意效法那些曾为信仰而受苦、殉道的中国教会的前辈圣徒，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情愿和有责任以和平、忍耐和怜悯之心，承受来自政府和社会一切可能的逼迫、误解和暴力。因为当教会拒绝服从恶法时，不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不是出于怨恨和对抗，乃是单单出于福音的要求，出于对中国社会的爱。

3、在中国的基督教会，愿意顺服上帝在中国设立的掌权者，尊重政府有管理社会和人的行为的权柄。我们相信并有责任教导教会的全体信徒，政府的权柄乃是出于神的，只要政府不越过《圣经》为世俗权力所设定的界限，即不干涉和侵犯一

切关乎信仰和灵魂之事，基督徒就有责任尊敬掌权者，并热心为他们的益处祷告，也切切为中国社会祷告。甚至甘愿为福音的缘故，忍受不公平的执法所带来的一切外在损失；出于对同胞的爱而情愿放弃一切原本属于我们肉身上的权利。

4、为此，我们相信并有责任教导信徒，凡在中国属于基督的真教会，必当持守政教分立的原则和基督是教会唯一元首的立场。我们声明，教会愿意在外在行为上，如其他社会团体一样，接受民政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依法管理；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带领教会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不带领教会在宗教管理部门登记，也不接受任何方式的挂靠。我们也不接受因信仰的缘故而对基督教会的“取缔”和“罚款”；并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预备承担一切损失乃至失去自由和生命的代价。

牧者联署（共 458 人） 第一批 29 人：

王 怡牧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

仰 华牧师（贵阳活石教会）

金明日牧师（北京锡安教会）

张晓峰牧师、孙毅长老、游冠辉长老（北京守望教会治委会）

黄小宁牧师（广州圣经归正教会）

窦绍文牧师（郑州磐石教会）

张春雷长老（贵阳仁爱归正教会）

温洪斌长老（成都溪水旁归正教会）

杨希伯传道（厦门巡司顶教会）
蒋建平传道（佛山橄榄树教会）
薛红根长老（成都郫都主恩归正教会）
查常平长老（成都生命之泉教会）
施尚标传道（漳州腓利之家教会）
李 涛牧师（昆明恩典教会）
申先锋牧师（武汉晨星堂）
唐伯虎长老（上海彩虹家归正教会）
崔 权牧师（上海万邦宣教教会）
苏耀荣牧师（台州天福归正教会）
王 腾传道（台州明道归正教会）
王昌以牧师（台州天台福音教会）
暨建羊长老（台州仙居蒙恩教会）
郭春雨牧师（长春临河之福归正教会）
李怜悯牧师（深圳沙井圣经归正教会）
庄志勇牧师（深圳华强北圣经归正教会）
陈景堂牧师（深圳桂芳园圣经归正教会）
黄 磊牧师（武汉下上堂教会）
张 勇牧师（长春阳光之家归正教会）

第二批（86人）：

高丽俊牧师（温州望坤教会）
蔡景良传道（佛山橄榄树教会）

徐建伟传道（河北唐山堂）
姜 添传道（成都福音堂）
安彦魁传道（太原郇城归正教会）
郝 鸣长老（德阳秋雨青草地教会）
李子虎传道（成都秋雨恩约堂）
程章纯传道（成都秋雨迦南堂）
曹庆恩传道（成都邻溪树归正教会）
王天民传道（厦门新造教会）
王兆荣长老、万长春传道（蚌埠活石归正教会）
李迦勒牧师（北京导航之家教会）
黄益梓牧师（温州平阳凤卧教会）
林雅各牧师（贵阳蒙恩教会）
吴轶奇牧师（长春福音之光归正教会）
顾洪飞传道（北京爱宣教会）
徐之兵牧师（江苏灌云县四队中心堂）
彭 强牧师（成都恩福归正福音教会）
郑照北长老、任利传道、界守团传道（成都溪水旁归正福音教会）
江国成长老、彭玉安长老（仁寿恩惠归正福音教会）
刘茂林长老（临沂恩约归正教会）
阎小新长老（日照恩照归正教会）
霍 伟长老（临沂恩泉归正教会）
陈 舜长老（临沂恩源归正布道所）
李荣泰长老（临沂恩临归正教会）

杨 斌传道（枣庄主恩堂教会）
刘红伟牧师（北京橄榄山教会）
林和生传道（成都芳邻教会）
刘志勇传道（西安祭台村磐石教会）
罗锐生传道（广州穗归正福音团契黄深江点）
叶新德传道（福建漳浦以琳之家归正教会）
孟永光传道（甘肃兰州晨星教会）
王梓晟传道（青岛积米崖教会）
黄文祐传道（香港中华基督教会）
陈惠珍传道（漳州龙海石码新城教会）
刘 洋牧师（西安信望爱教会）
孙 超传道（云南曲靖非拉铁非教会）
徐 梅牧师（西安恩泉教会）
董 志牧师（北京和睦佳教会）
巨大卫牧师（西安哈利路亚教会）
赵燕伟牧师（郑州钟爱教会）
任金彪牧师（河北泊头市宏恩堂）
黄 磊牧师（湖南岳阳市磐石圣经基督教会）
孙宏广牧师（吉林圣约真道教会）
朱乐海传道（张家界盼望基督教会）
张前进牧师（北京，宣教士）
高全福牧师（西安锡安之光教会）
郭 志牧师（东莞归正福音教会）

陈胜达传道（温州伯特利教会）
王兰青传道（山东临沂天城圣约教会）
郭易君牧师（北京恩道归正浸信会）
徐 峰传道（安徽阜阳男照兴起发光教会）
黄文广传道（深圳耶和華以勒教会）
李拣选传道（深圳感恩教会）
尹旭光传道（北京石景山曙光教会）
周云峰牧师（咸阳信望爱仰望教会）
杨赋立传道（石家庄弘道教会）
程超华教师（温州 神州布道团）
秦胜杰传道（河南八里庄教会）
王伟信教师（温州渔夫堂教会）
翁祥昆牧师（温州 神州布道团）
黄汉新牧师（温州 神州布道团）
王 泉传道（河南东郭村教会）
朱家好牧师（温州 神州布道团）
辛 义传道（大同利仁皂教会）
赵丽辉传道（大同利仁皂教会）
林金减牧师（温州 神州布道团）
严晓洁牧师（温州上江教会）
陈家福（陈大卫）传道（福州伯特利归正教会）
杜友长牧师（荆门橄榄山教会）
汪永诚牧师、冯光雄长老（温州神爱世人丰收教会）

阮大卫牧师（湛江更新教会）

管新元传道（江苏溧阳家庭教会）

赵若翰传道（河南喜获教会）

孙产力传道（湖北十堰荣光庇哩亚教会）

李友洪长老（成都生命之泉教会）

严熙夏长老、苏炳森长老、李英强长老、覃德富长老、张旭东
传道（成都秋雨圣约教会）

第三批（82 人）：

王春智长老、廖衍涛长老、兰军安传道（成都恩福归正长老教会）

覃 韬传道（佛山方舟教会）

梁咏恩传道（大连市恩真教会）

陈显飞传道（北安圣约永道教会）

游冠达传道（厦门殿前教会）

李远飞传道（重庆栽道归正福音教会）

花家泉传道、杨振江传道（宁波城市恩典教会）

谭松华牧师（武汉房角石教会）

王正荣牧师（天津圣光归正教会）

毛志斌牧师、申凌长老（深圳三一福音丰收教会）

张 森长老（阜阳麦种归正教会）

李乐清传道（上饶余干古阜约书亚教会）

王林牧师、龙降恩牧师、高颖佳牧师、尹会彬长老、李建军长
老、简兆鹏长老、王君长老、叶雄进长老、田杨博传道、袁国

深传道、王聪传道、郅佳富传道、陈勇传道、汪劲传道、张堃
传 道、陈如坦传道、刘桢彬传道、姜海林传道、杨俊传道、吴
镒传道、崔建国传道、金海兰传道、耿朋朋传道、吴鸿飞传道、
张永豪干事（北京锡安教会）

王德生牧师（北京安华教会）

宋洪涛传道（邯郸恩典教会）

汪守道牧师（山西省怀仁市圣爱教会）

梁君培牧师、张大卫牧师、毕国雄长老（香港基督路小教会）

任中志传道（美南浸信会耶路撒冷教会）

吕底亚传道（湖北硃都国度基督教会）

姚 昆传道（昆明田园里圣经教会）

李归圣传道（河南南阳家庭教会）

沈万众牧师（辽宁丹东耶中教会）

秦晨光传道（北京国门教会）

刘杨孙牧师（河南安阳教会）

郭利未传道（福建福清恩雨之家教会）

殷迎南牧师（上海中福基督教会）

王红忠牧师（长治牧宣教会）

黄 勇传道（成都恩福社区教会）

傅 军长老（成都生命之泉教会）

钟 正传道（新疆石河子基督教会）

杨建军长老（岳阳市磐石圣经基督教会）

胡会堂传道（东莞显明归正教会）

赵彰华传道（清远曙光福音堂教会）
覃祖正传道（南宁恩城教会）
赵 弼传道、许志强传道（郫县基督教会）
育培新传道（宣教士，四川宜宾）
胡摩西传道（浙江丽水新生命教会）
尹克山长老（临沂恩泉归正教会）
赵建新长老（临沂恩临归正教会）
李文卓传道（济南恩典之约归正教会）
范优才牧师（临沂三一圣约布道所）
安耀林传道、杨志刚传道（山西霍州教会）
李明华传道（山西太原青橄榄教会）
孙大文传道（天津锡安山教会）
桓满金牧师（淮南琴与炉教会）
安 溪牧师（北京福音第一长老教会）
王世强传道（玉溪沐恩教会）
潘永光牧师、游广波长老、谢建庆长老（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

第四批（81人）：

黄永辉牧师、郭有汉长老（唐河县复兴教会）
张孟侠传道（唐河县福乐教会）
史喜田传道、史书勤长老（唐河县恩崇教会）
崔丰三传道、徐兴义长老（唐河县永福教会）
刘宗勤传道（社旗县福音教会）

李勤乐牧师、曾宪瑞传道（唐河县恩福教会）
催保存传道、杨炳琴传道（唐河县信爱之家教会）
田玉娇传道（唐河县王岗教会）
李玉荣传道、祝小梅传道（唐河县恩惠教会）
陈朝见传道（唐河县施恩教会）
宗世昂牧师（唐河县宣道教会）
王祥海长老、刘道书传道（唐河县恩雨教会）
刘道彩长老（唐河县恩惠教会）
张永成长老、毕爱云传道（唐河县恩膏教会）
任文涛长老（唐河县荣恩教会）
黄福平长老（唐河县恩荣教会）
冯超长老（唐河县张店教会）
申庆克长老（唐河县申冲教会）
胡长林牧师（桐柏福源教会）
王明保牧师（桐柏同行教会）
姚明娟牧师（桐柏同心教会）
胡群星牧师（桐柏溢恩教会）
魏文国牧师（桐柏丰恩教会）
徐燕传道（桐柏太山教会）
李建坡传道（桐柏毛集教会）
廖西芝传道（桐柏新生教会）
胡长红传道（桐柏固县教会）
苗爱军长老（桐柏南岗教会）

于书华牧师（新野安舒教会）
冯学智牧师（信阳恩泉教会）
徐友兵牧师（信阳恩信教会）
舒文祥牧师（信阳恩雨教会）
郭春梅牧师（信阳宝石教会）
张 成传道、袁保罗传道（信阳仁爱教会）
李寿珍传道、刘 霞传道（信阳迦南教会）
周春艳传道、书 梅传道（信阳橄榄教会）
王锡平传道（信阳董家河教会）
鲁金旺传道（信阳双井教会）
王 艳传道（信阳佳恩教会）
胡世华传道（信阳沐恩教会）
余法荣传道（信阳甘霖教会）
杨玉霞传道（信阳武胜关教会）
曾 玉传道（信阳甘露教会）
魏金党牧师（郑州谷穗教会）
李自娟牧师（河南以琳教会）
姬后军牧师（郑州活泉教会）
岳群增牧师（郑州涌泉教会）
王军平牧师（郑州蒙恩教会）
马 腾牧师（郑州中兴教会）
陈乐嘉传道、颜祖源传道（宜宾市叙州区以马内利教会）
翁乐文传道（温州苍南县地方教会）

赵德伟等绝大数同工（北京宋庄艺术家团契）

李 洁传道（临汾圣约家园教会）

曾深元牧师（成都紫荆宣教教会）

王 玮传道（宁夏宣道教会）

陈启超牧师（北京大地颂歌教会）

陈德夫长老（临沂恩约归正教会）

孔凡永长老（临沂恩泉归正教会）

朱 宇长老（日照恩照归正教会）

阎圣临传道（日照恩照归正教会）

顾沛迎传道（临沂恩约归正教会）

杨玉明传道（临沂真爱教会）

经玉才牧师（江苏扬州播种教会）

陈 辉传道（成都恩福教会德阳布道所）

王永飞传道（深圳坂田福音归正教会）

李 哲牧师（北京青橄榄教会）

林志森传道、杨海山传道（辽源家庭教会）

丁 贺传道（天津爱之家教会）

第五批（26人）：

邓晖垣牧师、徐禹城传道、张静传道（陕西安康十架福音归正教会西北分堂）

卢要旺传道（郑州天路教会）

王兴本长老（武义恩民归正福音教会）

曹志超传道（广州羔羊归家教会）
宋晓贤长老、章晓冬长老（广州乐恩教会）
赵刚教师（华西圣约神学院）
霍磊传道（临沂恩泉归正教会）
战刚牧师（青岛胶州和散那教会）
冉子亦长老（利川市基督家教会）
颜安明传道（浙江丽水新生命教会）
王冠传道（山东潍坊市辛寨教会）
黄章武传道（温州市苍南县龙港天恩堂）
孙辉传道（恩福宜宾城区教会）
闫复兴牧师（吉林省四平双辽市中华爱生安提阿福音宣教教会）
潘钟传道（三明归正福音基督教会）
马器皿传道（河南省溪水旁教会）
邬小鹤牧师（香港基督教中福教会）
袁祖国牧师（昆明宣道教会）
吴显明牧师（云南昆明更新教会）
罗耀传道、王炳坤传道（台州明道归正教会）
张首成牧师（四川省绵阳纯福音教会）
吴斌传道（厦门海福教会）

第六批（39人）：

冯学忠传道、郭志强传道（长治改革宗浸信会恩约教会）
胡靖春传道（杭州文津布道所）

许秋诚传道（厦门巡司顶教会）
刘亚明牧师（郑州大里教会）
叶碎建传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香柏树教会）
陈 起牧师（漯河美盛堂）
郭新伟牧师（驻马店平舆堂）
王俊轻牧师（襄县阎寨堂）
李国伟牧师（洛阳教会）
雷 勇牧师（汝州教会）
李子娟牧师（驻马店教会）
文可远牧师（禹州方岗堂）
李军艳牧师（禹州华恩堂）
朱宗林牧师（开封和平教会）
师心平长老（河南宗店教会）
郭素英长老（河南了城教会）
孔凡海长老（河南大庄教会）
郝 夺长老（河南扶沟包屯教会）
刘成亮长老（河南位丘教会）
张成松牧师（三门峡门宣教会）
张汉东传道（河南邢口门宣教会）
梁中华传道（江苏宿迁福音中华网络教会）
罗铭生传道（广州宣教士）
邱烈勤传道（郑州加信家庭教会）
钱付起传道（台州明道归正教会新前布道所）

麦伟强传道（湖南岳阳盐光教会）

方纪栋传道（河南信阳市葡萄树教会）

郭志刚传道（临汾恩约教会）

刘铁根牧师、赵华锋传道（郑州牧宣教会）

方生雁牧师（浙江温州橄榄山归正教会）

李万华圣经教师（广东江门丰乐教会和鹤山蒙爱之家）

郑卫林传道（太原万柏林归正教会）

李大海传道（太原磐石之上圣经归正教会）

王勇祥牧师（昭通恩典教会）

孙超传道、季冬梅传道（吉林晨更教会）

尹雪梅牧师（兰州活水教会）

第七批（82人）：

陶崇壹教师（温州永强牧区五溪教会）

杨新华传道（厦门尚理教会）

蔡军牧师（淮安锡安教会）

于天祥传道（青岛锡安归正教会）

张刚华牧师（长沙火星教会）

王波传道（温州平阳凤卧教会）

高华兵传道（贵阳恩约小组）

黄新明传道（石首平安归正福音教会）

喻桑传道（厦门杏光教会）

易君牧师（北海晨星教会）

钟文军牧师（武汉街道口教会）
李泽新牧师（武汉丰翼教会）
刘四海牧师（北京新心教会）
杨宝英传道（燕郊丰盛教会）
张 玉传道（北京白石教会）
吕绍智传道（加利利得胜教会）
亓凤先传道（北京方舟教会）
许春秀传道（大兴磐石教会）
王景存牧师（北京圣恩教会）
纪程刚传道（北京恩泉教会）
岳功云传道，程新传道（应县明光教会）
刘俊杰传道（北京伯特利教会）
戴克义传道（丹东教会）
王迦勒传道（北京活水泉教会）
马洪波传道（大庆林甸教会）
王亚拿传道（北京伯特利教会）
张 恒牧师，田娜传道（北京载道教会）
吴鹏飞传道（石家庄教会）
姜 波传道（铁岭教会）
沈凤兰传道（北京宏恩教会）
姚超杰传道（新心教会）
史亚歌传道（北京水屯教会）
张兴海牧师（延边清晨教会）

石 洋牧师（北京佳音教会）
刘 华传道（北京救恩教会）
刘洁琼传道，魏和平传道（北京恩光教会）
邱 远传道（北京生命泉教会）
付群柱牧师（北京和一教会）
李春阳牧师（福州方舟教会）
李覃启传道（北京救恩教会）
李 锋传道（北京活水教会）
刘永朝传道（集宁新兴教会）
左龙飞传道（天津葡萄园教会）
沈智贤传道（北京玛哈念教会）
王 英传道（活石教会）
赵永团传道（大同青橄榄教会）
马景忠牧师（曲阜圣泉教会）
张春生传道（邢台新生教会）
王长青传道（长春佳音教会）
赵秀文牧师（辽宁调兵山教会）
姚书武牧师，李兰英传道，张进莲传道（八五二六分场教会）
顾洪飞传道（燕郊橄榄山教会磐石堂）
丁世杰传道（北京橄榄山教会棕树堂）
杜 斌牧师（锦州福音教会）
陈家友传道（黑龙江尖山教会）
刘同名传道（青县教会）

李长江牧师（新民市佳音教会）
垢恒祥传道（新民新福教会）
赵晓格传道（北京橄榄山教会右安门堂）
胡凤娇传道（新民活水泉教会）
李宝昌牧师（哈尔滨佳音教会）
尹书峰牧师（沈阳福音教会）
张成军牧师（安徽爱聚教会）
康承福传道（宝清福音教会）
王洪武牧师，徐海英传道，王淑艳传道（鸡西光明教会）
刘淑玲传道（黑龙江尖山教会）
钱程传道（葫芦岛馨香教会）
吕明玉传道（大庆市丰泽园教会）
垢福民传道（沈阳伊甸家园教会）
钱龙传道（沈阳恩雨教会）
白耘丰传道（沈阳野地百合教会）
黄丽荣长老，高文学传道（新民卢屯教会）
马蕊传道（新民新福教会）
夏明辉传道（加木斯双福教会）

第八批（14人）：

李约翰牧师（郑州家庭教会）
祝浩铭副牧师（广东广宁真道归正福音教会）
陈挺传道、宋细海传道（福州圣约教会）

吕金霞传道（武汉新生命教会）
张清平牧师（武汉荣美之家教会）
翁兴勉传道（甘肃天水甘霖教会）
唐仕平牧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
赵川鲁传道（山东临沂天城圣约归正教会）
方少平牧师（武汉百合花园教会）
王学明传道（潍坊橄榄园归正教会）
邓庆国传道（安徽阜阳归正福音团契）
王新华传道（济南，宣教士）
汤维莹牧师（瑞安市基督教会光明堂）

第九批（7人）：

林 杨传道（乐清城市盼望教会）
金 弦牧师（嘉善圣约教会）
黄开林牧师（云南昆明心合教会）
宋 超牧师（潍坊福音归正教会）
黄凤莲传道（潍坊昌邑归正教会）
程海蓉传道（重庆活水泉教会）
张建飞传道（广州国度复兴教会）

第十批（10人）：

刘 原牧师（北京枝子教会）

李约翰传道（泉州基督教会）

周春生传道、马益兰传道、马常昆传道（江西修水庙岭教会）

梁中安传道（江西修水溪口教会）

杨观新传道（江西修水走马教会）

梁振江传道（江西修水新湾教会）

吴赏赐传道、张建强传道（厦门活水泉福音教会）

第十一批（2人）

王红江传道（浙江新昌梅煮教会）

王 辉传道（山东省莘县东街教会）

中国教会的牧师、长老或传道联署，请附所在教会的简称，
致函 earlyraincovenantchurch@gmail.com

主后 2018 年 8 月 30 日第一版，9 月 1 日第二版，9 月 5 日第三版，9 月 6 日第四版，9 月 8 日第五版，9 月 15 日第六版，9 月 22 日第七版，10 月 6 日第八版，10 月 20 日第九版，11 月 3 日第十版，11 月 17 日第十一版共 458 位牧者。

最终版圣诞版原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布，因 12 月 9 日教会强制取缔，牧师、长老和主要同工被捕，圣诞版未能公布。

为中国作起哀歌

《以西结书》25-28 章读经灵修

人子啊，耶和华在圣经中，岂没有指着中国所说的话吗？
耶和华责备万国，刑罚万族的时候，岂没有中华各族在内吗？
耶和华指着推罗、西顿所说的，岂不也是指着神州所说的吗？
耶和华向以东人和摩押人所发的预言，岂不也向着汉人所发吗？

人子啊，你要向那厉害的国说出我的预言，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因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殿在你那里被亵渎，我的教会在你们中间被掳掠。因你们男女老少都说，啊哈，啊哈。所以，我要把你们交给西方人，又把你们交给东方人。把你们交给匈奴，又把你们交给海盗。看哪，拿弯刀的要从北方来，拿短剑的要从海上来。因为你拍手，

顿足，焚烧我的十字架在屋顶，又把歌颂我的书卷投入烈火。我也要这样将你投入火中，使你在万国中忽然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是知道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人子啊，我的箭已在弦上，却忍住不发。我的使者已在路上，不至于徒然返还。你要向中国发预言，使老年人和少年人都听见。说：“主耶和華如此说，看哪，中国与我所灭的列国无异。中国的王，与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王也无异。那藐视我的在哪里呢，那在我的圣城聚集，攻打神的儿子，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凯撒在哪里呢。中国的王啊，你若下到阴间，有推罗的王和西顿的王迎接你。那些被我所灭的王都要起身，他们要鼓掌，说，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我们还等着你崛起，为我们伸这沉沦的冤呢”。

人子啊，为你的国哭泣吧。因上帝的儿子也曾在客西马尼园哭泣。若他的苦杯被神挪去，你们今日岂不成了荒场吗？你们中间怎能有一人存活，不至灭绝呢？你们中间岂能有一间房屋被立起来，岂能有一颗粮食在地上找到呢？因耶和華如此说，“我的怒气，要向那不承认我儿子之名的国发作，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華。看哪，从北京到广州，从山东到新疆，人必倒在刀下，大地必跳跃如牛犊。你尽管说自己地大物博吧，我却要使海浪涌上来，吞没你的三分之一。你尽管称自己历史悠久吧，我却要让父亲不认识儿子，女儿大了也不知道她祖母的名字。因为你在我的教会、就是我的儿子遭殃的时候，

说啊哈，啊哈，教会已变成废墟，我好开发新的楼盘。为这个缘故，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起来喧嚷，又叫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散尽你的家业，又同娼妓一起逃到地极。然而，这还不能止住我的怒气，我又要使外邦的人涌进来，用船坚炮利，打破你古老的门户”。

人子啊，你要为中国作起一首哀歌，因为现在仍是拯救的时候，恩典的大门何时关上你知道吗？殉道者的数目何时填满你知道吗？千万天使何时随着曾被杀的羔羊降临你知道吗？人子啊，你要昼夜不断的说，也要穿州过府，让你的同胞都听见这可怕的噩耗。或者他们中间有数不过来的人，愿意披麻蒙灰，向主悔改，我就后悔不降我所说的灾，也未可知。所以你要向中国说，“看哪，你的城门要被攻破，你的王子要遮住他的脸，像妇女一样逃亡。你的大厦将倾，像从未有人住过的房子一样。你一时之间聚集起来的财富啊，就是你与万国交易所得来的，就像烟火在空中，不过一霎那就消失了。我也要使你们中间的好声音止息，就是一切歌颂的声音，使你们的耳朵成为摆设，又使你们的眼睛没有什么可看的。那广大的平原啊，那茂盛的高山，我必使他们成为净光的磐石，就是老鼠也不能在上面行走。中国啊，你不再被建立，不再被忍受，因为这是主耶和華说的”。

人子啊，你尽管来和我辩论吧。我岂没有为中国开一条出路呢，我岂没有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行呢。只是我的先知被你们杀害，我的使徒被你们驱逐。有的死在狱中，有的被用手

枪抵住后腰，有的被污名所伤，有的被谎言所杀。我的殿在中国被拆毁，我的仆人在中国被捆绑，我的话语在中国被审查。这一切岂没有报应吗？耶和华难道是不公义的吗？

人子啊，你尽管大哭一场吧。难道为中国人而死的不是我吗，难道如母鸡孵出小鸡、使亿兆黎民得以幸存的不是我吗？是谁在甘肃降雨，又是谁使日头照在桑干河上？是谁解决了温饱问题，是谁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难道不是我耶和华吗？不是因我的怜悯，才使一个邪恶的民族成为我的鞭子，又使一个黑暗的国家成为我的器皿吗？这一切你们谁作过我的谋士，我又和你们谁商议过呢？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岂不是出于我耶和华吗？救恩难道是从你们而出吗？是从孔子和毛泽东而出吗？人子啊，你尽管去告诉中国，救恩只从各各他而出，就是从被你们拆毁的十字架而来。

人子啊，你要为中国作起哀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自古以来有名的城邑，东方最坚固的城墙，现在何竟毁灭了？你数不过来的子民，一切住在那折叠之城的人，为什么如此惊恐？连你周围的群岛，你一切用钱结交的弟兄，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你的悠久名声，为何不再存留于世？你的历代典籍，为何找不到一个诵读者？那一切贪图你的钱财、前来与你交易的人在哪里呢？那接连成帮、为你运货的码头在哪里呢？你不是曾说，你全然美丽，光荣正确吗？你不是曾说，你凡事富足、极其荣华吗？你的资财、物件和储蓄，在你破落的日子，都要沉在海

里。因为有我大力的使者，要举起你来，如举起一块巨石，扔在海里。世上的民都要哀号，说，有何国如中国，有何城如京城，在海中竟成为寂寞的呢？这还不止，因你的人民也要一起沉下去了，就是一起说啊哈、啊哈的人民。因为这一国，要成为万国的惊恐。世上的君王想起它的时候，都要面带愁容，甚是恐慌”。

人子啊，你要告诉中国的王，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是天子。然而你虽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我要用虫杀死你。在那杀死你的虫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你必死在外族人手里，或是死在你的仆人手上。你要选哪一样呢？在那杀死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伟大、光荣和正确吗？你是去见马克思，还是去见秦始皇呢？在那烧着硫磺的地狱，你总能如愿以偿，因为一切不认识我的王，都在同一个地方。然而在伊甸，你也曾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有哪样聪明我不曾给与你呢，有哪样宝石你不曾佩戴在身上？受造物所能拥有的一切，都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了。那时你岂不在发光的宝石中间来往，在万物的仰慕和顺服中，得享你当有的一切荣耀吗？你却试图登上神的宝座，与至高者抢夺，可惜你的高傲败坏了你的智慧，你的悠久不再是你的荣耀，反成了你的罪证。千百年来，你亵渎我的圣所，坐在我百姓的宝座上，要到几时呢？中国的王啊，我要与你为敌，要使瘟疫进入你的左边，又使血流在你的右边。我要追讨你一切流人血的罪，也要你吐出一切的死人来。当你在万族中仆倒，在列王中败亡，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人子啊，主基督在他的大使命中，岂没有指着中国所说的话吗？主基督吩咐万国都要悔改，岂没有包括中华各族在内吗？主指着自已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来归他，岂不也指着华夏说的吗？人子啊，主耶和華如此说，“我的箭已在弦上，却忍住不发。岂不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吗？你要专心为中国作起哀歌，因你的哀歌不够哀，我的福音就在中国被轻看了。然而主的血岂是白流的呢，主的话语也必不落空。看哪，在九州，只有哀恸的人有福了。在诸夏，主的福音，也只给那些灵里贫穷的人。看哪，唯有他们要承受地土，唯有他们将称为神州之子。当我向他们的王实行审判后，他们要盖造房屋，坐在葡萄树下，喝自己酿的酒。当他们在此安然居住，永不移民的时候，天上地下凡有血气的，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们的神”。

2018年9月11日

2018 年——宗教战争沉思录

此文发表于主后 2018 年 12 月 8 日，第二天 12.9 教案发生，王怡牧师、蒋蓉师母、覃德富长老、苏炳森长老、葛迎锋执事被抓捕。严熙夏长老、冉云飞夫妇、宋恩光弟兄、张国庆副执事、朱红弟兄被带走失联，神学院和人文学院的学生宿舍有两个被冲击，其中学生全部被带走。

过去十年的家庭教会，经历了两件事，一是个人性的角色觉醒，就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的再发现。二是群体性的角色觉醒，就是对一个作为上帝心意之中心的教会论的认识。城市教会的兴起和堂会转型，是被福音所塑造的教会论的兴起。一批公开化的城市教会的成形，是被福音所更新的教会论的成长。

2018 年，凯撒的目标是打击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二次角色觉醒，就是教会论的觉醒。“信的人都在一处”，是五旬节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如使徒行传第 2 章所记载的，当这一结果首次

在耶路撒冷出现后，所引发的两个结果是，“得众民的喜爱”和“全城的人都惧怕”。

主后第一世纪，是基督崇拜与凯撒崇拜在帝国境内同步增长的世纪。“惧怕”超过“喜爱”是属灵争战的必然趋势。因为福音产生一个心灵的新秩序和新社群，与世界的有形的旧秩序与旧社群，构成一个漫长的双城记。

过去的一个世纪，也是基督崇拜与凯撒崇拜在中国同步增长的世纪。2018年，是这一略见雏形的双城记在中国的一个显现。基督崇拜与凯撒崇拜，终将此消彼长，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教会的责任是身在其中，以荣耀的盼望背负主的十字架。

事实上，宗教条例试图去处理一个危机。但这个危机不是教会的，而是政权的。因为宗教局作为革命体制的遗迹和“战斗的无神论”的器皿，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新条例的主要诉求，是通过重建对基督教的全面控制，来向凯撒证明，它的存在是凯撒崇拜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统战部负责镇压基督崇拜，宣传部负责树立凯撒崇拜。二者共同构成了朝廷的“礼部”。因此，新条例的实质是在凯撒崇拜的背景下，宗教局前所未有地上升为“礼部”。

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局的部门利益绑架了整个政权。新条例表明，一些利欲熏心的政客，正借助“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正确，试图发起一场国内的“宗教战争”。它们以谎言来说服党内保守派，将数千万不受政府控制的教会描绘为政权

的敌人，重新将人的灵魂树立为这个政权的仇敌。

真正的悬念，不是教会将遭遇怎样的打击？教会必将一直增长，复兴，一面被主拆毁，一面被主建造，直到充满每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法老无法阻挡的，凯撒也无法阻挡。真正的悬念是，宗教局作为礼部这一沉渣泛起的激进主义实验，到底能存活几年？在凯撒病重之后，下决心割掉这个阑尾之前。

正如 2018 年，储百亮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所说的，“在中国的问题清单中，政权对灵魂发起的战争，虽然不处在很优先的位置。但它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这个政权已经树立了一个无法被杀死、捕获、根除或治愈的敌人”。

这场关于灵魂的战争，具体目标是毁坏基督教在中国的公共崇拜和公共认信。很多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将陷入一种艰难，就是他们藉以保护自己的社会身份，面临被剥去外衣的威胁。尤其是那些在凯撒体系中谋生的基督徒。古代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奴隶是最低的身份。因此，剥去外衣几乎不构成对信徒的威胁。威胁一旦来临，就是直接剥去里衣。但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人们看重身份的竞争和流动。这种对世界的贪爱，构成了 2018 年凯撒对教会和基督徒的主要威胁方式。

换言之，和几十年前相比，这是一场过于温和的宗教迫害。几十年前，人们没有外衣，人人都只有一件里衣。逼迫的方式是剥去里衣，刀剑的权柄直接针对人身，逼迫意味着性命之忧。2018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人都穿上了外衣。基督徒和教会也不例外。逼迫的主要方式，是威胁基督徒群体的文化身份，

将他们赶出四十年社会进步的朋友圈。教会并无性命之忧，却在这一威胁面前大惊失色，反映出教会已经爱上了自己的外衣，舍不得再换上囚服。

但这并不是党在清党，而是主在清教。这场属灵的战斗，既是魔鬼操纵的邪恶行动，更是上帝安排的伟大的信仰试验。将那些向凯撒跪拜的山羊区别开来，将那些不爱主的可诅可咒之人赶出教会，将那些不能立在磐石之上的宗教俱乐部无情拆毁；并将十字架的印记和荣耀的囚服，神圣而庄严地披在那些忠心的教会身上。这是凯撒情不自禁地、去配合上帝达成的目的。

世上最邪恶之事，就是对邪恶之事无感。极权，谎言，奴役，自欺，虚空，尊严的丧尽，对灵魂的迫害，爱的无能，这一切都是凯撒崇拜的标配。或者反过来，如加尔文所说，邪恶的统治者，是邪恶的人民的标配。活在这一切之中，却不绝望、不吁求之人，是最平庸的邪恶之人，或最邪恶的平庸之人。教会必须在场，承认自己是这样的社会与文化的一员。而甘愿背负十字架，为邻舍受苦，这是教会脱颖而出、见证自己属天身份的唯一方式。

因为这世代最可怜的光景，是基督徒分不清真教会和假教会，就如小红帽分不清真外婆和假外婆。正如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逼迫也是上帝的手术刀。

世界有三类统治。第一类是世界的王和世上的国度的传统

统治。这个国度不要求，也无法要求他们的子民爱他们。他们只一味要求外在的效忠和行动的服从。

第二类是弥赛亚和神的国度的统治。这个国度要求发自内心的相信、忠诚和爱，因为基督藉着创造以及祂替罪人承受苦难、死亡、复活而成为这个国度的王。

而第三种统治，是世界的王的一种现代变形，他们要求对灵魂的统治，并要求他们的子民假装自己发自内心的相信和爱他们。这是阿伦特称之为的现代极权主义。这不是一种自古就有的统治形式，而是前两个国度在教会时代长期混合的一种结果。

换言之，弥赛亚的国度对世界长达两千年的文化影响，并未使这世界的统治在道德上更接近教会，而是使这世界的统治在形式上更接近教会了。就人类的统治形式而言，最近五百年的主要变化，并不是世界的祛魅，而是教会的祛魅。教会的祛魅导致了“世界的神化”，即霍布斯所说的“国家成为会朽的上帝”，或沃格林所说的“人的显灵”。

尽管在本质上，宇宙只有一个国度，即上帝藉着弥赛亚掌权的国度。但在历史的形式上，有两个国度，一个被容许的世界的国度（小要理称为撒旦的国度）和一个以基督为中保的国度（小要理称为恩典的国度）的此消彼长，这一双城记的目的和结局，则是上帝在全宇宙恢复一种受造物甘心乐意的道德统

治（小要理称为荣耀的国度）。

但在文化上，我们必须理解上述三种统治形式，尤其是第三种统治形式。福音必须向活在第三种统治下的后现代社会传讲基督的主权恩典，并向第三种统治形式下的王宣讲上帝的咒诅和祝福。

古代中国的皇权传统及当代中国的凯撒崇拜，是第三种统治形式的全球典范之一。就圣经的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埃及、巴比伦和波斯这一东方序列的当代继承人。而中美的贸易战，不过是古老的希波战争（东西方种子选手的千年角逐）的当代回响。同时，随着一百年多年来的西化，魔鬼在中国组建了法老与凯撒的二位一体。这正是基督教在中国长达 1400 年的漫长宣教、及超过 200 年的殉道之路仍收效甚微、甚至尚未取得世俗合法地位的主要原因。

2018 年是教会更深认识自己在中国的福音使命的机会。这一福音使命将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文化（广义的，包括对法老秩序和凯撒崇拜的认识）的敏感和适切性。

凯撒崇拜的实质，是一种“非世俗化的神权政治”。凯撒崇拜意味着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神权政治，在道德上必然与基督信仰，也与一切坚持心灵和思想自由的人为敌。尽管这种敌对，不一定会演变为政治和社会中的敌对。而根据基督的教导，教会身临其境，一方面应以极大的忍耐和

爱，避免在身体上的对抗。另一方面应以极大的信心与勇气，坚持这种道德上的对峙是正义的和不可避免的。

而中国文化的绝症，就是政治的宗教化。掌管权力的人想掌管灵魂，是这一绝症下的千古毒瘤。这是为什么，这一法老秩序与凯撒崇拜的二位一体出现于当代中国的原因。

在凯撒崇拜的底下，二千年来的个人主义散沙，一百年来的集体主义幻想，和四十年来的自由主义启蒙，是教会作为一个在福音里的属灵城邦，所面临的三个文化上的对手。不认识这三个约伯的朋友，就难以在宗教战争的新常态下，竭力向中国社会传讲“未识之神”的福音。

而国家主义的逼迫，启蒙运动的逼迫，和民间宗教的冲突，则构成了新教入华以来，宗教战争在中国的三大战役。上头是慈禧，下面是义和团，中间是曾国藩。教会需要认识到，这个格局一百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在祂的主权恩典之下，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

正如托马斯·史密斯牧师（1808-1873），在《教会治理问答》中所说，“教会的这种独立的、属灵的权柄是不可放弃的。若因屈从国家权力，而使属灵权柄被僭越或者贬低，我们就当予以抵制，甚至不惜流血殉道”。

非暴力的不服从，或称和平的抗命。是基督掌权的见证和结果。没有死而复活的恩典掌权，和平的不服从是不成立的。旧约时代，耶和華总是以武力干预，来为弱小的以色列护航。然而到了新约时代，基督复活的能力，藉着十字架掌权，成为了教会走十字架道路的保障。“爱比恨更有力量”的唯一原因，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

因此，福音是“和平抗命”能够成立的唯一原因。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说“非暴力的不服从”是一种无能的能力，是荒唐的。任何文化和宗教中都不可能产生出这种观念和实践。在亚当堕落之后，和基督降世之前，旧世界没有与刀剑匹敌的非刀剑的力量。

而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不相信福音而主张“非暴力的不服从”也是荒唐的。因为不服从者所使用的武器，仍然与凯撒的武器相似，就是对人的自义。因此，在福音之外，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意义上的、任何方式的反抗，都构成了这世界的统治方式的一部分，都是“人的显圣”的结果。

这是教会在关乎信仰的神圣之物上，基于良心的不服从，与任何意义上的“民权运动”或“维权话语”的迥然不同之处。教会的动机和教会的目的，出于福音，也为着福音。教会的良心不服从，所期待的全部结果，就是为一个属灵的国度和一种属灵的权柄作见证。

正如马太亨利所说,“你们受到公开的逼迫,将会使人们更加注意你们,探究你们的教义和所发生的神迹。你们被带到君王和诸侯面前,使你们有机会向他们宣讲福音,否则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你们忍受这些沉重的苦难,被最邪恶的人憎恨,证明你们是敬虔的人,否则这些恶人不会与你们为敌。你们在苦难之下的勇气、喜乐和恒久忍耐、将会见证你们相信自己所传讲的,见证你们有上帝大能的支持,见证上帝的圣灵和荣耀在你们身上”。

在这荣耀的使命之下,教会对任何社会制度层面的改良,都不感兴趣。甚至对宗教条例何时被修改或废除也并不感兴趣(这不排除或反对投身公共领域的基督徒将之作为公共努力的目标),因为那不过是恩典的国度和统治被彰显和复兴的一个可能的历史结果。

一方面,任何彰显公义、秩序和慈爱的历史结果,都符合教会的信仰。譬如废除堕胎或反对废除死刑,结束宗教迫害或结束极权主义,追究贪官和屠杀者的法律责任,这些都不可能不是福音所赞同的。但另一方面,这些都不是福音所要求的。因为基督的国度在末世中是中保性的,这意味着教会必须忍耐世界,世界也必须忍耐教会。教会对社会制度和历史过程的任何影响,都必须经过十字架,经过灵魂的重生和悔改。因此,教会对一个不信的社会无欲求而有影响。高举“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教会,必然产生文化副产品,但这些副产品只能

是间接的和短暂的。完全有可能，文化在某个历史时期极大地受到福音的塑造，但又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几乎跌回邪恶的原点。根据启示录的脉络，这一过程将反复不已，直到基督再来。

2018 年的中国，教会和社会都得到一个机会，来学习和区分这两者的不同。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基于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论的觉醒，2018 年是一个教会不服从的元年，是基督崇拜与凯撒崇拜这一普世的宗教战争、在中国的一个新回合。

基督徒必须站着被政府统治，无论是多么邪恶的政府。但基督徒绝不能跪着被政府统治，无论是多么美善的政府。

福音要求我们忍耐，也赐给我们忍耐的能力、盼望和安慰。福音也要求我们反对，并赐给我们反对的勇气、盼望和安慰。

在逼迫面前，最害怕的是传道人，最危险的也是传道人。传道人因信而站立，教会就要复兴。传道人为利而退后，会众就要溃败。求主为教会兴起一批忠勇的精兵，在这场属灵的战役中，情愿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软弱时怜悯他们，勇敢时支持他们。

三自是庙会，而不是教会。因为三自运动的实质，是政府将教会改造为法老秩序的一部分。而三自运动的成功，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事实上，许多不在三自中的家庭教会，同样在相当程度上被三自化了。也就是说，很多家庭教会同样是凯撒体制的一部分。与中国社会一样，在精神和良心上都被规训和意识形态化了。这就是许多家庭教会，在 2018 年这一场剥夺外

衣的宗教战争中，急忙卖主投诚、加入三自或解散聚会的原因。

2018 年是对中产阶级的一个威胁，也是递给中产阶级的一碗红豆汤。这样一个测试，让很多传道人和教会清楚自己是谁，或清楚自己不是谁。

在这一年，正如张培鸿所说，教会灵巧如蛇已经几十年了，再灵巧下去就真的变成蛇了。灵巧如蛇，是那些蒙主差遣，如羊进入狼群的基督徒的“艺高人胆大”。而在我们中间，却被扭曲成为在毫无性命之忧时对剥去外衣的不舍、躲避和反对。教会的可悲，是习惯了把牺牲当作不必要的，而把安全当作必须的。习惯了把勇毅当作不必要的，而把妥协当作必须的。

2018 年显出一件可悲的事，就是家庭教会四十年的复兴运动已跌落低谷，基督徒的人数已达到属灵遗产的天花板。不是因为凯撒的逼迫如此之强，是因为从未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和基督徒对于“为主受苦”这巨大的荣耀的评价，竟如此之低。“生病小培灵，坐牢大培灵”的十字架传统，已花果飘零。

2018 年的宗教战争，爆发于凯撒崇拜的高涨之际，也爆发于家庭教会青黄不接之节。坐过牢的前辈，雄心已老，大多不愿再坐牢。因为当年坐牢时，他们连一件外衣都没有。没有坐过牢的晚辈，未经火炼，大多也不敢坐牢。因为他们的外衣与这个时代过于相似。

这一年，当掌权者指着鹿说，这是一匹马。又指着人的灵

魂说，这是属于我的。教会就不断退后，不断闭嘴，为了与世界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留在会堂的杂物柜和封条背后。主啊，求你使我们舍弃那不必要的安全，而渴慕在你里面必须的牺牲。求你使我们热切地传福音吧，热切地祷告吧，就像我们根本不会活到下个主日一样。

当凯撒对我们说，“不在宗教局登记的聚会是非法的”、“不得在登记的宗教场所以外传福音”、“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参加教会”云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基督徒的良知和勇气，以更积极的福音行动，和更高声的赞美，去反抗这些“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吧。因为对世界最好的抵抗是传扬福音。没有奋兴，就没有抵抗。没有悔改，就没有和平。没有爱，就没有勇敢。

十字架是神与人决裂的最高峰，也是教会与世界决裂之处。

一方面，十字架表明称义不是我们做成的，是唯独上帝做成的。称义就是与自己、与世界割袍断义，而以基督的义为义。十字架首先关乎称义，即一个人在什么意义上，或可以凭借什么去肯定自己，又获得他人的肯定？并且最终可以获得上帝的肯定？十字架不断地诉说，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血。

在另一方面，十字架表明教会与世界的割袍断义。十字架意味着教会与撒但的国度“不共戴天”。十字架是教会与世界的停火线，也是世界的历史与天国的历史的重叠之处。这是十字架的荣耀，也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福音意味着政治权势是有边界的，福音意味着凯撒不能越过一条神圣的红线。在 2018 年，有人说，教会千万不能和政府对着干啊。但在 2018 年，教会需要发出对凯撒的警告，就是政府千万不能和上帝对着干啊。基督被杀，教会也要被杀。基督复活，教会也要复活。但若一个政权覆灭了，就将是永远的覆灭。十字架意味着，除非凯撒先杀了我，否则他不能往灵魂的疆域再走一步。在这个意义上，福音意味着良心的反抗。在属于灵魂和信仰的事务上，教会必须不服从，直到凯撒回到上帝为他设定的界限以内。

在中国，教会从来不搞政治，但政治从来都在搞教会。教会不屑于搞政治，但教会也不怕被政治搞。福音意味着，党可以领导一切，但不能领导教会。党可以杀我身体，但不能杀我灵魂。党可以昌盛一时，但不能存到永远。

为此，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在 2018 年，求你使教会与世界割袍断义，使教会在属灵的身份上与凯撒彻底决裂，舍堂成圣，舍钱成圣，舍工作成圣，舍学历成圣，为福音的缘故，不惜失去藏身在社会中的最后一件外衣。

2018 年，我们不是过于火热，而是过于麻木和安逸。不是过于危险，而是过于怯懦和安全。求主激动更多弟兄姊妹为主火热、为主癫狂的爱和行动。神必与这样的人同在！因为这世上虽有苦难，但我们的主已经胜了这苦难。

2018 年，中国在“全球作基督徒最危险的 50 个国家”中，只不过排在 43 位。教会无人殉道，牧师无人坐监，信徒无人被残害。

许多教会尚未走向各各地，目睹基督死于十字架；甚至尚未走进客西马尼园，目击犹大之吻和基督被捕，就已开始四散。

2018 年，许多忠勇的教会与乐意悔改的基督徒，仍在中国四处被主坚固。燃烧的十字架，和凯撒的封条，仍然吸引了许多对自己和对中国社会都绝望的人，被主耶稣潮水般地带去教会。从这一年开始，为着一场未来的福音运动，主耶稣亲自为教会洗牌，亲自洁净圣殿，赶走他不认识的人；也亲自邀请街上瘸腿的、乞讨的和瞎眼的来。

求主赐我们属灵的敏锐和谦卑，看见属灵的争战。不要用肉眼的常识去判断属灵的事。求主使弟兄姊妹们知道，针对教会的这场属灵战争，仍在慢慢升级并成为新的常态。这是一场凯撒藉着宗教条例向教会的宣战，也是向基督发出的一份战书。空中有看不见的沙场，而曾被杀的羔羊，既已受死，就不会再死。既已复活，升到天上，就无人能对抗那位天上的主。这场属灵的争战，关乎福音和上帝的国度在中国的扩展。没有侥幸，不可避免，也无人能免。

这是属灵的大战役，我们有幸在场，而主权牢牢握在基督手中。为新年的来临，为新的冲突与复兴，为凯撒正慢慢收拢

的更多行动和策划，为主基督莫测的美善旨意，求主赐教会信心、恩典，成为勇敢的和平之子。求主藉着逼迫和逼迫的风声，藉着凯撒的臣宰的每一次粗暴执法，让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基督徒都诚实地问：主啊，我预备好了吗？主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软肋、我的偶像，我还没有被宝血遮盖的罪在哪里。主啊，你都知道，所以不要不帮助我，求你赶在地上的掌权者之前，在我从今日直到永远的生命中掌权吧！

为此，主基督啊，无论你何时降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遇见我，愿我当时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2018 年 12 月 8 日

作一个职场圣徒

“属天的教会”以弗所书证道系列之二十八

引言、福音与身份

感谢主，恩约堂建堂已经一年了，看到你们的成长，特别的感恩。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保罗把在福音当中的新生命，包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的“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新生命，要应用在职场上面。在当时的以弗所，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因为那是一个奴隶社会。在过去的古希腊雅典和罗马的城市里面，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可能是公民，就是有公民权。剩下的人里面，大概一半的人是自由民，不是人的奴隶，但也不是公民；另外一半的人，差不多是奴隶。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如何把基督徒的新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中应用出来。

一个奴隶信了耶稣，一个主人也信了耶稣，一个贵族也信了耶稣，一个街上的乞丐也信了耶稣，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信了耶稣，就算是同一件事情——信的是同一位主，他们的生命就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另一个方面，他们有相当大的社会阶级和身份的差异。那么，信了耶稣，是要怎样去改变这些差异呢？信了耶稣了，是要改变、推翻和革命这个奴隶制度吗？信了耶稣了，奴隶还是奴隶，主人还是主人吗？信了耶稣了，福音怎么来对应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身份差异呢？

在保罗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差异是奴隶和自由民，是奴隶制度下奴隶和主人的差异。各位，我想请问，在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的差异是什么呢？是老板和打工的。我们在这一百多年里面，其实是经历了蛮多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共产党的革命中，最重要的差别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面，是官和民，那么，在一个商业化的市场体制里面，是老板和雇员。那你觉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哪一个是最根本的社会身份的差异？或者金钱的雇佣关系是第一位的，或者政治权力带来的官与民是第一位的，或者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这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划分，或者是城市的居民与农村的居民区别？其实，这些都是中国社会蛮复杂、多元的差异。

今天，我们要来面对这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都信了耶稣，知道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么，弟兄姐妹的生

命关系，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社会差异吗？在福音当中的新生命，会指导我们怎样来面对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金钱还是很重要的，你知道这个世界权力还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经济的权势和政治的权势，仍然是把人划分开来的。我们的信仰能够胜过这一切吗？我们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怎样胜过这一切呢？这就是保罗要在这段经文处理的问题。

一、旧生命和新生命之间的张力

所以，保罗带领我们从福音来进入更新婚姻和家庭的个人生活场景。今天的经文要带我们进入到社会、文化或者我们说的职场范畴。回到这一段经文来看，我们需要一个跨越——保罗这一段讲的是奴隶在奴隶社会下，他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我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有些基督徒对我说，千万不要跟基督徒做生意；有些基督徒的老板对我说，千万不要请基督徒在自己的公司里打工。请外邦人，比较简单，干不好就走人。我们的关系，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老我”和“老我”的关系。最好也不要给他传福音，因为他信主了，星期天就不加班了。所以，我们还在那一个旧的社会、旧的生命、旧的关系里面。虽然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比较简单。甚至我也听到一些基督徒说，不要到基督徒家里去工作。有一个基督徒，如果她是做钟点工的，如果她是做保姆的，如果她是做医护工作的，她去了另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家里工作，有的时候就有点尴尬。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更美好的情况，但是，我到底看她

是姐妹，还是老板呢？我看他是肉身的主人，还是邻里的弟兄呢？是应该更加尊敬他，还是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呢？是应该可以要求他呢，还是觉得都是教会的弟兄，就有点不好要求他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太知道该怎么处这个关系，因为“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混在一起了，“恩典的原则”和“律法的原则”也混在一起了。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奴隶信了耶稣，他的主人也信了耶稣，这事怎么弄呢？主人要洗脚，说：你去打水来。奴隶却想：我是你弟兄，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都是耶稣宝血所洁净的。那么，主人要不要把奴隶释放了呢？如果奴隶和主人都信了耶稣，是否会立刻发生一场废除奴隶制度的社会革命呢？如果不会的话，他们又怎么在那个社会当中来建立关系呢？

我曾经听过两个很美好的见证。有一个菲佣，她在一个人家里打工，她信了耶稣。后来，她的主人也信了耶稣。再后来呢，她就带她的主人去参加查经小组；她的主人到了查经小组才知道，这个菲佣是小组长。菲佣回到家里面，就当佣人；去到查经小组，她就带领查经。有意思哈！

我还听过一个台湾的基督徒的见证。他是一个军人，第一次来到教会。军队里面不是金钱的关系，而是政治权势带来的上下级的关系，等级要比公司更加森严，见到长官马上就得齐刷刷地敬礼，好像这里所讲的“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在军队的那个关系中，可能会表现得更加

的明显。台湾的军队里也是一样，等级非常森严。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忽然在教会中看见他的长官，而且他的长官那一天正在做接待。当他的长官看到他时，就把周报递给他。他一看是长官，就赶紧要向他敬礼，结果长官挺客气的，不像平常军营中见到的样子，反而好像下属一样，把周报递给他——“欢迎你来啊”。于是，他就经常来教会，他觉得教会真好；他就喜欢来教会，因为教会这里好像有一种不同的关系。他回到军营当中，见到他的长官，他还是敬礼；但是，他来到教会当中，他们就是弟兄——有他服侍的时候，也有他的长官服侍的时候。这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有的时候，这一种艰难，也体现在当这个士兵回到军营当中见到他长官的时候，他的尊敬、他的顺服会不会因着他们都信耶稣，都是这个教会的会友而削弱了呢？福音，会不会削弱这个士兵在军营当中对他信主的长官的顺服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蛮有压力的：要么在教会当中，你们的关系不够平等和友爱，因为你们带着世界上的关系；要么你回到军营的时候，你失去了敬畏和顺服的心，因为你觉得在主里面，你们都一样——干嘛他说话，我就得听呢！

其实，这是一种张力，一种旧生命、旧次序和新生命、新次序之间的张力。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张力，给出我们在这个张力和福音中的解决之道。

二、发自内心的顺服

我想请大家注意经文的几个地方。第一、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地方三次提到“你的心”。第一个在第五节，“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注意，他不是单单地要求你行为上的顺服，他要求你打心眼里听从你的主人，这是对你的动机的要求。要求你必须有一个外在的顺服，这个已经很难了；而且还要求你的这种顺服，必须是从内心中发出来的，这种顺服还得走心，这就更难了。第二个在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他再一次提到，不只是外面要去服侍他人，而且要甘心乐意，心里面还得愿意。主人说，你给我打水，我要洗脚了；你就打水过来，而且你心里面还得心花怒放。这个有点难为人哈。还有一个在第六节，“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保罗说，你们作为在职场当中的圣徒，不但要在外面的行为上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行，而且要从心里面遵循。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首先给我们的提醒是，他不是只要求一个外在的顺服。他回到了五章二十一节那里的总原则，就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罗12:2）的内在动机的改变。

所以各位，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在公司里面的工作，主首先不是说，你现在要如此这般地去行。主首先是说，现在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应该变了，你的动机应该变了，你里面的整个的心，要被福音所扭转。所以三次提到——心里的改变，心里面的顺服和心里面的遵守。

三、“像”——职场生涯基督化

第二、我要请你注意，在这一段里面还有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式，也出现了三次，就是“像”。你看保罗在第五节说：你们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听从的是你公司的老板，你部门的经理，但是保罗说这件事要像在听从基督一样。第六节再次说，“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而是作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说，你在公司里面听你老板的话，不是因为必须讨好老板，不是因为你希望讨好老板，而要“像”在讨好上帝一样，“像”在讨他的喜悦一样做这件事。第三处在第七节，“甘心事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保罗说，你在公司里面做事的时候，你是在服侍，要么服侍的是公司里面的上司，要么服侍的是客户或消费者。

保罗说这件事情，要像是在服侍上帝一样。你说，这个话我好像听过，叫做顾客就是上帝。我服侍顾客和客户的时候，好像在服侍上帝。请注意，这里有没有差别呢？顾客就是上帝，是把顾客本身当上帝——他是你的上帝。这句话的出现，应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见“上帝”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里听见的。那个时候，在中国社会里面，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听过有上帝。但是，以前的中国人同样会说这个话，只不过不会用上帝，因为这是基督教的用语。我们说，有奶便是娘，顾客就是娘，客户就是娘。这

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把对你有利的人当作你的神。顾客不是上帝，客户也不是上帝，上司也不是上帝，但是保罗说，服侍他们的时候，你要“像”在服侍上帝一样。你明白这个差异吗？他不是说你服侍的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上帝，把他偶像化，而是说你在服侍他的同时，你要知道还有一位是在场的，但是，他是另一位。在服侍一个看得见的人的时候，保罗说这件事要“像”在服侍另一位虽然看不见，但是在场的上帝。

四、职场关系的基督化

所以，这三个“像”就是“好像”，就是一件事情好像另一件事情，一个状态好像另一个状态。我把这三个“好像”，称为职场生涯的基督化。做一个职场圣徒的意思，就是职场生涯的基督化。一个活在福音当中的基督徒，在公司里面上班，这一生就有职业的生涯。保罗说，福音对你的职业生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要“像”。像什么？像服侍主，像作基督的仆人，像遵循神的指令，像耶稣基督就在你眼前一样。甚至让我这样说，就像王怡牧师、李子虎长老在讲台上讲道一样。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职场的圣徒，这就是最近五百年新教改革以来，我们常常所讲的职场工作的圣召——以神圣的呼召，来从事职场的工作；将职场的工作神圣化，就是要使整个职场生涯基督化。

职场生涯基督化有三个方面。第一点，职场上关系的基督

化，像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职场当中，福音要改变你的第一件事情，福音要更新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职场当中将平面的关系转化为垂直的关系。基督化的第一点，是关系的基督化，就是关系的一个转化。转化为什么呢？你们“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肉身的主人在哪里？就在我眼前，这个叫做平面化关系、水平面关系。要“好像听从基督一般”，那么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天上，他已经复活升在天上。所以，主要求你，把你的职场生涯的整个关系，要由平面关系变成垂直的关系。

这就是关系的基督化，我分享几点。第一，在这节经文当中，保罗一开始就说“你们作仆人的”。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先讲仆人再讲主人？同样，前面讲父母和儿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是先讲儿女再讲父母？在前面讲夫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是先讲妻子再讲丈夫？请你注意，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保罗在这个书信中先说“你们作仆人的”，然后说“你们做主人的”，表明什么呢？表明以弗所教会里面、会堂里面，坐满了主人和仆人。从一个角度来讲，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也盼望在你们这间教会当中，有老板和雇员，有官长和士兵，有公司当中最底层的工作人员，有公司最高层的工作人员，大家到了这里，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福音在以弗所教会中，已经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甚至让我们这样说，当时以弗所的这些家庭里都会有奴隶。在

任何一个场合，你都会看到奴隶在那里出现。你吃饭，旁边有奴隶要端菜，甚至你洗澡都有奴隶在旁边服侍你。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奴隶。奴隶是来服务别人的，奴隶并不是被关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奴隶是出现在任何一个场合里的。可是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主人和奴隶之间都有一个界限。你们主人在这里面聊天，然后仆人把一盘葡萄给你端过来。他们虽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但是绝不会出现这样一幕：仆人端来食物的时候，仆人也拿两颗来吃。这事不会出现。这事要出现，仆人就会被揍一顿。所以，他们虽然会出现在一个房屋里面，但是他们之间是完全被隔绝的。

当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对着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作仆人的，你们作主人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当中，仆人和主人不但同处一屋，而且他们已经打破了那个界限——待会爱宴的时候，主人和仆人都要一起吃。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一件事，因为保罗直接说，你们作仆人的，在以弗所除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之外，找不到第二个场合打破了社会阶级的身份区别。他们共同地在这里受教，他们共同地在这里唱诗，并不是主人在唱诗，仆人在旁边拿歌本，而是一起在唱诗，一起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他们也一起走到圣餐的桌前来领受圣餐。在以弗所教会，在人类历史当中，已经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奴隶和他的主人一同领餐。因为除了教会以外，奴隶绝不会和他的主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这是伟大的福音带来的一个更新。

第二、你注意这个词，“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听从主人就听从主人，为什么要加一个肉身的主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公司里面要顺服你们肉身的上司，为什么非要加个“肉身的”？什么意思？表明这个主人是暂时的、短暂的、有限的，不是至高的，也不是永远的。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你和他签了合同三年，就听从这主人三年。这就是“肉身的主人”的意思。在那个时代，不是三年，是一辈子；在你这里，肉身的表达在时间上是短暂的，他们那里是一辈子；但是，在保罗的眼光里，在永生的眼光下，那也是短暂的。同时，肉身的主人不涉及灵魂当中的权柄的，所以并不意味着，在心灵上，你低于他；在心灵上，你需要服从他；在心灵上，他要统治你。你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是一个平面上的关系，是一个短暂的人间的次序。所以，你听从这一个，遵循这一个人间的、短暂的、平面的秩序的时候，要好像在听从那永远的，那天上的，那掌管你身体灵魂的基督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工作没有被福音来更新，带来职场上上下级的关系，或者雇佣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的基督化；没有将你们的眼前的这份工作的关系从平面关系转化扭转为垂直的关系，换言之，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是在场的，但是基督不在你的前面也不在你的后面，不在你的左边也不在你的右边——他在你的上面，他在天上，那么，你的职场生涯就还没有基督化。

你虽然在一个公司，你在这个办公楼里面工作，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位神是超过这个屋顶的，虽然这里修得有屋顶，不过你可以想象这个屋顶相当于没有屋顶，是通天的，你的每一份工作都是通天的。这就是福音对你的职场的第一个基督化。

签合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你随时抬起头来，基督在上面。你要像听从基督一样地听从眼前的这一位，而无论他是谁。让我这样说，各位，如果福音没有带来你生命中的这一个关系的基督化，使你听从人就像听从主一样，那么你的工作就仍然只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在创世记第三章那里，上帝对工作的咒诅或者说是那个被咒诅的工作状态。你为什么工作呢？你信了耶稣，你为什么在职场上打拼呢？因为你汗流满面才能够得吃的，因为地里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如果没有在福音当中经历这个关系的基督化，你就仍然是背负着那个咒诅在工作。你即使顺服他，也是因为你不得不顺服他，因为你还没有做好辞职的打算，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代价太大——能忍一时，且忍一时，但是，你绝对不会心花怒放，你绝对不会从心里甘心服侍；因此，你也绝对不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身份的基督化。

五、身份的基督化

什么是身份的基督化呢？第六节说，第二个“像”，要像基督的仆人。这一个描绘比前面听到保罗呼唤你们作仆人的更加

的令人惊讶。第一个惊讶是说，原来教会当中居然奴隶和奴隶主都成为上帝的儿女，都在一起领餐，这真是一件在耶稣基督里，或男或女，或为奴的或自主的，或希腊人或化外人都成为一了，这是令人惊讶的。但这里的第二个令人惊讶的，你有没有记得保罗在他其他的书信当中，他常常怎样称呼他自己？基督的仆人这个称呼在其他的使徒书信里面通常是用来称呼谁的，或者称呼什么人的？让我说，主要是称呼我跟李子虎的，他不是称呼你们的，是不是这样？这个称谓在使徒书信的其他的地方都是称呼传道人的，是保罗的自称。保罗在所有的书信当中自称是基督的仆人。他说，他现在找到一份工作，但不是他找的是神呼召他的。他做了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叫做基督的仆人，福音的使者。

所以这个称谓，都是用来称谓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叫全时间的传道人的。但是在新约当中，只有在这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在这一个地方，基督的仆人，用来称呼一切职场上的基督徒，包括奴隶，包括看门的，包括农夫，包括园丁，包括工匠，包括一切的做卑微的工作的人，都在这里被称为，你们在你们的公司里面打工，你们在别人的手下干活，你们作为基督徒有一个职场上的追求。什么追求呢？不是追求钱挣得越来越多，不是追求职位越来越高，不是追求那一切的公司的奖赏，年终的分红。保罗说你们有一个职场上的基督徒的追求，就是追求成为基督的仆人。一家公司里面如果有了基督徒的职员，这家公司会蒙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会派人到这家公司当

中作基督的仆人。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身份的基督化——要像基督的仆人，这是世俗身份的一个转化。

福音更新基督徒的职场是将世俗的身份转化为一个神圣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有没有觉得你的工作是神圣的？无论你是做哪一份工作的，无论你在公司当中的职位是高或者低，你有没有因着福音，因着耶稣救赎了你？因为祂赐给了你永远的生命，因为祂带给了这个世界一个新的次序，因为他应允了未来的一个永远的新天新地，因此你开始意识到，认识到你现在所从事的那份工作是神圣的。这就是清教徒所讲的一天职。亲爱的弟兄姐妹，职场生涯的基督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你的身份，从世俗身份向神圣身份的扭转，你被称为基督的仆人。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他说，一个站在教会的讲台上讲道的传道人，和一个在家庭当中照顾孩子的母亲，和一个在工地上或者在农田里面种田的农民，可以是同样的神圣而尊贵的工作，可以同样是侍奉上帝的仆人。各位，明白吗？你哪怕是做一个清洁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清洁工，在我们母堂里是有做清洁工的弟兄姐妹——你在大街上扫地，马丁路德说，这份工作有可能，只是有可能哈，因为实际上的状态可能不是，有可能如同牧师站在讲台上，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道一样的，是整个宇宙当中神圣的一份工作，而且天使都会停下来观看，说：“看！这是基督的仆人”！我不知道各位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被福音更新，曾经有这样的体会。看到你的那一份工作，出于一份圣召，看你那一份的工作，是一份天

职，看你自己的身份，不是金钱的仆人，不是老板的仆人，不是肉身的主人的肉身的仆人，而是基督的仆人。在这里带出来一个非常惊人的观念，甚至对于教会来说，不只是全职的传道人是基督的仆人。原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仆人，也都应该在福音当中作基督的仆人。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换一份工作才能够做基督的仆人。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你想换一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工资有点低，因为怎么怎么样，我不是说那些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但是，保罗说有一个更合理的理由，有一个更高的理由，就是为了去做基督的仆人，而决定换一份工作。

你们当中有人因为要做基督的仆人而去找一份工作吗？你们当中有人因为要做基督的仆人而决定换一份工作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说福音还没有更新你的职场。可能你有十一奉献，你把金钱已经摆在神的面前；可能你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里面读书，你把这个儿女的关系也摆在上帝的面前了；你把你生命当中的婚姻家庭都拿出来给神，你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你的工作还没有拿出来给神，因为职场仍然是这个世界统治你的方式和领域。在你的职场，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哈，也许你有一个办公室或者在公司里面有一张桌子，是属于你的，你就再写一个“基督是我工作之主”，放在那里。基督不再是我家庭之主，不但是八小时下班以后回到家里面，基督是我家之主，终于回到基督的地盘了。而是在上班的时候，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基督掌管我的工作。你现在要干什么呢？上班是吧？

我来做基督的仆人。阿们！我盼望着在这间教会，恩约堂里面充满了在职场上的基督的仆人，充满了在职场上的圣徒，充满了在你们的手中，职场被更新的神圣的工作。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解这一点，我们讲过罗马或者是希腊的文化里面，有一半的人都是奴隶。那么同样，工作也会有区分，哪些工作是奴隶做的？哪些工作是主人做的呢？其实通常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呢，也比较相似，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奴隶所做的是体力活，主人呢，干的是脑力劳动。所以奴隶做什么呢？在罗马，在以弗所，卖菜的肯定是奴隶。修什么篱笆，拿着泥土捏个什么东西，或砌个墙，种个花，这些是奴隶做的。主人做什么呢？主人躺在那里，思想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哲学工作是主人做的，写诗、画画是主人做的，当然打仗也是需要这个罗马公民，因为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士兵的荣耀。奴隶也可以打仗，打仗是主人和奴隶都会干的一件事，但是，军官是只能主人做的。可是呢，在这样的一种希腊的文化下，甚至东西方的文化都是这样，当你去读创世记的时候，摩西讲述了一位非常惊人的创造的上帝，因为上帝在创世记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那里说，这位上帝怎么创造人呢？他用泥土造了一个人，然后吹气，向他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圣经创世记告诉我们，那一位创造的上帝是一位干活的上帝，那一位创造的上帝是一位做体力活的上帝，那一位创造的上帝不但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而且与这个物质的世界亲密接触。他不但创造了泥土，他还摆弄泥土。这位

创造上帝与他所创造的物质的世界、肉体的世界亲密的接触，甚至向用泥土所造的人吹气，不是吹风，是吹气。区别是什么，吹风可以隔得很远，吹气很近。有时候两个人说话，哎，你离我太近了，你吹的气都到我脸上来了。上帝向亚当吹气，上帝的气都到了他脸上，表明什么？表明亲密的关系。在圣经当中的那一位创造的上帝，做了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当中奴隶才做的工作。这一点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鼓励和安慰。更不用说在新约当中，那一位降生在马槽当中的耶稣，他不但与物质的世界亲密的接触，他不但触摸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他甚至亲自的来到，进入这个物质的世界，变成物质世界里面有血有肉的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当中，逃亡到埃及，行走在巴勒斯坦的大地上，又饥又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是奴隶的生活方式；他的整个传道的方式；是奴隶的传道的方式，不是哲学家的方式。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更新了你的身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21-23 节，我想请你们和我一起来读。你是作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阿们。各位你看这几句话，保罗的意思是说，奴隶信了主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做奴隶呢？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他好像一会说要，一会说不要。他最后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这是什么意

思？是不要在心里面做人的奴仆，是不要在你的生命的地位、你的灵魂上成为人的奴仆。但是呢，他又说你们蒙召是奴仆，那你就做奴仆，如果能够被释放成为自由民，那当然更好。但是如果不能，那就甘心乐意地继续做奴仆，所以福音在一个奴仆身上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是让他不再做奴仆，不再顺服肉身的主人吗？不是。福音给一个奴仆所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奴仆，就是可以做一个甘心情愿，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事人的奴仆，就是更新了他的一个身份，他原来不是人的奴仆，而是基督的奴仆。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们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用宝血的重价所买回来的，你们就不再是人的奴仆，甚至让我这样说，不是人的下级，不是别人的雇员。但是呢，你们却是主的奴仆，因着你们是主的奴仆的缘故，你们乐意，你们仍然可以去作人的奴仆，人的佣人，人的下属。但是这个却不影响你的属灵的自由。保罗在这里甚至说，你们做奴仆，蒙召信耶稣的，你们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主所释放的人的意思就是自由民，你们是自由的。他对着奴仆说，你们信了主，你们就是自由的，然后他对着教会当中的本来就是自由的人说，你们是自由的人，信了耶稣，你们现在是奴仆，你们是主的奴仆。

所以让我们回到今天来讲，如果你是打工的，那么保罗就说，你是打工的，你信了耶稣，你现在就是真正的老板，因为你是耶和華的产业，你不是受雇于任何人，你只受雇于耶稣基

督。然后他说，你若是一个老板信了耶稣，那你现在就是一个雇员，你现在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雇员。这是福音所带来的身份的基督化。

六、内容和标准的基督化

第三个“像”是内容或者标准的基督化，就是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像听从基督一样，这是内容或者是标准的一个基督化，你要不要听从老板的，其实就跟儿女要不要听从父母或者妻子要不要顺服丈夫一样，在本质上乃是听从基督，在本质上的乃是按着神的旨意，就是圣经的教导。因此福音带给我们的顺服，在某一点上表明了我们听从的这个主人，所顺服的人只是肉身的和暂时的，也表明了我们在本质上是基督的仆人，而不是人的仆人。这就是我们的顺服有一个超越的标准，这个超越的标准将构成对人间的命令，人间的权势的一个审视，他也会构成一个不服从的一个边界。那就是当你听从人的行为，不再是听从基督的时候，因为按着基督的意思，你不应该听从的时候，你就不再听从了。

妻子顺服丈夫的边界是什么？如果丈夫所发出来的，所做出来的决定，违背圣经的教导和基督的诫命，这个时候就表明了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乃是因着她顺服基督。这个时候她决不顺服，表明她在基督的面前，跟她的丈夫乃是完全平等的灵魂。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你没有办法在不能听从的时候不

听从。儿女顺服父母也是如此，如果从父母口中所发出来的命令，已经直接地违背了摩西的诫命，耶稣基督的教导，儿女就有责任和权利不服从。表明他和他的父母都是在灵魂上平等的，被耶稣基督重价所买赎回来的，那是表明他平时对他父母的顺服，乃是因着对上帝的顺服。同样，一个下属，一个雇员顺服听从自己的上司的一个边界，就是当你的公司发出一个直接违背耶稣基督诫命的命令的时候，你就有责任，也有权利不服从，从而表明你从来不是在作人的奴仆。无论怎样乖僻的主人，你都要听他的话，但是，这不是因为你是人的奴仆，是因为你是神的奴仆。在那个时候就表明出来，你是神的奴仆，不是人的奴仆的一个边界。这样，你职场的生涯乃是自由的，因为在内容上、标准上已经被基督化。但是，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那就是要冒着失去一份工作，失去一份利益的代价来显明你是自由的人。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因着良心的缘故，因着顺服基督的缘故，因着听从基督而不听从人的缘故，而曾经失去一份工作，而曾经决定换一份工作。因为那一份工作不能荣耀神，因为那一份工作里面，老板的命令直接违背上帝的诫命。他不愿意听从你，所以，你决定不再听从他。在 2008 年的时候，你知道在有一些地方，有很多的基督徒面临这样的选择。有很多地方的一些医生，有很多地方的一些教师，当然还有公务人员，都面对一个甚至不信教的承诺书——你是要这份工作，还是要你的信仰？

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讲，可能不是表现的那么冲突那么尖锐吧。但实际上，在今天中国的职场的环境下，我相信你们比我更加的有体会和经验。这样的信仰的争战，这样的善与恶的争战，听从基督还是听从人，随波逐流还是听从圣灵的声音？甚至这是日常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够做，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做，而是取决于这一个关系要被基督化，这一个身份要被基督化，这一个内容和标准要被基督化。取决于你要在其中，哎，这份工作非常的有前途，我觉得这份工作很好，这个空间很大。什么空间很大？就是在这份工作当中做基督的仆人的空间很大。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福音来更新你们在职场上的一种思维方式。求主帮助我们。有人说，什么时候信仰才是真正地充满了你的生命呢？就是当信仰改变一个人的钱包的时候，信仰才真正改变了这个人。因此，当信仰真正地改变了你的职场的时候，改变了你的职业择业的方式，职业的动机以及在这份职业当中全部工作的状态，包括你的心态与目的的时候，福音才真的改变了你这个人，因为福音开始改变你的钱包。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改变了你们的钱包了吗？福音改变了你们的职业了吗？福音正在把你们塑造成为在天府新区的一群职场的圣徒了吗？一群蒙神的呼召进入公司的圣徒吗？所以以前我们说，如果谁有这样的感动，谁在上帝面前有这样子的心志，要在自己的公司当中作基督的仆人，或吃或喝是为了基督而去工作，那你就来到教会里面，找你们的长老为你按

手祷告，差遣你进入那间公司。就像基督的精兵一样，不只是全职传道人，才是基督的仆人，你们都是基督的仆人。阿们！愿你们做基督的仆人，愿你们做基督在职场的精兵，做市井之间的圣徒。阿们！

七、最后的劝勉

最后呢，我想有一个劝勉。约翰·派博牧师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一个基督徒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或看待自己的这份职业的时候，应该要问的 12 个问题。我把它作为一个应用，来挑战福音对你们自己工作的更新：

第 1、在这份工作中，你可以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诚的，为上帝的荣耀而作，并彰显出上帝至高的价值远胜于一切吗？

第 2、选择这份工作是你追求圣洁的方式之一吗？

第 3、这份工作会帮助你还是会拦阻你把耶稣基督看为至宝？

第 4、这份工作是否会带给你过分的压力，使你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反对你的主耶稣基督？

第 5、这份工作能帮助你一生都积极参与成就神的大使命，在世界上所有尚未听闻福音的人当中高举基督吗？

第 6、这份工作值得你投入你全部的精力吗？

第 7、这份工作的活动和环境能塑造你，还是你能够改变这个环境，来高举基督彰显神的旨意？

第 8、你在这份工作中是否能做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为天父在众人中作光作盐，还是你的光会因着认同公司的价值观而熄灭？

第 9、这份工作的目标与你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不顾任何代价，公开彻底地让生命不断更新去委身于基督的人生目标一致吗？

第 10、当为永恒的未来做准备的瞬间逝去时，这份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说，还是一项好的投资吗？

第 11、这份工作符合你所相信自己被召和被耶稣基督所买赎的目的吗？

第 12、最后一个问题，这份工作与万物都是为基督而存在的终极真理相符合吗？

各位，我想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没有就自己的工作在神的面前来问这 12 个问题。盼望你们在神的面前来问这 12 个问题。

第八节那里，保罗提到一个跟职场非常相关的词，他说，无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这节把前后说你们作仆人的，和你们做主人的都结合起来了。你们所有的人，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各位，做工作上班，不就是

为了得赏赐吗？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你工作的目的是得赏赐，每个人上班都是为了得赏赐，年终有年终的赏赐，季节有季节的赏赐，每个月有每个月的赏赐。保罗在这里说，你们都要得赏赐，得主的赏赐。保罗在这里修改了成功的定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在你们的职场上能够得主的赏赐，阿们。愿你们在你们的职场上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阿们。如果在地上挣得多，在天上越来越亏空，多么可怜啊；如果在地上得到老板的赏赐、客户的赏赐，就不再有主的赏赐，多么贫穷啊！愿主帮助你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啊，你原本是做我们主人的，你却来到我们当中做我们的仆人。你亲自教导了那做主人的要怎么做主人，要怎么待人有恩，就如同你一样。你放弃了你自己做主人的权柄、尊贵；你没有偏待人，你没有威吓人；你甚至没有按着你的公义来审问我们，公平的夺走我们生命当中不应该再有的。我们亏缺了你这样的惩罚。你反倒是虚己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奴仆的样式。主啊，你的道成肉身，不但教每一个主人如何做主人，也教了每一个仆人怎么做仆人。你不但成为了所有卑微之人的安慰，你也成为了所有高贵之人的榜样。你教那高贵之人乐意降卑自己，你也教那卑贱之人在你的里面得着尊贵和自由。

主啊，愿你的创造之工和你的救赎之工，能够来更新你儿

女的工作的目的、工作的方式、工作的身份和工作的内容。主啊，我们也要在你的面前切切地祷告，因为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感到在中国社会这样外在的环境当中，似乎我们非常的艰难，难以去持守信仰，难以去抵挡黑暗污秽的职业的环境。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儿女在两千年来，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任何一个职业环境，甚至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之下都蒙你的恩典。这一段的经文，教导、鼓励、引导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知道怎么在你的里面、在福音当中去做仆人和主人，去做老板和做雇员，所以，就求主你特别地怜悯我们，使弟兄姐妹们在职场上不经历他们所承受不了的那样道德的压力，和那样一个来自魔鬼撒但的诡计和试探。主啊，救他们脱离凶恶，使他们能够在职场上作基督的仆人，不羞辱主的名，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主啊，使他们能够有勇气，愿意在职场上面为着侍奉你而舍己，为着侍奉你而愿意丧失自己在职场上的利益，是为要得着那天上的赏赐。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2018 年 12 月 9 日

| 编后语

尽管在王怡文库所收录的一千六百余篇文稿中，并未直接出现“公共神学”一词，但近年来兴起的这一神学概念，恰好契合王怡牧师回应公共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神学立场和教牧实践，作为对其公共神学的初步整理与回应，我们特别选编了本纪念文集：《看得见的山上之城——王怡牧师公共神学分享会纪念文集》。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一名，沿袭我们以往以王怡牧师作品标题命名纪念文集的传统。这个标题选自王怡牧师发表在《杏花》杂志 2010 年秋季号的同名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教会（堂会）就是那看得见的山上之城，是基督徒群体的公共性记忆和形象。

文集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旨在勾勒出王怡牧师从公共知识分子向公共神学家逐步转变的轨迹，呈现其神学思想在教牧实践中的深化与发展。

全书共收录王怡牧师四十二篇作品，体裁涵盖文件、讲座、访谈、书信、随笔、影评、牧函、证道与诗歌等，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艺术、

宗教、婚姻与教育等公共议题，展现出其神学的独特看见和牧养的深切负担。

本书的出版，既是一次整理与纪念，更是一个激励和呼召。我们深知，这不过是关注王怡牧师公共神学的起点。

愿那“看得见的山上之城”，因着更多的学者、牧者和弟兄姊妹对公共神学的关注、研究和实践，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王怡文库编辑部

二零二五年五月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王怡牧师公共神学分享会纪念文集

作者:王怡

编辑:王怡文库编辑部

出版:秋雨圣工

时间:2025年6月(电子版)



秋雨圣工
EARLY RAIN MINISTRIES

一家与受逼迫的中国家庭教会同行
和被捆绑的基督福音使者同工的机构

秋雨圣工的项目



王怡文库
WANGYI RESOURCE LIBRARY



王怡文库
YouTube Channel



中国的下午五点钟
— 5PM IN CHINA —



中国的下午五点钟
YouTube Channel

加入我们，与我们同工；
支持我们，与我们同行。

联系方式 earlyrainministry2020@gmail.com